

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意外的聖地： 陝甘革命的起源

周錫瑞

石岩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Joseph W. Esherick

open access

本書電子版為開放取用圖書，在遵守相關授權條款的前提下，公眾可以免費閱覽、下載和傳播。開放取用電子書的出版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資助，特此致謝。

建議引用格式：周錫瑞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2245>

This book is freely available in an open access edition thanks to funding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It may be read onlin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a Creative Commons (CC-BY-NC-ND 4.0) license.

Suggested citation: Esherick, Joseph W., trans. Shi Yan, *Yiwai de shengdi: Shaan-Gan geming de qiyuan* (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1. 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2245>

意外的聖地

周錫瑞是一位實事求是的傑出史學者，他的《意外的聖地》為「歷史的偶然性」(contingency)提供了一個精彩的詮釋。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周錫瑞研究辛亥革命和義和團運動後，又以地方社會經濟史的角度觀察和分析1940年以前陝北地區的革命史，而且把視野推到清初的李自成起義和清中葉的回民起義，認為陝北共產革命迥非單純內部結構的必然產物，而是不同層次內外因的複雜互動，而且充滿歷史偶然性。要不是毛澤東在1936年偶然看到關於陝北共黨力量的報道而決定前往會師，陝北革命可能胎死腹中，陝北也決不可能成為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革命的總指揮部，更不可能成為今天紅色中國的革命聖地。周錫瑞的地方研究清楚揭示，宏觀和短時段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存有簡單化歷史和歷史必然性的陷阱。其流暢的歷史敘事，建立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更具有引人入勝的魅力。

——**陳永發**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周錫瑞教授是美國知名的中國現代史家。自1960年代至今，他的學術生涯和研究興趣，一直都環繞着中國革命史。從尋找20世紀初兩湖地區革命的淵源，到探析清末民初山東及華北的義和團與農民革命，再到本書所聚焦的20世紀西北地方的共產革命，從不同的層面對中國社會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本書集中研究的是西北陝甘寧邊區，包括後來成為「聖地」的延安。作者運用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檔案，也走訪多個縣和村，本書可以說是檔案研究及田野考察結合的成果。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許多中國史家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有其必然性，是歷史發展的規律；而以貧瘠農民為背景的西北正正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孕育延安聖地。本書作者持不同看法，認為歷史發展中有很多偶然性，造成意料之外的結果。作者沒有提及的另一個意外，是共產中國崛起於最貧窮的地區，百年之後竟把中國建成世界強雄，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這也是許多史家的意料之外吧！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前院長、歷史系研究教授)

在中國有很多「革命聖地」，但沒有一個地方像延安那樣，既是失敗的蘇維埃革命的救命之所，也是中共通向1949年勝利之路的起始之地。許多年來，人們高度重視中共是如何從延安出發走到北京的，卻很少人關注過一個問題：為甚麼當年所有蘇區都已不復存在，陝北卻還殘存着這樣一塊恰好可供中共中央落腳的蘇區？周錫瑞教授的大作很好地解答了這個問題。

——楊奎松（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周錫瑞教授此著以紮實的材料和強有力的敘事，呈現了中國革命史中的偶然性——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確是「意外的聖地」。其歷史源流、特質與運作方式，及形塑了今日中國的種種遺產，在周錫瑞筆下均有精彩紛呈的剖析。

——齊慕實 Timothy Cheek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院金庸講座教授）

延安並不是毛澤東「長征」的目的地。紅軍彷徨四方之後，歷盡艱辛走到陝北，得到了延安這座小城。稍微冷靜地思考一下就會理解，陝北地瘠民窮，容納眾多紅軍士兵難處極多，不可能是中共中央最後的棲身之所。那麼，延安後來為何成為了革命聖地？長期被掩埋的陝北革命家的心聲，越過三十年時光，經周錫瑞教授的介紹，終於復蘇。

——石川禎浩（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意外的聖地

陝甘革命的起源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著

石 岩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校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封面圖片：

彥涵，《開展民兵爆炸運動》(套色木刻)，1940年(©彥東)

《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

周錫瑞 著

石 岩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校

© 香港中文大學 2021

2021年第一版

2024年第二次印刷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88-237-224-5 (精裝)

978-988-237-934-3 (電子書)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 · 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 (in Chinese)

By Joseph W. Esherick

Translated by Shi Yan

Edited by Editorial Divis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224-5 (hardcover)

978-988-237-934-3 (ebook)

First edition 2021

Second printing 2024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本書電子版採用創用CC授權條款 CC-BY-NC-ND 4.0，提供免費閱覽和下載，
具體使用條款請參見：<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The digital edi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downloaded and shar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ative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BY-NC-ND 4.0).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is license, se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DOI: <https://doi.org/10.978.988237/2245>

獻給母親及葉娃
——兩位非凡的女性

目 錄

中文版序 | xiii

致 謝 | xv

前 言 | 1

第一章 歷史淵源 | 25

古代的邊疆 | 29

清朝治下：和平降臨，元氣恢復，貧困依舊 | 33

貧困的文化 | 37

造反 | 48

平叛 | 57

回亂之後 | 60

帝國的終結 | 65

第二章 陝西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 71

五四和新文化運動 | 71

改造落後省份 | 79

馮玉祥和陝西的國民革命 | 92

黨開始獨立鬧革命 | 100

成為列寧式政黨 | 112

第三章 土匪和布爾什維克 | 121

劉志丹與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 122

謝子長 | 136

省黨部裏的問題 | 145

三原和渭北根據地 | 154

紅二十六軍的崛起 | 162

第四章 革命的崎嶇之路 | 181

南梁和紅二十六軍 | 184

變化中的政治環境 | 189

謝子長歸來 | 193

劉志丹和謝子長：對手和盟友 | 202

國民黨的圍剿與紅軍的應對 | 212

劉志丹在「陝北」 | 217

黨取得指揮權 | 229

革命與反革命 | 237

第五章 意外的聖地 | 249

黨中央來到陝北 | 252

陝北的新領導人 | 261

東征：長征的繼續 | 268

艱難時世 | 274

統一戰線的多重面相 | 279

向世界打開一扇窗 | 292

爭取蘇援的最後一次嘗試 | 299

在西安得救 | 309

第六章 延安時代的開端 | 317

重啟西安停戰協議的談判 | 318

抗戰前夜的陝甘寧邊區 | 326

戰爭和統一戰線 | 335

劃定邊區的邊界 | 338

新政權 | 356

結語 | 379

受訪者簡介 | 401

參考文獻 | 403

索引 | 421

中文版序

美國沒有黨史研究，學者們視中共革命史為更宏闊的20世紀中國革命進程的一部分。從上世紀中葉開始，闡釋共產主義的興起就成為中國研究的一大焦點。專家和記者探討了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如：農民革命的起因、中國專制統治的歷史、蘇聯對世界反帝運動的影響，以及中國共產黨在駕馭民族主義上獨一無二的能力。學者們則提出了諸如「農民民族主義」之類的理論解釋，研究中共的大眾動員策略，梳理毛澤東崛起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探討中共革命特殊的運動方式。但在改革開放為革命年代畫上句號之後，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革命的研究漸漸失去了關注。

1990年代之後，研究近現代中國的西方學者大多轉治民國史或共和國史。大陸和台灣檔案的開放是一大原因；城市史、包括電影和戲劇研究在內的文化史、女性史及勞工史的興起都促成了這種轉變。檔案文獻、報刊史料、口述材料都把歷史學者的注意力引向城市，遠離革命史的禁區。與此同時，經濟的增長，小康社會的建設，以及社會風尚的改變都將中國的民眾引向「與國際接軌的」新的現代化，革命已逐漸成為歷史，對於理解當代中國似乎已不那麼重要。

海外中國研究的上述趨勢，使本書更大程度上是為中國讀者而非美國讀者所寫。在開展此項研究的幾十年中，我在中國所做的報告遠多過美國，砥礪交流的學者也多在中國，並時時向中國的黨史研究者尋求建議、與他們討論材料。在寫作的時候，我心中的目標讀者是中國同行。正如讀者很快將看到的，我追隨革命史領域一流中國學者的做法，傾向於採信同時代的文獻而非回憶性的陳述，並盡可能一絲不苟地記錄何事、何時、何地、如何以及（如果可能的話）何故。我奉行的原則很簡單：實事求是。

此書的出版恰逢中共建黨百年紀念。中國上上下下都被號召學習黨史。此舉是完全必要的，值得稱許，因為中共是歷史上在大國執政時間最長的共產主義政黨。中國的崛起在現代世界史中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有必要理解這種崛起的緣由。正如中國的領導人所言：「我們一定要牢記紅色政權是從哪裏來的。」中國的「革命聖地」之一——延安，無疑是紅色政權的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它是「中國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的地方。本書即旨在理解中國西北一隅革命運動的起源。

如我所說，本書主要是寫給中國讀者的，它是一部中國革命史，但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黨史。作為一名以中國近現代史為專業的學者，我寫過關於辛亥革命和義和團的專著，對大規模社會運動及其所發端的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特別感興趣，尤為關注孵化革命運動的具體的地方環境。具體到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也就是陝北在20世紀初所面臨的種種特殊的歷史條件。因此，我的關注點有別於傳統黨史：我沒有做歷史評價的義務，也無意評判某些政策或領導人的是非功過。最後，如讀者將會看到的，我深信，各種具體因素的疊加，甚至一些偶然性因素，在決定歷史走向的緊要關頭曾發揮巨大的作用。這是我將延安稱作「意外的聖地」的用意所在。希望這些來自外國學者的見解能夠小有貢獻，增進我們對中國革命的共同認識。

致 謝

在這項三十多年才做完的研究中，我欠下的人情不是這篇簡短的致謝所能一一覆蓋的。開始研究時，我對共產革命的歷史，對中國西北或陝北的地理條件和社會構成都所知甚少。遺憾的是，我這些年的日誌對旅行、訪談及觀察的記錄總嫌不夠完整，那些曾經對這項研究中的人物、事件、地理與諸多細節給予啟發的人已經散失在時間的塵埃和我這位年邁的中國學者日漸消退的記憶中。我用了太長時間研究中國西北革命運動的起源，曾有許許多多人給過我幫助，而此處我只能以粗略的方式表達感激，且難免有不少遺漏。

通常，作者會在致謝的結尾處由衷但隨意地表達對配偶或家人的感謝。但此書頭一個要感謝的是我的妻子葉娃。她對陝北的了解來自文革期間的插隊經歷、在西北大學的求學歲月和在西陝考古所的工作經歷。沒有她的背景、她對陝北的了解和她的廣泛人脈，此項研究絕無可能實現。在我們婚後的大部分時間裏，她不得不把這個項目作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年裏，她的耐心、堅韌、優雅和給予我的支持非我用語言能夠表達萬一。女兒周文姬 (Lisl) 和兒子周斌 (Chris) 曾與我們生活在西安，共同經歷了那段值得紀念的歲月；並在此後多年中忍受他們的父親埋首於教學及此書的撰寫。

在本項目起始階段，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曾給我以資助。我尤其要感謝羅伯特·蓋爾(Robert Geyer)和林培瑞(Perry Link)的幫助和支持，特別是在1989年6月4日之後，美國國務院命我離開中國，而我從西安避至陝北之際，兩位幫我尋找了變通之道。在西安，我名義上的訪問單位是陝西社會科學院，但在它不予幫助、反施阻力的時候，社科院下屬機構——陝西考古所的所長石興邦先生向我提供了後勤及其他方面的重要支持。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徐氏中國研究基金(Hsiu Endowment for Chinese Studies)為後來的研究給予了資助和支持。隨後的陝北之行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延安大學的幫助下得以成行。十餘位中國受訪者的口述歷史對重構革命年代的陝北生活價值非凡。本書書末列出了他們的背景簡況。

多年來，本書的檔案研究有賴於以下諸多機構的幫助：台灣中統調查局檔案特藏室及國史館；大陸的陝西省檔案館、米脂縣檔案館、神木縣檔案館、延長縣檔案館、榆林地區檔案館、志丹縣檔案館；美國胡佛檔案館。這些檔案館的專業人員都曾向我提供幫助，我當向他們表示感謝。陝西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圖書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圖書館也曾提供重要文獻，我尤其要感謝聖地亞哥分校圖書館的程健和伯克利分校圖書館的何劍葉幫我查找稀見史料。金之夏和招淑英搜集了第一章用到的關於人口、科舉考試和教育等方面的數據。

多年來，本研究的部分內容曾在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劍橋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科羅拉多大學、哈佛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延安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的講座或研討班上與學界交流，也曾受惠於本書的出版機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組織的線上討論會。在這些討論會上，學界同行都以多年的深入思考及研究參與討論，並對我的工作

做出評議，對我而言，這都是極寶貴的意見。要一一列出這些曾給我建議和批評的學界同行得好幾頁，況且我本人對於向這些學者們公開道謝也顧慮重重。然而，我仍然要向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前同事們表示感謝，尤其要向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和我在該校任教的二十餘年間所帶過的諸位研究生表達謝意。這些研究生在理解中國各個層面的複雜性上有着不懈的追求，並以鍥而不捨的發問迫使我省視思考上的桎梏。他們的研究領域豐富而多元，我只能勉強跟上，這有可能拖慢了此項研究的進度，但無疑使其更加豐富。

就本書中文版而言，石岩提供了出色的譯稿，盛差偲在查對並還原引文方面表現出非凡的能力，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陳甜絕對是我學術生涯中所見最敬業認真、並提供最多幫助的編輯。她和盛差偲發現及訂正了引文及歷史細節方面的錯誤，避免了硬傷。感謝何浩教授設計了精美而富有穿透力的封面，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其他工作人員傾力為中文版提供專業支持。最後，我要感謝繪圖師們——哈佛大學的胡濤、北京的賈小新和台灣的廖泮銘，他們根據我不完整且變來變去的指令為本書繪製了地圖。不消說，目前本書在翻譯、文本和地圖上尚存的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前言

延安是中國的「革命聖地」。中國共產黨正在倡導「紅色旅遊」，宣傳「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延安就是目的地之一，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遊客前來參觀。¹他們在這裏瞻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抗戰期間住過的窯洞，走進宏偉的延安革命紀念館接受官方版本的根據地歷史教育。曾經的中共陝甘寧邊區覆蓋陝北十八縣、隴東六縣和寧夏一縣，首府就設在延安。從1935年抵達到1948年離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陝北。他們把這裏變成了中國革命的「搖籃」。在延安，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群眾路線、自力更生和新民主主義理論，給美國貼上了「紙老虎」的標籤。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延安這個大熔爐裏鍛造成型。

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1935年到達陝北的時候，他們不可能想到陝北會有如此輝煌的未來。事實上，他們曾絞盡腦汁，想要

1 “China Boosts ‘Red Tourism’ in Revolutionary Bases,” *China Yearbook, 2003–2004*.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government/120838.htm> (viewed 2020.4.28).

逃離這個乾旱、貧瘠的落後地區，轉移到更富庶的陝南或華北平原，甚至希望到中蘇邊境去找一塊安身之地。延安以及後來的陝甘寧邊區能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完全是個意外。共產黨在陝北的革命史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我們的敘事要從頭展開，陝北大地幾個世紀以來叛亂頻生，地方社會反覆遭受乾旱、饑荒、移民以及土匪的滋擾。一些心懷理想的年輕知識分子，從生吞活剝的馬列主義思想中看到了希望，走上了革命之路，其間有慘痛的失敗，有錯失的機會，也有代價高昂的勝利。早在1935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前，在陝北的小山溝裏就已經有所謂的「共匪」在打游擊戰了。本書所書寫的就是他們的革命史。在這齣革命大劇裏，演員紛繁登場、時生齟齬，佈景變幻不斷，也發生了一連串機緣巧合的事件。所發生的一切並非必然，也沒有一條既定的革命道路，不過，何以如此，我們還是能加以解釋。

陝北的革命運動聲勢雖小卻不屈不撓，當其成長之時，在約1,500公里以外的南方，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離開了江西蘇區，開始了那場後來被稱作「長征」的艱苦撤退。途中，毛澤東的部隊減員90%，抵達陝北時，僅剩下七千士兵，而且裝備簡陋。十年過後，抗戰結束，共產黨旗下已有百萬雄兵。毛澤東1948年離開陝北後不過一年有餘，他手下的人民解放軍就在與國民黨蔣介石的內戰中取得勝利，進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抗日戰爭期間，延安成為進步青年的聖地。他們一腔熱血，渴望逃離陳腐、墮落、保守的國民黨政權，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將是一個能夠代表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愛國者利益的新政權。他們投入延安窯洞裏簡樸的集體生活，在抗日軍政大學接受訓練，成為敵後游擊區的合格幹部。在抗大，他們聆聽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普遍萌生了一種新的信念：在延安，他們看到的是孕育未來中國的種子。他們的想法沒錯。

在江西蘇區的最後幾年，毛澤東的境況頗不如意。他的福星是在長征途中升起的。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陝北採訪他的時候，毛澤東已經成為世所公認的中共領袖。那些日後將被稱作「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主要是在延安時期寫的：〈實踐論〉(1937)、〈矛盾論〉(1937)、〈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此外還有文革期間所有中國學生都要背誦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1944)、〈紀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²抗日戰爭快結束時，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思想正式寫入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延安標示着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時代真正的開端。

關於延安時期已有豐碩的研究。最早的英文著作聚焦於毛澤東在延安撰寫的一批影響深遠的文章。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終其一生，細緻入微地挖掘毛著述的原始版本，並探討了其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³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毛如何樹立起自己的理論權威，以抵銷王明的影響力。這位1937年才從莫斯科歸來的書呆子氣十足的年輕人是當時毛最重要的對手。此後其他學者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毛澤東著作的「師承」及理論班底的理解：毛的很多理論出自對斯大林論述靈活而大膽的借用。⁴我

-
- 2 官方英文版見*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1); 原文譯本見Stuart R. 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7 vols. (Armonk: M.E. Sharpe, 1992–).
 - 3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o Tse-tung*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7).
 - 4 Raymond Finlay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shua A. Fogel, *Ai Ssu-c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7).

們已逐漸認識到，儘管毛在內心深處是民族主義者，但他仍然把中國共產黨視作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關於中共和蘇共之間長期而複雜的合作/衝突這一主題，已經有很多出色的研究，以細緻和高明著稱的中國歷史學家楊奎松的貢獻尤其值得注意。⁵

後來者研究陝甘寧邊區，都繞不開馬克·塞爾登 (Mark Selden) 的開創之作《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塞爾登對陝甘寧邊區的「群眾路線及平等主義價值觀」(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egalitarian values) 進行了充滿同情的描述，並將其定性為「人類自由與發展的願景」(vision of liberation and human possibility)，儘管這一觀點遭到很多人批評，但對於陝甘寧邊區的研究，塞爾登的著作仍不失啟發意義。關於陝北革命運動如何從當地的「土匪亞文化」脫胎而出，塞爾登給出了最好的敘事。根據他的描述，土地革命為一種新的秩序創造了前提，令當地幹部投身於斯巴達式的生活與革命事業。他還分析了新政權如何通過選舉、動員群眾墾荒、思想改造等手段推行一系列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塞爾登後來也承認，他的一些看法，尤其是關於整風運動的，太過樂觀，不過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要觀點。⁶

5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相關英文著作參見 Alexander V. Pantsov 與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Michael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較早，說服力略遜一籌。

6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E. Sharpe, 1995), 引文來自 1971 年版 p. vii。塞爾登的一批文章對陝甘寧邊區的起源也有很好的梳理，不過限於 1960 年代能掌握的史料：“The Guerrilla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Shensi-Kansu-Ningsia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28 (October–December 1966), pp. 63–81; and 29 (January–March 1967), pp. 61–81.

彼得·席蘭(Peter Schran)對陝甘寧經濟發展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支撐、印證了塞爾登關於陝甘寧邊區的積極評價。席蘭認為，陝甘寧的經濟發展「有效滿足了共產主義運動和邊區廣大人口的基本需求」。⁷紀保寧(Pauline B. Keating)也曾對大生產和互助合作運動進行過詳盡的研究，啟發人們注意陝甘寧邊區內社會經濟的地區性多樣化，其間的種種差異在許多重要方面影響了本書的敘述。⁸朱鴻召的著作生動講述了延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時間和金錢，舞會、戀愛、蝨子、大膽的年輕女性和被強迫的政治婚姻，以及政治對日常生活和私人領域的不斷侵佔。⁹

陳永發是一位在美國接受過學術訓練的台灣學者，他關於中共歷史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是數一數二的。陳曾專門就塞爾登的研究提出批評意見。他對邊區的鴉片種植做了深入研究，提出：「沒有鴉片貿易，馬克·塞爾登在陝甘寧邊區發現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可能。」¹⁰陳所使用的文獻僅僅提到了「土特產」，但他認為此即鴉片，邊區通過向外界輸出鴉片獲得購買藥品和其他重要物資的現款。陳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也意味着席蘭關於陝甘寧邊區經濟政策的正面評價有待商榷之處。1989年我在陝北搜集檔案、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關鴉片的話題是被絕對禁止

7 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6), 引文來自 p. ix.

8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0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p. 264.

的。不過，罌粟的種植和鴉片出口當時在陝北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一些老農講着講着就不顧地方幹部緊張的眼色，毫不猶豫地承認了。

關於1942至1943年整風運動的一系列研究構成了對塞爾登研究的重要挑戰。毫無疑問，在把全黨團結在毛澤東身後以及用紀律約束異見者方面，整風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塞爾登指出，整風運動的必要性在於，當時中共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敵後的抗日游擊戰中，需要將黨的紀律與地方能動性結合，但用常規的行政管理手段很難實現。他也提出，從延安到文革，毛依賴政治運動影響社會和政治進程的思路一以貫之，這是毛時代政治的重要特徵。¹¹然而，文革之後，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已非常明顯，由此出現了對整風運動截然不同的分析視角。

在其早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彼得·希伯爾 (Peter J. Seybolt) 強調，對恐懼有意識的利用可以促進知識分子和下級幹部的思想統一。¹² 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一書直接挑戰了塞爾登關於延安道路玫瑰色的解讀。陳首先注意到整風運動中不同尋常的過頭現象，這場運動從政治學習轉向審幹，最終發展成「搶救失足者」的瘋狂運動，一批忠誠的幹部成為打擊目標。¹³ 中國大陸的高華勾勒了一幅與此相似的圖景，他強調了毛對於整風運動特殊的責任——意在通過這場運動打垮黨內的競爭者，高華還將整風運動與上自蘇區時期、下至文革中共黨內持續不斷的血腥清洗聯繫在一

11 Selden, *Yenan Way*, pp. 188–200; 亦見 Boyd Compton, e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s on Asi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pp. xv–xxxiv.

12 Peter J. Seybolt, “Terror and Conformity: Counterespionage Campaigns, Rectification, and Mass Movements, 1942–43,” *Modern China* 12, no. 1 (January 1986): pp. 39–73.

13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起。¹⁴ 泰維斯 (Frederick C. Teiwes) 在一項重要的研究中，考察了毛時代中國特有的整風運動在延安的起源，以及整風如何在1949年之後變本加厲地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¹⁵ 上述研究均發掘了重要的新材料，揭示了整風運動複雜的政治態勢以及深刻的心理影響，並對我們理解延安在毛時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扮演何種角色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啟示。

因其方法論上的推進和概念之精微，大衛·阿普特 (David E. Apter) 和托尼·賽奇 (Tony Saich) 的著作《毛時代中國的革命話語》最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整風運動的理解。在阿普特和賽奇之前，沒有人接觸過那麼多整風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和受害者，兩人搜集到的口述材料和賽奇對於中共歷史無與倫比的了解，以及阿普特在概念層面的重要洞見相得益彰。儘管他們的研究偶有史實硬傷、有些言過其實，且過於理論化，但瑕不掩瑜，他們的著作仍雄辯地勾勒出整風運動所塑造的「話語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 和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主流革命敘事」。更重要的是，他們勾勒出「查經式親密化」(exegetical bonding) 所造就的那種近乎宗教的體驗。所謂「查經式親密化」即黨員在經過曠日持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根除過去的私念後，方能作為新人被黨組織重新接納。在這個過程中，阿普特和賽奇一方面注意到整風與宗教裏的查經儀式的類似之處，另一方面也強調蘇共斯大林式的方法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

14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近期推出了英文版：*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 translated by Stacey Mosher and Guo Jia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9)。

15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i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3)。

共的重大影響，對此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模式做出了重要調整。¹⁶

上述研究無不說明作為「革命聖地」的延安有着怎樣的深遠意義，它催生了一系列理念、實踐以及模式，形塑整個毛澤東時代並影響着時至今日的黨的政策。當然，如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的，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情況極為特殊。陝甘寧邊區是中國西北角一塊偏遠的根據地，遠離日軍封鎖線並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默認（不管多不情願），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黨的權力在這裏完全不受限制，這是所有其他根據地都無法企及的。更重要的是，戰時中共實力的大規模擴張恰恰是在其他敵後根據地實現的。因此，曾有學者提出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觀點：中共成功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應該從陝甘寧以外其他根據地尋找。¹⁷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陝甘寧的經驗與其他敵後根據地的演進確實無法相提並論。對本書將要展開的論述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

16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查經式親密化」一詞譯文蒙托尼·賽奇教授指正，謹此致謝。——譯者註。

17 持此觀點的學術研究難以一一枚舉，但其中最重要的著作無疑包括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M.E. Sharpe, 1989); Saich and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延安的情況等同於陝甘寧邊區其他地方的情況。延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來者佔據，有隨長征隊伍到來的紅軍老兵，也有以愛國抗日為目的、從沿海大城市投奔此地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然而，如果沒有根據地周邊的拱衛，延安革命將無從談起。延安之所以成為「革命聖地」或者（借用阿普特和賽奇的術語）毛所塑造的「革命擬像」（revolutionary simulacrum），恰恰因為它也是陝甘寧邊區的中心和首府。本書所要講述的就是建立邊區的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的研究興趣一直聚焦於造反和革命等社會運動。從辛亥革命、義和團，再到對1989年事件的研究，我一直致力於理解導致平素安常守分的人們起而抗議的社會經濟因素，和使得這樣的抗議行動獲得動力乃至成功的政治、軍事格局。¹⁸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裏都忙着維持生計、養家糊口、照顧老人。跟鄰居拌個嘴，跟領導甚至政府官員吵個架也都稀鬆平常，但這樣的糾紛很少會演變成大規模抗議。有些情況下確實會爆發抗議，但鮮少發展到推翻政府的程度。最罕見且因之引發學界強烈關注的，是那些造成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根本性變革，由抗議發展而成的革命。我在1960年代步入學界，親歷了美國的反越戰抗議，並受到諸如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等比較研究巨著的啟發。¹⁹像我這一代的很多中國學者一樣，我為那場被稱為中國革命的天翻地覆之變因何發生而深深着迷。

-
- 18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Joseph W. Esherick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 (November 1990), pp. 835-865.
- 19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越戰期間，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由農民重塑世界的時代。從中國到越南，從古巴到尼加拉瓜，農民在抵制帝國主義和階級壓迫上扮演著領導角色。長久以來，農民社會因無可救藥的落後與保守而遭到輕視，現在卻改頭換面為革命的溫床。農民曾被馬克思譏為「一袋馬鈴薯」——拒絕集體行動並常常被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對立面的那些保守分子所利用，現在馬克思的觀點完全被20世紀革命的實踐顛倒過來了。²⁰ 農民革命在學界風靡一時，而中國則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大學講授相關課程時，這方面的比較研究或理論文本讓我兼受啟發和挫敗。在《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一書中，埃里克·沃爾夫(Eric R. Wolf)指出了「戰術靈活的農民」的重要作用，而傑弗瑞·佩吉(Jeffery M. Paige)則在《農業革命》一書中指出了「佃、僱農制度與共產主義革命之間的普遍聯繫」。²¹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農民的道義經濟》有廣泛的影響力，不過他關於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瓦解了農村道義經濟一說似乎並不能解釋內陸地區的共產主義革命。²² 塞繆爾·波普金(Samuel L. Popkin)的

20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p. 124–125.

21 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Jeffer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引自 p. 63. 「戰術靈活的農民」(tactically mobile peasantry)，由擁有土地、自給自足的「中產農民」，及身處地主控制地區之外的「邊緣」農民組成，他們被視為「擁有某些內在優勢」和面對大土地主時「微弱的戰術自由」。「沃爾夫視之為革命的主要承擔者，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造成的變化最為敏感，而他們最倚賴的親緣及村莊關係正是在上述變化中遭到破壞。」參考：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91; Jeffery M. Paige, “Social Theor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Vietnam and Guatemala,”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pp. 699–737. ——譯者註。

22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理性的小農》一書挑戰了斯科特的理論，用「政治企業家」這一範疇來強調地方幹部的作用，不過很少有亞洲學者認為可以將其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套用到本地區農民的行為模式上。²³

當歐美學者致力於比較研究的時候，中國學者則以「農民戰爭」為題寫出了大批論著。「農民戰爭」這個詞顯然來自恩格斯關於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他們認為，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民造反是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先聲。²⁴ 歐美的中國學者往往發現，他們所做的案例研究與中國的學術成果和既有的理論框架都不相容。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一書中，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發現淮北的捻軍起義和共產革命之間並無連續性，相反卻有着明顯的斷裂。²⁵ 畢仰高 (Lucien Bianco) 一生研究中國農民的抗議行動，他的結論是農民造反很少出於地主對佃農的壓迫，更多是對抗官府的徵收無度。²⁶

23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政治企業家」 (political entrepreneur)，指的是「願意投入自己的時間和資源，協調其他人的投入，以推動集體行為或生產集體商品」的人，波普金特別指出：「當一位農民在計算個人的成本和收益、投入和預期產出之時，會對他要聽命的組織者——『政治企業家』的信譽和能力做出主觀估計……農民的這種主觀估計將直接影響到該『企業家』組織農民的能力。」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p. 259. ——譯者註。

24 See Frederic Wakeman,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The Study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2 (1977), pp. 201–237.

25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6 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M.E. Sharpe, 2001); Lucien Bianco with Hua Chang-ming, *Wretched Rebels: Rural Disturbances on the E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rans. Philip Lide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關於中共革命的研究揭示，各地起作用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態勢千差萬別，很少能與現存的理論框架和比較研究完全吻合。²⁷

在對農民社會及集體行動的興趣之外，本書的學術宗旨也受到另一種研究取向的影響。我合編過一本《中國地方精英與支配模式》，²⁸中國大一統政治體制之下的地方社會結構之多元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理解政治一統與社會多樣性相互作用的多種方式，我開始研究地方史，而我所關注的區域也不斷變化。做辛亥革命研究時，我關注的是湖南和湖北；研究義和團時，我的目光轉向了華北平原；現在因研究中共革命，又轉向了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很多學者自始至終在某一熟悉的地區耕耘，研究越來越精深，而我則深恐自我重複和收益遞減，所以不斷轉向新的地區。

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我也覺得有必要集中視野，試着做一些我最欽佩也最感興趣的微觀社會史研究。《改良與革命》比較了軍人在湖北領導的辛亥革命和士紳在湖南領導的改良。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中，我的視域從省進而聚焦於縣，由此發現了孕育大刀會的魯西南與孕育義和拳的魯西北之間的迥然不同。²⁹寫作義和團那本書的時候，恰逢中美兩國重啟外交和文化上的往來，我因此得以到當年出現過義和團的村莊裏去做田野調查。儘管這項

27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Roy Hofheinz,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及註釋19所引文獻。

28 Joseph W. Esc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9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調查為時不長，中國鄉村的多樣性仍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因此我一開始研究陝北，就把重點放到了村一級。我在中共1940年代曾經調查過的那些村莊展開田野調查，從這些村子所屬各縣的檔案館搜集了檔案和史料。

我曾就陝北農村調查寫過幾篇論文，其中，我試圖理解共產革命過程中的鄉村社會變遷。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共產黨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但是這樣的結論過於簡單化，無助於理解由多種社會背景、個人利益與政治意圖組成的政黨如何形成了有力的軍政團體。儘管黨員大多來自農村，但中共並不是一個農民黨，也不是一個按自己的意志改造農村社會的外來軍政實體。村一級、區一級、縣一級和中央一級的黨組織在關切點、利益訴求和革命志向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不同。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黨需要創造出一種在某種意義上能使各級黨組織協調一致的綱領性語言。向村幹部解釋教條主義的危害沒甚麼實際意義，不如鼓勵他們要靈活執行上級指派的任務。在研究和撰寫這幾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提出了「黨的人類學」，以了解黨是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協調運作的。³⁰

這為我帶來了一個無解的兩難問題。農村調查顯示，上級黨組織發現了農村幹部中的一些問題，我也多多少少找到了一些中共當時出台的旨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比如加強對黨的歷史和政策的學習；批評那些家庭觀念過重的幹部；把參加過哥老會，對革命不那麼忠誠的幹部清洗出去等。但我沒有發現促使中共中央制定這些新政策的爭議，也沒有發現上級要求中層黨組織怎樣實施的指

30 See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pp. 1052–1079;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24.4 (October 1998), pp. 339–377.

示，更沒有發現縣一級黨組織關於如何執行這些指示的討論。中共內在的工作機制對我來說是不可見的，我也無從進行人類學意義上的參與式觀察。這裏一個關鍵性的障礙是，1989年我在陝西省檔案館所能讀到的，是陝甘寧邊區政府檔案，而不是中共的材料。與此相關的材料都保留在北京的中央檔案館，只有最受信任的中國官方的歷史學者才能接觸到。在很多年裏，我的中國同行都告訴我，「等到老人們不在了」，檔案就會逐步開放。但我一直等到了21世紀，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相繼去世，卻發現檔案的開放程度非但沒有改進，反而變得更糟。2011年我重訪陝西省檔案館，發現二十年前還能看的檔案現在也不開放了。我從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退休的那段時間，研究冷戰史的資深歷史學家沈志華對我說：「老周，我們這一輩子，那些檔案都不會開放了，就用現有的材料去寫吧！」

這本書的問世就得益於沈志華明智的建議。現在就寫並且用手頭已有的材料寫——這個「指示」為我在書寫這段歷史時遇到的幾個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在對陝甘寧長年的研究中，我一直有意避開延安。延安的早期革命運動算不上活躍，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中共才進入這座城市。在戰爭年代，主政延安的是外來者：中共中央、從南方來的紅軍老兵、從沿海城市投奔而來的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延安是另一個世界，需要另外討論，在聚焦於陝甘寧邊區成立的過程時，我沒將太多筆墨花在這上面。再者，陝甘寧邊區的建立就已經是一個值得講述的複雜故事了，其間充滿各種戲劇性的插曲：盲目的熱情、尖銳的衝突和代價高昂的勝利。絕大多數時候，游擊隊轉戰於陝北的山溝，僅能接收上級的口頭指令，因此相關文獻資料的匱乏與其說是因為當代黨政官僚機構的政治審查，不如說是限於那一時期的客觀條件。還有一層原因，本書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發生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抵達陝北之前，對相關文件的政治審查可能沒那麼嚴格，因而我有理由認為現存文獻能真實地反映當時中共各級組織之間的交流情況。最後，

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在毛澤東從一張報紙上獲知陝北蘇維埃的存在之前，他本想把紅軍帶到中蘇邊境，尋找一塊安全的落腳之地，在那裏休息整頓，並接受蘇聯同志的軍事援助。如果他的這番設想變為現實，中國革命就會走上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陝北這塊相對安全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創生和存續，對我們所知的這場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至關重要。

陝甘寧邊區遠離西方影響之下的沿海地區，大多數農民是自耕農。它的存在證明：黨那套慣用的革命史敘述——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反帝反封——更宜視作宣傳鼓動的話語，而不是歷史分析的理論框架。落後的交通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市場的滲透基本上沒有威脅到農民「道義經濟」的存續。作為中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陝北肯定沒有「由期望值上升所引起的革命」，頻仍的自然災害加之19世紀晚期的回亂，使得陝北人口稀少，革命的人口統計學模型在這裏並不適用。³¹ 而另一個極其簡單、但相當重要的社會學模型卻適用於陝北，即政權薄弱的地區為土匪提供了機遇，使其有可能發展成對國家權威的系統性挑戰。³² 這一議論也適於所有的中共根據地，因為它們都位於幾省交界的山區。不過，最終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陝北革命的還不是那些一般性的社會學模型，而是對

31 關於「期望值革命」，見James C.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James C.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A Reader i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關於此理論還可參見同書所援引的托克維爾的主張，他是第一個提出相關看法的人。人口統計學模型參見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32 James Tong, *Disorder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2–159.

該地區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力量此消彼長的複雜變化進行把握的歷史學的方法。

讀研期間，我曾在一門研討課上主持介紹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的《法國農村史》。這本書建議讀者到鄉野間漫步以了解中世紀耕作方式，我質疑了它對我們這些當時被禁止進入中國的研究生有甚麼意義，這讓授課教授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不大高興。在推動中國向美國研究者開放方面，他是先驅。承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支持，我第一次獲得了在中國進行研究的機會，那個關於義和團的研究項目使我初嘗在農村進行田野調查的滋味。坦白講，對我來說，在中國鄉村徒步旅行、和老鄉聊天比任何其他歷史研究更有意思。為做實地研究，從1989年開始，我去過十幾次陝北，有時是幾天的緊湊行程，有時待一個多月。1989年我初到陝北，一批革命的親歷者還健在，不少人仍然住在只能徒步抵達的山村。我跟他們坐在烟熏火燎的昏暗窯洞裏聊天，當地助手幫我突破了方言的障礙，這些老農告訴我不少事情，令我耳目一新。儘管數十年的「憶苦思甜」重塑了他們的記憶，但他們已經老到可以忽略在場的當地幹部——對某些事件，幹部常常試圖提供在政治上更為正確的敘事。雖然老兵們可能會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打過的仗中有哪些神乎其神的故事，我依然相信：以正確的方法收集口述材料——邀請農民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並謹守事實——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³³

33 其他一些開展多年的研究項目也在鄉村進行了不少訪談，有助於獲得關於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重要洞見。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聚焦河北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村莊。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對毛時代陝西中部和南部的女性幹部的記憶所做的分析格外精妙。

上述訪談以及數十年來對陝北地理環境的熟悉無疑使本書受益良多。不過，本書的核心敘事建立在當代檔案史料的基礎上。近些年，中共黨史學者收集和出版了一大批史料集——包括黨的報告、指示、決議、往來電文、信件等，其中大部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版，供「內部使用」，但這些年來，這批材料已經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公開獲取。中國的各級政府機構都有黨史辦，其職責是為黨在各個時期所作的決議提供文獻證據。對於本書的研究尤為重要的是在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通過批判1920年代的「右傾機會主義」、1930年代王明等蘇聯人訓練出來的國際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賦予毛澤東路線一貫正確的地位。³⁴ 儘管上述史料集的政治目的相當明確，但一般認為其中的文件是真實的，專業歷史學家已廣泛採用。此外，陝西和甘肅的省一級及地方一級的黨史辦都曾經編過史料集，不同機構的史料集所收文件不盡相同，在材料的取捨上體現了一些差異。如同其他許多方面的情形一樣，黨在闡釋自身的歷史這件事上，看來也並不是只有一個聲音。

黨中央也時而向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提交報告。俄羅斯檔案館所藏的這部分檔案很多已出版並被翻譯成他國文字。這部分材料通常具體、準確得多，可見各國黨支部不會在其共產國際上級面前遮遮掩掩。1989年的時候，我一度能在西安讀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檔案，這批材料極有價值，原汁原味地記錄了針對邊區最初幾年所面臨問題的坦率討論。在田野調查中，我常有機會閱讀和抄錄

34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上冊，頁1179–1200；英譯見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1164–1179.

一些地方檔案。台灣國史館和調查局檔案也提供了一些出自國民政府視角的重要材料。最後，中國和美國的圖書館收藏的一批在國民黨佔領區出版的報刊（很多來自西安），也提供了陝西省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方面的有用信息。

不用說，這些材料並不能被視作對事實毫無矯飾的陳述。任何歷史文獻都是在某一特殊時刻由懷抱特殊目的的人以特殊的視角記錄下來的。地方黨組織在對主流路線表忠心時，在坦白一些小小的不足時，在為本地區不甚理想的革命形勢尋找各種理由時，其文件會愈加不透明。研究者必須在翻閱數千頁關於蘇聯五年計劃勝利如何鼓舞士氣、造成革命形勢高漲之類的黨內八股之後，才會發現，1930年代初，西安黨支部只有十幾個共產黨員。不過，要勾勒黨組織的規模、構成、分佈的話，這些材料仍是最佳信源。如果想對黨的那些變幻不定的政策及重大革命舉措按時間順序進行梳理，這些材料不可或缺；它們也揭示了地方黨按照中央部署在對特定階層和群體進行動員時面臨哪些具體的挑戰。

然而，在一些問題上，官方的黨史文件必須輔以親歷者的回憶錄。公開出版的文件往往美化並掩蓋黨內分歧，且出於安全的考慮常避免對個人指名道姓（除非此人已變節），以防交通員暴露和被捕。本書要講述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圍繞黨內一系列重要分歧，因此回憶錄材料必不可少，以幫助我們認清某場爭論的本質以及爭論各方所持立場。當然，任何回憶錄都包含作者本人的獨特訴求，因此必須以審慎、懷疑的眼光細讀，還要考慮到當代中國出版的回憶錄包含的一些特有的問題。其中之一是，領導人的回憶錄必須經官方審查，據稱是為了保守國家機密，實際上是為了使回憶錄與黨史的官方決議保持一致。其後果之一是使我們慣行的利用多種信源確定一樁事實的辦法有失效之虞：回憶錄呈現的也許只是所有歷史書寫都要遵從的官方立場。並且，有一整套相當可觀的激勵機制引導回憶者與官方敘事保持一致：這不僅涉及回憶者本

人的歷史評價，也與其身份和一系列特權掛鉤，從住房、醫療到子孫的就業機會，無所不包。³⁵

儘管如此，在檔案記錄非常欠缺的情況下，只能由回憶錄來補充。總體而言，我認為早年的回憶錄可信度最高，時間越久，記憶越不清晰，且會被官方歷史敘事掩蓋其本來面目。以此為原則，我很快就注意到一套特別的親歷者回憶錄，即1942年高幹會議以及1945年的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這批1940年代的材料是我所能搜集到的對兩次會議最早的記錄，但它們產生於整風運動這一非常語境之下，而且主持會議的高崗又抱着特殊目的——報復那些曾經在1935年肅反中整過他的人。我們將會看到，陝北黨分為兩派，積怨已久，在1942年及1945年的「七大」期間，爭論相當尖銳。如同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一樣，當時各方的發言充滿自我辯護和向對手算的舊賬，爭議各方都可以發言，相當鮮活，我使用的一些材料甚至記錄了與會者在會場上的插話。最後，1945年的座談會緊跟着「七大」之後召開，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對1942年高幹會議的平衡。在那次會議上，高崗飽受批評，因為他提名的七位中央委員候選人都是與他同一派系的。³⁶ 這些跡象表明，陝北對於高崗鐵腕政策的不滿很可能是將他調至東北、改由行事溫和的習仲勛主政西北局的原因之一。基於上述因素，我認為

35 在黨史研究領域，關於檔案與回憶錄所呈現的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有着怎樣的不同的，如下著作提供了最好的範例：以檔案資料為主的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和以回憶錄為主的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又見Ishikawa Yoshihir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 Joshua Fog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36 尤其參見1945年7月會議上李仲英和其他17人簡短的總結性批評。

為（一如既往，謹慎地認為），雖然整風運動在黨內生活的諸多方面統一了思想，但1942年和1945年形成的關於陝北革命的敘事對於我們理解革命的過程仍深具意義。

本書將大體按時間線索梳理陝甘寧邊區的建立過程。第一章介紹社會經濟背景：陝北貧瘠、匱乏、偏遠的地理條件，晚明流民叛亂以及19世紀中期的回亂讓此地幾經劫掠。其結果是到20世紀這一地區仍如死水一般：人口稀少，村子小，延安府以西一帶地方家族勢力薄弱，不過與此同時，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在東北部的無定河畔逐漸發展起來。第二章講述中共早期的歷史：黨的組織在陝西東北地區（榆林、米脂、綏德）的學校建立起來，由於左傾軍閥馮玉祥支持國共合作，黨也蓄積了力量。那時馮玉祥剛從蘇聯回國，帶回了蘇聯武器和顧問，共產黨員參加馮的軍隊，學生們則在學校周邊的村子裏組織農民協會。這一切在1927年戛然而止，蔣介石與共產黨分道揚鑣，馮玉祥很快追隨蔣，但不像蔣介石在上海那樣發動血腥清洗，只把共產黨人禮送出境。因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在中國西北軍隊的記憶裏還是美好的。

1930年代初，陝北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兩副面孔：北方是由土匪和民團組成的游擊隊；在較為富裕的渭河流域的關中地區，布爾什維克們試圖建立一個城市基地。第三章介紹了兩位主要的游擊隊領導人：西部陝甘交界處的劉志丹和陝西東部安定一帶的謝子長。兩人既競爭又合作。陝西黨的那些洋派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命劉的游擊隊向南方轉移，造成了軍事上的慘敗。緊接着，省一級黨的領導人被捕、叛變，陝西的革命運動陷入新一輪低潮。省委的潰散將游擊隊從黨的教條主義領導下解放出來，由此帶來我們在第四章將看到的陝北蘇維埃顯著發展壯大。劉志丹在孤立無援之中找到新的盟友，重建游擊隊，而謝子長則返回東部，在鄉村學校中發展黨的組織。1934年謝受傷並在次年年初去世，他所創建的黨組織在劉志丹的領導下與劉的軍事力量合二為一。這支隊伍在一連串前所未有的

軍事勝利中攻破了六個縣城。不過，軍事上的勝利卻使劉志丹和他手下的重要幹將成為被逮捕和清洗的對象。鄂豫皖蘇區的徐海東率部從湖北來到陝北，劉志丹在黨內的批評者因徐的加入獲得了新的力量。毛澤東和黨中央從江西抵達陝北後，劉才被解救出來。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自己那支紅軍隊伍向中蘇邊境預定的安全休整地區行軍時，讀到劉志丹在陝北建立了根據地的消息，遂轉道陝北。第五章描述了毛澤東為擺脫陝北的貧困所做的絕地求生般的種種嘗試，以及如何努力尋找新的盟友、抵抗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這是在貫徹共產國際建立新統一戰線的政策。打通山西的軍事嘗試失敗了，其結果是劉志丹及其麾下幾員重要指揮官陣亡，陝北失去了最有實際力量的領導人；另一個取道寧夏、穿越戈壁灘抵達蘇聯邊境的軍事計劃也夭折了。不過，黨招徠盟友的種種嘗試終成正果：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在西安事變中聯合綁架了蔣介石，逼蔣建立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之時，中共在陝北的根據地已縮小至陝甘交界處幾個窮縣的規模。第六章描述了這個小根據地擴展成陝甘寧邊區的過程。因西安事變，黨中央移駐延安，蔣介石開始給紅軍提供不多的軍餉。異常艱苦的統一戰線談判一直持續到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伴隨國共兩黨政治和軍事摩擦的升級，蔣介石的軍隊攫取了甘肅境內很大一塊地盤，中共的對應策略則是調回山西的軍隊，佔取了陝西東部較為富庶的綏德地區。至此，邊區的四至基本確定下來。直到此時，陝甘寧才真正成為一個安全的根據地。在地盤交換的過程中，綏德、米脂一帶轉到了共產黨轄下，那裏有一批力量不小的地主和鄉紳，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同時為應付他們的影響，中共有必要發展出一套新政策，這套政策後來也推廣到中國其他地方。

在中國，革命史有特殊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其革命起源之上。毛澤東的肖像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

天安門廣場一側的國家博物館內有名為「復興之路」的歌頌革命的大型展覽。近些年，中共也加強了政權對革命的認同。中國並不是唯一對革命過往念念不忘的國家。法國大革命的記憶在當代法國仍然相當重要，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至今是法國政治文化的中心。美國人對7月4日和《獨立宣言》的紀念延續至今，美國國父們對公共話語的影響也從未隱退，儘管他們在幾個世紀之前起草的憲法有不少落後於時代的條款，但它在政治光譜中始終保有合法性。在歷史上諸多偉大革命中，只有蘇俄革命已經失去神聖的地位，不過列寧墓仍留在紅場之上。

中國革命情結的獨特之處在於這個國家對革命意識形態的長期抱持。中國的第一場革命發生在1911年，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民初軍閥帶來的混戰與迷惘呼喚着一個新的開始，孫中山乘勢而起，在蘇聯的幫助下，重組國民黨並發動了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在蔣介石接過孫中山的權力、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之後，放棄了孫的聯俄容共政策，但並未放棄其革命抱負：他將共產黨斥為「反革命」。此後至少到六七十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對於革命的執着一直是這個國家最核心的政治文化。³⁷

要理解這一過程，重溫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典文章〈以政治為志業〉和〈以科學為志業〉不無教益。儘管我不願將歷史稱作科學，但我百分百認同韋伯的訓誡：學者應將「事實」從「價值」

37 關於現代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革命，尤其參見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04–141；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中分離出來，學者必須直面事實，哪怕是「令人不安的事實」。³⁸ 歷史學家的使命是發現過去發生了甚麼，以及何以發生。共產黨及人民解放軍無疑戰勝了武器更精良、也更具經濟實力的宿敵，但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等於說「革命」得到了廣泛的群眾支持，也不能說明「解放」的形而上邏輯。在其學養深厚的著作《歷史學家的謬誤》中，大衛·哈克特·菲什爾(David Hackett Fischer)對「恆等式謬誤」(fallacy of identity)大加撻伐，所謂「恆等式謬誤」即認為重大事件一定有重大的起因。³⁹ 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重大如中國革命這樣的歷史事件，也必須將其視作一系列偶然事件因緣際會的長期過程。地區、國內和國際環境為其提供了關鍵背景，地方及區域內的社會構造型態和限制着人們的行為；與此同時，個人與集體的能動性和政治選擇對一些特定事件的走向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一系列事件累積的效應構成了所謂革命的過程。總而言之，歷史學家信奉的那句古老的格言是有道理的：上帝存在於細節之中。中國也有類似的成語，即老子所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38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and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77–156, 引文來自 pp. 145–147.

39 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 177.

第一章

歷史淵源

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陝西既是邊緣又是中心。在古代，它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省會西安以北150公里處，有據稱是黃帝陵的遺跡。秦始皇的帝都就在離西安不遠處的咸陽，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0世紀，西漢、隋、唐等偉大王朝均建都於此。在現代，我們將看到，國民政府領袖蔣介石在西安被部下綁架，扣為人質，被迫同意與中共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儘管有這些古代的輝煌，在現代史上也聲名赫赫，近現代的陝西仍是一塊落後之地，遠離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政治中心北京（一度稱「北平」），偏安於有待開發的西北。一位曾在20世紀初造訪此地的美國人說：「那裏古老而閉塞……閉塞到北京人提起它來，就好像那是外國。」¹

位於陝西中部的渭河平原通稱「關中」，是古代兵家必爭的政治權力中心。河谷東西橫亘三百多公里，西邊以低矮的丘陵與甘肅相隔，東邊以險峻的潼關——即西方人所謂「黃河的直布羅陀海峽」——阻擋着來自華北平原的敵人。²關中在秦嶺北麓，而秦嶺是

1 Francis H. Nichols, *Through Hidden Shensi*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2), p. 1.

2 Ibid., p. 91.

中國南方魚米之鄉和北方麥黍之鄉的分界線。夏季，濕潤的南亞季風雨被連綿的山脈所阻隔，而地處秦嶺雨影區的關中則降雨豐沛，自古修建的灌溉溝渠滋養着渭河以北的廣袤平原，令其成為陝西的糧倉（參見圖 1.1）。³

陝南位於秦嶺南麓，將在武漢匯入長江的漢水流經此地。在 19 世紀之前，陝南還是相當不穩定的邊陲地帶，遠離政治中心，吸引着桀驁不羈的移民。18 世紀晚期，此地飽受白蓮教之苦，清廷花了數年才平定白蓮教叛亂。⁴ 進入現代之後，秦嶺南麓穩定的降水和溯漢江而上的貿易發展使陝南得享一定程度的繁榮。⁵ 1936 至 1937 年，長征的紅軍抵達陝北，毛澤東希望把部隊帶到更富裕的陝南，而蔣介石則寧願將其箝制在陝北的窮山溝裏。

以延安為中心的陝北是本書的重點。1930 年代，當地的共產黨人在陝北建立了根據地；1935 年，紅軍的長征以陝北為終點；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陝北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這裏無疑是陝西、也是全中國最窮的地方。在陝西，越往北，年降雨量越少，秦嶺擋住了南來的暖濕氣流，山西境內的呂梁山擋住了從太平洋東來的濕潤空氣。據民國時期（1912–1949）的數據，陝北的年降雨量是西安的三分之一，更系統的當代水文數據顯示，延安的降水量大約是陝南的二分之一，關中腹地的三分之二。在陝北，越靠近長城和戈壁，降雨量越小，且不如關中那樣穩定，降雨集中於夏季的幾個月，而且往往一來就是導致泥石流的暴雨。加之處

3 王金紱：《西北之地文與人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頁 11、67–69。

4 Yingcong Dai, *The White Lotus War: Rebellion and Suppress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5 Liu Ts'ui-jung,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 1800–1911*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1980).

於高緯度地區，農作物生長的無霜期比起關中平原明顯縮短，產量也低很多。⁶



圖1.1 民國時期陝西地形圖。據《中華民國新地圖》(上海《申報》館，1934)繪製。

- 6 華統：《陝甘寧邊區全貌》(1940年9月)，載張厚德編：《中共邊區根據地的歷史文獻選輯》，《共黨問題研究》11卷1期(1985)。《統計月報》，1935年第5期，頁103-104；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省志》，第6冊，《氣象志》(北京：氣象出版社，2001)，頁34-36、43。

從古到今，中國人對陝北的描述無不是「地瘠民貧」。⁷其實，只有陝北的最北部可用「地瘠」來描述，在那裏，每年春天來自戈壁的沙塵暴裹挾來大量黃沙，⁸其餘地方則像西北其他地區一樣被厚厚的黃土覆蓋。陝北和隴東構成了黃土高原，億萬年來，被風吹來的塵埃沉降到地表，枯草等腐殖質增加了土壤的有機成分。黃土極易吸收和保持水分，土壤中的水分也容易蒸騰到地表為植物提供養分。⁹陝北的土地並不貧瘠，與陝西其他地方的不同之處在於，這裏的降雨量太小且不穩定，無法為農作物提供生長所需的充足水分。同時，由於植被減少而造成的水土流失，使得陝北高原溝壑縱橫，適宜灌溉農業的川地少之又少。陝北的農田多在高原上或山坡上，純粹靠天吃飯。雪上加霜的是，自西北向東南流經陝北的洛河，從隴東的大片鹽鹼地流出，雨季氾濫的洪水中鹽分很高，既不能灌溉，又破壞了流域內有限的川地。¹⁰

因為降雨量太小，陝北地廣人稀，貧瘠的丘陵也極少能提供滋養土壤的有機物。自然條件導致了廣種薄收的耕種方式，這種耕種方式曾讓初到此地、急於提高農業產量的共產黨幹部大為受挫。尤其在經過19世紀的一系列叛亂之後，陝甘邊境的人口銳

7 沈青崖、吳廷錫等編：《陝西通志續通志》（1933）（台北：華文書局重印，1969），第11冊，頁5976（台版各卷之間使用連續頁碼）；《米脂縣志》（出版地不詳：1907），前言第1頁；華統：《陝甘寧邊區全貌》，頁200。1935年周恩來在接受斯諾採訪時，也用了「地瘠民貧」來描述陝北。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1), pp. 60-61.

8 侯昌明編：《保安縣志略》，1898年手稿，電子版見http://xadfz.xa.gov.cn/difangzhinew/muluFrame.jsp?bookname=gx_baoan_xianzhiluo，頁19。

9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original, 1940), pp. 29-31; Nichols, *Hidden Shensi*, p. 91.

10 《甘泉縣鄉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翻印自1905年版本），頁18-19。

減，土地被大片拋荒，農民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每當一塊地的地力用盡就搬家走人，到另一塊新地上耕作，他們根本不願意花時間、花本錢在原來的土地上精耕細作。正如一份報告所寫：「本地農民又不講究施肥，山地常常一點肥料不用，川地也施的不多。」¹¹艱苦的自然條件和農民的消極因應之道，讓陝北處於無望的貧困之中。民國初年到訪延安的一位外國領事將其稱作「絕望之地的中心，到目前為止，除了沙漠，這是我在中國見過的最貧窮的地方。」¹²埃德加·斯諾同意這樣的描述，他稱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¹³斯諾的妻子在斯諾1936年對保安進行歷史性訪問後的一年也造訪了延安，她的觀感與丈夫相同，她說：「從沒見過比陝北農村更貧窮的地方，在那裏，饑餓經年累月。」¹⁴

古代的邊疆

近代以來，地瘠民貧的陝北擁有一段雖干戈擾攘卻足以令陝人自傲的歷史。地方典籍多從公元前3世紀秦將蒙恬大破北方入侵的匈奴講起。時至今日，綏德附近仍有據說是蒙恬墓的遺跡供人

-
- 11 康迪：《邊區農業環境》，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2冊，頁14。在綏德—米脂地區，人口密度的提高使肥料得到更廣泛的使用。柴樹藩、于光遠、彭平：《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原版：1942），頁10。
 - 12 Eric Teichman,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63.
 - 1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57. 中譯文從《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下文作「董樂山譯本」），頁61。——譯者註。
 - 14 Nym Wales [Helen Foster Snow], *Inside Red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9), p. 291.

憑弔。¹⁵ 在古老王朝定都長安的歲月裏，陝北是抵禦中亞草原入侵者的戰略走廊，而中亞草原自古就是定居的農耕文明和遊牧的馬背民族角逐的戰場。關於陝北，當代歷史學家的建構多基於這樣一套敘事：古代將士金戈鐵馬、保家衛國，到現代卻一落千丈，令人嘆惋。¹⁶ 在宋朝（960–1279），陝北被中原王朝和西夏所分割，宋代著名的學者范仲淹以延安為大本營，指揮了陝北保衛戰。范仲淹在戎馬生涯中留下的大量詩文、碑刻，成了後世景仰、追慕的對象。宋代的邊防部隊駐紮在金湯寨，到了20世紀，陝北革命的英雄劉志丹就出生在這個小鎮上。¹⁷

將近一個世紀的蒙古人的統治之後，繼元朝而起的明朝（1368–1644）對其蒙古宿敵初以進攻為主，但很快出於軍事或財政的考慮改取守勢。國家的新戰略催生了中國修築長城的大時代，而陝北正處在這道至關重要又耗資甚巨的防線上。從15到16世紀，陝北邊疆築起了黃土夯建的邊牆以及數里一個的烽火台。這段長城位於鄂爾多斯沙漠南緣，¹⁸ 把陝北和黃河的「几」字形大拐彎分開，¹⁹ 總兵府設在陝東北和沙漠交界地帶的榆林。東起山西，迤邐陝北，西去入甘肅、寧夏的整條防線由榆林總兵負責。依明

15 《綏德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1905年版翻印），頁110–111。關於蒙恬和秦國對匈奴的抵禦戰，參見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29.

16 參見地方志對西北各地的介紹，《延綏鎮志》（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據1673年版翻印）；《綏德州志》，頁62–68；《金邊縣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1899年稿翻印），頁183–184。延綏鎮即榆林。

17 《保安縣志略》，頁6–12。

18 鄂爾多斯沙漠 (Ordos desert)，指的是鄂爾多斯高原上的荒漠沙地，北部是庫布齊沙漠，南邊是毛烏素沙漠，榆林位於毛烏素沙漠邊緣。——譯者註。

19 Waldron, *Great Wall*, pp. 72–139.

制，榆林鎮（時稱延綏）有官兵55,379名，馬、駱駝和騾子33,105匹。²⁰ 理論上，這一龐大的軍事建制靠屯田自給自足，它們佔用了陝北邊界大部分土地。然而，這裏的土地太過貧瘠，屯田收穫微薄，加之屯墾中的亂砍亂伐進一步破壞了地方生態。且屯田士兵大多募自外地，並不熟悉陝北耕稼，因而效率低下。結果，營田大多租給了本地農民，士兵則被稱作「客兵」。這套體系的運轉大大超出了陝北的承受能力，不得不從朝廷的國庫開支。²¹

這一體制在17世紀的崩塌給陝北和明王朝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當時，統治了中國兩百多年的明王朝已顯示出腐敗、內鬥和衰落的跡象。1590年代，統一日本的鐵腕人物豐臣秀吉對朝鮮發動了曠日持久的戰爭，明朝的財政因之吃緊。緊接着，東北滿洲人興起，於1644年征服中原，建立起大清王朝。雪上加霜的是，當時處於小冰河期，全球氣候變冷，農作物產量降低。²² 寒冷的氣候、農作物的生長期變短以及持續的乾旱使陝北的農耕經濟瀕臨破產。正是起自陝北的叛亂最終推翻了明王朝。

1628年開始的乾旱和饑荒導致了與以往類似的後果：人們以樹皮樹葉充饑，鬻妻棄子、人相食的慘劇也不時與聞。在朝廷財政緊張的情況下，士兵領不到餉，驛站關閉，驛站的差役失業。

20 《延綏鎮志》，頁124–125。

21 《延綏鎮志》，頁147–177；Waldron, *Great Wall*, pp. 81–84.

22 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567–584; Frederick Wakeman, Jr.,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Late Imperial China* 7.1 (June 1986), pp. 1–26, and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 pp. 1–224; Kenneth M. Swope, *The Military Collapse of China's Ming Dynasty, 1618–44* (London: Routledge, 2014), pp. 76–79.

饑民為求活路，變身為匪，燒殺搶掠，失業的士兵和小官吏則成為他們的首領。當時，大一點的匪幫人數有上千之多，他們穿着從富人家裏搶來的花裏胡哨的衣服，武器大多是長矛、劍和農具。兩位最有名的魁首來自陝北。張獻忠曾是延安附近的邊兵，他於1630年造反，後來成為一位殺人狂魔，四川省的人口因其屠戮大為減少。相比而言，另一位魁首、米脂人李自成更溫和，也更成功。他曾是驛站的驛卒，後因驛站關閉而失業。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之後滿洲旗人才加入王朝易手的廝殺，把李自成趕回陝西，他很快又跑到湖北，在那裏一命嗚呼。²³

李自成和張獻忠無疑是起於陝北的最有名的農民造反者，李自成對家鄉頗有感情，他把自己出生的縣命名為「天保」，在那兒修了一座宮殿並重修被當地士紳挖了的祖墳。²⁴時至今日，米脂還有一個為紀念他而修建的巨大花哨的行宮。不過，不管是李自成還是張獻忠，都很快放棄了陝北，轉而到陝南、華北等富裕地帶活動，尋覓糧草，張獻忠還到了長江流域。²⁵不過，陝北並未因他們離去而太平，繼而佔據此地的是一些實力稍差的匪魁。陝北匪首的名字稀奇古怪，像「不沾泥」、「王和尚」、「神一魁」等，²⁶他們裝備簡陋，缺乏火器，攻不下有城牆的城鎮，就對農村進行一輪又一輪的蹂躪。²⁷朝廷方面的軍事力量薄弱，一些措施常適得其反。因

23 Swope, *Military Collapse*, p. 103 ff.; James Bunyan Parsons,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pp. 20–21; 《米脂縣志》，第10冊，頁15–16。

24 Swope, *Military Collapse*, pp. 188–189.

25 Parsons, *Peasant Rebellions*, p. 26 ff.

26 《延綏鎮志》，頁446–451；《綏德州志》，頁390–394；《米脂縣志》，第10冊，頁15；《安定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據1846年版翻印），頁86–89。

27 Swope, *Military Collapse*, pp. 127, 145, 161; Parsons, *Peasant Rebellions*, pp. 6, 30–32.

無力承擔監禁和養活囚犯的費用，犯人常被倉促處決，甚至憑人頭數領賞，其結果是濫殺無辜。這種行為勢必激起反抗，於是朝廷的政策又變成鼓勵造反者投降，許以寬大的招撫政策，編入業已空虛的政府軍隊。不過，這僅僅換來了叛軍的多次詐降，包括李自成這樣的重要領袖在內，每當叛軍身陷重圍，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整才能東山再起的時候，他們就假意向朝廷投誠，一俟恢復元氣，就再舉叛旗。這一系列血腥的過程直到滿人入侵中原、在北京建立新王朝之後才告一段落。強大的滿蒙騎兵跨過黃河直搗陝北，平息了那裏殘存的叛亂力量。²⁸

清朝治下：和平降臨，元氣恢復，貧困依舊

滿人是中原王朝東北邊疆的征服者，與北方大草原上的蒙古騎兵結盟，將其法統追溯到成吉思汗的草原大帝國。他們的疆域概念大大超過了過往的漢人王朝。在其漫長的統治時間裏（1644–1911），滿人的八旗兵在中原王朝的北部、西部征戰，把蒙古、西藏和西面的回部（後來的新疆）收入囊中。²⁹ 在擴大的帝國版圖中，西北地區對於清王朝有着新的、重大的戰略意義。在北京之外，西安屯駐了數量最多的滿洲旗兵，寧夏境內黃河沿線亦有大的旗營，它們在西北方向拱衛着陝西，潼關則扼守着東邊的交通要道。陝西全省每年

28 Swope, *Military Collapse*, pp. 103–106, 118; Parsons, *Peasant Rebellions*, pp. 23, 49, 63, 130–138; 《綏德州志》，頁393–394；《安定縣志》，頁87–89。

29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開支的四分之一用於軍費。³⁰有清一代，陝西對川藏邊防、對守衛新疆都是不可或缺的戰略支點。18世紀的西征和19世紀的平叛及再次西征都證明了這一點。³¹考慮到該省極為特殊的戰略地位，陝甘總督與陝西巡撫多由旗人出任就是自然而言的事情了。³²

雖然新的戰略地位增加了該省的負擔，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清朝也放鬆了對陝西的索求。明朝曾在陝西北部大舉修建長城，修築的費用和守備費用成了地方農民沉重的負擔。如上文所述，晚明時期陝北的叛亂多由此而起，尤其是當統治者予取予求，遇災卻無力賑濟之時。在清政府治下，蒙古被合併到帝國的疆域中，蒙古王公成了統治集團的一部分。遊牧民族和農耕文明之間的邊界不復存在，隨之消失的是長城的戍邊作用。榆林衛被保留了下來——這座有城牆守衛的興旺城市直到民國時期仍是陝北的軍事中心；不過明代設置的十個辦公機構被裁撤了七個，所配備的邊兵數量也從55,000人下降到9,000人。³³

邊疆重享太平，漢蒙之間的貿易隨即開展起來。西北貿易的大宗是羊毛和毛皮。蒙古人熱切地參與到邊貿中，希望以皮貨換取中原的茶、布料、酒、煙草等。不過清廷還不完全信任遊牧民族：火器交易被嚴格禁止。³⁴一條重要的貿易線路在長城以北一馬平川之地被開闢出來，定邊縣的寧條梁鎮成為一個新興貿易中心。儘管這個鎮子比附近的幾處政治要衝更大，但並無城牆守衛，這是

30 Elliott, *Manchu Way*, pp. 105, 313.

31 R. Kent Guy,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p. 216–217;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pp. 303–323.

32 Guy, *Qing Governors*, pp. 203–204.

33 《延綏鎮志》，頁91、124–125；《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697–3699。

34 《延綏鎮志》，頁192–193。

帝國處於承平時期的跡象。伴隨着中蒙邊境線的消融，越來越多的漢族移民越過以前的邊境，去租種蒙古人的土地，草原的外沿就這樣變成了農耕區。雖然衝突並未徹底消散，但蒙漢和平共處是有清一代北疆的主流氛圍。³⁵

儘管重獲和平，邊貿也在復蘇中，陝北仍未從晚明的饑荒和叛亂中緩過來。天災人禍造成人口減少，大部分適於耕種的土地仍處於撿荒的狀態。各縣上報的可徵稅的民地面積往往是實際熟地面積的五到十倍。³⁶ 清初一位官員這樣描述當時的土地問題：「天下荒殘之地惟延為甚。千里頑山，四圍重阻，商賈不至其地，行旅不出其鄉。」針對陝北的低產量，明朝的賦稅體制將五至九畝地計作一畝。到清代，為了在已經縮小的耕地面積上完成固定的稅額，官員則要求一畝地納六畝地的稅。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有些縣欠了16年的田賦。那些在官場上有關係、有辦法的地方官可能獲得一定程度的減免，但沒有一個地方能享受明代那樣的低田賦。³⁷ 為了把新移民吸引到拋荒的熟地上，朝廷提供了三年免田賦的政策；但過了免稅期，田賦即以明代九倍的稅率足額徵收，農民的應對辦法是三年期一到就捲鋪蓋走人。³⁸

此外，還有一項財政問題長期困擾着陝西。該省是滿清帝國驛傳網絡上一個重要的節點，大量官郵要通過此地向西域傳遞，清朝的擴張增大了驛傳系統的壓力。長期以來，官差使用的道路、橋樑、渡口、驛站、旅館都是通過徭役系統由一般民眾來維繫。清朝通過收取丁賦簡化了這個體系並將其商業化。在中國的大部分地

35 《靖邊縣志稿》，頁287、294–302、313–314；《神木鄉土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原版：出版地不詳，民國初年），頁12–14。

36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6冊，頁3428–3429。

37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6冊，頁3428。

38 《保安縣志略》，頁25、29–30。

區，這一措施導致田賦增加了20%。³⁹ 陝西的丁賦更高，陝北一些縣的丁賦甚至導致田賦增加了80%。⁴⁰ 當地一位縣長因關閉驛站、取消稅卡，廣受轄區子民的愛戴，他還活着的時候，人們就為他立了一座生祠。⁴¹ 然而，在地廣人稀且極具戰略地位的中國西北部，驛站和旅社在維繫官方信息及人員往來的通暢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政府為維繫這兩項開支而收取的稅賦因此一直居高不下。⁴²

雖說稅很高，清初仍是陝北的一段平靜歲月。1667年的叛亂是為數不多的例外之一，這次叛亂十分滑稽，並未對社會秩序構成威脅。發生在綏德的這次叛亂是由鄰縣定邊一位軍官指揮的，此人有一個頗有意味的名字「朱龍」，即大明王朝的真龍天子。在綏德，一位名為周四兒的貧苦農民在一次礦場事故中受傷，後背留下一道蛇形的傷疤，因此自詡「真龍在身」。兩人偶然結識。一天夜裏，一個毛賊潛入朱龍的房間。朱被驚醒，機靈的盜賊立刻跪地求饒，假稱看見了朱周身發出的紅光和鼻子裏飛出的赤龍。朱龍把這個故事告訴了新朋友周四兒，其實四兒可能就是這出鬧劇的導演。他把赤龍解釋成真龍天子的徵兆，攛掇朱龍造反。朱龍說手底下僅有四五百人，不足以揭竿而起，四兒說，只消三千兩銀子就能從他在綏西的窮苦老家招徠千軍萬馬。朱龍把錢給了四兒，後者買了一大堆核桃，用十幾頭毛驢馱回家鄉。

39 Wang Yeh-chien,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0.

4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6冊，頁3459–3460；《神木鄉土志》，頁25；《甘泉縣鄉土志》，頁6。

41 《甘泉縣鄉土志》，頁4。關於「生祠」參見Sarah Schneewind, *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42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2冊，頁6090–6092；《靖邊縣志稿》，頁193–195。

回到綏德，周四兒玩了一個花招：賤賣高價買來的核桃。饑餓的鄉民間起這筆橫財從何而來，四兒答說他的新朋友朱龍給了他一萬兩銀子做生意，如果鄉民能每月付利息，他可以貸給他們一小筆銀錢。很多鄉民急需現金，四兒仔細記下了他們的姓名、年齡，讓他們下一個集日再來。之後，四兒趕回定邊，把花名冊給朱龍看，聲稱這是他招到的兵，還說如果朱龍能顯示一下自己的實力，這些人入夥的決心會更大。到了兩人約好的日子，四兒去了集市，朱龍則帶着他的部下埋伏在周圍。農民來繳利息的時候，四兒把造反的計劃告訴他們。農民抗議說他們只是來還利錢的，四兒卻點火為號，朱龍的人馬包圍了市場，殺了幾個拒絕就範的人。在這樣的威懾下，餘下的人只好附從，四兒把他們帶到附近一個村子裏大肆搶掠。搶來的戰利品吸引了數千之眾的新人入夥，他們很快攻下了綏德，州官跑了，守軍投降。知州帶着官印跑到西安，大部旗兵隨後被派往綏德平叛。此次造反事件說明，清初有大量饑餓的農民願意追隨那些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造反者，官方的迅速平叛則說明滿人新建立的秩序並未受到嚴重威脅。⁴³

貧困的文化

陝北以貧窮著稱。這裏降水稀少且分佈不均，又幾乎沒有灌溉設施，是典型「靠天吃飯」的地方。除了種在貧瘠高原和小山坡上的粟、豆、高粱，陝北基本沒有別的農作物。大豆種得少，當地人也不大吃豆腐。甘肅蘭州附近有煙草種植，但陝北高原基本沒有這種經濟作物。種棉花的話，這裏缺水；植桑養蠶，這裏的緯度又太高。手工紡織業在中國其他地方遍地開花，陝北卻沒有

43 《綏德州志》，頁395–398。

條件發展這項副業。布匹要從省外輸入，因而陝北男人出了名的一年到頭只穿沒有襯裏的光板羊皮襖。⁴⁴ 陝北、尤其是靠西的陝甘交界處，農民唯一的副業收入來自男娃娃們放牧的羊群。⁴⁵ 有時候窮人家會從富人家租羊，交給兒子們放，掙一點羊毛。⁴⁶ 本地唯一能有點貿易價值的產品皆來自羊群：羊毛、皮毛、羊皮和少量氈毯被運到省外，換成布匹等生活必需品。⁴⁷ 這裏就連豬都很少，當地的日常飲食不包括豬肉。在中國其他地區經歷顯著的商業增長，市場蓬勃發展，大批婦女兒童投入手工生產，通過區域分工提高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水準之時，陝北被遠遠拋在了後面。

自然條件限制了陝北發展多種農業經濟，交通不便則是此地發展商業的巨大障礙。陝北沒有一條可以通航的河流。所有交通都在陸上。即便到了1936年，這裏也只有一條通往延安的公路。⁴⁸ 更早時候，路都是極窄的土路，要麼順着河流的走向蜿蜒向前，要麼沿着小山忽上忽下。冬天塵土飛揚，雨季又是一片難以通行的泥濘，一位沮喪的旅人以「糟糕透頂」來形容陝北的路況。⁴⁹ 因為沒有便宜的水路交通，甚至能通行於那些小路的輪子車都很少，陝北的商業運輸主要依靠騾子或者驢，運輸成本因此居高不下。因無利可圖，本地人不願做生意，為數不多的服務於當地經濟的小販

44 華統：《陝甘寧邊區全貌》，頁224；匡裕祥：〈陝西膚施縣概況〉，《開發西北》2期4號，1934年10月，頁70-74。

45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876-5878。

46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第1冊，頁389。

47 Alexander Hosie, *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 (Boston: Small Maynard & Co., 1914), p. 12; 《甘泉縣鄉土志》，頁23。

48 Snow, *Red Star*, pp. 26-27.

49 Hosie, *Trail of the Poppy*, p. 11; 王金紱：《西北之地文與人文》，頁126-127。

和手藝人基本都是山西來的外鄉客。⁵⁰ 因為交通成本太高且行路艱難，遇災時，救濟糧也極難運抵陝北。⁵¹

此地既無商業又人口稀疏，大小都算上，陝北的城鎮也少之又少。地區的軍事中心榆林，城牆堅固、駐軍眾多，可能是陝北最大的城市，人口也不過一萬左右。延安和綏德也是陝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又是舉行三年一度的科舉考試的地方，但兩城的人口還沒榆林多。陝北大多數縣城僅有一兩千戶居民，少數幾個，像安塞和吳堡，只有不到五十戶人家。⁵² 城鎮的生活條件和農村一樣，都極為簡陋。外來的訪客都會注意到，當地人是住在窯洞裏的，窯洞一般修在黃土崖邊，進出的一面是木製的門、窗。洞頂留一個走煙的煙道，直接連着窯洞內的炕和灶，冬天在窯內做飯的同時，也燒了炕。窯洞最大的優點是冬暖夏涼。有錢人家常在窯面上飾以石料，有些設計得相當精美。⁵³ 窯洞經濟且舒適，但它之所以成為陝北民居是因為此地嚴重缺乏木料。黃陵附近的橋山林帶把陝北和渭河流域分隔開，除此之外，陝北的山基本上是禿山。當地人非但沒法用木頭蓋房子，做飯和取暖的燃料也是很大的問題。一般來講，莊稼的秸稈以及灌木枝子是當地唯一的燃料。⁵⁴

貧窮、落後的地方經濟困擾着當地人。構成陝北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放羊人日子十分艱難，當地農民乾脆被稱為「受苦人」。⁵⁵ 方志在描述民情時，最常用的字眼是「淳」。有時候，這個

50 《綏德州志》，頁328–320；《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976。

51 Nichols, *Hidden Shensi*, p. 229.

52 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志》，第七卷：陝西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8），頁119–140；《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3583。

53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出版地不詳：北極書店，1940），頁94–95。

54 匡裕祥：〈陝西膚施縣概況〉，頁70。

55 《綏德州志》，頁327–328。這個稱呼沿用至今。

詞有正面含義，指某人有淳厚的美德。一些簡短的地方志也會讚美本地人不尚奢華。⁵⁶考慮到當地的貧困條件，確實沒有甚麼可奢華的；不過這個詞的真正含義是說當地人都很淳樸。教育對於多數人家來說是昂貴的奢侈品。用省志的說法，「（陝西）地瘠民貧；讀書識字者蓋少，其故多苦家寒，無力入學，往往以聰穎子弟畜牧務農終其身。」⁵⁷清代中期，一位官員注意到，在清王朝建立後的80年裏，陝西北部八縣無一人在省試中取得功名。他上奏皇帝，請其下詔在三年一次的省試中，每50個名額中要為這些縣保留1個。這一最低限度的平權請求得到了皇帝的恩准。⁵⁸因為與外界的接觸極少，在一位20世紀初造訪此地的外國人眼中，「即便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個泥古不化的地方。」⁵⁹雖然民風的保守並不讓地方志的編纂者反感（他們稱其為「淳樸」），但清代外省的觀察者卻大多認為，陝西民間流傳的很多觀念、習俗只能冠以「迷信」二字。20世紀的共產黨人同樣這麼認為。他們大力批判當地廣為流傳的神鬼迷信，以及人們生病時不求醫問藥反而求助於巫醫神漢及靈魂附體一類的陋習。⁶⁰

20世紀的訪客，不管中國的、外國的，經常抱怨陝北人髒。一種典型的說法是陝北人「髒極了，從來不洗澡的，他們以前洗臉也不洗的，他們一生只洗三次臉，生出來，結婚，死。」⁶¹這些說

56 《爵秩全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據1904年版翻印），頁543。

57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977。

58 《綏德州志》，頁711-712。

59 Nichols, *Hidden Shensi*, p. 1.

6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977；《綏德州志》，頁329-330。

61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頁57。亦可參見Snow, *Red Star*, p. 230. 徐特立告訴斯諾，陝北人一生只洗兩次澡，一次是出生的時候，一次是結婚的時候。

法大致是準確的，不過它們所反映的與其說是衛生習慣，不如說是缺水的窘境。尤其是山裏人，他們去最近的河可能也要走上半小時，並不是每家都打得起井。對陝北人生活陋習的抱怨由來已久。清代的作家也有相關的表述。一本清代的地方志認為當地人有五大美德：男婚女嫁不嫌貧愛富；朋友之間講義氣；尊重先祖；樂善好施；婦女不在市場上拋頭露面。此書也提到了陝北人的一大缺點：懶。農民不灌田，不種樹，不種菜；婦女不紡線、不織布；男人不做買賣。⁶² 當代的訪客則發現這些習俗多出於陝北人的固執，當地人「有一點虛驕，也太懶惰」。⁶³

外人對陝北人的觀感體現在一位清代學者寫的一首廣為流傳的詩中，此人作此詩是為了警告兒子不要去延安。在這首長詩中，他列舉了七條理由，下面摘錄了其中的一部分：

堪笑儒流，一領藍衫便罷休；才入簾門口，文字輒丟手，匾額掛門樓，榮華已盡夠；坐吃饅頭，不向長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題名一筆勾。

可惜女流，兩鬢蓬鬆灰滿頭，黑漆銅刀手，腥膻猙獰口；腿褲不遮羞，驢蹄寬且厚；雲雨巫山，那見秋波溜，因此上把紅粉佳人一筆勾。

沒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冬帽尖而瘦，棉褲寬且厚，紗葛不需求，袷衫且耐久；氈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因此上把綾羅綢緞一筆勾。

客到忙留，乳子煎茶敬一甌，麵餅蔥椒醋，鍋塊和鹽韭；牛蹄與羊蹄，帶毛隨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筆勾。

62 《綏德州志》，頁326；參見《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977。

63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頁70-71。

未雨綢繆，窯洞低窪盡土修，夏日曬難透，陰雨偏肯漏；土砌牆頭，燈油壁上溜，馬糞牛溲，腌臢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樑畫棟一筆勾！⁶⁴

諸如此類的描述流露出中國富裕地區官員對陝西的輕視以及他們與當地人的文化鴻溝。不過，我們也不能認為這樣的描述是純粹的無稽之談。下面將會講到，共產黨初到陝北，也失望於此地的「人文條件」不適於發動一場現代革命。⁶⁵

需要牢記一點：陝北地處邊疆，此地的文化和習俗都體現了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交界處的特點。在中國早期的歷史中，這塊地方並不是漢族的聚居地，因此現代很多陝北人的外貌仍保留着多民族融合的特點，高鼻樑、強健的下頷骨，甚至有人是藍眼睛。⁶⁶因此，陝北人具有邊地的硬朗作風並不出奇。淳樸之外，陝北人也以強悍著稱。⁶⁷一些地方志注意到，邊民特有的軍事氣質既讓陝北人具有忠誠的品格，也讓他們任性，甚至自大。⁶⁸在陝北，武舉考試的成功率遠遠高於文舉。⁶⁹由於教育落後，既沒學校、也沒可以效仿的鄉邦大儒，陝北讀書人根本沒法跟關中學子競爭。自小在戶外長大，在丘陵地帶爬上爬下的年輕人更擅長學習騎射而非悶在教室裏記誦儒家經典。

64 〈七筆勾〉，轉引自尚季芳：〈再造「西北」：民國時期旅外學人對西北形象的重塑和建構〉，李建國、尚季芳編：《近現代西北社會研究：發展與變革》（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頁55。當代西北籍的學者自然覺得這些觀點是一種冒犯。而且，窯洞從不漏雨，也不會倒塌。這首詩的作者似在進行文學的誇張。

65 Snow, *Random Notes*, p. 49.

66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79.

67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875–5876；《綏德州志》，頁325–327。

68 《靖邊縣志稿》，頁117、119–121。

69 《神木鄉土志》，頁63。

陝北不止是邊疆，也是天災人禍不斷的地方。前文提到晚明的旱災和叛亂，在19世紀後半葉，旱災和叛亂將以更猛烈的強度捲土重來。這樣的災難不可避免令大部分當地人淪為難民。災難過後，外來移民漸次流入貧瘠的陝北。陝北沒甚麼世代定居的村莊，也沒有古老的世系或者歷代先祖的墳地，沒有宗祠和族譜。在中國其他地方，如果一對夫婦不生養，常見的做法是從丈夫這支的親屬中過繼一個孩子。但在陝北，這樣的近親可能並不存在，所以收養沒有血緣關係的孩子更為常見。⁷⁰新移民的遷徙造成了血緣關係的薄弱，考慮到親緣關係在中國其他地方的重要性，這對陝北的習俗和文化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外來戶搬到一個村子時，往往把年輕的女兒許給當地人家以換地耕種。⁷¹捨一個女兒對逃荒的人家來說並不稀罕，不過在陝北，外來戶靠這種辦法不僅獲得了村地，還成了當地殷實人家（有足夠耕地分給別人）子弟的老丈人。這種不合常規的做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並未被譴責。相比之下，婦女為養育子女再嫁甚至「招夫養夫」（招贅新丈夫養活殘疾或喪失勞動能力的第一任丈夫）的行為肯定是習俗所不容的。蘇成捷（Mathew H. Sommer）考察過這方面的司法案例：僱工幹農活就能和主人家的老婆睡覺，這種習俗並不少見。陝北可能也是這樣，不過這從另一方面證明，流動的年輕男性在鄉村生活中的地位不同尋常。⁷²血緣關係的薄弱最顯著的體現是陝西西北角

70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2冊，頁1010、1013、1049。

71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1冊，頁383；第2冊，頁724、1029。《靖邊縣志稿》，頁32。

72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2冊，頁1037；《保安縣志略》，頁32；Ma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3–54; see also Hershat, *Gender of Memory*, pp. 110, 330.

定邊縣通行的繼承習俗。中國其他地方男性子嗣享有平等的繼承權，但在定邊，女兒的兒子有優先繼承權，其次是妻子的姊妹的兒子，如果家族中沒有這樣的後代，父系的男性後代才能享有繼承權。據一項20世紀初的調查，這種繼承習俗造成父系親屬只能留下一成土地。⁷³

1930年代有不少報告提到了陝北性病氾濫。一位對中共根據地抱以同情的造訪者寫道：「差不多十之八、九患花柳病的。」⁷⁴ 惡劣的衛生條件，在未消毒的條件下分娩以及廣泛傳播的性病造成了當地嬰兒的高死亡率。⁷⁵ 有觀察者充滿惡意地將性病流行歸咎於1936年後大批單身的年輕人來到這裏，以及共產主義者在兩性關係上比較隨便。⁷⁶ 然而，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連年的戰爭和革命把年輕士兵帶到這裏，他們有性的需求，但很難顧及生理衛生。另外，清代就有對陝甘共妻及亂交的指責。⁷⁷ 儘管中國傳統上對於性諱莫如深，但高死亡率使得陝北有很多寡婦，而新移民中的年輕男子來來去去，在找工作的同時，也在尋找家的慰藉，這些原因使得陝北社會的性風俗比儒家訓誡更自由放任。

在一塊天災人禍不斷的土地上，人口的補充主要依靠從人口稠密的地區遷徙而來的新移民。正如一位地方官的公子觀察到的，離鄉背井尋找前程的年輕人更願意到鄰近的富裕地區，而不是遠離家鄉的窮鄉僻壤。陝北往往是移民們的最後選擇。而且，新

73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2冊，頁1022。

74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頁57、306–307。

75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196; 參看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頁306–307；Hershatter, *Gender of Memory*, pp. 157, 162.

76 〈陝北二十三縣請願書〉，1939年2月28日，秦孝儀等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台北：中國國民黨，1985），第2冊，頁86。

77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第2冊，頁1036。

移民得借錢買種子、買農具，才能在一塊新的土地上成家立業。在陝北，能向外來人口放貸的富戶很少，利息又相當高。借債人還不起錢就一走了之，搬到別的地方。這樣一來，肯來陝北並最終留下來的是一些騙吃騙喝、製造事端的無賴。⁷⁸一本方志記錄了其中一種麻煩：一夥百人規模的乞丐，自稱「螞螞神」。這些人往往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出動，騎驢、騎馬，卻不帶食物，他們在偏僻的村莊裏乞討；到沒人的人家偷東西；或者把主婦引誘出來，分散她們的注意力，再另外派個人進屋翻找值錢東西。有個慣偷隨身帶一串鑰匙，四處溜門撬鎖，偷別人的首飾家當。這些人自稱饑民，實則是「懶蕩游民，不務正業，不備盤費」。⁷⁹自然條件太惡劣，終年胼手胝足辛苦勞作卻不得溫飽，使得難民和無賴實際上是一體兩面。

因其貧困、流動且常常不服管教的人口，外放陝北對晚清的官員沒有吸引力。省志這樣寫道：

按延安府知府自自嘉道以來，率多久次，往往十餘年不遷，如洪蕙、邱煌……皆是。蓋以地居貧瘠，官矢清廉，悃悃無華者處之泰然，多不求去，此遷轉所由稀也。咸同之際，捻回肆擾，竄及北邊，延宥夏綏胥成戰地……榛莽千里，渺無人煙，廊綏皆然，延郡尤甚。大府視同甌脫，郡守一職，每出攝符。既多存五日京兆之心，安有百堵中澤之念……而當日封疆大吏，不能擇保障之才，俾求窮牧，厥咎固不可辭也。⁸⁰

陝北似乎成了一個仕途失敗者的落腳點，或者想在地方上撈一票就走的貪官的中轉站。《保安縣志略》的記述同樣令人沮喪：

78 《保安縣志略》，頁29。

79 《靖邊縣志稿》，頁333–336。

8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6冊，頁3215。

派駐到此地的官員無精打采，能吏少之又少，只有趨炎附勢之徒。從明代起就如此，據當時的一位官員說，地方官要麼是功名不高的年老體衰之人，要麼念書不多，只有捐來的功名。如果誰被放到陝北當地方官，他會求親告友，找人出面干預，理由無外父母年事已高，不能遠任；或者本人身體糟糕，受不住西北的苦寒。這樣磨蹭、運作上幾個月，往往就能謀到一個更好的職位。對於這一現象，方志不無嘲諷地感嘆道：「朝廷為地擇官，奈何為官擇地。」⁸¹

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功名的陝北地方官還不到總人數的一半，且比例在清代不斷下降。清代的省志證實了明代官員的說法：未循常例而當上地方官的現象相當多，並且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官員的任期也變得越來越短，約三分之一的任期還不到一年，考慮到從京城到陝北路途之遙，這些官員可能根本就沒有到任。⁸² 在這種情況下，由他人代行職責就屢見不鮮了，代理人通常也沒受過多少教育，只是教諭之類的佐雜，正常情況下不可能當上縣官。由此可見，有清一代，陝北的地方行政是相當薄弱的。

考慮到陝北的士紳階層也很少，地方行政力量的薄弱就尤為重要。在其關於中國士紳階層的經典論著中，張仲禮寫道：「士紳階層是政府官員與地方百姓之間的協調者。」⁸³ 法律規定，地方官不得在原籍省份任職。這些外來者要履行財政、司法、教育和保境安民等方面的大量職責，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地方精英。作為地

81 《保安縣志略》，頁32。

82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6冊，頁3213–3359。

83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p. 54. See also T'ung-tsu Ch'ü,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pp. 168–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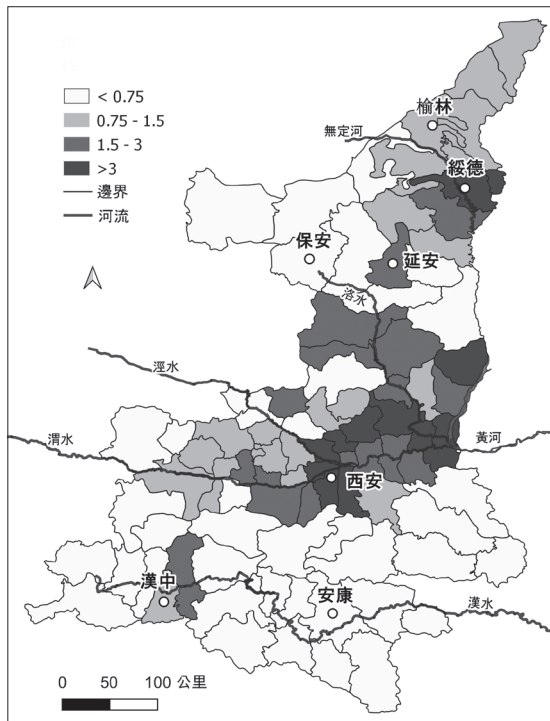


圖1.2 清代中期(乾隆-嘉慶朝)考取舉人功名者在各縣的分佈：每十萬人中獲得舉人功名的人數。舉人數字來自《續修陝西通志稿》，卷四十至四十三，《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505-3692；人口數字來自曹占泉編著：《陝西省志·人口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頁332等。

方社會中擁有功名的人士，士紳有與地方官相當的社會身份以及與之相交的機會。國家組織要想順暢運作，離不開士紳階層的合作。而陝北的問題是擁有功名、可以支援地方政權的士紳少之又少。一般來說，取得士紳身份需經過省試，取得舉人的功名，但陝北的教育太過落後，當地學子無法跟關中的才俊競爭。如圖1.2所示，十年中，關中腹地每十萬人中出了3位以上的舉人，而陝北還不到1.5個，廣大的洛河流域甚至不到0.25個人。

這意味着，陝北的士紳大多只有生員（俗稱秀才）的資格。秀才在地方上有配額，雖然在陝北窮縣的配額更低，但這好歹意味着每個縣都有秀才，儘管他們可能只有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其結果便是，陝北的「紳」成了地方官吏的代名詞。比如，靖邊縣被分為五個區，每區的中心城鎮有一堡，由一位「總紳」執掌；鄉間各區，則由四至五名「散紳」負責，每人大約掌管20個小村。⁸⁴ 沒有證據顯示「散紳」有任何科舉功名，他們只是被稱作「紳」的農村胥吏，之所以冠以「紳」名，是因為清帝國通常用這個詞稱呼那些維持鄉村社會秩序的人。這套體制運轉良好，到了民國時期，在國民黨政權中承擔保甲職責的保長仍襲舊稱，被稱為「紳」。⁸⁵

造反

像中國大部分地方一樣，陝北在19世紀中葉面臨着危機。也如同以往一樣，事端起於它處，陝北是被動的受害者。慣常的歷史敘事是，晚清的危機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有關：中國被迫打開國門，貿易、外交使團、傳教士以及鴉片如潮水般湧入，嚴重衝擊着老大帝國的祖宗之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及隨後一系列發生於19世紀的衝突中，大清帝國在英國、法國甚至日本等國優勢武裝力量的打擊下接連敗北。在屈辱失敗的刺激下，中國開啟了現代化改革進程，儘管進展緩慢且常遭頓挫，卻將最終改造中國。不過，對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生活在陝西這樣內陸省份的中國人而言，19世紀危機的來源不是外敵的入侵，而是國內的叛亂。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850年起於廣西金田的洪楊之亂。叛亂者於1853年建都南京，他們佔據長江流域的大部

84 《靖邊縣志稿》，頁96–99。

85 依據筆者在志丹縣所做的大量訪談。

分地區達十年之久，其領袖懷抱半生不熟的基督教信仰、土地改革和共有公產的含混觀念，以及對滿族統治者的刻骨仇恨。其叛亂構成了對清朝統治的直接威脅，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太平天國的兵燹中。1864年清軍收復了南京，此後不久，太平天國的殘餘勢力也被剷除乾淨。⁸⁶ 相比太平天國，北方捻軍之亂的組織性要差得多，意識形態色彩也淡得多，這是一支由農民組成的強勁武裝，從1851到1868年，捻軍的騎兵幾乎在華北平原全境奔突、劫掠。⁸⁷ 清末內亂的最後，是雲南爆發的以回民為首的多民族叛亂，造反者在1856年到1873年間一度成立了一個蘇丹國。⁸⁸ 這些叛亂以及西北的回亂動搖了清廷的統治基礎，對既存秩序構成了致命的威脅。

1850年代全國飽受叛亂衝擊之際，陝西卻風平浪靜。省內相對富庶的關中地區源源不斷地向帝國輸送士兵、穀物和賦稅，以支持朝廷平亂。儘管資源的調配造成了陝北地方軍餉的削減，一些士兵因此開了小差，但在叛亂不斷的動亂年代裏，陝西卻像一個安全的堡壘。⁸⁹ 不過，陝西也依然受到「邪教」叛亂波及。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白蓮教之亂在陝南為害多年。地方志中以「平定教匪」為

86 關於太平天國，見 Franz H. Michael,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Yu-wen J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Jonathan D.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87 Ssu-yü Teng, *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 1851–1868* (Paris: Mouton, 1961);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88 David G. Atwill,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 1856–187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89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496；第12冊，頁6072–6073。

題，闢專章詳述白蓮教的興衰與平定回亂的過程。⁹⁰ 宗教狂熱和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合流帶來的威力讓19世紀的陝西官員深感畏懼。

咸豐帝做了一系列災難性的決策，令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火越燒越熾。在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之際，皇帝丟下京城，倉皇逃到承德，1861年8月死在避暑山莊。五歲的同治帝繼承了皇位。外國人打進北京，朝廷上下一片混亂，這給了太平軍再次進攻北京的機會。雖然他們失敗了，但是其中的一支從陝南攻進陝西，直抵關中。⁹¹ 因為陝西兵將大多在外地平亂，地方官只得採取當時各地普遍使用的權宜之計——以團練抵禦太平軍的入侵。團練在各地都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平叛方式，陝西在團練的組織上則別有機巧。除了強調士紳領導和官方支持，陝西地方官注意到農民願意保衛鄉土，卻不願離家遠征。最關鍵的是為農民配備火器，但只消幾天的訓練就能上手。團練對叛軍有相當的威懾作用，探子偵知團練的存在，就會向後方發出警報。如果叛軍真的來犯，農民的首要關切是保護家人，「不值與必死之賊拼命，火銃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尚可爬山而逸。」地方團練在山村的作用尤為顯著，因熟知山路、地形，他們可以襲擾敵人或者攻擊敵軍的薄弱部分。而且，「山民質樸勤勇，耐勞習險，非平原百姓氣浮而脆者可比。」⁹²

在組織團練的時候，陝西的地方官面臨着一個特殊的問題。關中地區有大量漢化的穆斯林，又稱「回回」。他們的先祖多是生意人，在幾個世紀之前來此地做生意，經過幾百年的時間，這些人的後代已基本漢化，他們操着流利的方言，以清真寺和阿訇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個分散的聚居區。陝西有100萬到150萬回回，佔全省

9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514及以後各頁。

91 Jen Yu-w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pp. 463–472.

92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742–3743。

人口的十分之一，其中一半聚居在渭河以北的同州府，毗鄰山西，是渭河、洛河、黃河三河匯流的開闊平原地帶。⁹³ 在17世紀，更西邊的漢化回回受到起源於中東的蘇菲教派（所謂新教）的影響，但陝西的回民大多信奉更為保守、與儒家倫理有更多相通之處的格底目教派。即便如此，漢、回之間不同的宗教信仰，回民不沾豬肉、煙酒的飲食習慣，涇渭分明的回漢村莊以及雙方的通婚禁忌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族關係的緊張。在種族主義者的成見下，回民多被形容為高傲、好鬥且有體臭。在其對回族研究的經典著作中，喬納森·李普曼（Jonathan Lipman）傳神地將回民描述為「普通卻又不同，漢化但不徹底，在地同時又是局外人」。⁹⁴ 由於民族的分立，陝西的團練是漢回分立且相互競爭的。

社群間的衝突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常態。南方沿海省份的家族衝突常延續好幾代人，與鄰人衝突往往成為凝聚一個社群的紐帶。⁹⁵ 在陝西，漢回矛盾由來已久，漢族人抱怨回民的牲口糟蹋了他們的莊稼，回族不滿在當地市場上遭受的歧視。諸如此類的糾紛延續到19世紀，滿族統治者放棄了平等對待各族人民的承諾，將回民視作挑事者，支持對他們實行更嚴厲的懲罰。1862年，因竹子價格而起的一起小糾紛釀成了激烈的衝突。毫不出奇，這起糾紛發生在回漢共用的一個集市。兩邊在衙門都有眼線，當前來解決爭端的省團

93 路偉東：〈清代陝西回族的人口變動〉，《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頁71-77。

94 Jonathan N. Lipma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關於貶低回民的種族主義想像，參見曾毓瑜：〈征西紀略〉，白壽彝編：《回民起義》（北京：神州國光社，1952），第3冊，頁21。

95 Harry Lamley,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under Qing Rule," in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UNY Press, 1990), pp. 27-58.

總、一位行事霸道的漢族士紳慘遭殺害後，地方上謠言四起，傳漢人為了報仇要大肆屠殺回民。因陝西的民團是漢回分立的，兩族之間的暴力相向很快就升級為公然的叛亂，關中平原成了回族造反者縱橫擄掠的地方。再加上南邊的太平軍和捻軍時不時地出擊，陝西一片混亂。清廷和漢民團練聯手反擊，到了1860年代中期，除了西安的一個平和的回民小社群，回回基本上被趕出了陝西。⁹⁶

撤出陝西的回回把甘肅當作落腳點，那裏原本就有為數眾多的回民。陝西回回大多聚居於董志原，那是貧窮的隴東慶陽縣裏較有人氣的地區，馬蓮和蒲河兩大河流流經此地。回回以此為基地，曾多次嘗試返回他們在關中東部的富裕故土。在阿訇的帶領下，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大規模武裝遷徙，一次又一次地被清朝的軍隊阻擋在陝甘兩省的交界處。⁹⁷ 儘管其甘肅同儕一再籲求，陝西的官僚、士紳卻一口咬定：回回不能返陝。用陝西巡撫的話說：

以臣愚見度之，此時甘回可撫，陝回實無可撫之機。蓋甘回素多愚懦，自安耕鑿此次構難，實為陝逆所迫脅，其情既有可原，且與漢民構怨，初不甚深，投誠之後，有田可

96 Chu, Wen-djang, *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862–1878: 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ity Policy* (The Hague: Brill, 1966), pp. 1–50;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J. Smith, “The Military Challenge: 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11–219. 這些著述是研究西北回亂不可或缺的文獻，為下文的敘述提供了指引。相關的中文文獻可參看《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535–5715；白壽彝：《回民起義》，第3冊；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上海：東方書社，1951）。

97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46–5647；楊毓秀：〈平回志〉，《回民起義》，第3冊，頁84–85；〈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405。

種，有屋可棲，父子妻孥，足保無恙，其情亦較可信，但使地方官善加約束，安插得宜，自可解散逆黨。以孤莠回之勢。至於陝回，則狡悍性成，屢撫屢叛倡亂以來，屠戮漢民，以巨萬計，亦自知罪大惡極，為天地所不容，即使朝廷曲加寬宥，而陝民之子遺僅存者，念父兄之痛，思子弟之仇，刻骨刺心，亦必不能對宇望衡，相安無事。⁹⁸

簡而言之，關中的漢族官紳不允許回回返回故里。不幸的是，陝北承擔了這一決策的代價，成為腹地太平的犧牲品。⁹⁹

數十萬的陝西回回湧向董志原。他們在周邊鄉村劫掠以尋找食物，而當地當時正罹受1867年乾旱之苦。¹⁰⁰很快，隴東農村開始組織民間武裝保衛自己的收成。其中一些以民團的面貌出現，但當這些自衛性的組織劫掠他鄉的時候，他們又成了「團匪」。¹⁰¹其結果是，走投無路的農民既是自衛者又是劫掠者，這與裴宜理對華北捻軍的描述如出一轍。¹⁰²開始他們是為了守護鄉里，之後不得不搶奪他人。存糧吃完後，無主的僱農開始搶吃的。官府私下囤糧充作軍隊給養，越來越多的農民被迫為匪。¹⁰³很快，饑民組成的匪幫就有數千之眾，匪首起了奇奇怪怪的化名，像「高二鐵匠」、「張五大人」等。¹⁰⁴其中最有名的是董福祥，這位隴北人曾參與抗回的民團，之後自己拉起了一支人數可觀的隊伍，直到被清廷

98 〈劉中丞奏議〉，1866年6月6日，《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44-5645。

99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56-5658、5663。

10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63。

101 《綏德州志》，頁407-411；《靖邊縣志稿》，頁209、308-311。

102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pp. 48-151.

103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67；〈平回志〉，《回民起義》，第3冊，頁90。

104 《綏德州志》，頁407-409。

招安。他在平定甘肅及西北回亂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董福祥官至提督、太子少保，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包圍了外國使館區，被八國聯軍視為「首禍」之一，遭到革職。¹⁰⁵

隴東被劫掠一空的時候，回民和匪幫轉到了陝北。1866到1867年的情況最糟。這兩股勢力沿洛河而下，穿過保安縣進入洛河下游縣份。有時候，土匪和遊勇混入回民的隊伍，回民的武力因之大增；有時候回民發現土匪不守規矩，試圖加以約束。現存史料都說，找糧食一直是這些人的首要目標。¹⁰⁶很明顯，部分回民希望沿着洛河回到洛水與渭水匯合處的老老家。與以往的情況一樣，這些人都是男女老少全家一起走。在1867年，回回一度 and 當地的捻軍結盟，以期獲得足夠的軍事實力打回家鄉，但歸於徒勞。¹⁰⁷

到頭來，陝北農民是苦難的承受者。陝北可抵禦叛軍的兵力少得可憐，大部分兵力已被調走保衛西安府或被派往甘肅平叛。¹⁰⁸農民只能自衛，他們逃往有城牆的城鎮、山頂的堡壘或懸崖上的洞穴。土寇和流寇的裝備也很糟糕：據說刀劍甚至石塊就能當武器，基本沒有火器。¹⁰⁹有時候，回回或土寇也能憑人多勢眾攻破縣城低矮、殘破的城牆，搶糧、搶值錢的東西，殺人放火。¹¹⁰但一般來講，

105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63；霍維洮：〈董福祥起家與同治年西北政治形勢〉，《寧夏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頁52–58；Lanxin Xiang,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 A Multinational Stud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207–208, 291–293.

106 〈平回志〉、〈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85、88–89、401、406–409、428。

107 曾毓瑜：〈征西紀略〉、〈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29–31、354–355、369–370、374、378。

108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47–5649、5663；〈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405。

109 〈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391、396–397、420–421、423。

110 〈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442；《神木鄉土志》，頁24–25、46–51；《靖邊縣志稿》，頁306–317。

搶劫的目標主要是孤立無援、無力抵抗的鄉村。¹¹¹ 也有幾個領不到餉或只能領半餉的官兵劫掠鄉里，農民成了雙方衝突的犧牲者。¹¹²

晚清回亂中的農民之苦在保安縣得到了充分體現。該縣位於陝西西北角，是陝北共產黨領袖劉志丹的家鄉。甘肅的回回和團匪沿着洛河攻入保安，小小的縣城僅有一道破敗的城牆拱衛，很快陷落。叛亂者把所有值錢的東西劫掠一空，並破壞了公共建築，驅散了城中居民。縣官跑了，三年沒有繼任者。代理縣官把縣衙遷往境內唯一安全的地方——永寧山上的石頭寨。永寧山是一座石頭山，紅色的石灰岩上鑿出了幾層洞穴，上山的路很容易把守，山上還有一口可以為上千人提供飲用水的井。這樣的堡壘在保安縣有不少，永寧山是最安全的一座，民國時期也將充作縣政府的避難所（圖 1.3）。回亂期間，它是唯一沒有被攻陷的避難之地，其他山寨在被圍困並切斷水源後都一一淪陷了。

那些孤立的小村子對付匪患的通常做法是躲到峭壁上的崖窩裏。難民通過繩梯爬入洞內，敵人靠近的時候，繩子就被收起來，食物和水也被搬入窩內，以備萬一。直到今天，我們仍可以在陝北各地看到那些鑿在峭壁上的避難處（見圖 1.4）。不過，這些崖窩並不是總能躲過匪患。饑餓之極的匪眾會在山崖下點火，一旦難民忍受不了煙熏，就只能跳崖而死。而不管山上的人是死還是降，土匪很快就能弄出一架簡易的梯子伸到洞口。最終，躲在山洞裏的人要麼跑、要麼死。倖存者則抱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抱團尋求本地土匪的庇護，與回回對抗。叛亂終於結束之後，官府要求那些與匪眾合作過的人自首。保安縣在叛亂之前有人口 51,500，只有 170 戶人家前來自首。¹¹³

111 〈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 3 冊，頁 381；《甘泉縣鄉土志》，頁 7-8。

112 〈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 3 冊，頁 427-428。

113 《保安縣志略》，頁 14-18、23、26、36。



圖 1.3 永寧山。這座石灰岩堡壘經受住了回亂的考驗，後來成為保安縣政府臨時避難之所。



圖 1.4 陝北的崖窯，用於躲避土匪或叛軍。作者攝。

平叛

掌管中國西北部的陝甘總督駐於甘肅的首府蘭州。有清一代，這一戰略要職多由滿族大員擔任。不過，甘肅是一個窮省，過半人口是回民。¹¹⁴絕大多數回民對叛亂持同情態度，參加叛亂的也不少。可以理解的是，甘肅官員多主張招撫政策，而陝西官員力主軍事鎮壓。1866年，叛亂席捲甘肅，蘭州的一次兵變逼迫朝廷採取鐵腕政策。湖南籍儒將左宗棠被任命為陝甘總督，奉命平定西北叛亂。當時，大清的西部邊陲已經落入以阿古柏為首的哲德沙爾汗國之手。左宗棠是平定太平天國的悍將，現在臨危受命，剿滅危害帝國西陲多年的邊患。在這之前，掃清捻軍之亂延遲了他上任的時間，一年之後他才騰出手來，施展雄才大略，使大清帝國重獲對廣大西北地區的掌控。¹¹⁵

從一開始，左宗棠就把收復西陲置於優先位置。新疆的回民聚居區是在清代才被納入帝國版圖的，官員多為滿人或蒙古人。左宗棠收復新疆，將此地置於漢人的控制之下，並為此做了周密的籌備。他斷定陝甘軍事力量太弱，打不了仗，決意要帶自己統領的湘軍入疆。¹¹⁶為了達成這個目的，他運用了自己在上海的廣泛人脈，為其軍隊籌措給養、武器、彈藥，甚至徵集了西運部隊的馬車

114 黃正林：〈同治回民事變後黃河上游區域的人口與社會經濟〉，《史學月刊》，2008年第10期，頁81。

115 Chu Wen-djang, *Muslim Rebellion*, pp. 51–204; Liu and Smith, “Military Challenge,” pp. 221–243; Hodong Kim,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2004).

116 Chu Wen-djang, *Muslim Rebellion*, pp. 91–94;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67。

隊。¹¹⁷ 左宗棠對輿地有相當的研究，他對軍隊後勤工作一板一眼，做出長期規劃。在其部隊屯駐關中期間，他督促手下的士兵修路、植樹，那些樹木蔭蔽後世達一個世紀之久。¹¹⁸ 深謀遠慮的左宗棠做事果敢而有章法，他一步步建起自己的補給線：第一步是安撫陝西百姓，第二步是抗擊甘肅境內的回亂，最後才是收復新疆。¹¹⁹ 不幸的是，陝北百姓再次成為這一系列複雜軍事行動的受害者。

問題主要出在左宗棠的供給線上。除了取道關中到蘭州再到新疆的主供給線，還有一條途徑陝北、為攻打甘肅回回的大本營金積堡提供補給的副線，金積堡位於黃河東岸，黃河在此地向北流入今天的寧夏境內。馱畜馱着糧草，沿着山西境內的蜿蜒小路前進至晉陝交界處，過黃河，穿過綏德守軍的駐地和陝西最北邊的幾個縣。回回很少冒險進犯這一區域——可能因為他們起事的本意是為了回到南邊的家鄉；但這條供給線卻成了匪幫和遊勇打劫的目標，尤其是董福祥部，高峰時期，他的人馬有四五萬之眾。¹²⁰

在陝北搶劫官軍糧草的董福祥部吸引了眾多本地人入夥，「各處敗賊並歸之」。¹²¹ 據說，董部和土寇比回民流寇更得民心，前者邊打邊募糧，後者是明搶。¹²² 但是，這些團匪毀掉了邊境重鎮寧條梁和靖邊縣城。¹²³ 1869年初，廝殺經年的官軍和團匪終於握手

117 Chu Wen-djang, *Muslim Rebellion*, pp. 116–123; Liu and Smith, “Military Challenge,” pp. 221–243; Hodong Kim,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pp. 226–228.

118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57–5659；Nichols, *Hidden Shensi*, p. 115.

119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54。

12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11冊，頁5653、5662–5664；〈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435、438–439。

121 〈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436。

122 《綏德州志》，頁407–411。

123 《靖邊縣志稿》，頁31–35、84–87、308–317。

言和，董福祥的父親與左宗棠手下一員大將接洽，一番討價還價之後，雙方達成共識，董部接受招安，並為左宗棠部押運糧草。很快，董福祥就成為平定回亂的一員悍將，並在清朝的軍隊中一路攀升。陝北也從叛軍和流寇的雙重劫掠中暫時緩了一口氣。¹²⁴

不過，此前兩年，另一釁端已現端倪，新麻煩即將來臨。1867年，左宗棠駐綏德的部隊在湖北籍哥老會會眾的策動下發生了兵變。哥老會是由異姓兄弟結拜組成的秘密會社，不過後來其成員在陝北也很難稱得上「秘密」。這一組織起源於長江流域，參與者多為士兵等未婚男性，他們設計了一套入會和弟兄之間互認的秘密儀式，這一組織為年輕人，尤其是那些從事半犯罪性營生——如走私鴉片或收保護費之類——的年輕人提供了支撐性的人際網絡。這一組織在長江中游地區的軍隊中，尤其是左宗棠部極為發達，因其能為那些遠離家鄉、從事軍人這一危險職業的年輕人提供某種程度的安全感。綏德事件和發生在南方的類似兵變說明，哥老會也有可能發展成對抗行為的主導勢力。綏德兵變的原因純是經濟上的。軍糧出現了虧空，軍官在他處忙於公務，糧倉成了現成的目標。鬧事的士兵佔據了糧倉，襲擊了幾位地方官，騷亂升級為兵變，但很快就被控制住，該逮的逮，該罰的重罰。這一事件說明，左宗棠部在陝西實現了暫時的和平，但也把另一頗具能量的新組織帶到了當地。在辛亥革命中，陝西的哥老會扮演了領導的角色，直到中共佔據陝北的年代，哥老會仍是重要的地方勢力。¹²⁵

124 霍維洮：〈董福祥起家與同治年西北政治形勢〉，頁56–58；〈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405、447–408。

125 《綏德州志》，頁405–407；〈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第3冊，頁371–372、461–464。關於陝西哥老會，可參閱Carl Whitney Jacobson, “Brotherhood and Society: The Shaanxi Gelaohui, 1867–191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 dissertation, 1993).

回亂之後

回亂最明顯、最可量化的影響是陝北人口的銳減。方志和路過的官員時常提到劫後的廢墟、數十里之內人煙的荒涼和狼群在山間的嚎叫。¹²⁶ 鄰省甘肅也是同樣的情形，左宗棠寫道：「遠近城邑寨堡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涼）慶（陽）涇（州）固（原）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¹²⁷ 50年過後，一位西方旅行者仍有這樣的觀察：在陝甘兩省「一片廢墟中的村莊比比皆是」，兩地似乎「一直沒能從回亂的破壞中恢復過來」。¹²⁸

晚清的人口數據不完整也不可靠，因此回亂所造成的破壞是難於精確統計的。而且，叛亂繼之以1877至1878年的大旱，天災和人禍的影響密不可分。陝甘交界處的情況最糟。1896年的人口調查顯示，保安人口僅為回亂前的8%。20世紀初的調查顯示，與保安相鄰的安塞和延安，人口分別為回亂之前的27%和30%。¹²⁹ 平叛後不久的奏疏寫到，延安府僅有兩成的人口倖存了下來。¹³⁰ 隴東的情況也差不多，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估計是，當地人口減少了70%。¹³¹

叛亂的影響是持續的。根據相對可靠的18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數據，可以計算出如圖1.5所示的人口分佈變化。始自西北，沿

126 《甘泉縣鄉土志》，頁12、14；《神木鄉土志》，頁24–25。

127 轉引自黃正林：〈同治回民事變後黃河上游區域的人口與社會經濟〉，頁84。

128 Hosie, *Trail of the Poppy*, p. 26.

129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480–3482。

130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6冊，頁3429。當代學者依據1950年代更為可靠的人口調查數據和一段時期內的正常人口增長率，估算出延安府因回亂減少了57.5%的人口，不過此研究似乎低估了遷入人口的數量。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5卷·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頁599。

131 黃正林：〈同治回民事變後黃河上游區域的人口與社會經濟〉，頁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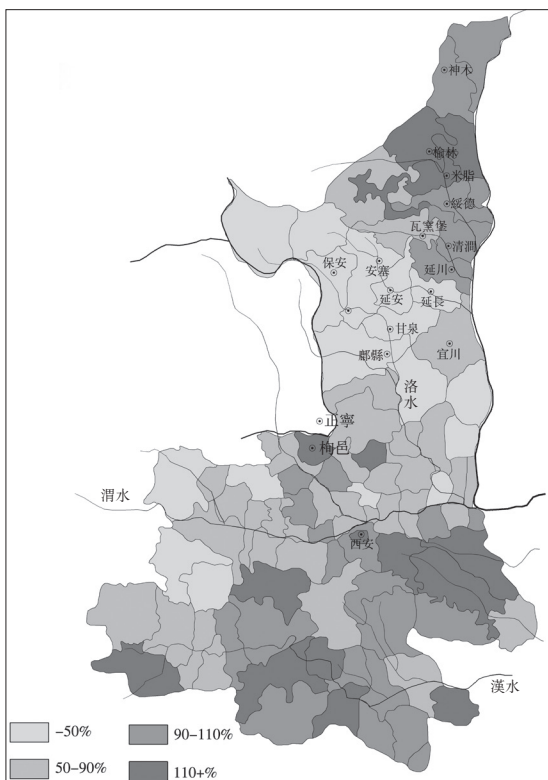


圖 1.5 1820 年代至 1930 年代陝西人口分佈變化，顯示了回亂對人口的影響。延安以西和以南人口下降明顯，而東北和陝南人口增加。1820 年代人口數字的來源同圖 1.2，1930 年代數字係作者根據以下資料估算：《陝西省各縣保甲戶口統計表》（1937 年 7 月）、《統計材料月刊》（2 卷 5 號，1937 年 11 月）及《民國二十四年陝西分縣人口數》，《統計材料》（1939 年），轉引自曹占泉編著：《陝西省志·人口志》，頁 96-98。

着回亂和土匪劫掠的路線，從洛河延至渭河的淺色區域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我們在後文將會看到，此地也是日後劉志丹領導的共產黨游擊隊興起的地方。陝南漢水上游人口的顯著增長也對此後的陝西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不過，對本書而言，最重要的變化仍是陝北人口聚居點的重新佈局。

如圖所示，與西部人口的急劇減少形成對比，東北部的人口實際上是增長的。榆林自古就是軍事重鎮，鄰縣米脂的縣官在回亂起於關中之時加固了城牆，兩縣都抵擋住了叛匪的入侵；回亂結束後，這些地方的人口有顯著增長。米脂西部的貧困地區遭受了叛匪的蹂躪，但無定河東岸的富裕村莊設置了堅固的堡壘，農民得以躲過叛匪的零星襲擾，當地的經濟很快就恢復過來。¹³² 附近的綏德因位處左宗棠的補給線上，有重兵把守，因而遠離兵燹，人口也有增長，到1902年，其人口已超過回亂之前。¹³³ 在港口開埠及全球經濟的帶動下，遠離此地的沿海地區大為改觀，經濟活力增加，上述增長也部分受此刺激。19世紀末，毛皮大衣和氈帽的流行，為西北地區傳統的毛皮出口帶來了更大的需求。外國貿易公司駐天津的代表到西北大批採購當地的皮毛原料，陝北東北部縣份成了重要的轉口貿易集散地。¹³⁴ 在綏德，保守人士抱怨，地方上的傳統美德被市場邏輯腐蝕。¹³⁵

伴隨陝東北的經濟恢復元氣，地方士紳階層也發展壯大起來。圖1.6是根據《陝西通志續通志》的舉人名單計算出的晚清舉人在陝西各縣人口中的比例。與清代中期(第47頁圖1.2)相同：教育系統發達、士紳網絡成熟的關中地區在晚清科舉考試中仍佔有優勢，陝北依然被遠遠甩在後面。而且，進一步分析便可以看到，陝南在科舉中已有相當的競爭力，陝北仍舊落於下風。在陝北，各縣情況也不一樣。東北部的榆林、綏德、米脂除了在人口密度上明顯構成了

132 《米脂縣志》，第2冊，頁11。

133 《綏德州志》，頁211。

134 《神木鄉土志》，頁55；李曉瑩：〈近代天津洋行在西北地區的運營機制——以羊毛毛衣為中心的考察〉，李建國、尚季芳編：《近現代西北社會研究：發展與變革》，頁16–26。

135 《綏德州志》，頁343–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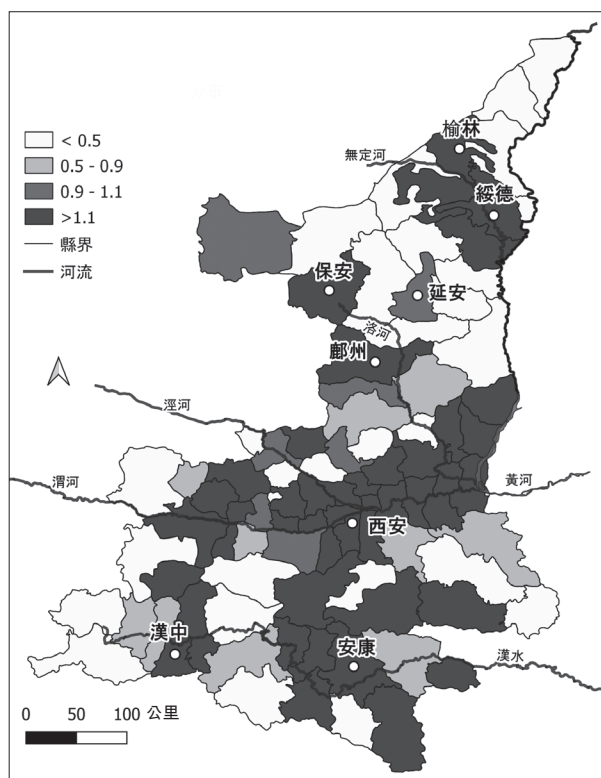


圖 1.6 晚清（同治－光緒朝）考取舉人功名者在各縣的分佈：每十萬人中獲得舉人功名的人數。舉人數目來自《續修陝西通志稿》卷四十至四十三，《陝西通志續通志》，第 7 冊，頁 3605-3692；此處用以計算的人口數字來自 1930 年代的數據（來源同圖 1.5）。

陝北的核心地區，其士紳數量的優勢更為明顯。紳權發達的榆林和米脂，在晚清的 40 年內（同光兩朝），每十萬人中有 3 個舉人，與關中大多數縣份的數字相當，不過關中好幾個縣的人口雖因回亂大為減少，舉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卻兩倍於榆林與米脂。鄉試所在地綏德在科舉考試中的表現相當搶眼，鄜州同樣如此，作為直隸州，它的行政層級比一般的縣高一級。與兩地對照，延安的數字少得可憐。作為府治所在地，清中期的乾嘉兩朝（1735-1820），延安曾出過 9 位

舉人，成績不俗；而到了王朝末年，延安只有2人中舉，同時期米脂8位、榆林23位。保安似乎是落後的西北唯一的例外，此地每十萬人中有1.8個舉人，這看起來是個相當體面的數字，不過要知道，有清一代此地只產生了一位舉人，之所以比例不低，是因為回亂之後當地人口非常之少。更重要的是，細讀文獻就會發現，這唯一一位舉人並不是保安本地人，而是一位湖北人，其父大概是左宗棠的部下，所以他是隨平叛部隊進陝的外來戶。¹³⁶

強大的紳權在很多方面影響着地方政治。如上所言，士紳的社會地位與縣官一樣高，是地方社會的實權代表。他們的重要職責之一即是荒年向官府籲請減稅。作為大地主，他們從田賦的減免上獲得了最大的利益，但也惠及普通農民。陝西在1876至1877年、1900年都遭受了嚴重的旱災，不過只有關中地區以及陝北的榆林地區成功地減免了田賦。¹³⁷ 晚清時期，米脂和綏德成為陝北的文化中心，兩地有最好的學校和強大的地主士紳階層。¹³⁸ 米脂位於榆林和綏德這兩大政治、軍事中心之間，很快就成為陝北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儒家學問和私塾教育在那裏都極為發達。¹³⁹ 這些學校為民國時期的教育系統提供了基礎，陝東北無定河流域的幾個縣吸引了全省學子，其中也包括日後將加入共產黨的那些年輕人。作為教育重地和紳權大張的地方，這一地區與陝西北其他縣份形成了鮮明對比，如上文提及的，在陝西北，幾乎沒有人通過科舉考試取得士紳身份，在那裏，所謂「士紳」指的是毫無功名的農村胥吏。

136 《保安縣志略》，頁38。陝西舉人的數字由金之夏搜集，參見《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605–3692。

137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9冊，頁4847–4851。

138 柴樹藩等：《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頁111–112。

139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594–3595；《米脂縣志》，第2冊，頁7–8。

帝國的終結

在20世紀即將到來的時候，陝西在帝國的近現代化進程中繼續扮演「落後一角」的角色。從1895年開始，清王朝進入了最後的衰落期。在這一年，清軍被迅速實現現代化的鄰國日本擊敗。雄心勃勃的改革者說服年輕的光緒帝進行變法維新，但這一自強圖新的努力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干涉和鎮壓，她很快與仇外的王公大臣聯盟，支持義和拳「滅洋」。這招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清廷被迫到西安避難。皇室躲藏於西北一隅的時候，列強的外交官與清朝的官員最終議定，不追究慈禧縱容義和團的責任，允許她繼續主持朝政。¹⁴⁰

儘管後世的歷史學家多強調其行將就木的一面，但清朝的最後十年其實開啟了一系列生機勃勃的經濟、社會、政治改革，即所謂的新政。以儒家經典為考試科目的科舉教育被現代化學校的教學體系所取代，科學、外語等新式學科出現在學校的課程表上。年輕的學子出國學習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必備的新知識。裝備以西式武器、從事西式訓練的新軍被組建起來。工業發展，鐵路鋪展，全國各個城市均組建了商會。在沿海城市，街道拓寬，鋪上了瀝青、點亮了路燈，還有警察巡邏。公園、博物館、圖書館、有軌電車、商店等市政設施紛紛出現。清廷以現代化的度支（財政）、郵傳（交通）、外務等部代替了傳統的六部，並開始了立憲改革，從士紳中選舉產生諮議局議員和資政院的一半議員。¹⁴¹

140 關於列強與清廷的談判，Chester Tan,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Norton, 1967) 提供了經典敘述。

141 Joseph W. Esherick and C.X. George Wei, eds.,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London: Routledge, 2014); 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The Xinc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1993); 張海鵬、李細珠：《新政、立憲與辛亥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這一系列激動人心的變革基本沒有影響到陝西，對陝北更是毫無作用。陝西的新軍有名無實，¹⁴² 省內的利益集團反對用外國貸款修建通達西安的鐵路。陝人對機械工業聞所未聞，教育改革進展緩慢且主要局限於關中地區，尤其是西安和三原縣。¹⁴³ 憲政改革旨在以救亡圖存為目標凝聚全國上下，令中國各地寄予厚望。各地有聲望的士紳被選入諮議局主持大局，準備組建立憲政府和內閣，內閣向經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負責。¹⁴⁴ 然而，陝西是這場運動的一個邊緣參與者，而陝北乾脆被排除在外。諮議局的選舉權本質上限於士紳階層，而陝北的士紳極弱。結果，66位議員中僅有3位來自陝北，而西安府有22位議員。¹⁴⁵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城武昌發生兵變，由此引發席捲中國南方的辛亥革命。1912年2月，清朝被推翻，給中國兩千年的帝制畫上了句號。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的百年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領導人才意識到，革命並不總是解決國家問題的最好辦法。¹⁴⁶ 1911年10月23日，陝西加入革命陣營，是頭一批響應革命的省份之一。不過，陝西的起義與南方諸省迥然不同，在南方，諮議局的進步議員與新軍軍官共同致力於建立一個新政權。而陝西，人單勢薄的革命者是依靠哥老會的強大影響力發動了起義。

142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721–3722。

143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696，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辛亥革命在陝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181–188。

144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3版）（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07）。這一關於立憲派的經典著作於1969年首次出版於台灣。

145 《陝西通志續通志》，第7冊，頁3693–3694。

146 Joseph W. Esherick, “Reconsidering 1911: Lessons of a ‘Sudden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6, no. 1 (2012).

反滿情緒推動着陝西的革命。晚清學生開始閱讀記錄兩百多年前滿人征服中原之時燒殺搶掠行徑的舊書，陝西的學者中滋長着反清復明的情緒。為了尋求新知，不少學子遠赴東洋，在那裏接觸到孫中山等在1905年建立同盟會的革命派。但從閉塞、落後的陝西來日留學的學生很少，且多來自西安、三原的幾所學校，其中有30人加入了同盟會。¹⁴⁷ 這些留日學生歸國之後，很多人當了老師，秘密地在新式學校散佈激進的主張；也有幾個人參了軍，他們的反滿信息受到軍隊中哥老會普通士兵的歡迎。如前文所述，哥老會是由左宗棠的平叛部隊從長江流域帶到陝西的。對於那些遠離家鄉的年輕人來說，哥老會營造了一個互幫互助的熟人社會。哥老會的每一個山堂都有自己的山主，通常是個有魅力的人物，能與其他堂的山主競爭或往來。還有一套立誓入會的儀式，包括喝下摻了新宰公雞血的酒等，這套儀式在成員之間締結了一種幫派式的忠誠。¹⁴⁸ 哥老會無論在軍隊還是此後在陝北匪幫中都深具影響力，所以革命者——從晚清的同盟會到1930年代的共產黨人——不約而同地以加入哥老會為手段，招募願為自己的事業而奮鬥的年輕人。¹⁴⁹

1910年夏天，一群年輕的革命黨人和哥老會弟兄在西安名勝大雁塔碰面，以反清為目標，歃血為盟。¹⁵⁰ 二者雖然有很多分歧，但革命黨人和哥老會弟兄同視滿人為敵，此時，龐大、懶散且低效

147 《辛亥革命在陝西》，頁8-12、181-197。

148 Jacobson, "Brotherhood and Society," pp. 3-53.

149 江西的例子與此類似，參見Perry, *Anyuan*, pp. 44-45, 55-56.

150 〈辛亥革命中的哥老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第5冊，頁104-112；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 pp. 21-26.

的滿族駐軍成了眼中釘。當滿族官員削減軍餉時，躁動不安的情緒在哥老會出身的普通士兵中滋長起來。¹⁵¹

南方爆發了武昌起義，陝西的革命黨和軍隊中的哥老會立即響應。10月22日，他們攻入守備空虛的軍火庫，胡亂分發了一批錯配的武器和彈藥，之後迅速控制了省城。第二天，他們對滿城發起全面進攻，炮轟城牆，殺了大約千餘旗兵，剩下的旗兵四散逃竄。哥老會士兵帶頭，對西安滿城展開了全國最大規模的屠殺，但這座城市現在牢牢地掌握在了革命黨的手中。¹⁵²

革命黨人控制了西安，但並沒有控制住中國北方，陝西孤零零地起了義。滿族巡撫跑到甘肅，由西向東對革命黨人發起攻勢，朝廷派出的軍隊佔據了東面的潼關。西安新成立的陝西軍政府把一個混成旅擴大至八個團，這意味着軍力擴大了四倍。¹⁵³ 雖然軍政府的領導人在擊退清廷軍隊進攻方面表現得相當出色，但是哥老會每個堂的山主都要求在政府中佔據一個職位，這使得軍政府裏有四個山頭相互競爭。防守的重心當然在關中，¹⁵⁴ 陝北則任其自保。

能夠孕育同盟會的新式學校在陝北少之又少，辛亥革命在陝北全賴哥老會。在榆林，軍隊中的哥老會領導了起義，他們把一位腐敗的縣令作為革命的目標，但與當地的道台有某種程度的合作，不過這位道台後來奉召回西安，在途中被殺。周邊大多數縣

151 郭孝成：〈陝西光復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6冊，頁40-41。

152 Jacobsen, “Brotherhood,” pp. 203-226; Keyte, *Passing of the Dragon*, pp. 16-19; Ernest Frank Borst-Smith,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cord of Risks and Rescue* (London: T. F. Unwin, 1912), pp. 20-21.

153 郭孝成：〈陝西光復記〉，《辛亥革命》，第6冊，頁43。

154 朱敘五、黨自新：〈陝西辛亥革命回憶〉，《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冊，頁12-16。

份跟在榆林後頭，支援革命。¹⁵⁵但在民團和紳權強大的綏德，哥老會「匪」或被處以極刑或被趕走。在延安，據稱哥老會「在人口中所佔比例超過陝西其他任何地方」。駐守當地的軍官提出守城需更多軍餉，被士紳拒絕後，他就跑了。當地的哥老會首領是一位不識字的麵舖舖主，他受命維持地方秩序。¹⁵⁶類似的情形在陝北各地上演。軍隊中的哥老會首領與地方官員、士紳達成交易，分享權力，一種新型的「革命」政權在各地建立起來了。¹⁵⁷

新生的民國很快就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失望。同盟會是反滿的主要力量，但實權卻把握在北方強大的新軍及其締造者袁世凱手中。袁世凱是一介武夫，1909年滿清攝政王載灃以宣統皇帝的名義發佈上諭，將他開缺回籍，在此之前，他已經在清朝的官僚體系中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最終，在革命烽火中搖搖欲墜的清廷不得不召回袁世凱，並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正是在這個位子上，袁世凱主持了與南方的議和，迫使清帝退位，為自己謀得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袁世凱麾下的北洋諸將很快就主宰了大半個中國，各自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不過在陝西，掌權的並不是袁世凱的嫡系，而是在哥老會領導的革命中脫穎而出的武將，他們和其他機會主義者成為新政權的基礎。由於缺乏財政支撐，陝西軍閥很快就開始推廣鴉片種植並徵收煙稅，以維持其不斷擴張的軍力。士兵領不到餉，就去當土匪。依舊閉塞，依舊隔絕於全國的經濟發展之外，陝西越來越落後於沿海地區。另一場革命必將爆發於三秦大地，不過其醞釀仍有待時日。

155 李文正：〈榆林辛亥革命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5冊，頁73–87。

156 Borst-Smith, *Caught in Revolution*, pp. 47–54, 76–77, 89.

157 Jacobson, “Brotherhood and Society,” pp. 260–279, 284.

第二章

陝西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

在很多方面，陝西的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其他省份沒有甚麼不同：精英學校的年輕學生受到新思想和激情澎湃的愛國主義鼓動，與同氣相求的朋友聚在一起，出版刊物，就社會改革和民族復興表達日益激進的思想。不過陝西還是有迴異於他省的特點，當地年輕人的關注點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本身閉塞的地理條件和文化上的保守傾向。為理解陝西革命漫長而曲折的過程，我們須同時把握其共性與特性。前者讓陝西革命成為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後者使革命在陝西的沃土中紮根。這兩種特質在革命史中長期共存，時不時地體現為地方和中央的尖銳衝突。儘管陝北在1935至1948年間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地方黨和中共中央之間的張力始終存在。要理解這種動態關係，我們必須從陝西黨早期的歷史講起。

五四和新文化運動

民國初年，北京既是中國的政治首都也是文化中心。袁世凱的中華民國總統身份隨着帝制復辟失敗和他本人在1916年一命嗚呼而畫上句號。袁的繼任者是一連串短命而無所作為的軍閥政

府，他們的保守主義傾向和在治國方面的無能，挫敗了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巨大期待。孫中山被流放，他創建的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儘管內鬥不斷，國民黨仍勉力在遙遠的南方、孫的家鄉廣東省維持着一塊脆弱的地盤。

在艱難時世中，中國的知識分子投入關於中國問題的根源及出路的廣泛討論中。北京雲集了一批這樣胸懷天下的知識分子，北京大學卓越的師資和思想活力、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新式師範教育和親民的學費吸引着全國各地有抱負、有天分的年輕人。身為精英學校的大學生，他們已然是天之驕子。儘管很多人出身於社會資源有限的農村家庭，老師和朋輩卻能激勵並支持他們到沿海城市探索新知。在國家的首都，陝西籍的學生是一個獨特的小群體，他們喜歡聚在一處，搭夥吃飯，共享家鄉風味。北京菜不合他們的口味，每逢週末或假期，他們都會聚在一起，大吃一頓陝西菜。¹ 他們的住處附近有許多青年學子，1918年毛澤東旅居北京的時候就住隔壁的一個大院。² 陝西學子深切地關注着家鄉所經受的苦難，並成立了一個本省學生的小團體，呼籲陝西的大小軍閥停止互相殘殺。他們還出版了一本名為《秦劫痛話》的小冊子，揭露家鄉的「黑暗」與「落後」。³

1 楊鍾健：〈關於共進社的回憶〉，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共進社和〈共進〉雜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後文引作《共進社》），頁407–408；楊鍾健訪談（1959），出處同前，頁420；王伯材訪談（1965），出處同前，頁457；張寶同：〈旅京學生群體與中共陝西早期黨組織的源起〉，《蘇區研究》2020年第2期，頁13–24。

2 陝西學生的住處和「伙食團」在景山公園東邊，位於吉安所左巷6號，毛住在8號。<http://m.china5080.com/detail/544209.html>（2020年7月17日檢索）。

3 楊鍾健：〈關於共進社的回憶〉，《共進社》，頁403–404。

在這些學生中，有出身關中興平縣農民家庭的魏野時和陝北綏德縣一位銀匠的兒子李子洲。兩人曾一道在西安求學，師從一位進步教師，這位教師受過孫中山「振興中華」大業的感召。魏、李二人到北京求學之時，正趕上1919年的五四運動——那是一場旨在抗議《凡爾賽和約》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移交給日本的愛國學生運動。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激進的知識分子創辦了一大批生機勃勃的學生刊物，應此潮流，1920年1月，陝西籍的激進年輕人創辦了一本名為《秦鐘》的雜誌。

五四時期，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沉浸在以民主與科學為鵠的新文化思潮中，《秦鐘》充分體現了這樣的時代風貌。⁴ 它的辦刊宗旨是自由、公理和人權——這本是共和革命的應有之義，卻被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所阻斷。時人普遍認為中國是沉睡的巨人，《秦鐘》亦有感於此，遂致力於喚起陝西年輕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舊道德不適於現世生存之道德也」。⁵ 魏野時向陝西的讀者介紹「潼關外的新思想」，潼關長久以來是陝西躲避外界入侵的一道屏障，但在當時卻成為新思想自沿海向西部內陸傳播的障礙。所謂新思潮的要義是：「(1) 科學的態度，(2) 民治的精神，(3) 改進的人生

-
- 4 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nd Vera 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兩書是關於五四運動的經典之作。〈魏野時〉，參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5卷，頁131-174；〈李子洲〉，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卷，頁77-100。若想了解時人對相關問題及陝西籍學生出版物的記述，參見楊鍾健：〈談陝西近年青年界出版物〉，《共進》第65期（1924年7月10日），頁1-6。
- 5 〈發刊辭〉，《秦鐘》第1期（1920年1月20日），頁2。關於「覺悟」的主題參見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63.

觀。」魏野時尤其提倡以批判的精神看待中國文化中的古老教條，鼓勵年輕人多問「為甚麼？」⁶五四青年所宣揚的科學，其實是這種批判精神——並不是日後所理解的通過科技進步實現經濟發展。此後幾期《秦鐘》宣傳了民主的理念，使用的是「德莫克拉西」這一五四時期的字眼，而不是後來的「民主」。「德莫克拉西」的說法強調的是西方語境中的自由民主的含義。⁷

《秦鐘》很快招致陝西保守的民政及軍事首腦的不滿：它所使用的白話、它對孔教的批評、它在男女平等方面的激進主張，這一切都讓他們大為光火。⁸1920年的夏天，外部壓力與內部分歧致使這本雜誌停刊，次年創刊的《共進》延續了《秦鐘》的辦刊宗旨。《共進》是學生團體「共進社」的同人刊物。四年之後，魏野時在回顧共進社的緣起時說：「吾社本應五四運動之含渾幼稚的文化運動而生，故有向上、向新、純潔之色彩；是很浪漫而思想不集中的，故對於種種問題可談……因初係朋友之結合，故重在友誼，感情方面，以為好友即同志。」由於缺乏共同宗旨，而且成員之間的生活條件迥異，共進社內部出現了眾多不同意見並很快分裂，幾乎半數成員離開。⁹發表上述講話之時，魏野時已經是一名中共黨員，主

6 魏風標(魏野時)：〈潼關外的新思潮〉，《秦鐘》第1期(1920年1月20日)，頁8-9。

7 《秦鐘》第1期，頁14、21；第5期，頁28；第6期，頁26都有相關的例子。

8 楊沛：〈陝西要人與過激黨〉，《秦鐘》第5期(1920年5月20日)，頁25-28。

9 魏野時：〈共進社第二屆代表大會總報告〉，1925年7月25日，重印於《共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8。此次分裂產生了一個更溫和、更親國民黨的組織：進化社。參見楊明軒：〈共進社與西北革命〉，《共進社》，頁429。這個過程正好扣合了方德萬的精彩描述，參見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張以更有紀律的方式從事政治鬥爭，儘管這樣的轉變需要時日。共進社的建社章程中確曾稱其成員為「同志」，但在1922年，這個詞的含義僅僅是「本社既由同志組合而成，當然含有修養意味在內」，協會對其成員在「氣味與品格」方面有某種最低標準的約束。¹⁰最初，共進社是一個致力於引領本省發展的進步知識分子的團體，在他們看來，為實現這一目標，個人品格的示範作用和政治動員是並重的。

像《秦鐘》一樣，《共進》上發表的文章涉及新文化運動方方面面的經典議題：白話的運用，教育改革，反對尊孔，將父權制批評為專制主義的社會基礎，廢除包辦婚姻，鴉片的罪惡，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威脅，中國覺醒的年輕人將成為未來的希望等等。¹¹漸漸地，關於社會和文化改良的議題中加進了左翼的政治主題，但這並不是一個朝着馬克思主義正統學說筆直演進的過程。在國家和地方局勢變動不居的情況下，每一個進步的陝西青年都在以他（此時仍只限於男性）自己的方式，努力探尋更可行的政治方案。這些年輕知識分子的激進轉型體現在《共進》對布爾什維克和俄國革命的討論中。

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中掌權，經由外國媒體傳到中國的相關消息要麼含混不清，要麼充滿敵意。1918年7月，戲劇性的轉折點到來：精力充沛、大有影響力的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發表了讚頌這場革命的一系列文章。李大釗在北京年輕的激進主義者中享有很高的聲望，英國學者方德萬曾恰如其分地形容李大釗是一位「父親般的保護人」。¹²一般認為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其實1921年十幾個知識分子聚集到上海參加第一次

10 〈1922年本社議案概略〉，《共進》第23期（1922年10月10日），《共進社》，頁20–21。

11 《共進》，第1–105期（1921–1925）。

12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p. 70.

黨代會的時候，他並不在場。李大釗關於俄國革命的最早一批文章，與其說體現了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平民主義思想和千禧年熱情 (chiliastic enthusiasm)¹³ 的雜燴。¹⁴ 當時，李子洲 (他是北大的學生) 和魏野時都是李大釗的追隨者，據說李大釗還是兩人的入黨介紹人。¹⁵ 有這樣的淵源，陝西激進學生刊物中介紹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迥異於任何正統的馬列主義就沒甚麼可奇怪的了。

《秦鐘》的倒數第二期刊登了第一篇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文章。文章開頭就批評當時把「布爾什維克主義」譯成「過激黨」是錯誤的，是受了「小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誤導。作者自稱無意也無力分析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與分配的那一攬子經濟理論，而是將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三項基本原則概括為：推翻軍國主義、打倒特殊階級、消滅私有財產，其目標是「平等、幸福、正義和人道」。儘管這種理解相當天真，文章卻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避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法是建立一個安全、自由、平等、民主的中國。可

13 “chiliastic”即千禧年主義或千年至福說，據《聖經啟示錄》，世界末日來臨前，耶穌將再次降臨，統治人間一千年。由此引申，認為千年為一新的輪迴，屆時世界的秩序將被重新定義的學說被稱作「千禧年主義」。——譯者註。

14 Maurice J.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52–89; Ishikawa Yoshihir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16–80;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pp. 23–35.

15 參見《中共歷史人物傳》中關於魏野時 (第5卷，頁139) 和李子洲 (第7卷，頁80) 的部分。之所以「據說」，是因為目前沒有當時的記載可以證明魏、李二人是如何入黨的，到了1930年代，兩人都已犧牲。把備受敬仰的李大釗說成他們的入黨介紹人，可能是提高這兩位革命烈士聲望的一種手段。

見，在那一時期，即1920年夏，《秦鐘》仍將布爾什維克主義視作一條通過民主改革可以避免的激進道路。¹⁶

到了1922年夏天，共進社更像是中共的一個外圍組織了。7月，它重印了黨於1922年6月15日發表的宣言。這份宣言發表於中共與國民黨組成統一戰線之後，其中稱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但同時強調因為無產階級尚未成熟，還不能掌權，所以與民主力量的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宣言所提出的具體主張與進步知識分子的觀點及國民黨的綱領均十分吻合：關稅改革及廢除治外法權，掃除軍閥，實行普選，實現言論和集會自由，改革稅制，男女平等。¹⁷在慶祝蘇俄革命六週年的文章中，《共進》仍強調：「自然中國的問題與俄國的問題絕對不能一樣，絕對不能盲目的說人家曾怎樣，我們也應當怎樣。」¹⁸在當時，蘇俄革命還只是靈感的來源，而非要照抄的塹本。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分歧在於他們對階級鬥爭的態度。《共進》中充滿對階級的討論，但與馬克思主義通過生產關係所界定的階級很不一樣。1923年，李子洲發表了一首詩謳歌在「二七慘案」中被北方軍閥槍殺的鐵路工人。詩的第一句是「階級戰爭開始了」，但這裏所說的階級不是無產階級而是「平民階級」。¹⁹1924年一篇關於「階級鬥爭和階級意識」的文章涉及的是當時的流行話題「有槍階級」和「無槍

16 楊沛：〈陝西要人與過激黨〉，《秦鐘》第5期（1920年5月20日），頁25–28。

17 〈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共進》第17期（1922年7月10日），頁1–3。這份文件的節譯版可見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 ed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pp. 34–38.

18 〈俄羅斯革命第六週年紀念〉，《共進》第49期（1923年11月10日），頁2。

19 〈施林及「二七」被害諸烈士追悼會有感〉，《共進》第31期，1923年2月10日。

階級」。一方面，這反映了當時對「反軍閥」這一議題的普遍關注，另一方面「無槍階級」的說法一語雙關地把知識分子納入了「無產階級」的陣營。²⁰ 共進社的創始人之一劉天章（他是《共進》雜誌最高產的作者之一，後入黨，但很早就犧牲了）的一篇文章，把這種希望知識分子引領社會改良的觀點表現得尤為充分。在這篇文章中，劉暢想，驅除了人人憎恨的軍閥後，陝西應該實行「知識階級攝政」，後來，他又把那即將到來的美麗新世界描述為「知識階級專政時代」。²¹

假以時日，這些年輕的激進分子會明白：僅憑學生和知識分子是無法改造中國的。當時，他們的觀點還遠稱不上是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1925年，共進社第二屆會議這樣定義中國的「兩大階級」：

一為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軍閥，與軍閥之走狗政客官僚，劣紳污吏，同一切惡勢力合為統治階級；一為受此統治階級壓迫之大多數民眾，農工小商，被統治階級。²²

此處對於「階級」的定義是相當寬泛的，它將世界劃分為兩大陣營：一方是帝國主義及其盟友——軍閥，另一方是中國人民這一龐大的群體。由此，人們不難聯想毛澤東早年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²³ 更重要的是，它也吻合了國民黨的主張：針對軍閥和帝國主義這兩大痼疾發起廣泛的群眾運動。

20 〈階級鬥爭和階級意識〉，《共進》第60期（1924年4月20日），頁1-2。
《共進》第8期（1922年1月25日）第1頁上亦有號召「無槍階級」反抗軍閥的文章。

21 （劉）天章：〈去劉之後〉，《共進》第16期（1922年6月25日）。

22 〈第二屆代表大會宣言〉，《共進》（1983年重印本），第2卷，頁1。

23 《湘江評論》第2-4期（1919年7-8月），英譯文見Stuart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M.E. Sharpe, 1992), vol. 1, pp. 378-389.

改造落後省份

在上述各個層面，即將成為陝西共產主義運動領導者的青年革命者們，跟其他地方的早期共產黨人沒甚麼兩樣：他們是一群年輕的男性愛國者，在沿海城市接受了科學、民主等五四思潮的洗禮，他們反對獨裁、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受到蘇俄革命的啟發但並不是百分百地清楚何為馬列主義，他們是孫中山領導、共產黨支持的革命運動熱情的支持者。此外，陝西獨特的地理、人文條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他們的關切和信仰。

關於陝西，或者確切地說整個中國大西北，最深入人心的印象就是封閉、落後。《秦鐘》在比較了陝西和其他地方所取得的進展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地處西陲，交通既不便利，消息又不靈通，地方那樣的黑暗，人民老舊頑固，甚麼新文化、新思潮也沒有人起來提倡，起來鼓吹。」²⁴ 一篇名為〈陝西的恥辱〉的文章將陝西的保守文化歸因於「交通不便，很少受外界的刺激」。²⁵ 為了改變這種閉塞的狀態，自晚清時就擬議修建一條連接西安和沿海地區的隴海線，但直到1934年12月才竣工。²⁶ 外國人也認為陝西「古老而閉塞」，他們說從北京到西安花的時間比從北京到倫敦還要長。²⁷ 在其他省份大步前進的時候，地處內陸、與世隔絕的陝西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頭。陝省年輕人的絕望是顯然易見的：「吾陝處於僻背地

24 〈秦鐘月刊宗旨的解釋〉，《秦鐘》第2期（1920年2月20日）。

25 〈陝西的恥辱〉，《共進》第18期（1922年7月25日），頁1。

26 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p. 113; 中共陝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黨史研究室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頁222–223。

27 Ernest Frank Borst-Smith,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p. 17–18.

方，離那新潮流很遠；恐怕到現在還是從前的老法子。假若長此以往，不但不能同西洋競爭；就是連別省他都趕不上。」²⁸

反對本省軍閥統治最能喚起年輕知識分子的熱情。當然，掃除軍閥的願望不為陝西一省獨有：這是五四時期的作品中一個常見的主題。軍閥這一新興武裝階級冒犯了中國文官統治的傳統，阻礙了年輕知識分子政治抱負的施展，也與一戰後全球反對軍國主義的大潮背道而馳。²⁹ 在陝西，陳樹藩首先成為年輕知識分子圍攻的對象，陳是陝西督軍，也是哥老會的成員。辛亥年，他在最後關頭倒戈加入革命一方，之後又靠巴結袁世凱和其繼任爬上高位。身為一名陝西土著，陳的嚴苛統治受到進步知識分子的普遍憎恨。³⁰ 1920年代初，反對軍閥劉鎮華的激烈而持久的運動開始了，劉是河南人，他自1921年秋起執掌陝西。「倒劉」運動兼具正義的知識分子反對「有槍階級」的訴求和「陝人治陝」的本土意識。³¹ 後者獲得了廣泛的支持，革命青年們希望引入新思想，指引「落後」的家鄉進步，但他們並不要外省來的政治領袖。劉鎮華一貫被他們斥為河南的「土匪」。省內小軍閥混戰不休、為擴充稅源而廣種鴉片、吏治腐敗、社會秩序混亂，這些都被算在了劉的頭上，他幾乎代表了軍閥治下陝西的一切問題。³²

28 曹配言：〈我對於陝西教育的意見〉，《秦鐘》第1期（1920年1月20日），頁13–14。

29 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Lond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3), pp. 64–81;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9–54。

30 張鈞：〈民國初年的陝西政局〉，《辛亥革命在陝西》，頁842–848。

31 See Keyte, *Passing of the Dragon*, p. 262. 關於辛亥革命中「陝人治陝」的「狹隘與自大」的討論。

32 參見署名「本社同人」的欄目「評壇」中的〈去劉篇〉，《共進》第5–8期（1921年12月10日–1922年1月25日）。李永春、雒麗：〈陝西驅劉運動初探〉，《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頁114–120。

在中國的沿海省份，變化是具體可感的：五四以來新文化的傳播、教育改革、交通和信息傳播技術的進步、新的市政管理等，趁歐洲尚未從一戰中完全恢復，工業也獲得爆發式發展。但在陝西，形勢卻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變化。評論者認為導致本省情形比帝制時代更加糟糕的原因主要有三條：軍閥、鴉片和土匪。辛亥革命的一個副產品是極大地擴充了陝西的武裝力量：因為陝西的革命者要在東（河南）西（甘肅）兩個方向上抗擊清軍。哥老會的各個幫派攫取了縣一級的權力，軍老爺們打來打去，一邊自保，一邊擴充地盤，這讓陝西的元氣大傷。為了籌措軍費，軍閥們開始加稅。鴉片稅的油水最肥，這些土皇帝們為了開拓稅源力推鴉片生產，導致灌溉條件最好的田地裏大面積地種上了鴉片，晚清的禁煙前功盡棄。³³

軍閥統治帶來的另一惡果是土匪叢生。匪患始自1911年鼎革之際，在1920年代，其規模及危害均有所增加。小軍閥之間攻伐不斷，戰敗一方的士兵要麼加入土匪組織，要麼扔掉武器、倉皇而逃，這使得那些亡命之徒極易獲得槍枝。土匪打劫商人阻礙了經

33 清朝在陝西查禁鴉片的歷史較為複雜。華萊士 (Harold Frank Wallace) 在1911年一次穿越陝西的旅程中發現，禁抽鴉片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以至於吸食煙草的人增加了。*The Big Gam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Being an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Shanghai to London Overland across the Gobi Desert* (New York: Duffield & Co., 1913), p. 30. 但另一方面，Edward Alsworth Ross在*The Changing Chines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1), p. 139引用了當地的一句諺語：「十個陝西人裏有十一個抽大煙！」到民國初年，禁煙運動顯然已經失敗。參見Alexander Hosie, *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 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 (Boston: Small Maynard & Co., 1914). 進步知識分子對此無疑相當關切。參見《共進》第8期（1922年1月25日）；第10期（1922年2月25日）；第11期（1923年3月10日）；第12期（1922年3月25日）。

濟的發展，令學子們赴京求學旅程十分艱難，從而讓陝西被隔絕在現代文明的影響之外。³⁴《共進》曾經刊登一篇關於「陝西土匪」的長篇雄文，指出清朝的時候，土匪比現在少得多，而且多聚集在關中以北的黃龍山上，很少襲擊無辜的村民。³⁵辛亥革命之前到過陝西的外國人有同樣的觀感。1908至1909年，一支美國考察團途經陝北，據他們說，延安南邊的山裏以前偶爾有強盜出沒，但在他們旅行時，路況已有改善，一支駐紮在附近的軍隊基本上解決了匪患問題。³⁶《共進》上的文章認為，民國時期的匪患是領導過辛亥革命的那些「無知識的革命家」和哥老會的「流氓」所造成的。對上一輩革命者來說，哥老會確實曾是一股參與推翻滿清統治的民間力量。但到了1920年代，哥老會已經成為目不識丁、文化保守的不安定因素，他們鼓勵土匪兄弟去當兵，結果卻是「越招而匪越聚越多」。領不到餉的士兵會發動兵變，佔據一個鎮子，之後就等待被招撫，這常常是他們獲得官方承認、獲得給養，甚至是在正規軍中得到提拔的途徑。當土匪被世人看作「升官發財之捷徑」。有時候，那些遵紀守法、老實巴交的農民也會為了解決與鄰里的宿仇加入匪幫；學生畢業後就業無門，也會把土匪窩當作「消納所」。最

34 楊鍾健：〈關於共進社的回憶〉，《共進社》，頁403、417。楊甚至建議陝北的學生赴京求學時應取道山西，這條路線土匪少一些、安全一些。共進社裏很多人持此主張，這為日後的革命播下了種子。

35 劉天章（賴泥）：〈陝西的土匪〉，《共進》第19期（1922年8月10日），頁2。

36 Robert Sterling Clark et al., *Through Shê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etc.]: T. F. Unwin, 1912), p. 34. See also Kyte, *Passing of the Dragon*; Borst-Smith,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Edward Alsworth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1), p. 266, 書中提到，他們駕馭着駱駝大篷車在夜間趕路以避免與騾子馱隊發生衝突。到了二三十年代，夜行是根本不可能的。

終，陝西的土匪問題被歸咎於官員：「匪不得官家之庇蔭養育，接濟槍械子彈，匪焰不能日漲不已。」³⁷ 一位外國旅行者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陝西的土匪大多曾是士兵或哥老會的成員，省裏的正規軍也是由這些人組成的，兵和匪的身份不時互換。」³⁸

我們將會看到，稍晚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共產黨人也把土匪當作可以利用的革命力量；但在1920年代，《共進》雜誌的那些激進知識分子卻將土匪視作危害人民的瘟疫。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案與晚清沒多少不同：「呼籲賢良士紳組織民團，尋求地方自治之途。」³⁹ 不幸的是，組織民團最好的辦法常常是招募那些已經佔據了某一市鎮、正等着招安的土匪。土匪就這樣成為陝西社會與政治機體的構成元素，以至於人們習慣以「土匪」稱呼自己的對頭。總體而言，這不是一群隱匿在山林裏的羅賓漢式的強盜。他們成群結夥，匪股常以百十計算，佔領山村或市鎮。與當地民團相比，他們的裝備更好，戰鬥意志更堅決，是令人生畏的武裝勢力。像那些收稅的本地軍閥一樣，土匪也在自己的地盤上收取保護費。從各方面來說，他們無疑都是「有槍階級」的一部分，也是進步知識分子所反對的勢力。

在由軍閥、鴉片、土匪構成的險惡環境中，陝西各地冒出的新式學校既是變革的主要力量，也是與當局衝突的導火索。一旦在北京或其他沿海城市完成了學業，進步學生就不願意回到他們深

37 劉天章：〈陝西的土匪〉。最近袁文偉關於中國西北地區土匪問題的研究使用了大量檔案記錄。袁文偉：《反叛與復仇——民國時期的西北土匪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尤其是頁56–57、92–93、112、134–135。

38 Eric Teichman,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p. 74.

39 劉天章：〈陝西的土匪〉。

惡痛絕的省機構謀職。⁴⁰ 新式學校是青年學生們的首選，這些學校往往受同情學生的地方精英庇護。學生和進步教師與教育機構中的保守力量一貫不和，罷課是常事。自然，大多數新式學校位於關中地區，尤其是西安市和三原縣，兩地是關中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在陝北，確切地說是陝省東北角那些略富裕、教育條件略好的地方，也有一些現代化的學校。

1916年，井岳秀被任命為榆林警備第三區司令，直到1936年意外身亡：當時他正在煙榻上抽大煙，手槍跌落並走火。井是一名軍校畢業生，出身於關中蒲城縣一戶富有的商人家庭，在晚清，他靠豐厚的家產而非他本人的學歷弄到了省諮議局議員的位子。他的弟弟井勿幕曾留學日本，在1906年回國創辦了同盟會陝西分部。井岳秀跟革命黨和參與辛亥起事的哥老會頭領關係都不錯，且在保衛新政權的過程中有不俗的表現，因而當上榆林的軍事指揮官，此後20年一直是陝北的「土皇帝」，其間他調解了幾次蒙漢矛盾，剿過匪，也用徵鴉片稅的辦法支撐軍費開支。他推動了當地教育、工業的發展以及軍事現代化。儘管後來他成為一個頑固的反共分子，但在1920年代初，他對國民黨的支持以及他在當地教育、工業和軍事現代化方面的種種努力，都使得他成為早期進步人士事實上的盟友。⁴¹

井岳秀創建的榆林中學面向陝北23縣招生，這所學校成為早期激進學者的聚集之地。校長杜斌丞出身於鄰縣米脂一戶顯赫士紳家庭，他從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返鄉後，致力於榆林的教育改革，先是被任命為榆林中學的教導主任，後又當上校長。1920

40 楊明軒：〈共進社與西北革命〉，《共進社》，頁429。

41 張始峰：〈民國梟雄井岳秀〉，《蘭台世界》2012年7月上旬，頁45-46；榆林地區地方志指導小組編：《榆林地區志》（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頁747；《陝西通志續編》，第7冊，頁3693。

年代初，他請魏野時和李子洲到榆林中學任教。他們的學生中，日後有兩人成為了陝北游擊隊運動的領導人：劉志丹和謝子長。高崗——這位抗戰時最風光的陝北領導人、1949至1953年的國家領導人——曾因領導反對「奴化教育」的抗議活動被原來的學校開除，杜斌丞把他收留到榆林中學。⁴²魏野時在榆林的教職很快因為保守派的反對而泡湯；但在1924年，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在陝西東北部另一個較富裕的重鎮綏德建立。綏德人李子洲被任命為校長。在一位同情革命的縣長的護翼之下，李在他的學生中發展共進社和國民黨的組織，之後又從這些人中汲取精英分子加入共產黨。⁴³

1920年代，在李子洲的影響下，綏德成為陝北進步活動的中心。外來幹部一般認為此地落後到令人絕望，「比東南省份落後三四個世紀」。⁴⁴這不像是一個能夠成為革命搖籃的地方。他們用老話寫道：「陝北，地瘠民貧，而一般農民的革命情緒，較漢南與關中道更為落後。」⁴⁵但綏德是陝北的文化中心，當地精英階層思想

42 〈杜斌丞〉，《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第54卷，頁288–291；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13–18。

43 田伯蔭：〈陝北建黨及活動情況〉，《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2期，頁2–4；何寓礎：〈綏德四師黨的活動簡況〉，《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7期，頁14–21。

44 任子良給中央的報告，1922年8月22日。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不詳：1991），第2冊，頁411。任來自四川，對調去陝北極不滿意，經常要求調離。這一時期黨的文件在後來重印時常由編者加標題，我在本書中多代之以包含作者和時期等關鍵信息的概括性標題。《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分甲篇和乙篇，以下相關引註，若非特別標明「乙篇」，均引自「甲篇」。

45 陝甘軍事委員會的決議，1927年11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66。

開通，這裏禁煙禁賭，年輕女子可以剪髮、穿裙子，走街穿巷去上學。當地黨組織視北京的李大釗為領袖，除了李子洲，李大釗還派了幾個學生到綏德教書並做革命的發動工作。在綏德師範，李子洲公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述，旗幟鮮明地支持孫中山的聯俄政策。當地軍隊規模不大，但態度積極，共產黨人很快就在軍隊的基層單位有了話語權。⁴⁶ 共產黨人對教育機構的掌控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很快，黨就能在當地的中小學安插黨員擔任教職。在學校裏，進步教師們組織年輕人對他們關心的文化議題進行討論：反對纏足和包辦婚姻，支持女生剪短髮。保守的老師仍主張尊重傳統習俗，維護三綱五常，常常成為學生抗議的目標。然而，學生們的主張與農民大眾有不小的隔膜，當學生們的「反迷信」行為變成對當地廟宇的破壞時，不少農民組成「神兵」前來抵制。⁴⁷

到1926年年底，魏野時和李子洲都離開了陝北。綏德周邊縣份的激進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的活動還在繼續，但新舊勢力衝突的中心已從綏德轉移到教育更發達的關中地區。在西安周邊地區，學生們不斷發起針對保守當局的抗議行動，抗議的由頭包括與他們切身相關的事務，如儒學教育、禁止女生剪髮、軍閥攻擊學生，也包括諸如華盛頓會議、日本侵佔東北、孫中山在1925年發起的國民會議、同年春天追悼孫中山等全國性事務。⁴⁸

46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出版地不詳：1958），頁125–138；〈李子洲〉，《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卷，頁82–86。謝子長是綏德地區的軍官，後來成為這一帶游擊隊運動的領袖，我們在下一章會對此人詳細討論。

47 李景林1945年7月4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48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34–107；《共進》雜誌中的相關內容隨處可見。

黨史通常將大規模的學運歸功於共產黨的領導，但同時期的檔案材料卻顯示了不同的圖景。黨中央派出的代表1922年才從武漢抵陝，但他們的組織關係屬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1924年的一份報告中，他們聲稱「在這暗無天日的陝西」根本沒法公開開展工作。⁴⁹ 這些人在經濟上完全依賴中央且不停地要求更多的經費。⁵⁰ 他們所有的活動都在學校進行，工作的開展有賴於教師當中為數不多的幾個共產黨員。⁵¹ 即便在學生當中，黨員的數量也是很少的。在學校裏，黨更善於操縱學生組織而不是直接跟眾多學生打交道。⁵² 共產黨員們同時面臨來自左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右派的國民黨保守分子的競爭。⁵³ 那些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也認為條件尚未成熟，他們衷心擁護的是國民黨關於國民革命的主張。⁵⁴ 在1925年年初，西安有兩個相互競爭的社會主義的青年組織，各有十來個成員，雙方互不信任，尤其是那些非學生成員，他們道德鬆懈，被說成一身「氓」氣。當對立一方的成員去看戲、

49 王尚德給鄧中夏的信，1924年6月1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3。

50 王尚德，1924年12月28日；李秉乾，1924年12月18日；張秉仁、吳華梓關於西安的報告，1925年10月1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4、64、111。

51 耿炳光關於陝北的報告，1926年6月1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341。

52 張秉仁、吳華梓關於西安的報告，1925年10月1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105；西安報告，1926年1月31日，出處同上，頁130。

53 參見1924年12月、1925年8月22日、1926年5月18日的報告，見《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61、28、49。

54 王尚德和張秉仁的報告，1925年2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13-14。

逛妓院、抽鴉片的時候，那些循規蹈矩的青年領導人便大為光火。⁵⁵顯然，早期進步人士對於私德的堅守在陝西黨形成之初仍然存在。在陝北，由於沒有信仰堅定的教師作為領路人，即便學生們在新文化運動中覺醒，大約也只是「為肉麻的新詩及戀愛像醉麻住了」。⁵⁶

陝西左翼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取決於他們與國民黨以及有權有勢的當地精英階層的關係。《秦鐘》把榆林杜斌丞和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列為代售處聯繫人，這為該刊的激進言論提供了絕好的保護。⁵⁷杜斌丞不久便離開榆林，成為軍閥楊虎城部的總參議，在那裏他繼續與遭到圍攻的共產黨人保持聯繫並為他們提供幫助。楊虎城本人也有明顯的左傾傾向，在父親被清朝的官員絞死後，參加了辛亥革命，之後又參加了一支以「劫富濟貧」為號召的土匪武裝。楊受到井岳秀的庇護，有一次，他在關中吃了敗仗，躲到榆林休整時與魏野時交上了朋友。在軍閥當中，他與中共的那些左翼主張最有共鳴，為魏野時在西安辦的激進刊物提供了經費。⁵⁸于右任是陝西黨另一位重要的保護人。他是三原縣人，出身於一個小有資財的商人家庭並曾在晚清中過舉人，但因反滿言論為當局所不容，去了上海。1910至1912年間，他在上海為孫中山的同盟會

55 武起的報告，1925年2月7日；鄒均的報告，1925年2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68–69、75–79。

56 陝北特別委員會，1925年2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221。

57 《秦鐘》第4期（1920年4月20日），頁42。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經銷點均為學校代售。

58 李振民等編：《陝西近現代名人錄》（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第1冊，頁205–208；張秉仁、吳華梓關於西安的報告，1925年10月1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103–104。

辦過幾份頗有影響力的報紙。民國初年，孫派他回陝西，在北方為孫的革命運動創建基地。1918年，于右任和辛亥革命的元老胡景翼一起統領靖國軍。靖國軍控制了關中14個縣，其核心力量在渭北的三原縣，即于右任的家鄉。⁵⁹

三原位於肥沃的關中平原，戰國以來開掘的數條水渠滋養着這片土地。⁶⁰ 西去甘肅的路途經此地，一位西方的旅行者因之稱其為「一座在商業上相當重要的城市」。⁶¹ 更重要的是，與省內其他地方相比，三原的學校更多，教育質量更好——事實上，在清代，陝西學政不在西安，而是駐節三原。⁶² 在1920年代，當其他縣最多只有一所中學的時候，三原已經有了一所師範學院、兩所中學、一所職業學校和一所女子學校。富有活力的學生團體及學生刊物、豐富多采的課外活動、對學生持友好態度的地方官員，這些因素吸引着周邊縣份那些學業優秀、政治上活躍的學生向三原匯集。⁶³ 1925年，西安的學生與當地軍閥發生衝突並罷課，學生團體受到當局壓制，魏野時帶領其中的積極分子轉到三原繼續抗議，直到那名不受歡迎的軍閥被逐出陝西。⁶⁴ 由於三原與孫中山革命的歷史淵源和靖國軍的保護，這裏成為了革命的肥沃土壤。當時的一份學生報告誇耀說，當地有一半學生支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贊同共

59 許有成、許曉彬：《于右任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頁10-123。

60 三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三原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3、291-295。

61 Borst-Smith,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37.

62 許有成、許曉彬：《于右任傳》，頁24-25。

63 王謙益：〈回憶六十年前三原學生的革命活動〉，《三原文史資料》第2輯，1986年12月，頁120-129。

64 出處同上，頁12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75-80。

產主義青年團對孫中山大業的宣傳。另外四分之一是反對一切的搗亂分子，剩下的則是遠離政治的書蟲。⁶⁵

共產黨人在1920年代的陝西革命中扮演了關鍵作用，但他們參與的革命是國民革命，其語境是國共結成統一戰線。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工作是這條戰線的特質之一，用當時一份文件的說法：「我們所有的工作，不管是軍事工作還是農民工作，均以國民黨的名義開展。」⁶⁶事實上，陝西的國民黨組織基本上是共產黨員建立的，這是在執行中央的如下指示：「凡是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共產黨要幫助建立。」⁶⁷在省一級，國民黨的機關報是由共產黨員編輯的；李子洲任國民黨組織部部長；魏野時負責宣傳，他也是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儘管魏一直被稱作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並很早就犧牲了，但他所堅定踐行的，卻正是日後卻被批評為與國民黨合作的「機會主義」路線。我們很難從一個人的行動中判斷出他最基本的信仰所在。⁶⁸

1925年的一份黨內文件呈現了早期中共黨員在這方面的共識：

一部分贊成而深信共產黨〔的青年學生〕，因在陝西鄙塞之地，恐遭一般無識社會之猜忌與破壞，而不願立即加入；有一部分亦深信而贊成共產主義，因現社會正需國民革命，故願加入國民黨，而謂共產主義之難以實現，不願立刻加入。……可知對主義很表贊成，惟感實行之困難。須知此

65 三原共產主義青年團向中央的報告，1926年6月1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458。

66 張某某的報告，1926年10月，參見《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4年第1期，頁17。同樣來源的這批文獻已無法查對，引文均係據英文譯出並經作者確認，下同。——譯者註。

67 《三原縣志》，頁676；《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89-90。

68 〈魏野時〉，《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卷，頁143-153；白超然：〈讀了《共進社簡史》三篇文章後的幾個意見〉，《共進社》，頁443。

種團體，在目前情況之下，只能秘密宣傳，實際做事，則毫不顯露。不過暗中與國內外相同之團體互通消息，取一致行動，以期將來之實現。目前行動，仍不外國民革命之工作與宣傳；且借他團體，實行本黨之主張，即中國國民黨之所以忽有起色，大施宣傳者，完全由本黨進步分子加入之緣故。⁶⁹

在國民革命時期，不管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做出了怎樣的貢獻，不管他們如何忠於黨中央及共產國際，也不管他們從兩處獲取了多少經費，1920年代革命的公開面孔仍是國民黨旗幟下的國民革命。

新式學校裏那些被喚起的年輕人為革命注入了的極大的動力並成為領導力量。但到了1920年中期，形勢已相當明朗：僅靠知識分子並不能改變中國。革命需要槍桿子。為此，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了黃埔軍校，蘇聯為其提供經費支持、軍火彈藥以及辦學指導。校長蔣介石起到了制約共產主義勢力的作用。像劉志丹一樣的陝西籍共產黨員被黨派到黃埔軍校，以國民黨員的名義接受軍事訓練。從三原各校保送到黃埔軍校一至四期學習的就有八十多人。⁷⁰ 革命也需要群眾基礎。為此，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曾一度主持農講所的工作，設計課程以訓練年輕幹部到農村發動農民。在陝西這樣以農業為主的省份，所有人都知道革命的動力來自農民。為此，三原派了一批年輕人到廣州參加培訓。⁷¹

此類活動因五卅運動激起的全國性的反帝情緒而如火如荼。1926年，蔣介石在國民黨的旗幟下發動了旨在統一全國的北伐戰

69 王尚德和張秉仁的報告，1925年2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13-14。

70 許有成、許曉彬：《于右任傳》，頁130。

71 〈魏野時〉，《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卷，頁152-153；《三原縣志》，頁26。

爭，這使陝西的革命運動獲得新的動力。伴隨北伐，長江流域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以毛澤東為核心領導人的湖南農運尤為突出。⁷² 陝西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馮玉祥和國民軍的到來將革命運動帶入新的階段。

馮玉祥和陝西的國民革命

據說，被稱作「基督將軍」的馮玉祥曾用消防水龍頭為他的部隊施洗。同時他也是一位開明軍閥。他努力規訓部下，告誡他們潔身自好，愛惜百姓。1924年他打進北京，把晚清的廢帝溥儀趕出紫禁城，並把自己的部隊命名為「國民軍」，因之暴得大名。他日漸崛起的實力和所持的相對開明的立場引起了蘇聯的注意，後者當時正在中國北方尋找一名可以制衡與呼應南方國民黨勢力的盟友，馮開始接受來自蘇聯的武器。不過，很快，他的部隊就遭遇了挫折，退守到察哈爾和綏遠（兩地今屬內蒙）的大本營。為了東山再起，馮於1926年春訪問了蘇聯，同時派人到廣州與國民黨討論結盟事宜。在去莫斯科的路上，馮玉祥遇到了于右任，于力促馮玉祥與國民黨合作，同時也希望他考慮以陝西為大本營。8月，馮玉祥回國，帶回蘇聯軍事顧問和曾在莫斯科學習過的中共黨員（其中包括鄧小平）。通過蒙古運送武器裝備的曲折交通線也建立起來了。與此同時，馮玉祥當選為國民黨中執委委員，9月，他在位於內蒙大草原的五原縣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誓師儀式，表示他的部

72 Angus W. McDonald,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 264–271.

隊將致力於實現孫中山的革命目標，並與一切贊助這一目標的國家——也就是蘇聯——締結友好關係。⁷³

劉鎮華1926年春回陝後，對西安實施了曠日持久的圍困。同年秋天，馮率部快速穿越甘肅抵達陝西，解了西安的圍，將劉部趕回河南老家。到1927年年初，整個關中地區已落入這個國民黨和蘇聯人的盟友之手。在「落後」與「黑暗」中掙扎多年，這一地區突然有望成為帝國主義勢力鞭長莫及的「革命的西北」。⁷⁴ 因與蘇聯之間直接的陸路交通，陝西成為國民革命的北方前線，並起到制衡廣州的作用。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左右兩派在廣州爭奪控制權的鬥爭日趨激烈。

在陝西，左派在新局面中起主導作用。從莫斯科歸來的于右任被認為是一個真誠的左派，他成了新一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他在文章中引用列寧的語錄，散發傳播列寧主義的小冊子，支持工人的權利和世界革命，一本名為《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小冊子公然在陝西的國民黨機關和軍隊裏銷售。⁷⁵ 旨在為新政權訓練幹部的中山學院在西北大學的校址上建立起來，該學院由若干位共產黨員領導，其中包括李子洲。⁷⁶ 與之同時，中山軍事學校亦在西安成立，共產黨員在其中起的作用更大。從莫斯科回來的共產黨員史可軒任軍校校長，政治部主任是鄧小平，政治指導員包括李子洲、劉志丹和幾位

73 James E. Sheridan,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122–206;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62–263, pp. 314–316; 李泰棻：《國民軍史稿》（出版地不詳：1930；曾在《西北軍紀事》中重印〔香港：1978〕），頁301–311。

74 宋嘉禾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3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10。

75 出處同上，頁8；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35、145。

76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34–135。

蘇聯紅軍軍官。⁷⁷軍校學員（包括日後成為陝北領導人的高崗）將成為重要的左翼軍事力量，與此同時，共產黨員也滲透到馮玉祥的國民軍內部，據說國民軍80%至90%的政治指導員都是共產黨員。⁷⁸楊虎城和鄧寶珊這兩位後來與共產黨多有往來的軍事將領在那時被認為是相當進步的力量，他們都樂於與共產黨互通聲息。⁷⁹宣傳工作受到了特別的重視，共產黨人主導了陝西國民黨刊物的編印。⁸⁰中共向新的陝西省政府的滲透大獲成功，後來甚至被批評做過了頭：「黨使同志佔據機關，好像是要實現C·P專政，忽略了下層工作，尤其對農村發展未曾注意。」⁸¹功利主義、就業至上的考慮威脅到了黨的革命目標：「同志們都是努力向機關中跑，離開群眾，或以黨為討飯吃、討官坐的機關。」⁸²

在推動陝西革命的過程中，中共最緊迫的任務是建黨：增加黨員數量並增強其紀律性。儘管黨在陝西省機關裏佔了不少重要位子，1927年2月，陝西僅有338名共產黨員。⁸³3月的一項指示要求在三個月之內把黨員人數增加到1,200人，其中的三分之二必

77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36–137；Sheridan, *Feng Yuhsiang*, pp. 210–214.

78 省委給綏德的指示，1927年7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59；關於高崗，參見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79 宋嘉禾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3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2–13。

80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15–116、132–133。

81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83。

82 陝甘區目前工作計劃，1927年3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23。

83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09–112。

須是農民。⁸⁴ 很快，這個指標又增加到3,000至4,000人。⁸⁵ 事實上，到了5月，黨員數量就已增加到2,170人（軍隊中還有近200人），其中52%是知識分子，30%是農民，4%是工人，5%是警察或士兵，8.5%屬其他成分。僅有的58位女黨員全部是「知識分子」（可能是學生）。⁸⁶ 共青團也經歷了類似的增長：從525人增加到2,400人。⁸⁷ 不過，黨所需要的不僅是黨員人數的增加，也需要規訓革命者：「黨的機關是職業之革命者的組織，是無產階級科學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和秘密工作應取代之前的「浪漫」行為。⁸⁸ 綏德支部因紀律鬆懈、讓奸細有機可乘，以及「思想比較單純」而遭到批評。⁸⁹ 毫無疑問，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綏德方面都是以反對纏足、反對包辦婚姻、抨擊農村迷信活動之類的文化議題動員群眾，政治覺悟遠遠不夠。在日後的回憶中，這一時期入黨的黨員說他們入黨時還得問黨到底是甚麼。有黨員甚至不知道「蘇維埃」究竟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地方。這些年輕人在對黨的信條知之甚少的情

84 西安工作計劃，1927年3月2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6-17。

85 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4。

86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87-88。8月，李子洲在向中央的口頭報告中給出了更成問題的數據：總數近似，為2,179名黨員，但他報告說其中80%是知識分子，20%是農民，幾乎沒有工人。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8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3。9月的數據可能把家在農村的學生黨員也算為農民。

87 陝甘區過去、現在與將來——團省委報告，1927年10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39。

88 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1、36。

89 省委給綏德的指示，1927年7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57-58。

況下加入了黨組織。吸引他們的是當地領導人的聲望：個人的人脈和品格遠比意識形態更重要。⁹⁰這不是省委所樂見的現象。渭南支部的派系鬥爭和地方主義被批評為「反革命的破壞黨的紀律的」。⁹¹把共進社這樣關係鬆散的友朋團體鍛造成紀律嚴明的革命組織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⁹²

儘管黨極力要求作為無產階級先鋒的黨員們在西安發動工人階級，⁹³運動的中心仍然在動員農民階層。有一種看法認為，黨的注意力轉移到農民階層上，靠的是毛澤東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並不符合事實。陝西省委當時已認識到「現在中國的革命就是農民革命的時期」。⁹⁴到1927年，被派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積極分子回到陝西，在三原縣和陝北的安定縣建立起同名的機構。學員在農運所受訓後到周邊縣份組織農民協會。一般來說，哪裏學校黨組織活躍，哪裏的農民協會就發達：三原縣及周邊縣份，關中東部的渭南地區，陝北的綏德一帶都是這樣。據說農民

90 子長縣民政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子長陵資料》，第2冊（延安：未注明出版日期，前言寫於1991年），頁109、176。

91 省委給渭南的信，1927年7月3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62-63。

92 中共在1927年對共進社的態度相當有趣：「共進社比較左的分子十之八九全為我們同志，其餘簡直是反動派……共進社被人攻擊甚力。事實上不能把共進社再拿出來。我們現在決定不許它再露頭角，一面作我們的『折（擋）箭牌』，一面令其自生自滅，在我們的組織健全時，再把我們的面目露出來。」簡言之，共進社已經徹底成為中共的外圍組織，用之、棄之都由黨決定。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50。

93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19-121。

94 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9。

協會共擁有37萬會員（另一份文件說有20萬），不過，難說農民的革命意志有多堅定。⁹⁵ 像在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農民協會大多由家在農村的青年學生領導。黨務人員發現，最成功的農民協會組織者大多是鄉村教師。在安定等縣，每一個農村黨支部的書記都由教書先生擔任。⁹⁶ 我們知道，當時的中學教育所費不貲，因此大多數人至少來自小康之家。他們所推動的運動受到其出身的限制。在農村，他們鼓勵積極分子和富農與「開明紳士」一起反對惡霸和土匪。「我們目前在農運中不能提出過高的口號，如反對一切苛捐雜稅，參加行政權等。」基層黨員被特別提醒，對馮玉祥和于右任要持支持態度。⁹⁷

95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49；政治及黨務問題報告，1928年3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19；《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22–131。三原縣的154個村子有農會，鄰近的富平縣有284個。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中共咸陽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渭北革命根據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1–2；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60；高崗1942年11月17–18日，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安定（今子長）縣早期黨組織的創建及其主要活動〉（出版地不詳：1988），由子長縣黨史辦提供的複印本。

96 陝北委員會向中央的報告，1925年4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226；中共子長縣委組織部、中共子長縣委黨史研究室、子長縣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子長縣組織史資料（1925.春–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16–18。學者對江西的類似過程有細緻分析，參見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pp. 109–143.

97 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40–43。三原縣安排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黨員擔任重要的組織者，命其與當地的民團首領一起生活。參見李鴻儒的講述，《渭北革命根據地》，頁272。

支持馮和于的命令尤為重要，它反映了陝西農民運動事實上是國民革命的一部分。正如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敘事將湖南農民運動與毛澤東及他日後在中共的崛起聯繫在一起一樣，關於陝西的歷史敘事也聚焦於黨對本省農民運動的領導作用。中共的領導角色無可置疑，不過事實的另一面是當時的農民運動是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部分，運動本身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開展起來的。當農民代表大會在陝北某縣的孔廟裏成立的時候，牆上掛的是列寧和孫中山的畫像。⁹⁸各地的農民協會均依賴於當地政府和軍方的積極支持。省教育廳廳長是一位共產黨員，他可以把左傾人士任命為縣教育局局長，而局長又可以把共產黨員及其他進步人士安插到各地學校，於是這些學校便成為當地農運的組織中心。⁹⁹馮玉祥部隊的支持也至關重要。馮命令其部下在駐防地區協助建立農民協會。¹⁰⁰中共日後曾抱怨，馮玉祥的支持力度令自己一方的行動相形失色：

當時老馮正藉（1927年）五一節宣誓擁護工農利益，促進世界革命，大出而特出其赤化風頭，反而顯得我們的宣傳很平常了。自區一再發表宣言傳單，而得的反應很少，可見群眾的心理是被老馮的口頭赤化弄得痺麻了。¹⁰¹

98 《陝西民國日報》，1927年6月20日，《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85。亦可參見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北京：出版機構不詳，2010），頁35–43。

99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41–42、51、90–91。教育廳廳長楊明軒是陝西資深的教育家和進步人士，1926年年底加入中共。李振民等編：《陝西近現代名人錄》，第1冊，頁202–205。

100 Sheridan, *Feng Yu-hsiang*, pp. 215–216.

101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34。

農民運動之迅速開展，正有賴於當局，特別是來自「槍桿子」的保護和支持。

也如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農民一旦被發動起來，就很難對其進行約束。國共兩黨的宣傳均將批判的矛頭對準「土豪劣紳」。¹⁰² 在陝西，那些打家劫舍、由散兵遊勇或欠餉士兵組成的匪幫，也成了農運的目標。為了與這些本地的敵人對抗，農民協會組織了自衛隊，不過自衛隊大多只有寥寥幾件武器，還都是由馮玉祥部同情農運的士兵所提供的。¹⁰³ 農運的全部目的是鼓動農民向壓迫者伸張自己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是對抗那些巧取豪奪的收稅人。橫徵暴斂的田賦以及花樣迭出的新稅——鹽稅、肉稅、麵粉稅、茶稅、煙稅、木材稅，尤其是鴉片稅——是軍閥統治最為人痛恨的一面。¹⁰⁴ 在農運的高潮中，稅吏自然成為打擊的目標，稅單、賬本等被付之一炬，收稅人被痛打甚至被殺。革命的懲辦對象——「劣紳」很多都是收稅的元兇。¹⁰⁵ 總體而言，1920年陝西農民運動符合畢仰高所概括的模式：這不是農民反抗地主的階級鬥爭，而是農民反對徵收無度的政權的鬥爭。¹⁰⁶

102 Huaiyin Li,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09–214; Patricia Thornton,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pp. 100–126.

103 李培文的講述，《渭北革命根據地》，頁264–265。

104 Sheridan, *Feng Yu-hsiang*, p. 25. 對軍閥時期的稅收情況給出了一份清楚的目錄。

105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21–131、151–152。

106 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 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M.E. Sharpe: 2001); Lucien Bianco with Hua Chang-ming, *Wretched Rebels: Rural Disturbances on the E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rans. Philip Lidell.

共產黨反對以「苛捐雜稅」為鬥爭目標，不過沒甚麼效果。農民恨的就是這些稅，但他們的抗稅行動妨礙到了馮玉祥政權的稅收。馮對此持暫時的容忍態度。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清黨並屠殺共產黨員，馮玉祥有些搖擺不定，似乎更傾向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但在6月與蔣介石於徐州會面之後，他準確地把握到了當時的政治風向，決定站在蔣介石一邊。他取締了轄區內的農運，關停了那些共產黨員編輯的報刊。¹⁰⁷ 陝西激進的國民革命戛然而止。馮玉祥把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打發回國，把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趕出陝西，有些也送去了蘇聯。馮沒有採用上海那種血腥清洗的模式，一種經常被提及的說法是，他將共產黨員「禮送出境」——但馮的做法卻使中共的活動轉為地下，其保存下來的有生力量也搖搖欲墜。陝西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¹⁰⁸

黨開始獨立鬧革命

早期陝西革命運動的發展基本上與國共合作聯繫在一起，而國共合作不是一夜之間結束的——不管是蔣介石4月在上海發動的清黨還是馮玉祥6月的變心，都沒有一舉終結兩黨的合作關係。很多共產黨員仍然希望與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共事。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此次會議在新一任共產國際代表羅

107 陝西省委關於軍事局勢的報告，1927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70–71；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56–157。

108 參見耿炳光、劉繼曾、王林等人的回憶，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620、631–632、638；張秀山1985年9月的訪談，收在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的文件中。Sheridan, *Feng Yu-hsiang*, pp. 216–232;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40–154。

明納茲 (Besso Lominadze) 牢牢的掌控之中。缺席此次會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在會上被指控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應為黨在蔣介石手下遭遇的失敗負責。不過，黨仍然希望能繼續與國民黨左派合作並以後者的名義發動起義。陳獨秀這一任領導人也被指控過分限制農民運動，新領導人號召「系統的、有計劃的農民起義，規模越大越好」。當然，黨很快就意識到：起義有賴於黨掌控的武裝力量，這就是毛澤東發表那句名言「槍桿子裏出政權」時的語境。新的形勢下，黨要求積極展開關於農民革命的宣傳，並將建立農村蘇維埃提上了1927年11月的議事日程。¹⁰⁹

陝西省委派李子洲從西安出發去參加此次緊急會議，不過他到武漢的時候，已經休會。¹¹⁰ 李子洲向中央做的口頭報告異常坦率，他顯然並不知道中央已有了新路線。據他說，陝西黨80%的成員是知識分子。因為之前一直跟地方要員打交道，轉型做群眾工作讓很多黨員頗感困難。發動農民革命的空間也極為有限。在關中腹地，80%的農民為自耕農，他們的不滿集中於苛捐雜稅和高利貸。陝北有很多空地，賦稅同樣是農民不滿的主要對象——尤其是鴉片稅。即便在農民協會，大多數成員也是自耕農，他們對太激進的口號不感興趣。至於馮玉祥，李子洲不建議立刻將其視作敵人，極力主張繼續在國民黨及陝西省政府內部開展工作。¹¹¹

109 Marcia R. Ristaino, *China's Art of Revolu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Discontent, 1927 and 192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9–55, 此書對八七會議做了精彩論述。關於擴大會議文件，可參閱 Saich and Yang, *Rise to Power*, pp. 296–317. 上文所引出自 Ristaino, p. 53; Saich and Yang, p. 317.

110 杜衡：〈陝西共黨沿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80–881。杜衡的陝西黨史全文現藏陝西省檔案館，從未出版。這些年我多方嘗試，至今未能得見。

111 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8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3–36。

所有這些建議，中央一項也不打算採納，李子洲遭到嚴厲批評。與馮玉祥及其軍隊合作是錯誤的，是「軍閥政客的把戲」。李子洲作為當地人對於陝西土地分配情況的切實了解，也被一概否定，中央堅持沒收地主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號。當李提出陝西的土匪不講甚麼義氣，「陝西可說兵即是匪」時，中共中央則堅持「土匪亦多半是貧苦農民」，而且湖南的經驗已經證明「地痞流氓是很勇敢的農民」。¹¹² 為地痞流氓的過激行為作辯護是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最具爭議的部分，毛本人是八七緊急會議的一個重要與會者。¹¹³ 現在，中央在回應李子洲和陝西黨的時候，就採用了毛的觀點。

李返回陝西之後，新成立的陝甘省委馬上於9月26日召開了第一次擴大會議。地方黨組織一片混亂，失敗主義的情緒四處蔓延。因馮玉祥不再支持革命，五六百名黨員脫黨，到9月，全省僅剩下1,681名黨員。¹¹⁴ 進入夏季，農民忙於田間地頭的勞作，學生們放暑假離開了學校，農村的革命組織陷於停頓。¹¹⁵ 在陝北，榆林軍閥井岳秀於7月叛變了革命，壓制中共在那裏的工作並臨時關閉

112 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及中央答覆，1927年8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3-39。

113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第1冊，頁19-20。〈報告〉的原始版本可見竹內實編：《毛澤東集》（東京：北望社，1972），第1冊，頁207-249。

114 第一次省委會議決議，1927年12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69。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73；組織工作計劃，1927年11月1日至1928年1月31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50。在黨務報告之後，同一本文件集給出的當時陝西省黨員的數字是1,591人。

115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55-156。

了綏德和榆林激進的學校，向左傾的教員和學生施加壓力，迫使他們停止大部分黨的活動。力量一度最強的綏德支部被省委批評有名利思想，學生和老師中間出現了分裂。除了一些小規模的地下工作，陝北的大部分革命活動土崩瓦解。¹¹⁶

1927年9月召開的陝甘省委會議為西北黨的組織工作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此之前沒有省委這一級設置，各地支部是鬆散的合作關係。陝甘省委位於西安，名稱中包含甘肅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願望而非現實：甘肅沒有幾個黨員，而且大多分散在軍隊裏。省委報告幾乎完全在談論陝西的問題。¹¹⁷ 當李子洲帶着八七緊急會議的指示回來之後，新省委將其視作「共產國際的指示」接受下來，並保證「完全聽從中央的指揮」。持不同見解的人被建議脫黨。¹¹⁸ 陝西黨進入到需要嚴守紀律的新時期。不過，對於如何緊跟新的路線，特別是如何繼續跟國民黨左派合作，陝西黨其實並不百分之百地清楚。

省委領導深知馮玉祥在歷史上曾與共產國際緊密合作過，因而不願意公開反馮。¹¹⁹ 當中央批評陝西黨對馮玉祥的態度游移不

116 省委給綏德的指示，1927年7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58-61；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86、93；何寓礎：〈綏德四師黨的活動簡況〉，《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7期，頁14-21；〈榆中黨組織的產生和在大革命時期的活動〉，《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7期，頁22-26。

117 1927年9月26日的報告中說陝西有2,147名黨員，而甘肅只有30名。《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13。

118 省委的聲明，1927年10月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09-211。

119 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7月11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6；耿炳光在會議上所作政治報告，1927年9月2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02。

定時，地方領導人又把希望寄託在於右任身上，當時于仍被視作可靠的國民黨左派。考慮到于當時仍是國民黨在陝西的政治領導人，而馮玉祥已離任去了河南，這似乎是一個說得過去的戰略選擇，然而8月，于亦離任，去了武漢，陝西黨失去了最後一個重要的國民黨左派盟友。¹²⁰ 省委領導人痛苦地意識到以學校為基礎建黨的弱點和局限，很多黨員被描述成「教書匠或小紳士，小政客」，「在群眾中的力量簡直等於零」。¹²¹ 黨員「取了書生的態度」，認為農民落後且無知。中央對陝西黨的這些缺點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省委立刻緊跟新的路線，支持土地分配並開始將從前不屑一顧的「紅槍會、土匪、流氓」作為依靠力量。¹²² 如當時一句流行的口號所說，黨現在要「反對書生姑娘習氣，提倡暴徒潑婦精神」。¹²³ 不過，上述措施收效甚微，黨的革命動員工作主要還是得圍繞陝西的軍隊展開。

黨認為，楊虎城和鄧寶珊是兩位對革命同情之至的軍事將領。一些中共黨員與楊、鄧麾下的下級軍官有共同的成長環境，

120 宋嘉禾向中央的報告，《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8-9；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44；陝西省委關於軍事局勢的報告，1927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70-71。到了1927年10月，省農會仍然號召支持「我們西北孤獨的革命領袖于右任」。省農民協會的公開信，1927年10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60-61。

121 第一次省委會議決議，1927年12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63。

122 省委擴大會議關於農民鬥爭的決議，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89-190。

123 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馬文瑞1945年7月1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可以通過同學之誼或其他社會關係向其進行革命滲透。¹²⁴日後楊虎城將在國共關係的歷史上扮演重要角色，1931年他主政陝西後，從監獄裏釋放了一批共產黨員，後又與東北軍將領張學良結為盟友，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中綁架了蔣介石。1927年，楊虎城追隨馮玉祥去了河南，陝西的共產黨領導人魏野時作為楊部的政治部主任一同前往。不過，這種關係並沒有持續下去。魏很快就到附近的安徽去發動農民運動，於1928年4月的一次暴動中被逮捕和處決，成為陝北早期革命烈士中的一位。¹²⁵鄧寶珊這位于右任的得力幹將則留任陝西，他的部隊向危難之中的中共黨員及其他左翼人士敞開懷抱。¹²⁶這些對中共抱以同情態度的軍事將領把一些知名共產黨員視作進步、愛國的同志，設法加以保護。然而中共中央的目標是發動起義。陝西黨員確實也那麼做了，不過這種零星的起義很快就被平息了，未能對新政權造成威脅。

1927至1928年的武裝起義大都發生在國共合作時期中共的組織工作已有一些基礎的地方。第一次起義發生在黃河邊的陝北小縣清澗，此地離山西不遠，盛產蜜棗和可以做磨盤的石灰石。縣城裏有很多鴉片窟和狡詐的賭棍，民風兇悍好鬥。清澗北部與綏德接壤，李子洲做過綏德師範的校長，在那裏建立了陝北最強的

124 房成祥、黃兆安：《陝甘寧邊區革命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2-3。

125 〈魏野時〉，《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卷，頁160-173。

126 耿炳光：〈我在陝西省委的工作〉，《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620；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67；陳家珍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11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81；省委關於政治軍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71-72。

黨支部。清澗和綏德西邊的安定縣也是黨的據點之一。黨組織雖是以學校為基礎發展起來的，在爭取當地部隊下級軍官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¹²⁷那裏是動員工作的希望所在。其中最有希望的是駐紮在清澗周邊五個縣的第六旅，旅長石謙在陝西武林人士中很有代表性——這些人曾經是刀客，他們以義氣著稱，很多人在辛亥革命時期參加過哥老會。¹²⁸石於1911年參軍，儘管他很早就在一次戰役中癱了腿，但卻沒有影響其亨通的官運。¹²⁹他是一位有權有勢的鴉片販子，同時，像其他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刀客一樣，他又是陝北進步人士的友人。1920年代，他派下屬李象九到北京去找李子洲，與李生活在一起，李象九在那裏先後加入了共進社和共產黨。石的兒子和義子也入了黨。在1927年初的激進時期，石對激進學生持歡迎態度，還把自己的士兵派出去幫助組織農民協會。在鄰縣安定，當地駐軍掌握在謝子長手裏，日後他將成為陝北革命的領導人和烈士，他也動員學生並派士兵去發動農民。¹³⁰

9月會議之後，省委派黃埔軍校畢業生、河北人唐澍到清澗領導起義。榆林軍閥井岳秀懷疑穿長袍的學生在他的部隊煽風點火，遂把石謙請到榆林參加他的五十歲壽宴，趁機對石下了黑手。李象九當時是石手下的一個營長，也是石的同鄉，準備為其報仇。石死後，李當上了旅長並於10月12日發動了兵變。鄰縣安定的謝

127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95-97、131-138、156-164。

128 〈關中刀客〉，《辛亥革命在陝西》，頁244-255。

129 〈白水英雄：石謙〉，<http://weinan.sanqin.com/2016/0517/210397.shtml>（2017年6月29日檢索）。

130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60；《陝西民國日報》，1927年6月20日，《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85-86；第2冊，頁179-190。

子長部也參加了這次起義。約六百到七百名裝備精良的士兵沒收了本地商人的銀錢和鴉片，他們向南穿過延長縣和延川縣，最終佔據了宜川縣。在那裏，他們解散了當地的軍隊，處死了反對他們的軍官，搶奪並「沒收」了更多的錢和鴉片，之後，唐澍把這些錢帶回西安，充作省委的經費。省委對陝北的革命潛力不無懷疑，特別是在中央強調把工作重心置於工人運動之後。在省委看來，「陝西本是中國最落後的一省。而陝北又為陝西最落後的一部分，社會經濟地位，完全是小農經濟，大生產的新式工業，在陝北的一般人簡直尚未夢想到。」¹³¹ 省委懷疑陝北共產黨人的政治成熟度，希望那些起義的士兵能繼續南移，與陝西戰略中心、中共比較活躍的關中地區那些政治性更強的部隊銜接起來。唐澍回到宜川後，開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教育，以加強部隊的正統性，這很快就與李象九產生了衝突。李更樂意與陝北的軍閥做交易。很快，軍隊中就出現了動搖、異見和叛變：士兵們參加兵變是為了給旅長報仇，仇既然已經報了，他們自然更願意與家人一起留在陝北，而不是跟着一位陌生人跑到人生地不熟的關中。那位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外鄉人唐澍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些訴求，也無視當地黨組織動員農民以獲得支持的意願，很不明智地把關注點只放在軍事戰術上。井岳秀將駐紮延安的高雙成部隊派去宜川，鎮壓了兵變，到1月，絕大多數參加兵變的士兵都投降了。唐澍逃到南方繼續革命，李

131 陝西省委關於陝北軍事活動的報告，1927年11月；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清澗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16（同樣的文件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第91-97頁也有記述，不過標注的日期1928年1月可能有誤）；省委給陝北的指示，1927年10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76-78。

象九與黨的革命運動分道揚鑣，謝子長帶領一小股隊伍在陝北堅持打游擊。¹³²

1928年初，另一更具意義的起義在關中東部的渭南縣和華縣爆發。渭華起義的參加者包括學生、農民和一支中共控制的軍隊。國共合作時期，蘇聯顧問和共產黨指導員主導了陝西的中山軍事學校。軍校學員規模因不斷招生而擴大，遂編為直屬於校長史可軒的學生旅。史把他的部隊帶出西安，計劃與黨在陝北的部隊連為一體。但是史在1927年7月遭暗殺，¹³³不久把清澗起義的隊伍帶到南邊與史部會合的努力也失敗了。另一位共產黨員許權中取得了部隊的指揮權。當時，陝西黨組織仍在嘗試將當地的軍閥聯合起來反對馮玉祥。¹³⁴為此，許帶着他的一旅人馬回到他的家鄉、陝西東南部洛南縣，投奔當地軍閥。1928年春天，這支隊伍被派到陝西東部省界，阻擋意欲返陝的馮玉祥部隊。此時，剛剛在清澗起義中遭受失敗的謝子長以及唐澍和劉志丹以省委代表的身

132 關於清澗起義最好的敘述收錄在《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3年第1期，其中以下幾篇文章尤其值得注意：李象九：〈清澗起義前後〉，頁19–25；呼延震西：〈清澗起義的回憶〉，頁25–33；李瑞陽：〈「黨在石謙部隊的活動」的補充〉，頁35–37。上述材料經過後人加工，由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以《清澗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公開出版。關於起義的官方敘事對李象九的「動搖」充滿敵意，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161–165；亦可參見杜衡：〈陝西共黨沿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83；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10月1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44–145；陝西軍事委員會的報告，1927年11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52–254；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59–60、101–104。

133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12。

134 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7年10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67–68。

份加入了許的隊伍。他們與黨的立場一致，對許權中與當地軍閥的合作持日益加深的懷疑態度。¹³⁵

1928年初，黨日趨左傾。1月，中共中央指示陝西省委，農民運動必須「變和平的依賴政治勢力的請願運動為激烈的反對地主軍閥的直接行動」。¹³⁶ 渭南—華縣一帶的學生自1925年開始做農民的組織工作；到1927年秋天，這一地區已有超過500名黨員；到1928年3月，黨宣稱已有超過1,000名黨員，其中75%至80%是農民——「在全省各地的支部中黨員人數最多，成分最好」。¹³⁷ 此地的黨組織是以學校為大本營建立起來的，也經歷了教育系統內進步一方與保守一方的激烈競爭，其模式可以參看對其他地區的詳盡研究。¹³⁸ 春節之後的新學期伊始，渭南縣城外的一個小村子裏爆發了激烈的衝突。村裏的一個舊廟當時是左右兩派學校共用的校舍，因國共合作破裂，保守派的氣焰大增，他們關閉了共產黨員開辦的那所學校，遣散了教員，並強迫該校學生要麼轉入自己這一方的學校，要麼捲鋪蓋回家。就在此刻，省委的領導碰巧取道渭南去上海聽取中央的指示。在他們的建議之下，當地黨

135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渭華起義》（出版社不詳，1985），頁3-7；中央給許權中的指示，1928年3月20日，《渭華起義》，頁32-33；劉繼曾的回憶，出處同上，頁118-121。

136 中央給省委的指示，1928年1月2日，《渭華起義》，頁27。

137 政治及黨務問題報告，1928年3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16。蕭鳴在1928年9月6日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渭南（那是他獨立開展工作的地方）已有超過1,000名黨員，《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18。1927年秋天的數字，參見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70及以後各頁。關於早期的農民組織工作，參見團赤水特支1925至1926年的報告，《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35-43、47、127。

138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pp. 109-112.

組織動員當地中學的高年級學生和教師鬧事，使矛盾升級。1920年代國民革命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反對土豪劣紳；現在渭華的激進分子聲稱「有土皆豪，無紳不劣」。¹³⁹ 他們襲擊保守教員，兩人被殺，其他人重傷，有個人被丟進了井裏。¹⁴⁰ 這些激進分子自稱，他們的目的是：

1. 通過非常舉措清除機會主義的惡劣影響；
2. 呼籲同志們離開辦公室到農村開展工作；
3. 在實踐中學習暴力；
4. 通過有限的行動在全渭南發動一場大暴動。¹⁴¹

當地政府反應激烈，關閉了大多數共產黨人開辦的學校，但中共機關組織的抗稅行動以及國際勞動節期間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讓運動推進了下去。儘管當地黨組織下了很大的決心動員農民，但革命運動的策源地和重要組織者都在學校。在當時紀念起義的一張照片上，大多數人是學生和穿着長袍的教員（見圖2.1）。

在渭華醞釀一場大規模暴動之時，許權中部在與河南來的馮玉祥部交手時吃了大敗仗，唐澍、劉志丹、謝子長帶領七八百名士兵脫離了許部。三人帶着這支被稱作「西北工農革命軍」的隊伍去參加渭華武裝起義。與當地黨組織一道，他們襲擊了渭南、華縣

139 高崗 1945年8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在農運的激進階段，這是一句無處不在的口號。參見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原始版本，竹內實編：《毛澤東集》，第1冊，頁212。

140 何寓礎的回憶（1951），《渭華起義》，頁237–238。

141 〈渭南宣化暴動〉，1928年3月10日，《渭華起義》，頁87；省委的聲明，1928年3月1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26–227。



圖2.1 1928年5月的渭華起義。佔據圖片中心位置的是一群孩子——他們是在校學生。他們的老師在照片右邊，穿着長袍。圖片係作者翻拍自南梁革命紀念館。

一帶的士紳，殺了其中的60人，並宣稱暴動的目標是建立蘇維埃。但是夜襲士紳的做法很不得人心；起義的時間又不明智地選在農忙收穫季節；而且渭華一帶位於關中平原最東邊，有公路與外界相通，在地區軍政勢力觸手可及的範圍之內。一個月後，在當地部隊、民團和紅槍會的聯手出擊之下，暴動以失敗告終，地方黨組織受重創。事實證明，紅槍會並未如中央設想的那樣是革命的盟友，相反是革命的敵人。唐澍慘遭殺害。劉志丹和謝子長先是逃到西安，之後又逃到陝北繼續戰鬥。¹⁴²

官方版本的陝西革命史誇大了清澗及渭華起義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謝子長和劉志丹這兩位陝西革命的英烈參與了這兩次起

142 《渭華起義》一書各處都有相關信息。杜衡：〈陝西共黨沿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84-885；潘自力：〈有關渭華起義問題〉，《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2年第9期，頁4-11；省委關於渭華的報告，1928年8月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2冊，頁339-342。

義。¹⁴³兩場起義均是為響應中央發動武裝起義、建立農村蘇維埃的不切實際的號召，草草組織、倉促發動的。黨的領導人為戰略和戰術爭執不下，他們所領導的部隊對蘇維埃革命也並沒有特別的信奉。以往，中共黨員在地方被視作文化上的進步主義者、孫中山國民革命傑出的捍衛者、本地軍官和進步士紳的合作者。¹⁴⁴將這樣的黨轉變成一個有嚴格紀律約束的無產階級政黨，道路阻且長。

成為列寧式政黨

陝甘省委直到1927年7月才告成立，其領導層是共進社的知識分子，省委書記耿炳光畢業於北京大學。與當時很多地方領導人一樣，耿對激進的農民革命持懷疑態度，堅持認為「陝北農民確實非常落後」，李子洲曾在武漢會議上因類似觀點遭到嚴厲批評。因為不支持激進暴動，耿很快就受到一位好鬥的青年團領導人的攻擊，耿認為此人「非常討厭」，日後此人脫黨成了所謂的「托派」。¹⁴⁵不過共青團裏那些激進的年輕人與黨中央的步調更加一致。1928

143 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出版了關於兩次起義的專輯：《清澗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1988）、《渭華起義》（1985）。第一本書也記述了1928年的柞邑（旬邑）起義，在那次起義中，縣長被殺，但也只持續了很短時間，起義失敗後，與當地士紳的合作模式也與其他地方別無二致。

144 1943年，習仲勛曾批評柞邑黨的領導人「和豪紳地主進行聯合，要他們給群眾散發糧食」。見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第2冊，頁980。

145 耿炳光給省委的信，1928年2月1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11、213。那位團領導叫張金印，他後來的名字張慕陶更有名。

年年初，耿炳光被免去省委書記的職務，很快又被清除出黨。¹⁴⁶新上任的左派領導人激烈地反對「西北落後論」，批准了一項旨在以「紅色恐怖」對抗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政策。在這項政策之下，黨宣佈「反對一切大小軍閥，實行民眾與軍閥戰爭，殺盡所有的豪紳地主官吏，履行徹底的土地革命，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¹⁴⁷

支持渭華起義激進行為的新路線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928年2月，陝西黨號稱有2,900名黨員，其中三分之二在渭華和三原地區——兩地由學生組織的農民協會最為成功。¹⁴⁸到1929年春，全省的黨員數跌至1,300人，且集中於陝北。關中地區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西安僅剩下十幾人，華縣也差不多，原本力量最強的渭南支部只剩下120名黨員。¹⁴⁹叛徒告發以前的同志，或者勸誘他們加入國民黨左派和一些今天已被人們遺忘的進步組織，像新黨和進化社等等。省委機關被迫躲進紳士府邸風格的大房子，完全脫離了群眾。¹⁵⁰1928年底和1929年初，省委機關被叛徒出賣，隨之

146 共產主義青年團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28年1月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編》，乙篇，第1冊，頁83–90；省委將耿開除出黨的決議，1928年1月29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99–200；耿炳光給省委的信，1928年2月1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05–215；杜衡：〈陝西共黨沿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84。

147 陝甘區過去、現在與將來——團省委報告，1927年10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24；省委關於游擊鬥爭的指示，1928年1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71–272。

148 政治及黨務問題報告，1928年3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16–317。

149 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5月4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80–282。

150 陝西代表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5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70–371、375–377；陝西省委八月工作報告，1929年9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434–436。

而來的是兩次大搜捕，在第二次搜捕中李子洲被捕，並於1929年6月死在監獄裏。¹⁵¹伴隨魏野時（1928年犧牲）和李子洲之死，以及耿炳光被開除出黨，在北京受過教育的共進社進步分子主導陝西黨組織的歷史結束了。由他們開創的、黨與地方士紳及國民黨左派人士合作的政策已經過時，新一代領導人脫穎而出，他們將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路線。

在國民黨內開展工作的舊政策現在被批評為「寄生政策」。¹⁵²

陝西黨部過去完全寄在國民黨中生活，因一切都給國民黨作了，完全沒有無產階級獨立的政治立場和群眾基礎，一直到現在，還有一部分黨員留戀於國民黨內，不願脫離。¹⁵³

新領導人不允許這樣的合作，他們甚至禁止黨員加入共進社，這就等於讓黨與其外圍組織切割，從而把相當一部分進步力量推到對手一邊。¹⁵⁴黨必須是排他的、緊密團結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嚴格的紀律。新省委批評前任「對於紀律太不注意，只有個人行動，無黨的行動」。現在，伴隨對紀律的重新強調，那些被認為不可靠的黨員被開除出黨。¹⁵⁵部分黨員被秘密處決，下此狠手的人受到長期

151 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64–267；曹砥麟和任青雲的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647–651；〈李子洲〉，《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卷，頁95–99。

152 杜衡：〈陝西共黨沿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80。

153 省委代表對中央關於陝西工作決議的發言，1928年3月1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16。

154 省委關於共進社和進化社的決議，1927年9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02–204。

155 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年9月2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119。

的怨恨。¹⁵⁶ 不幸的是，這種純潔隊伍的行為卻讓黨組織更加脆弱：動搖分子叛變或被開除出黨後揭發指認從前的同志，導致後者被捕，而被捕者要麼被殺，要麼長期關押，於是很多人選擇了第三條路——叛變。白色恐怖威脅着黨的生存，安全和保密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國共合作時期，各級黨組織可用掛號信聯繫。¹⁵⁷ 現在，他們得用上海黨中央提供的隱形墨水在普通信件的反面或者行間寫字，傳遞信息。¹⁵⁸ 黨命令交通員在遞送報告時只能用腦子記住地址，而不能把地址寫下來。¹⁵⁹

黨變成了組織嚴密的職業革命家團體。畢竟，這是列寧式政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然而地方黨組織是靠人際關係網絡以及進步教師的聲望和影響力建立起來的。現在，人際網絡分崩離析，被另一種組織化的運作方式所取代。「黨的機關是職業之革命者的組織，是無產階級科學的組織。」¹⁶⁰ 在1927年秋天，有報告稱646人——佔陝西黨員總數的29%——從事黨的各種工作。雖反映的是國共合作最後階段的情況，但其職責分佈仍具代表意義（參見表2.1）

156 陝西代表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6月1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29–130。

157 王尚德給（團）中央的信，1925年2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冊，頁10。

158 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12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28；張秀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60；亦可參見王世泰的講述，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我所使用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第1卷是掃描版，其頁碼與母本有出入），頁296。

159 省委給渭南的指示，1927年10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75。

160 陝甘委員會對黨支部的指示，1927年3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1。

表 2.1 中共黨員職能分佈表（1927 年 9 月）

工作類型	人數	比例 (%)
黨務工作	254	40
農民運動	124	19
工人運動	28	4
在國民黨內工作	66	10
青年工作	77	12
婦女工作	20	3
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33	5
在政府中工作	10	2
共青團工作	30	5
總計	642	100

資料來源：省委擴大會議黨務報告，1927 年 9 月 26 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 2 冊，頁 114–117。

上述人員有 40% 直接從事黨務工作；19% 從事農運；青運和對國民黨工作各佔 12% 和 10%，此三項合計所用人力僅次於黨務工作；兵運、工運、對政府和婦女工作所佔人力要少得多。到 1927 年年底，在政府或國民黨內部，已沒有共產黨員繼續開展工作，估計從事其他工作的幹部力量也在清洗中元氣大傷，倖存的力量集中到交通、宣傳和黨自身的組織工作上。

這些黨員靠甚麼維生？在浩如煙海的中共黨史出版物中，關於黨的經費數據一直是個空白點。這方面的不少數據可能在當局掃蕩黨的機關時丟失或損毀，不過考慮到畢竟還有那麼多報告保留下來，很明顯，檔案保管者有意將大多數經費方面的材料封存了起來。此舉或許是為掩蓋非法或者來源可疑的經費，但更大的可能是它要隱藏這一事實：地方黨組織嚴重依賴中央，最終依賴共產國際的資助。在陝西省黨組織成立初期，上行報告中頻繁出現要求中央經費支持的字眼，但很少提及確切的數字。¹⁶¹ 國共合作時期，

161 1924 年 12 月 28 日王尚德給團組織的信中提到 1924 年收到 780 元，但還需要 400 元。他從當地籌措到一部分。《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 1 冊，頁 4；亦可參見此書頁 63–64、87、110–111。

黨員可在學校、報社、政府、軍中或國民黨內謀職。這些工作可能是他們賴以謀生的手段，即便有來自黨中央的補貼，可能是通過國民黨和馮玉祥部發放，那裏有一大批蘇聯顧問。¹⁶² 陝北力量最強的綏德支部，成員中有很多是收入優渥的教員，這使得綏德黨能夠維持運轉，但仍然需要省委每月提供100元經費。¹⁶³ 國共合作結束後，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黨員們再次只能向中央呼籲支持。筆者找到的一份1927年8至10月的詳細預算很說明問題。在這三個月間，中央提供的經費從123元增加到500元，之後又加到877.3元。中央很清楚，每月下發的生活費不敷所需，因此每月的人頭費從4元增加到7元，再到9元。地方支部的花銷也增加了：被服津貼，給共青團的補貼，印刷品和交通員的費用，建或租辦公室的費用，來訪同志的食宿費用、差旅費等。¹⁶⁴

這些數字與另外一些關於經費問題的零散報告是大致吻合的。在1927年8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李子洲列舉了他每月合計超

162 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67，顯示黨組織靠國民黨或農民運動支持。

163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42–143。

164 省委關於財務問題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10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22–125。如同中國統計數字普遍存在的情況，文件中的這些數字也有很多問題：總數目字跟各項之和並不相等。原始文件開頭附有說明：因為看不清楚，部分數字有缺漏。數字對不上的問題可能是這樣造成的。10月份的收入問題最大，總額是2,222.2元，但實際上各項相加只有1,007.2元。如果「蒲同志電匯的中央補貼」是1,350元，而非135元，總額還對得上。而且，10月的餘款(911.22元)按總額2,222.2元算還比較接近(也不是百分百能對得上)，與各項之和一起計算，數字之間則有很大缺口。如果這個數字是準確的，則10月份中央的津貼從877.3元增加到了2,092.3元。這也不是不可能，為營救被捕同志，當月的開銷確實激增。不過這純屬推測，並無直接的證據證明。

過1,000元的各項開銷，並要求黨組織每月給陝西黨發放900元的津貼。¹⁶⁵ 1929年的一份報告提到了每月津貼600元。¹⁶⁶ 經費永遠不夠花。地方黨組織的幹部每月只有三到四塊錢的生活費，剛夠吃，穿和住還沒有着落。¹⁶⁷ 即便是省委這個級別，同志們也是每天靠兩碗紅薯過活。女同志生完孩子沒有足夠的食物，健康受到嚴重損害。¹⁶⁸ 當局的一再突襲讓陝西省委的經濟危機雪上加霜。1929年1月，省委剛從中央得到1,000元經費，就遭遇襲擊，1,000元錢全部被搶。¹⁶⁹ 從這些報告中可以感覺到，中央給基層黨員的微薄津貼令他們牢騷滿腹。這種反應並不是沒有理由。共產國際撥給中共中央上海機關的經費，只有23%劃撥給了省一級的黨組織。上海區一級的工作同志每月有19元的津貼（與工廠工人的月薪相當），而陝西省委同志的津貼數額還不及這個數字的一半。¹⁷⁰ 省一級的幹部經常覺得自己拿着吃不飽飯的工資，幹着基層的髒活，而中央同志卻活得相當滋潤。可以想見，此類抱怨在

165 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67。他在報告中承諾會就每月開支提交一份單獨的文件，不過這份文件並沒有出現在《文件彙集》中。

166 任子良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8月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408。

167 省委關於經費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8月1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43；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43。

168 省委關於經費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1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60–361。

169 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63。

170 Patricia Stranahan,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pp. 52, 132.

黨的內部文件中是遮遮掩掩的，但在叛徒公開發表的脫黨宣言中卻相當露骨：

如秦邦憲等中央委員、住洋房、吃大菜、乘汽車、以及進跳舞場、電影院等，其浪費金錢的手段，較之大資產階級生活，只有過之無不及，使一般下層工作人員，生活之困苦，已達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餓着肚皮工作，已成為他們的普遍現象，工作稍不注意，則被徹底消之，然或吃警告，開除黨籍。¹⁷¹

諸如此類的批評大概只有叛徒才能明目張膽地表露，黨內同志更普遍的反應是順從於中央和共產國際，因為經費是他們給的。與國共合作時期的黨內文件形成鮮明對比，從1927年下半年開始，省委的報告開頭通常要對中央和國際表一通忠心。李子洲在八七會議之前所擬的關於陝西混亂情形的報告尚能相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個月之後陝西省委開始諂媚地宣稱「國際的決議絕對正確」，兩相對比，變化驚人。¹⁷² 不可否認，中共在形式上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無論是黨的建立，還是在幾個相互競爭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中選定正式的共產黨，共產國際都起着決定性的作用。¹⁷³ 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像陳獨秀和李大釗是全國知名的大知識分子，因其自身的威望，他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黨的決定。

171 李曉嵐，《西京日報》，1933年7月30日，轉引自Joseph W. Esherick, “The CCP in the 1930s,” *The PRC History Review* 2.2 (April 2017), p. 4.

172 李子洲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8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66–69；省委的決議，1927年9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05。

173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30–32、176；Ishikawa,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 13, 126–150.

各省也都曾有類似情形。像魏野時和李子洲這樣的領導人既有在北京受過高等教育的光環，與李大釗等黨內元老又有良好的個人關係。在黨中央把處理與國民黨領導層和蔣介石部隊的複雜關係作為工作重心之際，陝西早期黨組織也能相機制定適宜的路線。

但在1927年這一切都變了。陝西黨的建黨元老很快就犧牲了。新一代的領導者更年輕，受教育程度更低，也更藉藉無名。他們起家的地盤小，根基也不牢。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經濟上、在現實生存上完全依靠中央。毫不出奇，這批新的領導人完全服從於中央的路線——哪怕它一月一變。此後幾年，是出沒於陝北群山中的那些難以馴服的游擊隊，而不是坐鎮西安的陝西省委，找到了革命的新方向。

第三章

土匪和布爾什維克

再次掀起革命運動的過程緩慢而痛苦。陝西省委由一小群堅定的布爾什維克組成，他們不遺餘力地在沒有工業基礎的地方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卻毫無起色。沿陝甘交界處活動的游擊隊倒是實打實地幹起了革命，他們把土匪、士兵和一些來自北部人煙稀少山區的貧苦農民組織在一起。省委深知這些游擊隊魚龍混雜，曾嘗試通過把他們拉到黨在三原縣和關中農村地區的老據點，將其整編為更守紀律的紅軍。這一努力失敗後，新編的紅二十六軍被調往之前革命形勢激進的渭河以南的渭南—華縣地區。其結果是災難性的軍事失敗，在1933年，陝西的革命形勢再次面臨覆滅的危險。因其成員被捕及變節，省委幾乎全軍覆沒。這反而造成一線生機：游擊隊得以放開手腳去探索出自己的生存之道。¹

1 關於這一地區軍事鬥爭的最好的概述，出自兩本史料集的編者所撰寫的介紹性文章：《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1-22；《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1-75。我大體上參考了這些介紹性材料，但是本章註釋則依據原始文獻：首先是當時的黨內文件，其次是一些回憶性的敘述。

劉志丹與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游擊隊的領導人、陝北革命的英雄劉志丹來自陝西西北部貧窮、閉塞、人口稀少的保安縣。他是中共元老魏野時在榆林中學的學生，也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後來在1936年的一次戰役中犧牲，那時毛澤東和紅軍主力剛剛到達陝北。1937年，為紀念這位陝北革命的烈士，保安縣被更名為志丹縣，黨史對於劉志丹英勇事跡的記述過於聖徒化，很難讓人相信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照片和一些早期描述顯示，劉志丹身量細長、結實，濃眉、鼻樑高挺，這樣的體貌特徵是很多傳家日久的陝北家族所共有的，這些人家祖上曾與很早之前遊牧於此的突厥人通婚。保安的那些認識他的人說，他有一點斜視，因此與人對視的時候不看對方的臉——不過公開出版物中沒有這樣的描述。² 1936年到訪保安的埃德加·斯諾將不久之前犧牲的劉描述為「亂世的豪傑」(chaotic warrior) 和「現代俠盜羅賓漢，對有錢人懷有山區人民的一貫仇恨。」³ 這樣的描述看起來比較準確。

劉志丹出身於保安的一個顯赫的家庭，報紙上的一篇文章稱他為「小土豪」。⁴ 他的祖上在晚清回亂造成一片瘡痍之後回到保

2 受訪者5和受訪者6。

3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3), p. 219.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紅星照耀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頁206。——譯者註。又見Xu You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 “Heroes, Martyrs, and Villains in 1930s Shaanbei: Liu Zhidan and His ‘Bandit Policy’,” *Modern China* 44.3 (2018), pp. 243–250; 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日本當代中國研究》(2012)，頁25–32對劉志丹的生平做了較好的概述。<https://www.waseda.jp/prj-wiccs/wp/wp-content/uploads/2012/07/jscc2012.pdf>。

4 衡之：〈陝北匪魁劉子丹〉，《中外問題》14卷3期(1936)。



圖3.1 身着黃埔軍校戎裝的劉志丹

安，置了相當可觀的地產。⁵官方出版的劉志丹傳記以及其他一些資料稱其祖父有貢生的學銜，將他的父親稱為秀才。⁶這些學銜及功名的說法是有問題的。民國時期的陝北，有一定程度傳統學識的教書先生通常都被稱作「秀才」。劉祖父的貢生頭銜就更可懷疑。劉的一位同父異母的兄弟說，祖父從沒上過學，只在學校的窗外旁聽過。這種程度的教育不足以使人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最大的可能是，每縣的秀才或廩生都有定額，劉家父子的教育程度雖然不高，但在貧窮的邊地，已足夠獲得某種榮譽性的學銜。⁷劉志丹的祖父在當地素有公正的聲望，他的父親教過書，做過紙紮

5 受訪者7、受訪者8。

6 〈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191。

7 受訪者8。亦可參見第一章所論陝北士紳的情況。

活，也在當地的民團裏作過文書。劉志丹出生的金湯鎮只有四戶人家，但這個小村子位於一條西去的幹道旁邊，劉志丹的父親經營着一家雞毛客店，按保安的標準，也可勉強稱其為鎮。⁸儘管環境艱苦，劉家在當地還算有身份，並且劉父曾狀告一位濫收稅的貪官縣長，因此在鄉里頗受尊重。⁹

生於1903年的劉志丹受益於家庭的聲名。他跟着祖父和父親學習了四書五經，15歲的時候轉到永寧山高小念書——也就是從前的縣衙躲土匪的地方。兩年之後，按照當地習俗，劉與一位姑娘結了婚。他想接着念書，但也到了雙親認為該找個「賢內助」的年紀。¹⁰劉志丹本想繼續到西安求學，因為匪患，路途上太危險，於是1922年他去了榆林上中學。19歲的已婚青年劉志丹比今天的中學生成熟多了，不過在那時候的陝北很常見。他的英語和數學跟不上，需要補課。但國文很好，可以為別人捉刀或在入學考試中代考來賺外快。在榆林，他是學生組織中的活躍分子，在魏野時的介紹下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他先後參加了共進社和共產黨，1925年考入廣州的黃埔軍校。在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中，他在馮玉祥的部隊中做政治工作，並於1928年參加了以失敗告終的渭華起義。¹¹

大革命失敗後，劉返回保安。他在榆林中學的同學、一位進步的父母官把他任命為督學。這一職位使得他可以身穿學生制服

8 受訪者5。

9 受訪者8。

10 Joseph W. Esherick,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 39.

11 劉志丹：《劉志丹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7、90-5；〈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191-199；王子宜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劉景範的回憶，見劉米拉、劉都都編：《劉景範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上冊，頁17-18。

在縣內各地活動，組織年輕人和平請願，針對肆虐四鄉的饑荒，他們迫使糧食以低價出售，強迫富人把糧食分給窮人。¹² 劉志丹的好口才、親和力和極強的社交能力使他做起這方面的工作來得心應手。劉不善於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表公開演說：很少有回憶提及他做過甚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講，他的強項在人際交往，跟任何人都處得來：不管是貧苦農民、軍官、土匪，還是地方精英。¹³ 作為陝北本地人，他樂於遵守地方習俗和價值觀。他對兩性關係方面的保守眼光非常在意，曾警告手下的游擊隊員不要跟婦女廝混。¹⁴ 當地人把共享鴉片煙槍看作男性友誼的一個重要部分，劉也吸鴉片，直到1933年被上級要求戒除。¹⁵ 為了從勢力強大的哥老會中招募同道，他與人拜把子，成為哥老會中頗有地位的一員。正如他日後寫道：「蘇區哥老會很多，他們大多講義氣，對我們有過不少幫助，並與我們有長期的關係。」¹⁶

並沒有跡象顯示身為中共早期黨員的劉志丹對政治有系統性的思考。他關於黨以及黨的目標的看法都極為樸素。「中國共產黨——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當前反帝、反封建、反買辦、反貪污腐敗，反苛捐雜稅。」¹⁷ 他不把黨看作精英的革命先鋒組織：「只要

12 劉景範的回憶，出處同上，頁9、38、45。

13 劉景範的回憶，出處同上，頁20–21；張達志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受訪者5（一位金堂人）。

14 張達志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15 張策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在1933年，張策是黨支部書記，強迫劉志丹戒掉鴉片癮。關於中國社會中的吸煙習慣，參見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2–63, 146–150.

16 劉志丹、習仲勛：〈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十大政策」〉，1934年11月，參見《劉志丹文集》，頁38。

17 〈陝甘邊根據地軍政幹部學校授課提綱〉，1934年11月9日，《劉志丹文集》，頁29。

願意參加革命，誰都可以入黨。」¹⁸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民主的政權，使耕者有其田，沒有苛捐雜稅，使農民能過上安寧的好日子。」¹⁹即便在黨催促地方採取更為嚴格的無產階級路線，反對所有的地主和富農時，劉仍將鬥爭局限於豪紳和地主。²⁰他希望建立盡可能廣泛的革命聯盟：「不但要團結好全體農民、手工業者、商民、念書人，就是有良心不欺侮農民的紳士、民團團總，哥老會大爺也要團結。」²¹對於陝北革命，他素持民治（不管他的理解有多含混）、平等的信念和未曾動搖的樂觀心態。²²劉作為一名領導人的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他個人對於這些平等主義價值觀的遵奉。他身上頗有五四遺風：他堅信個人行為是政治信念的構成要素。他自己給衣服打補丁；為兄弟們做飯；把馬讓給傷員騎；在床位住滿的時候，他就睡在外面：諸如此類的故事在回憶劉志丹的文章中屢見不鮮。這當然帶有典型的黨內聖徒傳的色彩，不過還是有事實的成分。²³他唯一的奢侈消遣是一根接一根地抽價格不菲的哈德門香煙。²⁴

18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11。

19 〈在軍政幹部學校開學大會的講話要點〉，1934年11月，《劉志丹文集》，頁31。

20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佈告〉，1932年，《劉志丹文集》，頁22–23。在當時的文獻和回憶中，「豪紳」一詞用的很多，泛指黨的敵人。它縮寫自「土豪劣紳」——1920年代國民革命的敵人。考慮到陝北並沒有幾個人能通過科舉考試、夠得上「紳」的標準，此處的「豪紳」可能更宜理解為「土豪」。

21 〈在軍政幹部學校開學大會的講話要點〉，《劉志丹文集》，頁32。

22 張仲良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66–467。

23 〈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225；馬文瑞、張達志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24 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01；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11。

劉本質上是一名軍人，一位暴力革命的信奉者。1925年，在去黃埔軍校的路上，他途經三原，參加了共進社的一次大會，在會上激情澎湃地寄語：「同志引着被壓迫民族向帝國主義者進攻！不惜犧牲！殺開血路！前途自有光明與幸福！」²⁵ 軍旅生涯所需要的禁欲主義、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的品格他都具備。²⁶ 他生活簡樸，與游擊隊員同甘共苦，部下因此對他忠心耿耿。需要的時候，他也能做到冷酷無情。有一回，他跟一位民團首領躺在炕上就着同一根煙槍抽鴉片，暗中覬覦着對方的武器，當獵物飄飄欲仙之時，劉繳了他的槍並殺了他。²⁷ 還有一回，他割破了一個叛徒的喉嚨，讓對方在一夜之間血盡而亡，因為該叛徒的出賣令黨內一名同志喪了命。²⁸

劉志丹打游擊之所以能成功，與他對陝北地理的熟悉是分不開的。同袍說他是「活地圖」，²⁹ 他好像知道每條河的流向，知道翻越每一座山的捷徑，也知道如何最安全地抵達某一城鎮。陝北的深溝、梢林和黃土高原雖然適合打游擊，但對地形地貌及人文地理的熟悉仍是必不可少的。在他開展武裝鬥爭的初期，陝甘邊境地區對他至為重要。經歷了1860年代回亂的洗劫，此地人煙稀少。1870年代及1928至1929年大饑荒的創傷很難恢復。人稀意味地廣，在一些地方，整座山被新移民跑馬佔圈。這與陝西東北部米脂、綏德的情形很不一樣，兩地緊鄰無定河，人煙稠密，土地集中在土紳手中。³⁰

25 〈第二次代表會議文件〉，《共進》第2期（1925年7月21日），頁11。

26 呂文華的訪談，延安革命歷史博物館。

27 馬雲澤的回憶，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76。

28 張占容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5。

29 張策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30 陝北特委的報告，1932年12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407；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12-413。

在這一貧窮、閉塞、人煙稀少的典型三不管地區，國民政府的控制力尤為薄弱。陝甘邊境處於三位軍閥地盤的夾縫中：西安的楊虎城、寧夏的馬鴻逵、榆林的井岳秀。原則上，井岳秀負責保安及陝北各縣的防務，但這些地方離他在榆林的駐地太遠，又太窮，窮到他不願投入自己有限的軍政資源。³¹ 人稱陝北「土皇帝」的井岳秀及其大部分兵力來自關中的蒲城縣。這位陝北的「外來戶」，並不願加強當地的軍力。³² 兩省交界的甘肅一側就更不安定。六盤山阻斷了這一地區與蘭州的聯繫，隴東成為互相競爭的小軍閥們的大本營，回亂過後該地區稀少而貧困的人口成為他們搜刮的對象。³³ 這一地區民政管理虛弱，腐敗是常態，每有新軍閥得勢，就換一茬地方官。³⁴

地方政權弱小且四分五裂，遍佈深溝、山林的地形地貌，加之人煙稀少，這些都是開展游擊戰爭的絕佳條件；但在共產黨的游擊隊出現之前，當地已有土匪出沒。上文曾提及，由於這一地區匪患不斷，保安縣衙曾經撤退到永寧山，以難攻的高山為天然屏障（第56頁圖1.3）。位於兩省交界處的保安極易成為土匪的目

31 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317。陝西省委工作報告，1930年9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07。

32 趙伯平的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707-708；陝西軍事委員會報告，1927年11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252-253。

33 陝西黨委關於游擊隊活動的報告，1932年2月15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451；《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291-294；張秀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9。

34 尚季芳：〈縣長難為：民國時期縣級官員的艱難處境——以甘肅省為例〉，李建國、尚季芳主編：《近現代西北社會研究：發展與變革》（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頁250-252。

標：他們可以輕而易舉逃到官府抓捕不力的鄰省。民國政治的混亂和司法體系公信力的缺乏，讓情況更糟。分析土匪現象的社會土壤是一件頗具挑戰性的工作，貝思飛 (Phil Billingsley) 對鄰省河南的土匪的分析，與陝西的情況倒有相通之處。³⁵ 陝北幾位知名的匪首原本是小商人或店員，他們之所以參與非法的營生，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官司中吃了虧，但又上訴無門。還有一些匪首是退伍士兵、鴉片販子、或者拳師，這些人要麼是在農業社會中經商的邊緣人物，要麼是嘗到過權力甜頭的鄉村土霸。其中，尤其重要的一隻力量是曾在小軍閥部隊中當差、因為軍餉縮水而離開的前士兵。³⁶ 這些人有成為匪首所需要的軍事技能，而聚攏在他們周圍的無名匪眾多是想從農業勞動的貧窮和單調中擺脫出來的貧苦農民。這些人大多十幾、二十歲，尚未成家，樂於嘗試冒險生涯。這一地區犯罪活動的盛行，與曾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哥老會，以及紅槍會一類的「迷信組織」也有關係，它們均參與諸如賭博、鴉片走私、賣淫等小型犯罪活動，並保護其成員免受訴訟之苦。³⁷ 紅槍會那套刀槍不入的儀式，「硬肚會」也用，後者1920年代曾在保安組織過一次抗稅活動。³⁸

35 Phil Billingsley,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36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12–13；張占榮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5–256；〈陝甘寧調查專報〉，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日期不詳（疑為1938年），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37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37；Whitney Jacobson, “Brotherhood and Society: The Shaanxi Gelaohui, 1867–1912,”; 袁文偉：《反叛與復仇》，頁85–114。

38 受訪者3。

由於陝甘邊境匪盜盛行，富人們自然想聯合民團以自保。在當地，有槍者才能有權有勢。精英家庭大多住在守備森嚴的塢堡營壁之內。³⁹ 不過，不宜簡單地把這裏的關係理解為一種階級對立：一方是受壓迫的赤貧土匪，另一方是自保的地方精英。事實上，土匪和民團之間存在着一種極為特殊的共生關係。因人口減少，兩省交界地區許多村鎮幾乎處於荒棄的狀態，⁴⁰ 常常會有規模在數百人左右的大匪幫佔據這些地方。匪眾們通常裝備精良，是一班不好惹的好狠鬥勇之徒，他們知道怎樣使用武器，對於當地的地形也爛熟於心。⁴¹ 民團、甚至當地軍閥對這樣的匪幫發起進攻，常常以慘重的傷亡告終。因此，軍閥收編土匪，向其授予番號並讓他們在本地承擔一些民團職責，也就沒甚麼好奇怪的了。對土匪們來說，這不僅使他們免受進攻，也讓他們得到了軍餉、給養、武器和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兩者之間的張力造就了一塊由土匪軍閥掌控的化外之地。⁴² 如果這些民團一匪幫沒能及時領到軍餉（在財政緊張的時候經常發生），他們就會發動兵變，重走佔山為王、落草為寇的老路。⁴³

39 關於隴東游擊隊的報告，1932年9月2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98；馬仰西、李培福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62-663。

40 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02。

41 〈陝甘邊區白軍進攻紅二十六軍形勢〉，1933年7月1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123-124；張仲良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61。

42 黃金貴、張秀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8-259。

43 焦維熾的報告，1932年6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72-273。

也有一些民團真是當地村民的自衛組織，但在抗匪之外，他們常常也保護農民免稅吏、軍閥的敲詐勒索。尤其是在1928至1929年的大饑荒之後，儘管武器裝備極其粗劣，赤貧的農民仍組織起來，反抗地方上所徵收的不堪承受的重稅。⁴⁴ 如果政府徵斂無度，違反了當地的習慣，反抗會相當激烈。曾經有土豪想在兩家結婚時收稅，這種冒失的行徑使他自己命喪黃泉。⁴⁵ 總體而言，從階級利益出發來區別民團和匪幫的傳統理論模式，無法勾勒出問題叢生的邊境地區特有的複雜張力關係。不過有一點當無疑義：這一地區正在經歷意義深遠的軍事化過程，暴力成為日常，有槍便是草頭王。

1928年劉志丹回到保安。開始，他按照1920年代的老辦法從事組織工作——在同情革命的縣長的支持下，在教育系統活動。縣教育局長和永寧山高小的校長都是共產黨員，他們能把共產黨員或黨的同情者派到各校任教，通過這些人影響學生。⁴⁶ 當時能上得起學的自然都是小康家庭，一位當地人說，保安早期的共產黨員家裏都有錢。⁴⁷ 但很快，劉的注意力就從組織學生（在當地寥寥可數）轉移到更適合他本人所受軍事訓練的方法上去了。他在當地民團謀到一個職位，他父親曾效力於此，而民團的頭領跟劉家是姻親。這位頭領把劉志丹視作競爭對手，也當成一個沒甚麼手腕的年輕知識分子，他誇下海口：劉志丹的筆得聽他那桿槍的。⁴⁸ 劉率領一支地方小分隊，並利用這支隊伍發動了革命譁變，不過這支隊伍的成

44 李志合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98-500。

45 常有福、趙元恆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316-317。

46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12-14、38、45。

47 陝北受訪者1。

48 受訪者4。

員都是剛招進來的，僅接受了一天的槍械訓練，譁變以失敗告終，此後，他轉而跟隴東的小軍閥合作。⁴⁹

當時黨在尋求新的革命戰略，兵運，即在舊政權的軍隊中發動兵變，是一個重要部分。在這方面，辛亥革命和蘇俄革命的實踐都提供了很好的先例。黨在軍隊中的工作需要高度保密，這意味着那些身兼特殊使命的人要以單線聯繫的方式向上級彙報，現存的省委文件中也很少記錄他們的活動。有些人直接向中央彙報。⁵⁰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部隊並不總是歡迎這些新招募的學生兵，常常把他們派到學兵隊，唱唱愛國歌、做做軍操，不過很少操作武器。⁵¹軍旅生活是艱苦的，很多在1920年代入黨的年輕學生幹不了

49 保安的民團頭領是張廷芝。我們在第六章還會提到這位革命的宿敵。在述及劉志丹與張早期合作的回憶文章中，張的反動歷史被大加渲染。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說，他們的胞姐嫁到了張家，回娘家的時候，常講述在婆家遭受的虐待。不過，劉志丹的父親——估計就是他一手安排了女兒的婚姻——仍與張廷芝共事，之後又敦促劉志丹重回這個民團。張廷芝一方面想用劉志丹，曾提議兩人結拜把兄弟（劉志丹當大哥），不過據說劉志丹沒同意。另一方面，他又嫉妒劉志丹的高學歷。在革命的敘事背後，兩人的恩怨中含有地方望族之間常見的既競爭又合作的複雜關係。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7、13、15-17、21。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02；袁旭秀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馬錫武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15-416；某某（未具名的解放軍軍官）1977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張廷芝，部分材料亦作「張庭芝」。——譯者註。

50 中央給陝西省委的指示，1928年1月2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91-192；謝華的回憶，出處同前，頁877-878；省委通告三十號，1928年2月28日，出處同前，頁278；張達志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51 王世泰1942年11月1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軍隊中的工作。黨發現「同志都過不慣兵士群眾的痛苦生活」。⁵² 這結果自然不能令人滿意。據陝西資深的革命者習仲勛總結，這個地區的兵變失敗了七十多次。⁵³ 習本人參與的隴東兩當縣兵變尤其混亂，幾乎無法收拾。⁵⁴ 劉志丹比其他人更適合此項工作，不過他也是敗多勝少。

1929至1930年，劉大部分時間都在陝甘邊境的各種各樣的小型軍事組織中發展黨組織。黨的政策強調，要在軍餉微薄、常遭虐待的士兵中建立革命的基礎，要通過教育幫助他們認識到：是壓迫人的體制讓當官的有錢有勢，而他們只能吃苦受窮。黨反對自上而下的「官長路線」，即僅在軍官一級的親朋故舊和同情者中開展工作。⁵⁵ 然而事實上，劉志丹等人之所以能打入軍隊內部恰恰因為他們與軍官的私人關係（同學或者同鄉）。對劉志丹來說，他在馬鴻逵軍中服役的經歷和黃埔軍校畢業生的名頭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從各個角度來說，這是一種互惠的結盟：當地軍閥（其中一些也知道劉曾是中共黨員）需要有能力的指揮官、需要靠劉志丹正派的名聲去招徠盟友；而為實現革命目標，劉也需要武器和士

52 陝西臨時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4月31日（原文如此，下同），《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65。

53 習仲勛：〈歷史的回顧〉，《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陝甘高原革命征程〉，出處同前，頁247。

54 杜衡給北方各省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32年6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45–249。

55 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5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389–390；省委關於軍隊工作的指示，1932年9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32–36；省委關於士兵工作的決議，1933年2月18日（原文件說是2月28日，疑誤），《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252–257、261。

兵。⁵⁶ 劉志丹善待隊伍，一旦提拔為軍官，士兵就會對他忠心耿耿。再加上士兵的裝備、制服、彈藥和後勤補給都仰仗上級。因這一軍事指揮鏈的等級結構，從上而下的兵運工作比黨從基層組織發動兵變更見成效。

儘管劉志丹成功地在兩省交界區域的小軍閥部隊中獲得了職位，他的黨內上級卻並不讚賞，他一度受到紀律處分並被開除出黨。⁵⁷ 劉的種種努力無疑讓他獲得了軍事經驗，不過他發動的兵變最後都以失敗告終。有一回，他被敵軍俘虜，在敵軍被另一支部隊打垮的時候才得以逃脫。⁵⁸ 還有一次，他領導了一次成功的兵變，之後為了獲得武器和軍裝，接受了第三方的收編。⁵⁹ 1931年春天，他的隊伍又一次被一位地方軍閥收編，因其部隊誅求無厭，當地一位大地主憤而自殺，軍閥讓劉志丹當了替罪羊。劉被捕了，全靠他在榆林中學讀書時的老校長杜斌丞和在省主席楊虎城手下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的搭救，才被釋放。⁶⁰ 顯然，在敵人的部隊

56 〈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200–201；姜兆瑩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0；亦可參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52–557。蔣雲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63；《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1–3；張秀山、王世泰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有關劉志丹與當地軍官的友好關係，同時期的一份證據是他寫給一位在西安住院的同志的信，在信中告訴對方可以向誰求助。給白冠五的信，1934年4月2日，《劉志丹文集》，頁26。

57 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值得注意的是，此後關於劉志丹的公開出版物中，均不再提及他被開除出黨的這次經歷。

58 張秀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60–261；蔣雲台的回憶，出處同前，頁263–264。

59 呂文華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60 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43–244；馬錫武的回憶，出處同前，頁239；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95–297。

裏工作並不是一條革命的坦途。劉需要一支自己的游擊隊，為此他轉向陝甘邊境另一種武裝勢力：土匪。

上文已經提到過，小軍閥、地方民團和土匪之間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事實上，劉曾經效命的一位小軍閥陳珪璋就是土匪出身。⁶¹而且，劉投奔的武裝匪幫人數眾多，從規模上看，他們儼然已經成為兩省交界區半合法的武裝力量。其中最著名的匪首趙連璧以其乳名「趙二娃」聞名鄉里。趙曾經是一個貧苦農民，在保安一帶作過僱農，跟劉家有姻親關係。他跟劉志丹從小就認識，兩人的友誼延續到他們成年之後。趙是一個狠角色，也是一個神槍手，很多人怕他。趙的一些同情者說他是迫於貧困才當土匪，不過趙的軍事技能似乎是成為土匪之前在當地民團裏習得的。到了1931年，趙已經成為甘肅一側太白鎮上的民團頭目。⁶²他自己的隊伍大約七八十人，三十條槍，後有兩隊人馬投奔他：甘肅的一支土匪人數有一百五六十人，不過槍很少；另一支是從陝西東北角的神木遠道逃荒而來的饑民，大約三四十人，裝備也很差。⁶³

劉志丹依靠自己在本地的人脈以及在哥老會裏顯赫的地位，將這三支土匪隊伍招募到自己的游擊隊中，希望通過教育使他們認同革命的目標，逐步改掉土匪的習氣。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對於土匪們的積習，劉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耐心和寬容。大多數土匪接着抽鴉片，在搶劫當地的富戶之後，他們指望能從老大那裏分點戰利品。在這樣的隊伍裏，領袖的身份是個人化的，沒有人以官銜稱呼劉志丹，僅僅叫他「老劉」。拜把兄弟關係是隊伍內部和不

61 張秀山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62 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04；張占榮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5。

63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93-294。

同隊伍之間有效的黏合劑，游擊隊的士兵委員會又為一般士兵賦予權力。⁶⁴

儘管游擊隊以搶劫當地富戶為生，劉謹慎地避免製造不必要的麻煩。一般而言，游擊隊在陝甘邊境的最大威脅是地方民團，但劉很樂意與這些武裝力量達成一定區域內的互不侵犯協定。這讓他可以用鴉片和別的戰利品交換武器、彈藥、補給，並得到民團收容傷兵之類的幫助。⁶⁵ 與這一地區哥老會的頭領，劉也建立起類似的關係。⁶⁶ 靠這種方式，在1930至1931年間，劉在問題重重的陝甘邊境地區建立起一支聽命於自己的小游擊隊。此後，劉的隊伍因另一支隊伍的加入而壯大，率領這支隊伍的是陝北革命的另一位重要領導人（也是一位烈士）——他來自黨曾在1920年代建立據點的陝西東部地區。這個人就是謝子長。

謝子長

陝北有三個縣以革命烈士命名。劉志丹死後，保安縣很快改名為志丹縣。抗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綏德以西的游擊區成立了一個以

64 姜兆瑩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52–253；張秀山的回憶，出處同前，頁262、379；閻紅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68–269；陝北受訪者2。袁文偉關於中國西北部土匪問題的透徹研究《反叛與復仇》中有一章（頁175–187）專門分析土匪的政治傾向，重點討論了共產黨的土匪政策。此書徵引了豐富的史料，但這一章沒有腳註，且從頭到尾沒有提到劉志丹。這反映出，關於不斷變換的中共土匪政策，黨的審查制度使得作者必須非常謹慎。

65 習仲勛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49；張秀山的回憶，出處同前，頁380。

66 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05。



圖3.2 謝子長

李子洲命名的新縣，李畢業於北京大學，是中共的第一代革命者。介於上述兩次命名之間，緊鄰綏德的安定縣被更名為子長縣，縣城設在著名的瓦窯堡鎮。子洲縣用於紀念建黨先烈，志丹縣和子長縣因陝北黨的兩支重要隊伍的領導人而得名，直到今天，這兩支隊伍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仍是革命史上爭論不休的話題。⁶⁷

67 這兩派的衝突非常激烈，以至於1980年代召開了一系列旨在解決雙方分歧的會議，其結果是禁止雙方再撰寫任何與爭議有關的作品——對於希望搞清楚事實的人來說，這是一個不幸的結果。《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6年第8期有對此次報告的總結。參見王曉中：《中顧委工作紀實（1982-1987）》（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頁5-75。石川禎浩也提供了引人入勝的敘述：〈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16-51。有一種說法是，1935年，西北工作委員會曾決定把安定縣改名為子長縣，那就早於保安縣改名。據謝紹明（謝子長的養子）回憶，參見《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16。

關於陝北的兩位革命領導人因何交惡，官方傳記所提供的線索寥寥無幾。兩人的背景驚人地相似。謝出生於1897年1月，比劉志丹大六歲。他出身於安定縣的一個殷實家庭，家中兼營農業和車馬店，給過往馬幫提供住宿和草料。像劉一樣，他上學的時候已經進入青春期的：14歲上冬學，17歲上小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他在西安，1920年轉學到榆林中學，劉志丹也在那裏求學。後來劉志丹投考了黃埔軍校，而謝子長則考入閻錫山在鄰省山西辦的一所軍校。

在個人生活方面，謝子長在這一時期失去了雙親，他的父親死於1925年，母親死於1926年。謝母經歷過大饑荒，從小被賣到謝家，據說謝對窮人的關切是受了母親的影響。謝年輕的時候，家裏為他包辦了一次婚姻，不過好像謝從來沒有跟那個不識字的鄉下姑娘一起生活過。⁶⁸ 1933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謝和一位年輕的女同志結婚了，這位姑娘以前是安定的一位老師，她跟謝通過信。但他們的婚姻並不幸福，新娘子沒有跟謝回到陝北。⁶⁹ 我們無從判斷，這些個人生活的細節對謝造成了怎樣的社會及心理上的影響，但很明顯：劉的領導方式是輕鬆、融洽的，而謝更嚴厲、「機警果斷」，可能還有一點為人不隨和。⁷⁰

劉更像一個士兵，在混亂無序的邊境地區如魚得水，而謝的生活卻日益受到黨組織的約束與引導。劉在軍中的事業蓬勃發展，他看上去就是一個軍人。與他對照，謝又矮又瘦，有一張面

68 強鐵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83–384。受訪者17。

69 謝妻尤祥齋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90–293。受訪者18則說，謝的夫妻生活「有問題」，暗示這可能是謝沒有子嗣的原因。

70 〈陝北收復赤區視察記〉（八），《大公報》1936年12月18日。

色灰黃的學生臉，有人覺得他貌不驚人。⁷¹ 在個人經歷方面，兩人在國民革命時期開始有所不同。劉在1920年代效力於廣州的國民革命軍和馮玉祥麾下；謝則去了北京，先是加入共進社，後來又加入共產黨，之後他回到安定，投奔當地民團。在民團裏，謝是一個活躍的本地政治人物，他發動學生、組織農會，與進步的地方官一道進行民主改革（私下裏卻鼓勵學生攻擊地方官的腐敗行徑），這為他建立起威嚴正直的好名聲，也為他贏得了「謝青天」的綽號。像很多民團中人一樣，他是哥老會的一員，事實上是當地哥老會的龍頭，人們對他又敬又怕。⁷² 他奉行嚴格的紀律，在一次新年慶祝活動中，他懲罰了吵吵鬧鬧的兵工廠工人；作為1927年清澗起義的領導人，他處死了趁亂搶劫的士兵，之後在渭華起義中與劉志丹的隊伍合併。⁷³

清澗起義和渭華起義失敗後，謝在劉志丹保安的家中避了一陣風頭，之後轉移到隴東，和劉志丹一道加入了一些武裝組織，致力於在其內部發動兵變。在以失敗告終的此類早期行動中，有一起大約應由謝負責：他從安定縣招募的土匪，其匪首後來叛變了，因為當地的民團首領允諾把妹妹嫁給他。⁷⁴ 接着，在1931年初，山西的一個中共小組組織起一個游擊支隊，閻紅彥是領導人之一。閻是謝的安定老鄉，1927年曾與謝在同一支當地部隊共事。等到山西軍閥閻錫山從中原大戰的挫敗中緩過氣來，打過幾場勝仗的閻

71 馬佩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40–141，李赤然：《李赤然將軍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5–7。

72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出版地不詳：1958），頁164。

73 〈謝子長〉，《中共黨史人物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3卷，頁229–258；《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52–86、131–132；第2冊，頁1–9（賀晉年）、50–58（閻紅彥）、91–97（楊子蔚）。

74 〈謝子長同志早期的兵運活動〉，子長縣黨史辦，時間不詳，頁3–4；受訪者19。

紅彥的游擊支隊就舉步維艱了，最終30位裝備精良的游擊隊員跨過黃河，來到陝西。通過謝子長的哥哥，他們與當地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因一夥鴉片販子的保鏢的加入，壯大了力量。⁷⁵在安定縣，他們的活動並未獲得廣泛的支持，省委將這些人描述成「只有單獨式的軍事投機與土匪式的亂搶亂燒」。⁷⁶因無法在東部立足，這夥人轉移到陝甘邊境，在那兒，他們找到了劉志丹，他們把閻紅彥的戰利品——一支毛瑟槍作為禮物送給劉志丹，這是雙方訂交的象徵。⁷⁷

劉志丹的隊伍和這支來自山西、陝東的新隊伍合併，組成了陝甘邊境上一支力量可觀的游擊隊。劉志丹所招募的大多數是土匪武裝，人數在四百人左右，山西那支隊伍加上沿途依附他們的鴉片保鏢人數大概兩百。⁷⁸到了1931年年末，省委開始注意這支游擊隊的行動並派謝子長去加強領導。⁷⁹省委還向游擊隊派出一位政治代表：他就是高維翰，一位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他向省委傳回的報告並不讓人樂觀，游擊隊的階級成分被定性為「非常不好……大部分還是土匪成分，流氓無產階級佔最大多數。」⁸⁰這些人毫無政治覺悟可言：「這一些分子有了洋煙，共產、紅軍甚麼都

75 閻紅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64–267；吳岱峰的回憶，出處同前，頁420–421；馬文瑞的回憶，《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3期，頁80–84。

76 陝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2年2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5。

77 閻紅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67；吳岱峰、馬佩勛、馬雲澤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46–555。

78 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06–407。

79 閻紅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67。

80 省委對陝甘游擊隊的指示，1932年1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4。

好，但洋煙癮發了胡弄一陣，零碎在民間，私取物件等事還不斷發生，不過好者就是不敢公然搶劫、姦淫婦女而已。而第二支隊（劉志丹手下）則更壞，時常出外搶人，姦淫婦女，與土匪毫無分別。」⁸¹ 因為這些游擊隊員是通過私人關係和拜把兄弟招募來的，所以他們忠於的對象不是黨或革命，而是他們的老大。農民則將之視作游擊隊領導人的私人武裝：「在游擊隊所在地的四、五里路周圍，以及已經行動過的地方，農民還認為是劉大人、謝大人的軍隊，還沒有聽過紅軍是甚麼，更談不到蘇維埃了。」⁸² 在游擊隊內部，劉志丹仍被稱作「老劉」。⁸³

在游擊隊員之間，個人指揮被一種原始民主制度所制衡。隊伍裏的士兵委員會可以規範部隊的紀律，也可以向領導人提出批評。伙食和後勤方面的義務大家一起承擔，搶來的東西平分。在正統布爾什維克看來，這都屬「極端民主」的錯誤。⁸⁴ 黨的報告指責各支隊伍之間鬧矛盾，抱怨政治教育難於施行。「一般戰鬥員……在七十餘人中，幾乎四分之三是陝北人，到這一部隊並不是政治上去號召的，完全拿同鄉的感情去拉攏的；佔有絕對多數的戰鬥員，是為了每月二十元大洋而革命的，經濟極端困難的現在，他們告假的人也就很多了。在這一大隊中，俗語所謂『逛架子』太多了。」⁸⁵ 游擊隊員的經濟訴求是無可辯駁的。顯然，很多人入夥

81 關於陝甘游擊隊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4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19。

82 省委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決議，1932年3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39；參見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49。

83 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79。

84 閻紅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68-269。

85 來自陝甘游擊隊的報告，1932年3月2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57。

是衝着每月二十塊現大洋的優厚（以陝北標準來說）待遇：「黨在群眾的眼中，認為是吃得開，普遍的喊出『共產黨吃得開』、『共產黨的走狗』。」如果游擊隊的領導人不能如約發放月餉，士兵們就會帶着武器離開，回歸土匪生涯。⁸⁶

儘管這支隊伍的政治可靠性很成問題，它已經成為一支擁有600名戰士的頗具實力的武裝力量。⁸⁷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武器，整支隊伍只有250條槍，彈藥就更加緊缺。為解決這一問題，游擊隊選擇了老辦法：加入一個地方軍閥的隊伍，在即將到來的冬季，由此人供給軍裝、補給和彈藥。杜斌丞的渠道也提供了一部分武器供應，他是劉和謝的老師，也是他們的保護人，同時還是楊虎城的高級參議。在部隊得到給養之後，游擊隊的八位領導人以結拜的方式鞏固了他們之間的聯盟。⁸⁸時下已經是1931年的冬天。這年9月日本人佔據了東北，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黨決定將新軍隊稱為西北反帝同盟軍，這樣一來既響應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又不必把這支問題重重的土匪武裝納入紅軍旗下。⁸⁹這個方案對「土匪」來說也頗具吸引力，他們本來就不願遵守紅軍的紀律。⁹⁰

86 杜衡給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32年6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212-213。

87 出處同上，頁232-233。

88 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07；閻紅彥，出處同前，頁268；馬雲澤，《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46-249。

89 關於陝甘游擊隊的報告，1932年2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6；此後的回憶錄經常在這支部隊的名號前冠以「抗日」二字，其實這種叫法並不準確。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07。

90 馬雲澤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48-251；吳岱峰等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57。

臨近春節的時候，新軍駐紮到陝甘邊境，三嘉原附近的每個小村子裏都有一個小分隊駐紮。趙二娃的隊伍被派出去弄補給。他帶回來一千塊錢、一些當地人在趕集時當錢用的鴉片、一場過年宴會所需的豬肉，以及把這些戰利品馱回來的幾頭騾子。他的搶劫行徑激怒了當地村民，他們指控趙那幫人欺負了他們那裏的婦女。⁹¹一份報告記述，當趙的手下經過一個大地主坐鎮的塢堡式的村莊時，村民咒罵他們、向他們扔石頭。作為報復，趙的隊伍衝進村子，混戰變成明搶，他們毆打村民，並強姦了村中的婦女。⁹²謝子長和劉志丹曾討論如何以紀律約束游擊隊員，改造他們的土匪作風，不過劉一直傾向於漸進的、寬容的辦法，他希望能通過不斷的教育，逐漸讓土匪明白：他們應該把拳頭對準權勢人物，對普通農民應該保護。與劉的方式不同，謝在安定當民團首領的時候，就曾對部下的胡作非為嚴加懲罰。因為他對任何濫用職權的行為嚴懲不貸，人送外號「謝青天」。這回，謝決心採取行動，在沒有知會劉的情況下，他跟游擊隊的其他幹部們碰了頭。

第二天，不是大年初一就是初二，全體游擊隊員被召集到一起開大會，他們的武器堆放在一邊。趙二娃的隊伍站在前排。謝站上一塊磨盤，發表講話。他強調，紀律對游擊隊是絕對重要

91 有人指控了趙部隊的強姦行為（參見下文引述的馬佩勛和李維鈞的敘述）。當我向劉家人詢問這件事的時候，得到的答案很簡單：「她是個寡婦。」似乎這就能解釋甚或開脫強姦一事。正如蘇成捷的研究所揭示的：隴東一帶的性關係以非正統著稱，一妻多夫和婚外性關係屢見不鮮，貧困婦女以之獲得經濟、可能還有情感上的支撐。參見 Ma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pp. 53–54. 趙性欲旺盛，他有兩位妻子與他一起生活在游擊隊裏（李維鈞的說法，見下文引註）。

92 馬佩勛，《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44。

的，並點了趙二娃的名字。趙有反應，可能是想掏手槍，結果他本人和他的兩位扈從被當場擊斃。劉志丹也被繳了槍（不過當晚謝就把槍還給了他），劉的隊伍也被繳了槍，隨後被解散。第二天，安定的那支鴉片保鏢也離隊了，游擊隊的規模大大縮減。游擊隊給趙二娃買了一口好棺材，這是一種彌合分裂的努力，不過裂痕已經生成。⁹³

在幾天之後的另一次會議上，「西北反帝同盟軍」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隨着大部分土匪和鴉片保鏢離隊，紅旗終於可以驕傲飄揚了。劉志丹被從指揮員的位置上撤換下來，又被派去西安做彙報。減員後的游擊隊由謝子長擔任領導人，省委派出的政治代表高維翰成為游擊隊政委。⁹⁴ 最終，陝甘邊境上有了一支正規的紅軍隊伍，不過兩位陝北游擊隊領導人的合作關係開始變得岌岌可危。

93 三嘉原事件在陝西黨的歷史上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當時的材料都是一筆帶過。參見1932年4月27日的報告，以及杜衡給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不大可靠），1932年6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18-122、200-203。關於此事最可靠的一批回憶性文獻，《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劉景範（頁407-408）、吳岱峰（頁424-425）、馬佩勛（頁469-470）、曹恩鈞（頁485-488）、李維鈞（頁490-493）、楊培勝（頁495-496）；亦可參見《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雷恩俊（頁265-266）、梁懷德（頁266）、武智學（頁267）。《子長陵資料》，第2冊：馬佩勛（頁143-144）；受訪者2。爭議的焦點是誰射殺了趙二娃。劉景範（劉志丹的弟弟）說是閻紅彥，閻是山西游擊隊的領導人，也是謝子長的安定老鄉。吳岱峰、馬佩勛、曹恩鈞、雷恩俊說是謝的另一位助手白錫林開的槍。李維鈞說的又是另一個人。最大的可能是，見證人多的那一方是對的。劉景範的說法可能受到他對閻紅彥的敵意的影響。

94 陝甘游擊隊黨委，1932年3月20日，《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88；第1冊，頁11；劉景範的回憶，出處同前，頁246-247。馬雲澤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51。

省黨部裏的問題

進入1930年代，中國的革命形勢進入低潮。1927年的清黨過後，蔣介石經受了國民黨左派短暫的挑戰。然而到1930年，他已經牢牢掌控住黨、軍大權，南京國民政府漸漸獲得主導地位。這年，蔣介石擊敗北方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在中國建立起自晚清倒台後最統一的政治體系。他的政權在國際關係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進展：減少被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強加的主權限制；恢復關稅自主權（這使得中國可以提高關稅、保護國內工業）；收回了條約口岸的部分治外法權。中國的銀本位貨幣體系使它躲開了全球大蕭條最初的衝擊，國內經濟的復蘇有模有樣。在全國範圍內，共產黨已變成地下黨，他們轉戰山區，雖然對地方秩序仍是一種挑戰，但對國民黨政權來說已不再構成根本的威脅。從各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的未來都談不上光明。

在陝西，1929年的大搜捕使省委遭到重創，幾乎難以為繼。很多共產黨員叛變，在報紙上發表批評黨的文章；其他人乾脆脫黨。西安支部只剩下12個人。這支小小的隊伍感到孤立無援，似乎已被中央遺忘，他們抱怨既缺經費也無指示。⁹⁵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希圖以激進的樂觀主義重振士氣，並預言革命高潮即將到來，陝西黨鸚鵡學舌一般緊跟並鼓吹這一路線。⁹⁶ 以新領導人李立

95 省委，1929年10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490；臨時委員會的報告，1929年3月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264–267；任青雲的回憶，出處同前，頁649–651；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3月3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81–184。

96 例如，可參見：省委給蒲城縣委的指示，1930年4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12。省委的聲明，1930年4月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15–16。

三為首的中共中央甚至比莫斯科所希望的更加左傾，號召在一省或幾省發動起義，更強調在城市的鬥爭。陝西省委忠實地執行了一策略。⁹⁷ 在既沒有城市也沒有無產階級的陝北，黨內教條一樣戰勝了常識，地方幹部被敦促集中精力開展城市工作。⁹⁸ 黨中央的政策並不總是毫無異議地被貫徹執行。1920年代溫和的知識分子領導人在很多黨員中仍能引起共鳴。⁹⁹ 當黨內元老羅章龍與黨中央決裂並在北方召開「緊急會議」挑戰李立三的冒險路線時，在西安的陝西省委觀望了一陣子。到共產國際表態他們只會支持一個共產黨時，陝西省委很快就放棄了觀望姿態。¹⁰⁰ 地方黨在經濟上完全仰仗中央的支持，緊跟中央幾乎是唯一的出路——不管他們對中央的激進樂觀主義有多少疑慮。

儘管在1931年李立三被受莫斯科支持的新領導人所取代，以城市為重心的無產階級路線仍然延續下來。中央敦促陝西黨集中

97 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層面的情況，可參見Saich and Yang, *Rise to Power*, pp. 277–288. 關於李立三，見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pp. 57–89; Benjamin Yang, “Complexity and Reasonability: Reassessment of the Li Lisan Adven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1 (Jan. 1989), pp. 111–141. 〈陝西省委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1930年9月1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60–275。

98 省委對陝北的指示，1930年5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97、104–107。

99 吉國禎對中央的報告，1931年4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240、254、261。

100 省委向中央的彙報，1931年2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303–308；省委第六次全會決議，1931年3月28日，出處同前，頁325–332；張文華的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699–700；關於羅章龍的挑戰，參見Saich and Yang, *Rise to Power*, pp. 287–288, 463–471.

力量發動「作坊工人(如西安等)和鄉村無產階級」。同樣，農民運動也被要求「以西安為中心」。¹⁰¹ 陝西省委再次緊跟。報告顯示，他們重點籌劃在城市發起國際勞動節的示威遊行，鹽業工人、搬運工、油漆匠，幾乎能找到的、跟無產階級沾邊的人都被組織起來。在農業縣富平，縣委決定「建立城市工作，以樹立城市的中心領導」。¹⁰² 在農村工作中則推行嚴格的階級路線。當斯大林在蘇聯向那些抗拒集體化的富農發起剿滅計劃時，中共順從地跟在共產國際後面，對「富農路線」發起一輪強過一輪的攻擊。¹⁰³

如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在陝西，農民最普遍的抗議形式是抗稅。陝西農民抗稅採取一種特殊的方式：扛着農具集結到一起，把農具放到縣衙門口。這種被稱作「交農」的行為就是停工：交出農具，再不下地幹活，以此抗議難以承受的重稅。這樣的抗議一般是當地有影響力的人物領導的，通常是富裕農民或士紳，因為他們同樣也承受着沉重的賦稅負擔。¹⁰⁴ 黨組織認為這種鬥爭形式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陝西一般的群眾鬥爭中，最主要的危險，是黨還不便深入群眾樹立自己的領導……農村鬥爭，多半落在富農甚至豪紳地主的領導下，多半停留在反捐稅的基礎上，未深入土地革命。」黨應該做的是「開闢群眾的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

101 中央給陝西省委的指示，1931年5月24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429-430。

102 富平縣委工作計劃，1931年4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364。1931年全年，這一冊的文件均呈現同樣的以城市為重心的思路。

103 趙伯平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104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56-58。陳忠實在小說《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第95至108頁對此有一段扣人心弦的描述。

命，在這一基礎上，組織地方暴動，創造蘇維埃區域」。¹⁰⁵ 在黨看來，不僅將抗稅優先於土地分配及建立蘇維埃是錯的，在偏遠地區發動游擊鬥爭，之後像土匪一樣逃到山區也是錯的。¹⁰⁶

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政策都百分百正確，但對陝北的具體條件來說卻是徹頭徹尾的不切實際。正如李子洲1927年已經指出的，陝西不缺地，農民需要的是少納稅而不是擁有更多土地。尤其1928至1929年的大饑荒過後，人口減少，很多人被迫拋棄了家園和土地，黨所推行的土地革命沒甚麼吸引力。某地方黨委曾大膽提出：由於軍閥勒索無度，加重了農民的賦稅負擔，「土地對農民是有害無利」。¹⁰⁷ 把目光集中在西安和關中腹地的指令同樣是不切實際的。游擊隊之所以逃向山區正是因為只有在那裏他們才能生存。

1930年11月，陝西的政治局勢再次發生轉變，在短時期內，共產黨人要面臨另一種考驗。楊虎城作為省主席重返陝西，恢復了陝人治陝的傳統，他的個人背景很簡單（有人說他當過土匪），素有進步的聲譽。他降低了稅率，以更為寬容的政策對待1920年代他在陝西結交的那些盟友，從監獄裏釋放了大批左翼人士和共產黨員。¹⁰⁸ 第二年春天，旱情結束，穀價降了下來，關中腹地的匪

105 北方局對陝西省委的指示，1930年10月17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364-365。

106 陝北秋收起義決議，1930年7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169。

107 陝北特別委員會工作報告，1934年6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79。

108 李大章就是這時獲釋的人之一，他的回憶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646；閔繼騫的回憶，出處同前，頁695；陳雲樵的回憶，出處同前，頁773。關於楊虎城，參見Mi Zan Chen (米暫沉), *The Life of General Yang Hucheng*, trans. Wang Zhao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1).

患「基本消失」，楊虎城開掘水渠並實行其他改革措施，他發展地方經濟的努力使很多人相信：革命的那陣風已經刮過去了。有同樣感受的黨員被斥責為改良主義者、機會主義者，違背了國際路線，很多人被開除出黨。¹⁰⁹ 其他人乾脆脫黨，向投降主義和持續的經費困難（交通員被捕後，地方黨組織的經濟來源就斷了）屈服。¹¹⁰ 由於教條主義在黨內盛行，從監獄獲釋的黨員大多沒有回到中共組織（黨對從監獄裏放出來的人一直持懷疑態度），而是選擇了與中共有競爭關係的其他黨派，特別是托派或第三黨，這兩黨主要由知識分子出身的前中共黨員構成。在1931年之後抗日運動漸成聲勢之際，這些早被遺忘的小黨派的重要性將會顯現出來。¹¹¹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佔領東北，扶持清廢帝溥儀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這標誌着日本對中國北方的持續蠶食與侵略發展到了新階段，並最終導致1937年的全面侵略和戰爭。蔣介石知道他的部隊尚未做好與日本對抗的準備，因此命令軍隊撤出東北，隨即採取「以空間換時間」的策略，整軍建軍、加緊建立軍事工業，為戰爭做準備。公眾把蔣介石的態度視為妥協姑息，不滿情緒與日俱增。1930年代中期，左翼力量和共產黨也參與對政府的批評，並

109 富平縣委決議，1930年4月6日；李艮等人的陝西工作決議案，1931年3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134-135、149；《北華捷報》，1930年12月2日、1931年2月10日及1931年5月5日；高崗1942年11月17-18日，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賈拓夫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110 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111 陝西臨時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4月3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53；國際勞動節宣言，1931年4月，《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396-397；八月工作彙報，1931年9月3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544-546；〈省委通知〉，1931年10月1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578。

大大受益。與此相應，歷史學界形成關於1930年代的一套敘事：日本的侵略逐漸削弱了國民黨，提高了共產黨的政治地位。¹¹² 不過，我們必須意識到，這一歷史過程並不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立刻就開始了。在1931年下半年和1932年，共產黨人發現自己在愛國運動中是落在了後面。

問題在於黨必須遵從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政策。1932年，共產國際提出所有的帝國主義力量都在威脅着中國，不僅僅是日本。因此，陝北的游擊隊被稱作「反帝同盟」，而不是「抗日同盟」（儘管後來有人這樣稱呼它）。¹¹³ 由於堅持反帝而非抗日的政策，黨有時甚至反對抗日的愛國行動，號召黨內積極分子「絕對反對反日會作反日鬥爭，不提反帝工作」，理由是僅僅針對日本的抗議「顯然是投降了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¹¹⁴ 在中共的報告及宣傳中，日本入侵東北對中國的威脅不如對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威脅更大。相應地，地方幹部不斷接到指令，要求動員工人階級「武裝擁護蘇聯」。¹¹⁵ 不消說，在日本佔領了中國大塊領土及連成一線的戰略要衝之後，黨關於保衛蘇聯的號召在政治上孤掌難鳴。加上蘇聯政府強硬主張其在中東鐵路上的利益——這條路跨越北滿，將符拉迪沃斯托克與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更使得中共的主張在國內無

112 關於1930年代的日本侵略與中國政治，最好的歷史敘事來自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113 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46。

114 陝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2年4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47。

115 陝西省委紅色五月決議案，1932年4月2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08；省委關於九一八週年紀念日的指示，1932年9月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1–7。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

人響應。蘇聯對中東路的控制最早於1929年釀成爭端，國民黨部隊採取了收回鐵路的軍事行動，蘇聯派出部隊護路。¹¹⁶日本佔領滿洲後，蘇聯開始跟日本談判。在圍繞中東鐵路的爭議中，蘇聯人從前在中國人心目中「反帝同盟軍」的聲望受損，反被稱作「赤色帝國主義國家」。¹¹⁷中共對蘇聯政策的遵從損害了其自身的反帝主張。

這些政策使得黨錯失在九一八事變後領導抗日愛國運動的機會。內部報告顯示，中共對第三黨和所謂「托派」力量的崛起，尤其在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的影響力日隆，表現出不同尋常的擔憂。第三黨和托派均由前中共黨員主導。¹¹⁸當然，因為每一個偏離斯大林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正統教義的前共產黨員或左傾分子都被貼上「托派分子」的標籤，托洛斯基的「第四國際」到底有多少追隨者是很難估計的。但毫無疑問的是，在中共的創建者陳獨秀因中共在中東鐵路事件中所持的捍衛蘇聯的態度與黨決裂並加入「托派」

116 Michael H. Walker, *The 1929 Sino-Soviet War: The War Nobody Knew*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117 Joseph W. Esherick, "The CCP in the 1930s: The View from Defectors' Declarations (脫離共黨宣言)," *The PRC History Review*, Vol. 3, No. 3 (December 2015), pp. 1-5; 關於國民黨針對中東路事件之宣傳的效果，參見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2冊，頁436；《北華捷報》，1929年9月28日。

118 關於陝西托派的報告，1932年9月1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296-305；關於關中的報告，1931年10月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559；陝西省委關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聲明，1931年10月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559；陝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2年4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56；省委宣傳部，1932年7月2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396。

之後，後者的影響力大增。¹¹⁹ 這些黨派與國民黨成為抗日運動的領導力量，陝西黨承認「滿洲事變後的反日運動，都完全成了小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甚至尾巴都趕不上。」在對比了黨與國民黨及托派分子的工作後，省委承認「黨的宣傳落後於反革命的宣傳鼓動」。¹²⁰ 1932年春天，中共組織了激進的示威遊行，抗議國民黨領袖戴季陶訪問西安。幾名學生挨了警察的打，中共稱其為「大屠殺」，不過應者寥寥，說明了共產黨宣傳的效果極為有限。¹²¹ 這些報告顯示，共產黨在北方城市中無疑已成為邊緣力量，在那些城市裏，那些早已被遺忘的小黨派反倒是國民黨統治更有力的批評者。

1930年代初，陝西黨的核心人物是杜衡，一位來自陝北葭縣（佳縣）的年輕知識分子。杜衡曾在綏德師範求學，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又入了黨。他曾短暫擔任陝北特派員，之後從1930年開始在西安黨的機關內擔任各種職務，1932年25歲時升任陝西省委書記。杜衡能言善辯，精通黨八股，強烈鼓吹左傾激進主義，以取代1920年代溫和的「書呆子」政策。¹²² 然而，中央對

119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頁206–210。陳獨秀宣言的英譯，Saich and Yang, *Rise to Power*, pp. 414–428。關於托派在中國的活動，參見Gregor Benton, ed., *Prophets Unarmed: Chinese Trotskyites in Revolution, War, Jail, and the Return from Limbo*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5)。

120 省委關於中心任務的報告，1931年12月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610、613–614；省委關於中心工作的決議，1932年12月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339–340。

121 這一事件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中有記述，見頁209–212；省委報告，1932年4月2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53–157；賈拓夫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將這次事件作為左傾幼稚病和虛假宣傳的例子。

122 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79；賈拓夫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於1932至1933年陝西黨的領導並不滿意，曾兩次派員指導省委工作。¹²³ 其中一位特派員對新崗位不滿，不斷以個人原因為由要求調崗，最後被開除。¹²⁴ 另一位在1933年被捕並叛變（杜衡亦在此次事件中被捕、叛變，下文將會提及）。幾篇當時的報道把領導人的問題歸結為他們不和諧的性生活，或與妻子兩地分居，或與年輕女同志發生關係。¹²⁵ 顯然，陝西省委不是一個穩固的領導集體。然而，杜衡一直是核心人物，1932年6月，正是他本人參加了由北方幾省代表在上海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在會上，他們討論了如何解決「北方落後」的老大難問題，為下一階段的北方革命做出規劃。

六位北方代表和兩位從莫斯科回來的「國際派」的新領導人——張聞天和秦邦憲（即博古）參加了上海會議。¹²⁶ 此次會議的主旨遵循共產國際的既定路線——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帝國主義勢力妄圖對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發動進攻。中國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同謀，出賣東北，將包括陝西在內的西北幾省發展成入侵蘇聯的跳板。至於那些秉承愛國主義的反對派，他們鼓動南京政府與日本斷交、向日本宣戰或抵制日貨的種種主張，不過是支持南京的投降行徑的煙霧彈。就連（中共以外的）左翼人士敦促政府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允許共產黨公開活動等主

123 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3月23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188；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74–275。關於省委構成，《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4年第2期，頁3–16。

124 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4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53–54。

125 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2月2日；陝西黨向中央的報告，1934年2月16日；陳靖波，1934年2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420、432、455、466–468。

126 杜衡：〈陝西共黨沿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893。

張，也被拒斥為「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奴役統治的擁護者」，「革命最危險的敵人」。¹²⁷ 所有這些說法均效法斯大林鬥爭托洛茨基的那套說辭，將黨內分歧定性為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正確路線，一條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背離。¹²⁸

上海會議沒有改變黨在陝西的政策，卻無疑增加了杜衡代表中央、推行新的左傾路線的本錢。會議重申「堅定的階級路線」和無產階級領導對革命的成功至關重要，因此，在農村，黨應將工作重心放在貧僱農身上；在城市裏，則應致力於發動罷工，設法動員工人參加新組建的紅軍。會議還號召游擊隊發展平原作戰的能力，為此，將在渭北建立起以三原縣原有的農民協會為中心的蘇維埃政權。¹²⁹

三原和渭北根據地

當黨決定在三原重建根據地並在渭河以北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時，這一戰略得到一個小試牛刀的關鍵機會。如前所述，三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中心，在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時期，縣內許多學校的教員和學生曾在組建農民協會的過程中發揮作用。這一運動受到地方開明紳士和農村富戶的保護並經常在其領導之下，他們的影響力

127 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於1932年6月24日「基本通過」了〈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六大以來》，上冊，頁252–260。

128 更多關於這種新「兩條路線」的說法，參見〈團西安市委對漢南工作〉，1932年4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91；團西安省委，1932年4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03–104；〈中央給陝西的指示信〉，1932年8月25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483。

129 〈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決議〉，1932年6月26日，《六大以來》，上冊，頁262–264。

持續到1930年代。¹³⁰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後，黨設法在武字區紮根並維持住了這塊根據地。這是一塊相對閉塞的平原區域，地勢略高，位於縣境的東北部，毗鄰富平縣。黃家是武字區的望族，家中的一位長輩曾是同盟會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是于右任的朋友。黃家有三百多畝地，兩兄弟黃子文、黃子祥都加入了共產黨。在1928年的交農鬥爭中，黃子文利用原有的農會網絡，動員起上萬農民到縣政府要求免除當年的糧款。這是一次和平示威，但卻繼之以對稅吏的攻擊，幾位稅吏被殺。在1929至1930年的大饑荒中，黃家兄弟組織了籌賑委員會，他們獻出自家的糧食並強迫其他富戶也這麼做。農民們把這看作以往士紳們在饑荒時樂善好施傳統的自然延續，當局卻不這麼看。黃家兄弟被捕了，他們的母親賣掉150畝地，才把他們贖出監獄。¹³¹ 此後，黃子文先是逃到北京，後到山西，在那裏，他參加了閻紅彥領導的游擊隊，並在1930年隨這支隊伍回到陝北。當時本地的黨組織仍以災年減租為號召，並成立了災民自救隊，自救隊的活動日趨暴力，他們暗殺稅吏和富裕的地主，甚至綁架並處死一名過路的縣長。¹³² 黃子文於1931年底回到三原，即着手組織當地學校的教員和學生遊行，抗議日本佔領東北。¹³³

130 陝西省委工作報告，1930年9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16。

131 李盛雲（黃子文遺孀），《渭北革命根據地》，頁459-460；張寶田的回憶，出處同前，頁263；唐亦民和郭立三的回憶，出處同前，頁267；編者的話，出處同前，頁2-5；習仲勛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48；筆者2016年6月在三原所作調查。

132 唐亦民、郭立三的回憶，《渭北革命根據地》，頁268；陳雲樵的回憶，《渭北革命根據地》，頁295-297；陝西省委工作報告，1930年9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22。回憶錄中的陳述常常將這支隊伍稱為災民自救軍，此處說法從《渭北革命根據地》的編者（頁23）以及當時的文獻。

133 孫海章的回憶，《渭北革命根據地》，頁315-316；王瑞琪的回憶，《渭北革命根據地》，頁283-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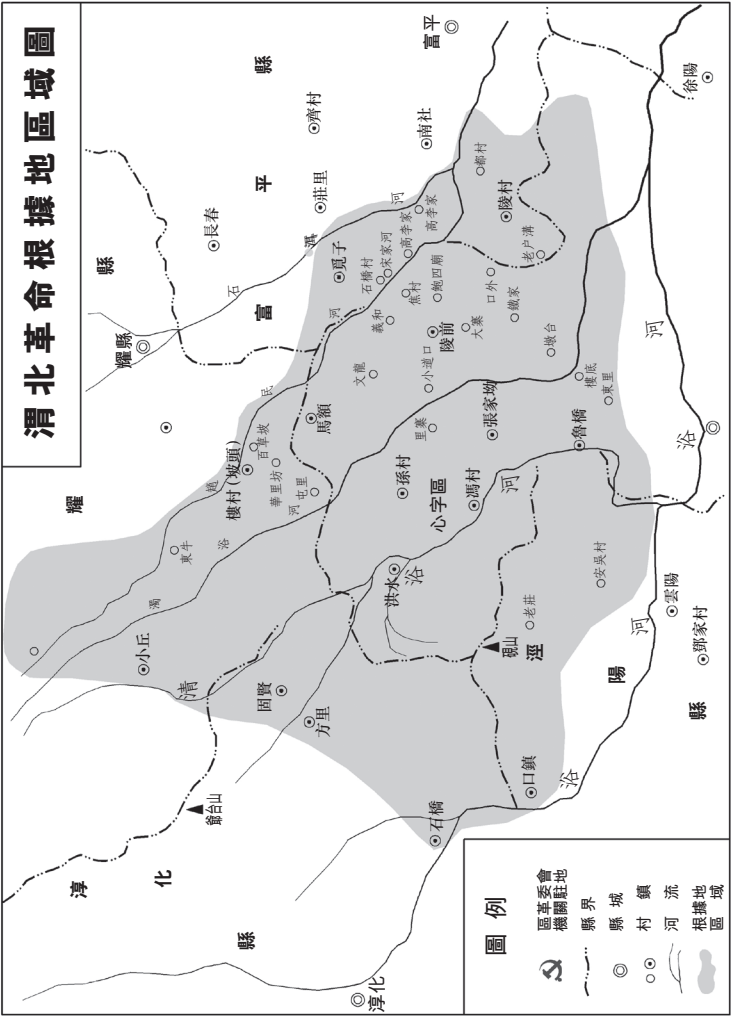


圖 3.3 以三原縣武字區為中心的渭北革命根據地區域圖。據《渭北革命根據地》中的插圖重新繪製。

顯然，三原黨組織的革命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領導人出身於當地的大家族，他們把對貧苦饑民的鼓動與對學生的愛國號召結合在一起。1932年，革命委員會控制了三原，而黃子文是革委會的領導人。當地農民視他為權力的源泉，不管遇到甚麼困難都向他求助——也請他吃飯，用白麵殷勤款待，以示特殊的禮遇。「革委(會)……形成了一個人的政府……形成這樣的原因，是子文過去在三原負責，游擊隊負責，一貫的家長制度。」¹³⁴ 黃子文自己也承認「革命委員會的骨幹是富裕的農民」，他們能夠影響黨的工作。基層黨組織以村莊為單位建立，並常由某一家族主導。¹³⁵ 當省委要求貧農在革委會中有更多席位時，縣委就把革委會一位委員的佃戶委任為黨委書記。¹³⁶ 顯然，三原的農村黨組織建基於當地既存的權力結構，這使它得以紮根、成長，但它改造社會的能力也因此而受限。這種局面是省委所不能容忍的。

為打破當地的權力結構，省委派代表到三原去加強黨的階級意識並在一定程度上確立布爾什維克的紀律。黨為貧僱農建立起專門組織，不過其領導權的歸屬卻模糊不清，混亂和爭議隨之而起。婦女組織也帶來了一系列黨始料未及的問題。一些逃婚的年輕婦女跑到武字區，對年輕的游擊隊員展開大膽的攻勢，為他們縫

134 〈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省委與團渭北特委書記程建文關於渭北革命鬥爭情況的談話記錄〉，1932年11月1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88–289。

135 黃子文關於三原工作給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300–303。

136 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9月，《渭北革命根據地》，頁65。基於該報告的日期，以及《渭北革命根據地》第471頁所列革委會委員，該地主可能是黃子文，而佃農為金理科。在本章末尾所述事件（《西京日報》，1933年9月17日）中，金理科遭到揭發並脫黨。

衣做飯。¹³⁷ 一位廣東籍的外來幹部被派到三原，受命恢復秩序，不過因為方言問題無法與當地人交流，也就沒法完成使命。¹³⁸ 更根本的問題在於，三原農民的主要訴求是遇災減租、分糧，他們對分田分地並無多大熱情。省委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僅僅是因為三原的黨組織被富農所主導，他們一直在執行錯誤的「富農路線」。¹³⁹ 省委不願承認這一事實：一旦地主回來，分田分地會讓農民面臨被報復的危險，真到那時，黨並不能保護農民；分穀卻能立刻解決農民眼前的困難，農民也很容易找到說辭：與本地久已有之的士紳善行相比，分穀只不過多了那麼一點點的強制性。

伴隨鬥爭日趨激烈，當黨試圖控制它所創建的游擊隊時，更大的問題顯現出來。至少從1930年開始，一些武裝組織就開始暗殺稅吏，強迫富戶獻糧，其中的幾支乾脆變成土匪，黨曾設法控制他們，但失敗了。¹⁴⁰ 當黨開始着手組建游擊隊的時候，依靠的也主要是這樣的力量。他們很多人有兄弟、叔侄之類的親屬關係，可以輪流在小團體裏活動，也不耽誤照顧家裏的莊稼。¹⁴¹ 其中一

137 渭北給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70-271；〈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省委與團渭北特委書記程建文關於渭北革命鬥爭情況的談話記錄〉，1932年11月1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90-292。

138 汪鋒的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738。

139 省委給三原的指示，1932年10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127-140；渭北特委李杰夫（高維翰）給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56-259；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9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19-322；張策：《我的歷史回顧》（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頁27-28。

140 陝西省委工作報告，1930年9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17-226；陳雲樵的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771-772；黃子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61-562。

141 趙伯平的回憶，《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713。

些人曾經是同學，黨組織便利用同學之誼動員他們。¹⁴²一位富農兼店主曾領導一窩土匪為黨工作過一段時間，之後因受到批評而脫黨。¹⁴³當地最有勢力的匪幫活動於與富平接壤的村莊，這是一個家族組織，其首領人稱孫帝國，他們是黨所面臨的最大問題。自國民革命時期起，孫和他的兄弟們就是農會中的活躍分子。1930年代初，孫氏兄弟和黃氏兄弟不僅主導着武字區委，也主導着三原縣委。¹⁴⁴孫家控制着這一地區最有戰鬥力、武器最精良的武裝力量，但孫帝國公開反對土地改革。在保存實力方面，他也相當謹慎。1932年秋天，當政府軍和民團進攻蘇維埃的時候，赤衛隊裏年輕的積極分子和少先隊員們急於抵抗，但「『帝國』領導的游擊隊罵群眾，不讓集合：『我們拿槍都不敢打，你們拿棍還能怎樣？』」接着，孫帝國公然與黨對抗：他趕走了一支紅軍派來的游擊隊，解散了一個宣佈實行土地改革的會議，撕掉貼在牆上的革命標語。積極分子罵孫是「武字區的皇帝」。黨內有人主張把他開除出黨，但也有人遲疑不決。¹⁴⁵對當地黨組織來說，孫的游擊隊最能打仗，一份報告承認，黨面臨着兩難的選擇：是要能打仗的，還是要響噹噹的階級成分。¹⁴⁶

142 陝西省委工作報告，1930年9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22。

143 培述關於苗迪民部轉變情況的報告，1933年4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4。

144 渭北革命根據地組織序列，《渭北革命根據地》，頁470-471。

145 〈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省委與團渭北特委書記程建文關於渭北革命鬥爭情況的談話記錄〉，1932年11月1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84-289；賈拓夫向省委的報告，1933年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88。

146 楊聲關於三原的報告，1933年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30；李杰夫（高維翰）等人，1932年11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61-262、268-269。

到了1932年秋天，三原的革命形勢陷入無望的混亂。縣委與農村的黨組織矛盾重重，前者忽視基層現實，因後者抗拒土地改革而深感挫敗。¹⁴⁷老黨員的謹小慎微讓年輕的積極分子惱怒不已，並發展到「團的同志看不起黨，許多團的同志以至青年群眾都說只有青年能幹，成年是不成的，造成黨與團、成年與青年對立的傾向。」¹⁴⁸秋天，一些左傾幼稚病的黨領導人堅持大辦一場紀念十月革命的活動。此舉對於武字區的農民來說有多大意義實在令人生疑，卻刺激政府用堅決的軍事行動在幾週內就摧毀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赤衛隊的年輕人想抵抗卻沒有好武器。孫帝國有最好的武器，但他卻不打。¹⁴⁹其他積極分子只能採取脅迫士紳、大戶、地主和稅吏獻糧或暗殺的老辦法。一般來講，此類襲擊都發生在外鄉，因此，當地人眼中的游擊隊在外鄉人眼裏卻無異於土匪。¹⁵⁰

147 楊聲關於三原的報告，1933年1月(20–3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38–141。

148 賈拓夫關於渭北的報告，1933年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91。

149 省委指示，1932年10月7日，《渭北革命根據地》，頁104；〈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省委與團渭北特委書記程建文關於渭北革命鬥爭情況的談話記錄〉，1932年11月1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94–296；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25；黃子文關於渭北的報告，1932年11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30–341。

150 渭北特委李杰夫(高維翰)給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253；烈君關於渭北的報告，1933年1月2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14；賈拓夫向省委的報告，1933年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69。培述關於苗迪民部轉變情況的報告，1933年4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3。

形勢發展到這種地步，孫帝國認為黨欺騙了他，決定與革命分道揚鑣，他發明了一個詞，把黨的教條譏諷為「日弄主義」¹⁵¹。孫及其黨羽說，「共產黨叫我們做工作，工作好他們來把我們開除了，我們不替他們做奴隸。」孫的隊伍是一個兄弟會，其成員要麼是親兄弟要麼是結拜兄弟。他們信奉有仇必報，現在伺機報復黨內那些針對他們的人。一些脫黨者也加入了孫的隊伍，並且出賣以前的同志。很多農民也學着他們說話，「群眾在敵人進攻後說黨是『日弄』。」¹⁵² 共產黨的前盟友與民團聯手剿滅當地的革命力量，一時血流成河。後來一些報告稱，多達三四百農民被殺。¹⁵³

遵照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政策，陝西黨委伺機在本省的城市發動革命。為此，他們得把在山區安營紮寨的游擊隊拉到關中的平原上。三原本是實現這一戰略的理想選擇：由學運助燃的革命運動已經在該縣相對貧困的北部地區紮下根來。不過，革命的領導權卻牢牢地掌握在富農和地主手裏，有戰鬥力的民團和幫派被當

151 參見李建彤編著：《劉志丹》（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頁170。「日弄主義」即「愚弄主義」，三原農民用此語揶揄黨的一些左傾領導人提出不顧實際的激進主張。——譯者註。

152 游擊隊領袖天花（一些文獻中寫作天華）給三原縣委的報告，1933年2月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204–206；賈拓夫關於渭北的報告，1933年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76–177。對研究中共黨史的人來說，孫氏兄弟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一個尚未搞清楚的敏感問題。孫帝國（孫銘章）1961年還在世，在《渭北革命根據地》文獻彙編中有從當時對他進行的訪談中摘抄出來的一小段（頁313），不過，不同於該書其他訪談對象，沒有介紹他在蘇區和1949年之後的角色，也沒給他寫生平。他的哥哥孫平章1933年被富平的民團頭領所殺，也收入《渭北革命根據地》，頁449。2016年我到訪三原，問起孫帝國，本地人多稱他很勇敢，槍打得很準。

153 王世泰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陳仲良1942年1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地的大家族掌控。黨關於土地改革及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指令遭遇了頑強的抵抗。渭北蘇維埃分崩離析，當地最堅強的黨組織也只能動員其成員以「布爾什維克的精神和斯大林同志的工作方式」去執行上級的指示。¹⁵⁴

紅二十六軍的崛起

1932年1月的三嘉原事件中，趙二娃被處決，一些隊伍叛變，此後，劉志丹被派到西安，謝子長取得游擊隊的指揮權。考慮到這支隊伍的實力大減，它所構成的軍事威脅已微乎其微，很少有正規軍去找它的麻煩。它的競爭對手是小股的地方部隊和民團。他們基本上只在夜裏或黎明時分發動小規模的進攻，持續時間最多幾小時，出動的兵力不過幾十人。一部分游擊隊在渭北山區的枸邑縣活動，當地守軍掌握在中共地下黨員張漢民手裏，他跟游擊隊假意打了幾仗，不過裝裝樣子。他手下的共產黨員向游擊隊提供武器，後者則用偷來的役畜交換。¹⁵⁵ 游擊隊對有圍牆的城鎮發動的少數幾次進攻無不以慘敗告終。甘肅那邊的正寧縣，縣城位於山河鎮，有城牆護衛。當地官員在饑荒時期徵收無度，激起農民反抗。當地民團顯然是富裕農民領導的，但紅軍仍嘗試與其合作，想拿下山河鎮。當地人沒有火器，只有劍和矛，由他們打頭陣。不過攻方的一個叛徒偷偷潛入城

154 〈三原中心縣委給武區區委指示信（原字第七號）——關於衝破「圍剿」及建立蘇維埃政權〉，1933年2月1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249。

155 馬佩勛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70；《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47。張作為地下黨員的秘密生涯以悲劇告終。1935年他被派去與途徑陝南的紅二十五軍建立聯繫，紅二十五軍懷疑他是敵人派來的奸細，拷打之後將他處死。黃正林：〈1935年陝甘邊蘇區和紅26軍肅反問題考論〉，《史學月刊》2011年第6期，頁65-66。

內，提醒守方，頭兩次進攻均被擊退，民團和紅軍都傷亡慘重。¹⁵⁶ 謝子長因為這次失敗的軍事行動而遭到批評，省委把他派往甘肅，任務仍是在軍閥部隊內部建立中共組織。劉志丹重掌陝甘游擊隊。¹⁵⁷

1932年夏天，劉志丹和黃子文（中共三原特別支部書記，曾參加閻紅彥在山西的隊伍）共同發表宣言，宣佈新成立的陝甘紅軍是「貧苦工農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這支隊伍宣誓要廢稅；重新分配糧食、財產和土地；廢止一切高利貸和賒債契據；建立起一個蘇維埃政權。¹⁵⁸ 從其行動上判斷，重點無疑是頭兩項：廢稅和分糧。儘管一開始游擊隊號稱有1,000人，¹⁵⁹ 這支新成立的紅軍只有三個連，每個連90人，七八十條槍。¹⁶⁰ 他們最多對陝甘邊境的70個村子有鬆散的控制，¹⁶¹ 其活動主要包括夜襲和綁架。

156 田志啟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05–506；雷鴻軒和其他人的講述見《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74–279。當時，對山河鎮的進攻被批評為「為富農去抗款圍城」，李杰夫（高維翰）的說法，1932年8月1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293。

157 馬佩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55–156；馬雲澤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53–254；王世泰1942年11月1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158 1932年（可能是5、6月間），劉志丹和黃子文的公告，參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7–68。

159 關於陝甘游擊隊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4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46。

160 省委關於陝甘蘇維埃的決議，1932年6月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87；之後杜衡向中央彙報這支隊伍有600人、250支能用的槍。杜衡給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32年6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202、233。

161 杜衡在1932年6月的報告中稱70個村子。杜衡給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的報告，1932年6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233。但他1933年被捕後在供詞中稱，照金根據地方圓七八里地，包括10個村子。杜衡等：〈脫離共黨宣言〉，《西京日報》，1933年9月20日。

綁架有錢的地主是重要的經費來源，一位當地幹部曾回憶其過程：

為了解決活動經費，游擊隊有時也出去搞些浮財。把豪紳地主抓來押起來，讓他們的家屬出錢來贖。當時老百姓說話算數，大家說這人名聲比較好，我們收錢後就把這人放了；大家說那人很壞，我們收錢後把那人也殺了。¹⁶²

為了獲得大眾支持，游擊隊把從地主手裏搶來的糧食給農民分了，不過這也有問題：農民不願要同村地主的糧食，怕紅軍走後遭到報復。¹⁶³ 對很多人來說，紅軍跟土匪沒甚麼兩樣：「戰鬥員要餉，而他們的私有心非常重，他們以為當紅軍可以得到衣服物件，賺到錢。」¹⁶⁴ 隊伍裏的老兵後來承認，那時候，游擊隊「帶有土匪氣味」。¹⁶⁵

當地的一些土匪冒充紅軍游擊隊的行徑使得區分「共匪」和真土匪更加困難。¹⁶⁶ 據當時的一份記錄：

當時在游擊隊指揮部下有十幾個游擊隊，這些游擊隊是怎樣東西呢？都是用游擊隊用委任狀改編的土匪，不論甚麼人來一報名，於是就給他一張委任狀，編為多少多少支隊，因此，雖在名義上有十幾隊，但有很多多指揮部根本就沒有

162 李生華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413。

163 關於陝甘游擊隊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4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20-123。

164 渭北游擊隊給三原的報告，收件日期1933年4月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12-13。

165 張秀山1942年11月15日、王世泰1942年11月1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166 李德祿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99-1003。

見過。這些土匪部隊利用我們的紅旗到處隨意勒索群眾，姦淫擄劫無所不為，群眾謂之「假紅軍」。¹⁶⁷

儘管有來自省委的這些批評，政治代表高維翰（從莫斯科回來的幹部）在清除土匪、提升游擊隊的階級純度方面仍採取了拖延戰略。¹⁶⁸ 作為回應，由杜衡領導的省委批評高犯了機會主義及拒絕遵守新的國際路線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高的一些錯誤源自對毛澤東井岡山經驗的效仿——現在這已被視作發動農民革命的經典模式，但在1932年卻被批評為不適於組建蘇維埃的新任務。「用他自己的話他是『以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游擊戰爭，來了解目前創造蘇維埃的任務。』完全不了解目前革命尖銳發展的形勢，昨天還是正確的策略，今天已經不適用。」¹⁶⁹ 追隨毛的著作當時還並不等於選擇了正確的革命路線。

省委主張在關中發動武裝鬥爭，相信群眾運動能夠糾正游擊隊那種綁架及在山區「逃跑主義」式的襲擾戰術。¹⁷⁰ 相應地，黃子文和一些游擊隊員到三原去支援農民運動，但換回的是如上所述的慘淡結果。另一個支隊被派往更靠東的韓城，那裏地方黨組織能提供的支持更有限，紅軍再次遭遇失敗和更大的損失。更重要的是，群眾並不歡迎紅軍游擊隊。據當時的報告，富人說他們是「土匪，行不開」；窮人說：「怎樣，他們走，把我們不管了。」一般公

167 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44。

168 關於陝甘游擊隊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4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144-145。

169 省委對李杰夫（高維翰）的決議，1932年8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287。

170 李艮向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42-348。

眾認為：「沒共好，真正共產不是怎樣。」「農民上人家當，人家把好東西和錢拿走了，他們受災。」¹⁷¹

諸如此類的頓挫加劇了游擊隊和省委之間的緊張關係。1932年6月上海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後，加強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通過在關中發動平原戰爭將革命風暴引入陝西人煙稠密的地區，成為日益緊迫的任務。為了實現這一野心勃勃的進攻戰略，游擊隊重組為紅二十六軍。¹⁷² 西安任命李艮為政治代表，由他引導游擊隊走上正確的道路——即放棄對富戶的襲擾，轉而建立穩固的蘇維埃。這項日後被稱作「死守政策」的錯誤決策，讓游擊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李艮把游擊隊其他領導人的反對稱為「反革命陰謀」，他試圖在比較聽話的游擊隊員中組織反對派。不過反對派難成氣候，三週之後，李艮被迫終止在游擊隊的工作，回到西安。在那裏，他的失敗招致同志們無情的批評。¹⁷³

高崗作為李艮的繼任者，被省委派去執行新的政治路線。高是陝北橫山縣人，畢業於榆林中學，他將在陝西黨內一路高升，直至成為戰時陝北最重要的領導人。1950年代初，高一度頗得毛澤東的信任，但在1953年從黨的領導職位上隕落，隨之而來的是對

171 韓城黨的工作報告，1932年6月3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331-334；參看閻紅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71；吳岱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31-432。

172 省委關於第二十六軍的決議，1932年8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428-455；省委的軍事計劃，收件日期1932年9月1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55-67；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決議，1932年6月26日，《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121-122。

173 省委關於李艮視察邊境地區的報告，1932年12月3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60-368。

他的清算以及他本人的自殺。高崗政治生涯的屈辱結局將會影響此後涉及他在陝西革命史中所起作用的一切敘述。¹⁷⁴ 1940年代，高崗極力將自己歸為黨內劉志丹一派，但在1932年他是省委的布爾什維克們派出的鐵桿代表。在一份針對謝子長（他已在夏天回到游擊隊，此時被定性為「階級敵人」）和劉志丹（被定性為「土匪、學生、富農」）的報告中，高崗寫道：「游擊隊的產生是由於階級模糊的同志採取亂拉票子的方式弄錢買槍而創造的，不是由階級鬥爭中創造出來的……內邊大部分的群眾是土匪和販大煙土的流氓。」政委在開展政治教育方面失敗了，「武力中心」沒有掌握在黨的手裏。游擊隊的領導人公開抵制省委的戰略，稱「省委的路線執行了，我們的部隊快損失完了」。這種分歧日後發展成激烈的爭論：究竟是向北轉移到安全一些的地帶，還是聽從黨代表的意見、設法向南面關中的方向發展。高崗在報告中寫道，「北邊這一夥混帳東西」想槍殺省委派出的代表高維翰（這能解釋高為何不敢清洗他們）。「他們在群眾中大罵愚癡混帳，省委路線不正確，這是他們為爭取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他的結論相當明確：「我們執行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必須要把這些東西徹底肅清。」¹⁷⁵

最終，游擊隊分裂了。被批評犯了「富農」錯誤的黃子文帶着他從三原帶出來的隊伍回老家落腳，劉和謝則向保安發起了一次進攻。至少在省委眼中，謝子長是此次行動的領導者。

174 戴茂林、趙曉光的《高崗傳》對高崗生平提供了頗為客觀、公正的敘事。關於他1953年所受清算，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M.E. Sharpe, 1990) 一書有驚心動魄的記述。高崗在陝西革命中的角色極具爭議，有關他的情況，我將盡可能依據當時的文獻。

175 高崗給陝西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9日，《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153–158。

謝××在游擊隊中公開講過去他在部隊中受省委同志的壓迫，犧牲許多個人意見，現在他要「實行獨裁」，決定分路游擊，將較好的同志調開，要這些同志回省委，說只有這些同志離開部隊，游擊隊問題才能解決！子長和閻紅彥等將游擊騎兵大隊的中心隊伍帶往陝北保安、鄜州，那是土匪的巢穴，恢復他們土匪的生活。¹⁷⁶

謝和閻的保安之戰以慘敗告終。慘重的傷亡對士氣造成重創，許多士兵離隊或叛變。¹⁷⁷ 1933年年初，倖存者再次集結到陝甘邊境。¹⁷⁸ 這時，紅二十六軍已減員至一百六七十人，三四十匹馬和百十來條槍。¹⁷⁹ 1932年年中，從上海歸來的杜衡帶着最新指令和黨中央的全面授權，從省委書記的職務調派到紅二十六軍任政委。杜衡履新之時，謝子長和閻紅彥的「反革命陰謀」正遭批判，省委下決心要牢牢控制住槍桿子。¹⁸⁰

176 陝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2年10月1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28–329。

177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43–545。

178 高崗給陝西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9日，《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156–158；黃子文向省委的報告，1933年1月5日，《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166–168；吳岱峰、劉景範等人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82–289；崔平元等人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28–533。

179 高崗給陝西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9日，《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158–159；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42。

180 陝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9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14–316；李艮向省委的報告，1932年11月2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44–347。

杜衡能言善辯，寫一手漂亮的官樣文章。他挾中央的權威和省委關於必要時可解散二十六軍的授權而來。¹⁸¹不過他年僅26歲，用一口濃重的陝北葭縣方言上課，講解張國燾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經驗以及為何需要堅持無產階級領導。一位老游擊隊員回憶杜衡表達的是這樣的意思：「山溝裏沒有馬列主義。」¹⁸²對於強悍的游擊隊倖存者來說，這樣的演講沒有甚麼說服力。¹⁸³杜誓要「執行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和省委正確路線……以爭取中國蘇維埃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徹底勝利。」¹⁸⁴對於一支170人組成衣衫襤褸的隊伍來說，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目標。

他為二十六軍制定的計劃就更有問題。對於這支游擊隊的個人化的領導方式，黨素來持批評態度。現在游擊隊再次被指控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跑到深山老林裏，逃避真正的革命鬥爭。指揮官們獲允作自我批評，表白他們不是反革命，之後杜衡開始了他的重組計劃。他想依照高崗的建議，撤掉所有的游擊隊領導人，但因為謝子長和閻紅彥曾公開違抗西安的省委，他們倆成為現成的靶子。兩人被派往上海接受再教育，而性格上服從上級、受游擊隊員堅定支持的劉志丹則留了下來，不過權力受到限

181 袁岳棟向中央的報告，1933年3月12日；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33年3月2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408-409、411。

182 賀晉年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1。

183 關於柵邑黨的工作的報告，1933年3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316-317；韓文禔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12。

184 杜衡關於二十六軍的報告，1933年1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67。

制。¹⁸⁵ 這三個人還算幸運的：前政委鄭毅因通敵的指控被處死。¹⁸⁶ 曾就讀延安中學的劉志丹的鐵桿追隨者王世泰被任命為二十六軍的指揮官，杜衡任政委。¹⁸⁷

到了1933年春，紅二十六軍建立起以耀縣西部的照金鎮為中心的根據地。這一地區有很多新近遭災的饑民，按一份報告的說法有20萬之眾，但大片土地掌握在當地望族手裏。這為喚起那些基於階級矛盾的訴求提供了相對有利的條件。與從前的情形一樣，本地的游擊隊裏也有痞子和土匪。¹⁸⁸ 游擊隊的糧食一度是充足的，但一段時間過後，游擊隊只能到外面去搶糧，常用的委婉說法是「打外線」，¹⁸⁹ 而山地叢林地貌降低了游擊隊的防守難度。最堅

185 黃子文向省委的報告，1933年1月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乙篇，第1冊，頁389–392；杜衡關於二十六軍的報告，1933年1月9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150（一般來講，我認為《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版的文件最可信。不過關於此事，《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68收錄的這份報告稱「兩個軍事負責同事被害後」，於史不合）。高崗在這次清洗中的角色有些模糊。從他1932年11月給省委的建議來看，他扮演了省委特派員的角色，曾以包括劉志丹在內的所有游擊隊指揮員為清洗目標。現在，陝北的游擊隊領導人中只有謝和閻被調離，劉免受清洗；而最終高崗成為劉志丹堅定的同盟。高在謝被清洗上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日後成為劉志丹的盟友這兩件事，似乎加深了謝子長對陝甘派的疑慮。

186 鄭毅的死刑顯然是秘密執行的，因為此後省委曾批評杜衡沒有將鄭的「反革命」罪行公之於眾。沒有材料列出到底有哪些罪行。省委給二十六軍的指示，1933年3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324、337–338；鄭毅的報告，1933年1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63–65。

187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90–294、307–310。

188 黃羅斌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67；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4–385。

189 張邦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684–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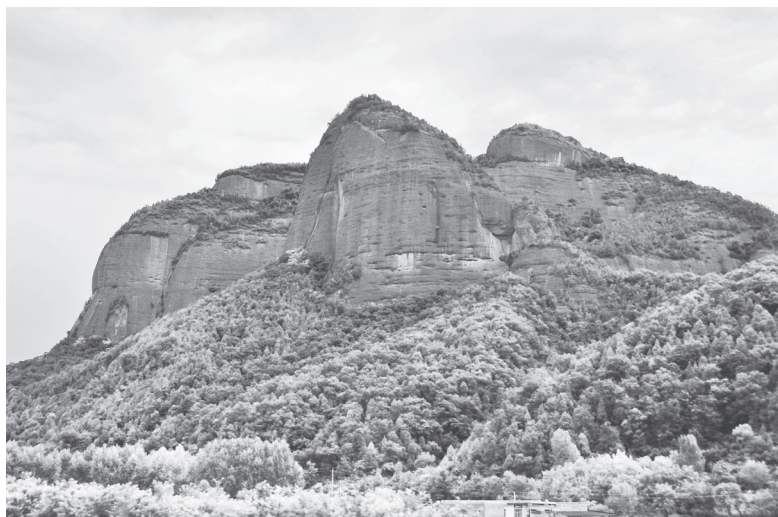


圖3.4 薛家寨，照金蘇維埃的山寨。作者攝於2016年。

固的防守據點薛家寨位於照金附近的一座高高的石頭山上，它成為游擊隊的軍事指揮部以及扣押肉票的地方。那裏有一家簡陋的醫院和一個小小的槍械作坊，作坊中的熟練工人是從西安的政府兵工廠裏招募來的。紅二十六軍積累起的財源讓杜衡甚為欣慰。騎兵有20包鴉片煙土（約一千兩）。杜衡報告說，有了這批貨，「經費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預備全交常委，作常委經費」，再由省委劃撥一部分用於紅二十六軍購置藥品和裝備。¹⁹⁰ 杜衡一如既往地以黨組織為優先考慮。他認為，游擊隊的一項重要職能是為省委提供財源，補貼來自上海的微薄經費。

照金曾有過一個不太成熟的蘇維埃政權，短暫運轉了一陣子。嚴格地說，三原的渭北蘇維埃還更早，但如上所述，這只是

190 杜衡向省委的報告，1932年12月22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139–142。關於薛家寨，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4–385；桂生芳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03–609。

陝西革命歷史中一個短暫而混亂的插曲。照金有一個革命委員會，按照當時盛行的階級路線的慣例，由當地農民牽頭，但以習仲勛為特委委員與軍委書記——這是這位未來黨的領導人的第一個重要職位。¹⁹¹ 黨希望從三原招募三千農民，以改變游擊隊對土匪的依賴，但三原本地的幹部激烈反對這種損耗兵力的做法，所以這個數字遠未實現過。¹⁹² 關於照金蘇維埃在何等捉襟見肘的條件下運行，從杜衡1933年1月開具的所需物資清單中可見一斑：政治及軍事幹部、熟練工人、醫生、鋼筆、墨水、筆記本。¹⁹³ 藥品尤其匱乏：傷兵由一位當地的獸醫負責治療，他手裏只有用作麻醉劑的鴉片。只有重要的軍官才有機會被秘密送到西安，在那裏的一家現代化醫院得到救治。¹⁹⁴ 不過，仍有證據表明：這一片閉塞的邊境地區確實在這支游擊隊的適度掌控之下，黨朝着建立一套新的地方秩序邁出了嘗試性的第一步。

可以想見，這一進展很快就受到了左傾錯誤的威脅。既往的歷史敘事一般將其歸咎於杜衡，但事實上杜衡一直處於省委的壓力之

191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17；賈巨川：《習仲勛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上冊，頁130–131。耐人尋味的是，三原只有一個小小的地方博物館，而照金則修築了一座巨大的紀念館，時有官方組織的「紅色旅遊」團體前去參觀。南梁有同樣的大紀念館，位於山上的蘇維埃政府舊址立了一座宏偉的雕像，其容貌特徵酷肖中國如今的國家主席。

192 省委給三原的指示，1933年1月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7、12–13；楊勝給武字區的指示，1933年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32–133；天花關於二十六軍的報告，1933年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35。

193 杜衡關於二十六軍的報告，1933年1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71–72。

194 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3、385；《劉志丹文集》，頁26。

下，而省委也不過是在響應黨中央的左傾路線。¹⁹⁵ 儘管如此，一些糟糕的決定無疑是杜衡本人做出的。他要求游擊隊向一位民團頭領進攻，此前游擊隊一直心照不宣地與此人合作，甚至從他的隊伍中獲得武器。¹⁹⁶ 進攻以失敗告終，傷亡主要在游擊隊一方。杜衡承認「我在軍事上完全不懂得……使我在戰鬥員中的威信是消滅了。」¹⁹⁷ 因命令部下燒毀當地的香山寺，他也傷害了民眾的宗教情感。這家寺廟是照金的大地主，它所儲存的巨量穀物已被充公，將其燒毀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但在當地這是不得人心之舉。¹⁹⁸

上述行為削弱了游擊隊的力量，不過更糟糕的還在後頭。杜衡和上級黨一直反對游擊隊以山區為據點發動小規模襲擾的戰術。1932年6月召開的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號召對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區發起進攻。三原第一次有此嘗試，失敗了。之後杜衡提出了更為激進的計劃。他先是提出游擊隊往蘇聯邊境打通國際路線，對於一支幾百人組成的裝備低劣的地方武裝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過於魯莽的計劃，因而很快就被否決了。¹⁹⁹ 接着，他又

195 參見省委給二十六軍的指示中對杜衡的批評，1933年3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322–324。

196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13–314；楊勝關於耀縣的報告，1933年1月2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21；天花關於二十六軍的報告，1933年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35。

197 杜衡關於二十六軍失利的報告，1933年1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87–89。

198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11–312；黃龍斌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63；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0–381；高崗1945年8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199 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45；習仲勛1942年11月11日、王世泰1942年11月15日、陳正人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提出跨過渭河，在西安以東的渭南—華縣（渭華）一帶建立一個新的根據地。1920年代，陝西最早一批中共小組曾在那一帶活動過。劉志丹和游擊隊其他指揮官對這一計劃不無疑慮，但杜是部隊的政委，他的主張佔了上風。渭華一帶人煙稠密、經濟富庶，中共地下黨已在那裏建立起自己的網絡。並且，紅四方面軍當時正取道陝南從分崩離析中的鄂豫皖根據地向四川撤退，黨的文件一般將此次撤退稱作「勝利進攻」。杜衡罔顧所有的客觀條件，堅稱這導致在陝西「暴動的客觀條件成熟了」。反對派提出，渭華一代地方精英實力雄厚且緊鄰該省軍力集中地，此類疑慮被斥責為一貫妨害游擊隊的「逃跑主義」的表現：總是打完一仗就躲進山裏。²⁰⁰

這樣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自然需要錢、武器和給養，游擊隊遂求助於當地的士紳朋友，儘管這種辦法在三原造成了大麻煩。照金南面有一支由苗家祥領導的小小的游擊隊。苗出身於涇陽縣北貧困山區一個人脈頗廣的富裕地主家庭，在國共合作令人熱血沸騰的年月裏，他先是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又於1927年加入共產黨，那時他還是一個學生。此後他的個人生涯經歷了一番波折，還一度充任楊虎城的助手。1933年他回到家鄉，與朋友們組織了一支小小的游擊隊。今天此人已被尊奉為革命烈士，但在1933年，他穿着入時，總戴着一副墨鏡，晚上跟哥們兒一起噴雲

200 黃子文向省委的報告，1933年1月5日，《渭北革命根據地》，頁195–196；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46–250。根據一份材料，從莫斯科回來的高維翰也提議向北打通與蘇聯的通路。汪鋒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73。如果此說符合事實，這並不是陝北最後一次被視作前往蘇聯的可能通道。

吐霧、大抽鴉片，當時的出版物稱其為「臭名昭著的罪犯」。²⁰¹不久，他們籌劃了一個綁架計劃，目標是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派來陝西開鑿新灌溉渠的一位挪威籍工程師。1933年5月，苗的那支小隊伍——一夥腰纏紅巾，袖子上繡着斧頭、鐮刀的普通農民綁架了工程師安立森 (Sigurd Eliassen) 和他的助手。兩名俘虜被帶到山裏，那裏有約四百名紅二十六軍戰士，大多是十幾歲。依據安立森的描述，這些士兵吃的不賴，穿的是棉軍裝，但他們的裝備特別差：大多數人只有「老式的前膛槍，幾把新式來福槍，不少人僅在子彈帶上插了一把劍。」工程師及其助手的贖金，游擊隊開出的價碼包括：20萬銀元，120支來福槍，每支配120顆子彈，36支帶彈藥的機關槍，5,000麻袋穀子，4台無線電。儘管由於安立森和他的助手中途逃脫，上述大部分物資的交付不了了之，但顯然劉志丹的部隊與一夥可疑的當地強人結成了盟友。這一結盟或許是看在苗家祥與楊虎城的淵源上，允諾為一次重大的軍事行動提供軍火和通訊設備。²⁰²

201 Sigurd Eliassen, *Dragon Wang's River*, trans. Katherine John (London: Methuen & Co., 1957; 挪威文原版: 1955), pp. 19–20, 184–219 (安立森稱他 Miao Hsiang Feng); *China Press*, 1933.5.11; <http://www.sanqinyou.com/mingren/info/137221123219532.html> (viewed 2020.5.14).

202 Eliassen, *Dragon Wang's River*, pp. 184–219;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16；《上海時報》，1933年5月12日。安立森在書中對苗的母親有生動的描述：這是一位富有、時髦且門路很廣的女人，她還想安排另一個兒子當工程師的「跟班」。在安立森看來，苗家的說法半真半假：苗家祥之所以策劃這次綁架是想挽回土地投機中的損失，因為華洋義賑會開挖的灌溉渠沒能把水送到他所在的村子。袁文偉在《反叛與復仇》第183至184頁也提到涇陽有一個姓苗的人領導的游擊隊，這支隊伍在1933年變成了土匪。雖然袁書的這一章沒有註釋，但看起來可能就是苗家祥的那支隊伍。當地網站現在將苗稱為革命烈士，但這一事件讓我們可以想見這背後複雜的社會現實，苗曾綁架外國人這一轟動事件，官方歷史中現在已經對詳情略過不提。

1933年6月，劉志丹帶領約300名裝扮成正規軍的士兵在西安以東冒險渡過渭河。這支擁有七八十匹馬、幾十頭騾子和充足武器彈藥（這意味着他們索要的贖金部分兌現了）的隊伍，設法劫持了幾輛卡車，向渭華以南秦嶺山區的丘陵地帶開拔。杜衡跟着隊伍走到三原，在那裏，省委才有所覺醒，想阻止此次冒險，杜衡遂離隊到西安作進一步討論。²⁰³在渭華，紅軍沒能找到此前允諾接應的當地黨組織，反而在不熟悉的地形裏中了當地民團和紅槍會的埋伏。隊伍被打散後又在山裏遭到搜捕，傷亡慘重。他們把武器埋起來，四處藏身，希望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或同情紅軍的農民能前來搭救。此次冒險變成了徹頭徹尾的災難。劉志丹在一個山洞裏棲身，被倖存的同志們發現時，飢腸轆轆，渾身濕透。此後，幾十名流亡士兵設法逃回了陝北。²⁰⁴

在其主力開拔到南方的時候，照金的蘇維埃根據地遭到了攻擊。黨的領導人之所以青睞照金，是因為耀縣離關中的革命目標相對較近，但這也讓根據地更易成為靶子。7月，前共產黨員、參加過1928年渭華起義的老兵王泰吉在耀縣騎兵團發動兵變，這群裝備精良的士兵增強了照金蘇維埃的實力。²⁰⁵不過這樣的增援是

203 趙伯平的回憶，《渭北革命根據地》，頁384–385；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629–633。

204 陝西省委（賈拓夫）給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46–250；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19–324；《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633–658；及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黃羅斌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65–367；吳岱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35–436。

205 習仲勛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51–254；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25–330；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9–390；王英的回憶，《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4年第4期，頁23–29。

不夠的。夏季，政府徵召民夫修了一條通往該地的公路，隨即拖來大炮，向薛家寨據點發起猛轟。10月中旬，游擊隊的一個叛徒帶領敵人從一條山後的小路上山，據點被攻佔。倖存的抵抗者向東撤退到甘肅。²⁰⁶

在薛家寨陷落之前，陝西黨已經歷了一次毀滅性的挫折——儘管後來的事態證明，這對游擊隊來說反是天賜良機。從第二十六軍政委的職位上離開之後，杜衡回到西安，與省委的同志們一起商討游擊隊何去何從。沒有跡象顯示他曾設法歸隊。到7月中旬，他無疑已經知道他在渭華建立一個新根據地的指令造成了怎樣的災難性後果。與此同時，一直在地下活動的西安黨組織也自身難保。5月，國民黨中堅分子、前共產黨員邵力子取代楊虎城，成為陝西省政府主席，蔣介石治下堅定反共的國民黨政權因之增強了在陝西的影響力。我們已經知道，楊虎城班底裏的中共同情者常常設法保護共產黨員。隨着邵力子召集一批中共叛徒在報刊上大肆宣揚南京的剿共大業，這樣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²⁰⁷ 與此同時，當地黨組織愚蠢地試圖在國際勞動節舉行示威活動，這引來了警察的注意。夏季，好幾位共產黨員被捕。儘管還沒有同志暴露，黨經常召開會議的幾個場所已在監視之下。1933年6月28日，杜衡在西安的一個飯館與新任省委書記袁岳棟及包括高崗在內的幾位同志一起開會。袁是一名印刷工，曾參加1925至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中央派他去加強陝西黨的無產階級領導。之所以選擇在餐館見面就是為了避人耳目，但幾位男顧客進來，坐在附近的桌子上，之後又離開了。共產黨員的警惕性被調動起來，杜和他的同志迅速中斷了會議並分頭

206 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95–397；楊玉財等人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85–596；《西京日報》，1933年10月16日。

207 關於前一天邵力子的任命，參見《西京日報》，1933年5月5日；賈拓夫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離開。但是太晚了。杜和袁岳棟雙雙被捕，高崗和另一個人逃走了。袁岳棟很快叛變並供出了陝西黨的其他成員。

到了9月，拷打不斷升級、花樣百出，杜衡也挺不住了，他和其他九位同志一起在西安的報紙上發表了公開信。²⁰⁸ 他們的〈脫離共黨宣言〉在國民黨當地機關報《西京日報》上連登六期。他們一面重申自己矢志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面聲稱在國民黨而非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他們寫道，「拋棄了中國政治經濟特點，機械的抄襲俄國革命，企圖用馬克斯列寧主義在中國實現，『工人無祖國』實現共產主義，以根本毀滅中國，毀滅中華民族。」²⁰⁹ 當務之急是團結起來抵禦日本侵略，共產黨人卻在此時分裂國家，聽命於蘇聯及「紅色帝國主義」，這成為攻擊的口實。至於陝西，這些城市裏的布爾什維克們現在終於承認了他們那些在農村摸爬滾打的同志們一向的主張：旱災之下，農民對土地改革並無興趣；他們想要的是糧食和減稅。肯定不能把這類被迫的公開表態當真，不過表態中大部分措辭和黨內文件仍是一致的。無論如何，杜衡及其同志將黨內那些派系紛爭呈現在世人面前，肯定是不大光彩的。²¹⁰

在7月抓捕之後的數月之內，杜衡等叛徒對黨內各部門的熟稔了解使國民黨當局得以在全省展開對中共地下黨員的搜捕。在三

208 賈拓夫向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1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151–168；趙伯平的回憶，《渭北革命根據地》，頁376。

209 《西京日報》，1933年9月17日。「工人無祖國」的說法譯自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Karl Marx,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4), p. 50.

210 這篇宣言以〈脫離共黨宣言〉為標題出現在1933年9月17–22日的《西京日報》上。對此宣言以及類似宣言的分析，Joseph W. Esherick, “The CCP in the 1930s: The View from Defectors’ Declarations (脫離共黨宣言),” *The PRC History Review*, Vol. 3, No. 3 (December 2015), pp. 1–5.

原根據地，杜提供的情報讓當局明白共產黨人發動的「紅色恐怖」掩蓋了當地中共黨組織事實上的虛弱，他們迅速清剿了殘餘的游擊隊員。²¹¹ 據1934年初的一份黨內報告：「捕去的同志，有的被判處徒刑，有的被槍決的……餘十之八九都叛變了，發表了所謂『自首宣言』（有的是被迫叛變，發表宣言，他本人還不知道；有的為要保全一條狗命；有的為要跟國民黨老婁去升官發財。我們現在不管他是自願或被迫叛變，我們一律開除黨籍）。」²¹² 逮捕及隨之而來的叛變持續到1934年，陝西省委及周邊許多縣的黨組織全面消失。據說大部分黨員投降，全省黨員人數下降到只剩二三百人。²¹³ 城市中的黨組織已經癱瘓。對於劉志丹等在農村地區活動的游擊隊的倖存者來說，這不見得是壞事：他們從省委和黨中央不切實際的指揮下解放了出來。現在他們可以自由地探索自己的革命之路了。²¹⁴

211 黃子祥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561–562。

212 關於陝西省委恢復工作的報告，1934年2月1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565。

213 來自陝西的報告，1934年5月26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頁575–581。現藏台灣的調查局檔案中只有少量檔案是關於1930年代初的陝西中共，我猜大部分來自1933年的大搜捕。

214 習仲勛用另外的說法表達過類似的觀點。習仲勛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64。

第四章

革命的崎嶇之路

1934年10月，蔣介石的圍剿迫使中共領導人放棄了江西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在從華中向外撤退的時候，紅軍傷亡慘重，整整減員90%。1935年的大部分時間裏，紅軍主力在中國西部盲目地左衝右突，尋找生路。6月，毛澤東部在四川和張國燾部會合。但很快，這兩位中共建黨的元老就分道揚鑣了，毛北進到了甘肅境內。儘管當時的口號和隨後建構的歷史敘事都稱此舉的目的是「北上抗日」，其實當時毛澤東是想在中蘇邊境上找到一個避難之地。在毛抵達甘南後，這一計劃起了變化，他在一份國統區的報紙上讀到陝北有一塊頗成氣候的蘇維埃根據地。¹毛到底讀了哪篇報道，我們現在已不得而知，不過很有可能是《大公報》的一篇頭版文章，在引人注目的大標題「陝北共匪甚為猖獗，全陝北23縣幾無一縣不赤化」下，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發表了一通危言聳聽的演說。閻錫山稱，陝北各縣均被不同程度地赤化，其中有八個縣已完全在共

1 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5期，頁266–274；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22–25；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p. 286.

產黨的掌控之中。² 這讓從江西一路長途跋涉、本已疲憊不堪的紅軍士兵驚喜異常：原來陝北的小山溝裏還有一塊生機勃勃的蘇維埃根據地。這一發現足以改變很快將被稱作長征的那場大轉移的方向，並最終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陝北蘇維埃能倖存下來，是一個不小的成就。到1935年，中國境內其他大大小小的蘇維埃政權已經被蔣介石的清剿戰役所摧毀。到1940年代，那種「黨在『白區』（即國統區）損失了100%的有生力量，在『紅區』損失了90%的有生力量」的說法已經成型。³ 唯獨陝北挺了過來，並最終為毛始自江西的曲折撤退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落腳之處。不久，來自湘西的賀龍部和張國燾殘部與毛部會合。1935至1948年，黨中央就設在陝北；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組建了以延安為首府的陝甘寧邊區。其範圍最終確定下來之時，據稱陝甘寧邊區包括31個縣，其中8個是新建的縣。⁴ 這塊地方最終成為一個穩固的紅色根據地，延安也一躍而為對國民黨統治不滿的進步青年的聖地。在延安，毛和他的同志們發展出一套在1949年帶領中共走向全國性勝利的戰略。

在大多數關於中共革命的歷史敘事中，陝北的窯洞都被視作紅軍歷經長征考驗後的休養生息之所，毛和他的同志們在那裏擘劃

2 《大公報》1935年7月23日。張聞天在1935年9月22日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該期及《大公報》另外幾篇報道。參見〈發展着的陝甘蘇維埃革命運動〉，《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292–294。孫書雲在《長征》一書中說，毛讀的是1935年7月23日的《大公報》。參見Sun Shuyun, *The Long March: The Tru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s Founding Myth* (New York: Doubleday, 2006), p. 183.

3 賀龍1942年11月2日、任弼時在1943年1月8至1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4 見雷雲峰等編：《陝甘寧邊區史》（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4）中的地圖。

了他們未來的事業。鮮有提及的是，在毛率部離開江西，向北曲折迂迴撤退之前不久，陝西的革命運動也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直到1933年底，劉志丹才從渭南那場糟糕透頂的遠征中脫身回到陝北。倖存者寥寥，最終回到陝北的游擊隊員也只有七零八落的不到一百人。劉在渭南打仗的時候，他的留守部隊被從照金根據地趕了出去。在劉的家鄉保安縣，建在學校和民團裏、原本就很脆弱的黨組織都被破壞了，中共的活動陷於停滯。⁵在陝甘邊境貧窮且人煙稀少的南梁山，劉的那支小小的游擊支隊經歷了一個缺吃少穿的冬季。

幾乎與此同時，在延安以東領導革命運動的謝子長，也回到了他在安定縣的家鄉。那裏的游擊隊不久之前遭受重創，游擊隊員們決定先把武器埋起來，保住性命後再看有沒有重新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謝叱責這些人是投降主義，不過當時他也僅能拉起一支十人左右的隊伍。在跨越1933年和1934年的那個冬天，陝北各地的革命都處於低潮。與此同時，在西安和關中地區，大饑荒結束了，陝西終於擺脫了經濟落後與社會隔絕的罵名。到1931年，一條始自西安的汽車道和從東向西緩慢修建的隴海線把去北京的路程從三個星期縮短為三天。灌溉工程刺激了棉花生產，陝西的經濟作物不再限於罌粟。很快，西安就有了電燈、自來水和第一批現代化的工廠。⁶在關中地區取得這樣的經濟進步和共產黨組織被大面積破壞的情況下，革命運動要如何在一年半的時間裏發展壯大、

5 〈志丹革命歷史發展的幾個時期〉，未標注時間（約1943年），志丹縣檔案館藏。

6 Eduard B. Verme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Central Shaanxi since 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55, 70–88.《北華捷報》，1935年2月13日、1935年8月7日、1936年1月29日及1936年5月20日。

足以在毛結束長征時為他提供避難之地？在展開敘事之前，我們必須重申這一點：即便在1933年的慘敗之前，陝北游擊隊的行動基本上是針對孤立的民團據點或者有機可乘的地主發動的小規模襲擾。他們從來沒有成功拿下過一座防禦堅固的城鎮，縣城就更不用說了。1935年戲劇性的勝利源於一系列新的契機。

南梁和紅二十六軍

當劉帶着他的隊伍跨過渭河進行那場注定失敗的遠征之時，王泰吉帶着一支裝備精良的隊伍加入了照金根據地的留守部隊。1928年，王和劉志丹一起參加過渭南起義，之後王投入楊虎城麾下，1933年，他成了一支駐紮在耀縣的、沒有馬的「騎兵營」的營長。7月，王帶領1,300名士兵發動兵變，在這次混亂的起義和幾次軍事挫敗之後，僅100名忠心耿耿的士兵跟着他加入了照金的紅色根據地。他帶來100桿尚未組裝的機槍和幾門迫擊炮，這些武器大大地增強了游擊隊的戰鬥力。⁷機槍尤其受歡迎，長久以來游擊隊一直艷羨對手擁有這樣強大的武器。⁸王泰吉被任命為游擊隊隊長，實踐證明，此人極具軍事才能，他帶領裝備大為改觀的游擊隊取得了幾次軍事勝利。

1933年7月，高崗從對陝西省委的大搜捕中僥倖脫身，被派到二十六軍當政治代表。二十六軍的軍事指揮權掌握在一位剛從國民黨部隊投誠過來的軍官手中，作為政委的高崗有豐富的黨內工作經驗，也有與上級黨組織聯繫的渠道。如上文所述，就在此前一年，高崗還曾斥責游擊隊員是「土匪」、是「販大煙土的流氓」，主

7 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9–390；張秀山和張邦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690。

8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35–537。

張對游擊隊的領導層進行清洗，迫使他們服從省委的布爾什維克路線。但在1933年夏天，高迅速改變了論調，這個180度的大轉彎自此把他的命運與陝甘革命永遠地聯繫在一起。在時間的迷霧中，高的動機已不可考，不過他充滿爭議的一生足以證明這是一個精於計算、野心勃勃的共產黨人，極善於迅速把握推進革命及個人事業的最佳路徑。雖然在西安躲過了逮捕，但他是上了黑名單的人，在城市已無法立足。作為陝北本地人，他將個人的時運跟游擊運動的前途掛起鉤來，通過將自己塑造成劉志丹的盟友而非西安任命的政委，他在陝西革命運動中的地位不斷攀升。⁹8月，他打消了三原縣黨組織解散游擊隊、伺機再起的「右傾」企圖。相反，游擊隊決定向北面山區發展，10月照金根據地失守後，高和王帶着殘部北進，在南梁建立了一塊新的根據地。¹⁰

在南梁，劉志丹從渭南的慘敗中回復元氣後，重新參加了游擊隊。此前，省委那些洋派的布爾什維克一直譴責劉忽視城市，催促他集中力量進攻關中地區的城鎮。現在，他終於能夠放手規劃自己的革命戰略了。南梁的新根據地在照金以北約150公里處，這裏沒有甚麼像樣的路，密林和一道道矮矮的山梁形成屏障，將南

9 張秀山和張邦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689–691；王英的回憶，出處同前，頁692–694；宋飛的回憶，出處同前，頁694–698。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收入最早一版《毛澤東選集》時，附有一條註釋，將劉志丹和高崗同時標舉為「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但高崗1953年失勢並於1954年自殺後，他的名字被抹掉了。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38–39。

10 8月的陳家坡會議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陝甘游擊隊的批評者指責他們置紅軍於王泰吉這位白軍軍官的指揮之下。為游擊隊辯護的人則稱，此次會議是針對投降主義路線的勝利，也是高崗在陝西革命運動中逐漸上升的開始。參見張秀山1942年11月、習仲勛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梁與位於省府的權力中心隔絕開來。南梁鎮在陝甘省界的甘肅境內，游擊隊的營地則設在附近的陝西保安縣南部的小山中。這裏遠離任何權力中心，政府的統治力鞭長莫及。¹¹ 大部分居民是新移民，從陝西東北部的家鄉逃荒而來，湧入尚未從回亂的創傷中恢復的地區。土地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很多地主家族根鬚繁茂，甚至成立商號經營土地租佃，這在陝甘邊境並不常見，自然為階級革命的號召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¹² 不過，對游擊隊來說，更直接的利好是哥老會在此地的勢力。劉志丹本人是哥老會的一員，這層關係給游擊隊弄來不少情報；哥老會在民團中的那些弟兄為游擊隊提供彈藥；他們的家人收容、照料那些在戰鬥中負傷的游擊隊傷員。¹³

這一兩省交界的閉塞之地久經匪患之苦，地主大多退至有圍牆的鎮子或山間塢壘，大片丘陵地帶和零散的小村子就成為游擊隊的地盤。中共的游擊隊被視作新一代的流民，跟之前來來去去的那些土匪沒甚麼兩樣。然而，他們領導的鬥爭也並不是代表佃農反抗地主，同以往一樣，只有沉重的賦稅才能激起群眾的反對，於是，稅吏成為游擊隊暗殺的主要目標。劉志丹的游擊隊從不向民眾鼓吹複雜的馬克思主義；他們所傳遞的信息非常簡單：劫富濟貧。這個口號為他們那種綁架富人、索要贖金的給養籌措

11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34-335。用當地的說法，南梁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區，是被一切統治者拋棄的角落。張明科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885。

12 王生金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68；劉景範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1冊，頁318；馬仰西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42。這些地主商號中最著名的一家取了一個喻示生意興隆的傳統名字——裕茂隆。

13 王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812-815；蔡子偉的回憶，出處同前，第2冊，頁939-940。

方式提供了合理的解釋。¹⁴ 他們試圖改變當地習俗的舉措少而又少且一拖再拖。當地人普遍抽鴉片，如果禁種罌粟，他們無疑會站到敵人一邊。在鄰省山西，閻錫山推行嚴厲的禁煙政策，其結果之一是許多鴉片販子和他們的保鏢因為沒活計就加入游擊隊。由於顧慮民間的反對，游擊隊在兩年的時間裏未採取任何禁鴉片的措施。¹⁵

在游擊隊，王泰吉在整飭軍事紀律方面貢獻良多，他和劉志丹一起把那些不能適應長途行軍的鴉片鬼清除出隊伍，也處決了幾位不服從命令的土匪頭子。接着，他們在游擊隊裏開展了基本的政治教育，把農民的貧困歸咎於權貴階層的剝削。¹⁶ 就連高崗也曾因為違紀（強姦一位當地婦女）被短暫地免去了政委的職位。不過這一懲罰只持續了幾個月，表明高崗在游擊隊中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而對婦女的嚴重侵犯也只需付出微小的代價。¹⁷ 王泰吉在提升二十六軍軍事素養方面頗有作為，不過時間極短。在劉志丹歸隊後不久，王泰吉就離開了，他想去山東一位同袍的軍中發動兵變，但在途中被一位朋友出賣，死於非命。¹⁸ 劉志丹接過王的指揮權，部隊繼續發展壯大並建起一支騎兵分隊，這樣它就能與小股的游擊

14 張仲良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64-467；受訪者9。

15 張秀山1942年11月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陝甘寧調查專報〉，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16 張策：《我的歷史回顧》，頁38-40。

17 張邦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84；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39。張對於高崗的不檢點行為含糊其辭，王只是說他「企圖強姦婦女」，不過，終其一生，高崗一直飽受「生活作風」方面的指控，受訪者2稱，高崗的所作所為遠不止意圖強姦。到了1934那年夏天，高崗官復原職，又成了游擊隊的政委。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50。

18 張邦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83。

隊分兵合作，前者對地方民團發起快速進攻，後者拿下落了單的地主。騎兵分隊在甘肅取得了數次軍事勝利並俘獲了一批武器。到1934年底，劉的隊伍已經從270人增加到600人。¹⁹

紅二十六軍成為一支可觀的軍事力量。不過，與上級黨組織重建聯繫的努力卻不太成功，劉志丹對於在當地建黨也不怎麼上心。²⁰ 據一份關於隴東游擊隊的早期的黨內報告，鄉村沒有基礎與影響——「本隊游擊過兩千餘里之地方，沒有一個大小村鎮發現了黨的組織與黨員，大多數的勞苦群眾都不知道共產軍是來幹甚麼的怪物。」²¹ 在陝北東部，黨組織是以農村學校為據點建立，但在陝甘交界地帶，村莊稀少且非常分散，幾乎沒甚麼學校。（直至1989年我到這一地區調研，縣里最大的村莊也只有48戶人家。）在保安，黨擴建學校體系之前，近3,300平方公里的地區內僅有一所高小和四所初小；98%至99%的人口是文盲。²² 游擊隊靠綁架富人索要贖金過活，「紅色恐怖」主要針對當地的保甲長和稅吏。²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落後的陝甘邊境，有功名的人幾乎不存在，所謂的「紳士」就是指握着收稅權柄的保長、里長。²⁴ 這些人成了革

19 黃羅斌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881；王英的回憶，出處同前，頁971-972；高錦純的回憶，出處同前，頁789-796。

20 二十六軍第42師向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報告，1934年6月20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19；朱理治在1945年7月的一段講述，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432。

21 給中央的報告，收件日期1932年9月2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98。

22 志丹縣：《兩年半工作報告書》，1940年8月22日，陝西省檔案館，2-1-157-1。

23 高錦純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91。

24 受訪者11。

命的對象，在當時的文獻中，他們通常被稱作「豪紳」，遭到共產黨的無情打擊。這其中當然有階級鬥爭的成分，但並不是建立在地主—佃農的任何差別之上，而是基於與當局關係的遠近，以及權勢上的不平等。在沒有地方黨組織領導的情況下，對地方精英的鬥爭運動不能發展成更大的革命運動。

變化中的政治環境

在全國範圍內，1930年代中期最重大的變化是日本入侵的危機持續升級，南京政府的懦弱回應在國內招致越來越多的抨擊。繼1931年佔領東北之後，日軍又入侵熱河，引發激烈的長城抗戰，隨之而來的是日本企圖把包括京津在內的整個華北劃為一個新的、獨立於南京國民政府的「自治區」。這樣一來，日本鐵蹄所到之處就不限於遙遠的滿族人的老家了，中國腹地的領土完整也危在旦夕。九一八事變之後，南京的蔣介石政府一邊疾呼抗議，呼籲國聯主持正義，一邊在軍事上謹慎地撤退，並與日本就停戰進行小心翼翼的談判。蔣介石的政策在最初贏得廣泛支持，前文已談及，這一時期的共產黨將日本入侵說成是針對蘇聯，沒完沒了地呼籲「武裝擁護蘇聯」，極不得人心。另一些勢力對國民政府的批評更加有力。馮玉祥部直赴察哈爾抗日前線，此舉即便沒有為他贏得來自南方軍政首腦真金白銀的支持，至少也讓他成了輿論追捧的抗日明星。1933年11月，福建爆發了反對南京綏靖政策的事變。雖然閩變被蔣輕而易舉地平息了，但全國的軍事將領均響應福建，呼籲國民政府堅決抵抗日本的進攻。²⁵

25 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pp. 90–181.

中共漸漸意識到自己政策的失誤。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抗日運動對黨的對手極為有利。1932年，中共的宣傳寬泛地強調反帝，把所有威脅到「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強權都列為敵人，這樣的政策對中國的愛國者來說沒甚麼號召力。很快，黨轉而號召抗日並嚴厲批評了那些無視抗日情緒之高漲的地方黨組織。²⁶ 紅軍也被重新定位為一支愛國武裝。長征的隊伍從華中出發之時，就有「擁護紅軍北上抗日」的號召。²⁷ 這些口號對國民政府的軍隊產生了無可爭辯的影響，國軍將領中有不少人之所以選擇軍旅生涯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在陝西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王泰吉部的兵變，王部的軍官不滿於南京政府從熱河撤兵的指令，又受到學生抗日遊行的感召，最終在「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的旗幟下發動了兵變。²⁸ 前文提到，參加兵變的1,000人大約只有100人最終留在了革命隊伍裏，王泰吉本人不久在去山東策動袍澤兵變時遇難。不過他的人馬、武器卻極大地增強了陝北游擊隊的戰鬥力。

郭寶珊部的到來也有重要意義。郭也是在抗日的旗幟下投奔劉志丹部的，不過他還有其他一些更為複雜的動機。郭部原本是以渭北的黃龍山為據點的一支千人左右的大型兵匪武裝。郭出身行伍，和許多類似的大型軍事團夥一樣，他的隊伍也時不時投入地方軍閥麾下。劉志丹一直在爭取郭，還曾派代表帶着禮物邀請郭加入紅軍。1934年夏天，楊虎城一度想收編郭部和另外兩支黃龍

26 《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中有大量有關這種轉變的例子。如陝西省委給三原縣委的指示，1933年4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19。

27 陝北特委向中央駐北方代表的彙報，發表日期1935年1月3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461；陝甘晉省委聲明，1935年10月3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01。

28 賈拓夫向中央的報告，1933年11月2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52–256。

山的兵匪，三路人馬跑到了隴東。在那兒，劉志丹通過哥老會的中間人聯絡上郭，並再次送上三匹馬作為禮物。不久，郭帶着120人投奔了劉志丹，被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的一個獨立大隊。游擊隊打敗從黃龍山逃來的其他兵匪之後，又有一些被擊潰的隊伍加入了劉部。他們中的很多人有土匪部隊中常見的鴉片癮。郭受到特別照顧，可以繼續抽鴉片，其他人則要麼強制戒煙、要麼轟走。加入劉部之後，郭部仍集結在一處，在戰鬥中，劉志丹也不會把他們放在前線。這些周到的措施，令郭寶珊對劉志丹本人及其事業忠心不貳，他的人馬在1935年的軍事勝利中戰功彪炳。郭後來在被授銜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²⁹ 儘管吸引郭加入革命的因素不止抗日這一項，在當時，愛國至少已經成為投身革命的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舉國關於「攘外」與「安內」的爭論在另一個層面上影響了陝西的大環境。一個普遍的共識是，伴隨國民革命軍在西部省份對中共的追剿，南京政府的影響力滲透到了它以前達不到的地方。蔣對閩變的鎮壓也增強了他在南方的勢力。³⁰ 在陝西，蔣介石於1933年任命邵力子為省主席，從而制約了楊虎城的權力。之後他又削減了楊虎城部的軍餉，使得楊不得不遣散兩萬名士兵。楊虎城還

29 郭寶珊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10–611；黃羅武（早期幫助劉志丹爭取郭寶珊的人）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16–620；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56–358；張邦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87–288；張秀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867–870。Xu You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 “Heroes, Martyrs, and Villains in 1930s Shaanbei: Liu Zhidan and His ‘Bandit Policy’,” *Modern China* 44.3 (2018), pp. 254–264, 對郭寶珊的背景及加入革命的情況所做介紹很有幫助。

30 Hung-mao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esp. pp. 177–182.

面臨另外兩重威脅：一是閩變的前車之鑒，二是蔣介石把愛將胡宗南調到西北，阻截紅軍北上。楊虎城感覺到自己的獨立地位岌岌可危，放緩了對共產黨的進攻，甚至還在張國燾部路過陝南的時候向其拋出了橄欖枝（不過後來湮沒不彰）。³¹ 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蘇區撤退、路過陝南時，陝北革命獲得了更多休養生息之機。陝西黨將徐部的轉移頌為「勝利的進攻」，其間徐部還搞了一次向北進逼西安的佯攻。雖然其軍事實力還打不下有城牆拱衛的省城，但幾千名全副武裝、身經百戰的士兵足以證明湖北軍遠比陝北的任何一支武裝更具威脅。這支部隊分散了楊虎城大部分的兵力，部分軍隊從陝北南部撤離，這給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更大的騰挪空間。³²

況且，還有天氣的因素。多年以來，黨的文件一直宣稱，陝西持續的旱災為革命提供了客觀條件。一份1930年的宣言如是寫道：

農村經濟更是空前破產，赤地千里，土地荒蕪，五百萬災民嗷嗷待哺，陷於饑餓凍餒與死亡的境地，在饑餓、寒冷和死亡的邊緣掙扎……〔在這樣的條件下〕廣大勞苦群眾的

31 陝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2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23；張秀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875；高崗1945年8月2日、賈拓夫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北華捷報》1934年9月5日。

32 關於「勝利的進攻」，參見省委歡迎紅四方面軍來陝宣言，《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冊，頁304-306；省委給陝南的指示，1933年2月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52；賈拓夫向省委的報告，1933年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6冊，頁167-168；高錦尚、王玉麟、孟履誠給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書節錄，1935年8月1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9；《北華捷報》1935年3月13日及1935年8月7日。

革命鬥爭，無疑的要更高漲起來，更加速統治階級死亡的命運，爭取全省革命的完全勝利。³³

事實上，饑荒很少引發革命：農民太貧弱、無力抗爭，必須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糊口上。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在擺脫生存危機之後才成為可能。³⁴ 在陝北，1933至1934年冬天的一場大雪把人們從大旱中拯救出來。對於南梁山上那些忍饑挨餓的游擊隊員來說，這個冬天是一個尤其大的考驗。他們瑟縮在沒有取暖設備的山洞中，為避免敵人的圍剿，還要費力抹去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足跡。³⁵ 不過瑞雪兆豐年，豐年意味着富人將糧穀滿倉，這樣一來，游擊隊就又有了獵物；豐年也意味着穀價將下跌，農民能用來納稅的錢會更少——而稅卻無疑會增多，以補幾年大旱國庫之虧。³⁶ 因此，旱災的結束反而讓農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可能也促使更多的年輕人產生了鬧革命的想法。

謝子長歸來

1933年1月，謝子長被送到上海接受再教育，這是陝西省委清理、整頓二十六軍領導層的動作之一。關於謝子長在上海的相關

33 省委關於政治任務的決議，1930年9月1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冊，頁253。類似的表述在這一冊及同一套文件彙集的后續各冊隨處可見。

34 Louise A. Tilly, "Food Entitlement, Famin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4.2 (Autumn 1983), pp. 333–349.

35 張策：《我的歷史回顧》，頁46。

36 陝北特委工作報告大綱，1934年6月27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378–379。陝北特委向中央駐北方代表的彙報，發表日期1935年1月31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462–463。

信息現在還塵封在檔案裏，估計黨糾正了他的那些重大錯誤並用主流路線對其進行了一番再教育。之後他被派到北平，在中共北方局的領導下工作。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支部聽命於西安的省委，與此相對，位於陝西東北的「陝北」支部一直通過北方局與中共中央聯繫。³⁷ 從「陝北」支部開展工作的那些小鎮到北平的旅途又快又便宜：取道山西，坐火車向太原方向走，再北上去北平。相比之下，交通員去西安要在羊腸小道上輾轉兩個星期。³⁸ 「陝北」支部也直接從北方局取得經費，大大提高了它相對於西安省委的獨立性。³⁹ 作為回報，謝子長也用游擊隊從綁架中獲取的贖金去解救北平那些身陷囹圄的同志。⁴⁰ 謝子長被派到北方局工作，本身就體現出「陝北」與陝甘兩派在組織上截然不同的從屬關係，也令北方局與「陝北」黨之間素有的聯繫變得更加緊密。這樣的兩套彙報系統、經費來源和組織關係，加深了謝子長的「陝北」黨與劉志丹的「陝甘」黨之間的矛盾。⁴¹

北方局派謝子長到張家口，在抵抗日本進攻察哈爾的一支國民黨部隊裏工作。在那兒，他跟一位受過良好教育、出身富裕家庭的米脂姑娘結了婚。米脂是陝北的女學中心。這位叫尤祥齋的姑娘1920年代曾在安定縣任教，謝那時候就認識她。之後她在黨

37 為區分謝子長領導的「陝北」支部與作為地理名詞的陝北，我在提到前者時都將使用引號。

38 任子良關於陝北問題向中央的彙報，1929年8月2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2冊，頁423；黃某某向中央的報告，1932年2月1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4冊，頁23；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34-35。

39 陝北特委書記崔田夫有一次從天津帶回1,000元錢。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87。

40 吳岱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34。

41 王曉中：《中顧委工作紀實（1982-1987）》，頁55。

內擔任過各種各樣的工作，謝給她寫過幾封信、求過婚。姑娘頗為猶豫，但黨鼓勵同志之間結成連理。已婚夫婦可以為黨的集會提供掩護；女同志與黨外人士結婚則有泄露黨的機密的風險。⁴²兩人在張家口重逢後，匆匆舉行了婚禮。儘管尤之前對作為革命領袖的謝頗為崇拜，但很快就對新展開的婚姻生活失望了。她發現自己的角色不過是在一間年輕的男共產黨員來來往往的屋子裏做飯和縫縫補補。這可不是她參加革命的目的。很快，謝所在的那支部隊在察哈爾吃了敗仗，兩夫婦回到北平，謝又被派回陝北。從那以後，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過面。一年之後，尤在北平入獄，並且懷了孕，謝肯定不是孩子的父親。⁴³

1933年11月，北方局派謝子長回家鄉安定縣重振那裏的游擊運動。很快，米脂人郭洪濤也被派去指導黨建工作。⁴⁴他們工作的重點區域與劉志丹游擊隊所在的陝甘交界處很不相同。在陝西東北部，無定河、清澗河流經的縣份是陝北最富裕、人口最稠密、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這裏也是陝北黨最早發展壯大的地方。這一地區的北邊有長城的殘跡和戈壁風沙，榆林就在那個方向，那裏是軍閥井岳秀所掌控的地區政治中心和軍事基地。井在榆林辦了一所中學，為當地培養人才，老師是校長杜斌丞從北京請來的，其中包括魏野時和李子洲，兩人後來成了陝西黨的創始人。前面已交代，劉志丹和謝子長都曾是榆林中學的學生。無定河再往南是米脂，在陝東北，米脂士紳的教育程度最高，也最有實力。綏德曾

42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76、142。

43 尤祥齋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90–293；受訪者17、18。據說謝子長的同志閻紅彥，是尤在獄中生的孩子的父親。尤後來在延安跟閻紅彥結了婚，然後再離了婚。

44 《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99；賀晉年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4；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25。

是清朝的直隸州，陝西第四師範學校就在綏德，在1930年井岳秀將其關閉之前，這所學校也培養了大批共產黨員。綏德和米脂的土地集中程度相對較高，地主有權有勢，在當地也名聲在外。綏德往南是清澗，那裏曾是1927年共產黨發動起義的地方，也是跨過黃河前往山西的一個重要渡口。謝子長的家鄉安定在秀延河的上游，東臨清澗。民國時期，勤儉持家和詩書繼世的傳統頗讓此地的人自豪，也支撐起了一個穩固的教育體系。⁴⁵

劉志丹領導的陝甘革命運動以士兵、民兵、土匪、哥老會為群眾基礎，而陝西東北部的黨組織是在學校中建立起來的。東北各縣的學校最多、也最好。在1920年代的國共合作時期，中共對教育系統的滲透相當成功。⁴⁶ 1928年反革命浪潮襲來，陝西黨的領導層遭受重創，其大部要麼被殺要麼叛變，不過，還是有人活了下來，人們對左翼教師的記憶和同情也保存下來。直到1933年，號稱有1,100名黨員的「陝北」黨，70%是農民，但黨的報告承認：「到目前為止，全部領導權仍然在知識分子手裏。」⁴⁷ 據一位當地幹部說，這是因為工人經常叛變，而農民在領導職位上發揮不了任何作用。⁴⁸

教書先生是黨可以信賴的領導力量。綏德師範裏的黨員教師可以從學生中招募黨員，他們畢業後到附近的村鎮任教，在同情革命的教育局長的庇護下，把革命的火種擴散到四野八鄉。安定縣

45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70-77、95-172；柴樹藩等：《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

46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58-160。

47 陝北特委代表崔瑞生給中央的報告（第二號），1933年12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85。

48 馬文瑞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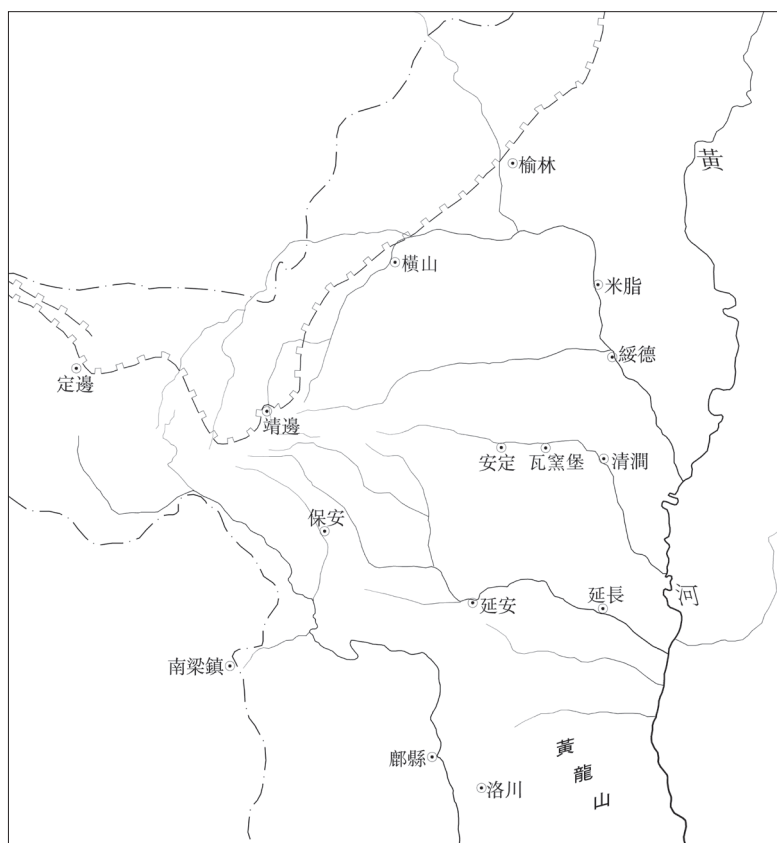


圖 4.1 陝北地圖

所有支部書記都是教員。通過這些人際網絡，黨在農村建立起組織。⁴⁹ 知識分子的領導並非沒有問題，正如一位黨內左派所說：

49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74-77、90-91、101-104、136、158-160；馬明方的回憶，《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3期，頁57-58；常黎夫的回憶，出處同前，頁63-65；《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子長縣組織史資料（1925.春-1987.10）》，頁16-18。

當時黨的幹部完全是知識分子，而且地主豪紳的子弟佔了十分之八九。你拉你的相好，我叫我的知音，發展非常快，客觀上造出了黨的組織公開和許多糾紛，同時他們回家又把自己的佃農、僱農發展成黨員。他們都是縣、區或支部的書記，在一切黨的會議上宣傳和鼓動的口號，只是清談的材料，要是的確成為鬥爭時，便與自己利益衝突了。⁵⁰

陝北黨通過深深紮根於鄉村社會的學校和家族網絡發展壯大，由此形成一個以農村為基礎的組織，它與一切建基於既有權力架構的革命運動一樣，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劣勢。

1930年代初，井岳秀以及他背後的保守派力量有力鎮壓了陝北北部的黨組織，榆林和米脂學校裏的共產黨員被驅除出校，綏德師範的黨員學生散發紀念1927年廣州起義的傳單，這種在這一時期十分典型的「左傾幼稚冒險」舉動給了當局關閉這所學校的理由。一小群革命意志堅定的激進分子繼續鬥爭，他們以夏天的入學考試作為集會掩護，以婚事或喪事為由外出，強調秘密行動，使用暗號接頭，在外鄉不說方言，免得暴露身份。女同志被要求攜帶機密文件，因為她們被搜身的可能性要小一些。⁵¹黨員生活在被叛徒出賣的危險之下。米脂一位打入軍隊內部擔任文書的黨員遭到當局懷疑和解僱，黨給了他一個小職位，可是不夠養家。因對自己的待遇不滿，此人叛變並暴露了當地黨組織。⁵²可能就是因為這次出賣，1933年米脂的六名學生遭逮捕和處決。他們的屍體被扔進了無定河，屍體在下游被拖上岸的時候，當地人對這些受過教育的年

50 黃某某向中央的報告（關於陝北），1932年2月1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冊，頁24。

51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5–16、23。

52 陝北特委代表崔瑞生給中央的報告（第二號），1933年12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99–300。

輕人表達了普遍的同情。在當地，知識分子頗受尊重，槍殺學生——即便是共黨分子——也是不得人心的。白色恐怖的作用有限，黨損失了同志，卻贏得了同情。⁵³

政府的鎮壓把縣城和鎮上的中共組織趕到了農村。這種形勢也迫使黨員們離開北方——當時「陝北」黨的小股游擊隊大多活動於軍政中心榆林以南、但相距較遠的清澗縣和安定縣。學校裏仍有中共的地下組織，他們在支持農民的抗稅運動中取得了些許成功，但總體來說，游擊隊只能採取小規模行動，且其成員中包括常見的土匪和哥老會弟兄。閻錫山在山西禁煙後，山西的鴉片挑夫和保鏢沒了生計，地方經濟受創，游擊隊有了新的兵源。當時報紙上的報道經常把鴉片販子和革命運動的發展聯繫在一起，而他們與當局之間的對抗關係使得這種說法似乎有幾分道理。⁵⁴ 中共以紀律約束這些烏合之眾的努力常常適得其反，一名游擊隊領導人在改造土匪的時候反被後者槍殺。地方黨組織的派系之爭也讓游擊隊飽受其苦。中共希望在土匪之外開發新的兵源，但發現農民和學生缺乏必要的軍事技能。一旦打起仗來，這些人往往開兩槍就跑。⁵⁵

53 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64-67。

54 〈陝北收復赤區視察記〉（二）、（三）、（八），《大公報》1936年11月26日、1936年11月27日及1936年12月18日。

55 陝北特委代表崔瑞生給中央的報告（第三號），1933年12月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04-308。馬文瑞也提到過，參見《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3期，頁83-84。我對陝北黨的敘述不涉及毗鄰內蒙的陝西東北角神木縣的黨組織，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獨立運作的。1933年，號稱「陝北」黨員的40%都在神木（陝北特委給北方代表的報告，1933年10月20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133-134），不過到了1935年，那裏的革命運動已被鎮壓下去了。參見《西北革命根據地》一書輯錄的回憶性文章，頁321-324；馬文瑞1945年7月1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亦可參見關於陝西黨史的另一文獻集，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中共榆林地委黨史辦、中共神木縣委黨史辦編：《神府革命根據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黨組織清楚地意識到「陝北」和陝甘革命運動的差別，這一點在其語氣誇張的報告中非常清楚：「陝北……群眾情緒非常高漲，目前已經到了武裝群眾的階段。但槍械的缺乏，是我們的一個弱點。」與此對照，儘管陝甘的游擊運動也很活躍，但缺少稱職的幹部，意味着「一時不能普遍建立農村支部」。⁵⁶結果，陝甘有軍隊但無黨組織；「陝北」有農村黨組織但無軍隊。⁵⁷「陝北」黨迫切希望得到更多的軍事援助：「二十六軍過去一向都是在關中道方面的進攻，從來未曾來過陝北北部……他們只注意佔據西安。」⁵⁸當然，命令劉志丹部進攻關中的是西安的陝西省委；但現在省委被破壞，劉和隊伍北上南梁了。

到了1934年，「陝北」和陝甘黨進一步合作的道路打通了，這並不是兩個支部的第一次合作。1932年，劉志丹部騎兵隊長、安定人強世清就曾返鄉，重振「陝北」的游擊運動。剛過春節，他就安排了頗具戲劇性的第一次行動：暗殺安定縣長。此後，強似乎往返於安定和南梁兩地，在安定西部山區發動以村莊為單位的小規模革命運動。1933年秋天劉志丹歸隊後，強又被派到安定，帶着一小支隊伍和一點錢去支援那裏的游擊運動。然而，強世清太過自信，他不明智地進攻了謝子長老家的一支軍隊，在戰鬥中受了傷，很快又被叛徒出賣並被殺害。他的部下繼續戰鬥，最後也失敗了。謝子長回來的時候，這支隊伍已經埋了武器，各奔東西了。⁵⁹

56 二十六軍第42師向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報告，1934年6月20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19-220。

57 這是朱理治在1945年的總結，參見《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2。

58 陝北特委代表崔瑞生給中央的報告（第四號），1933年1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09。

59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19-720；賀晉年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4-35；馬佩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59-164。

謝子長歸來後，嚴厲斥責那些垂頭喪氣的同志不該就此放棄革命，之後命他們挖出掩埋的武器，組成一支約十人的隊伍繼續在安定縣西部開展武裝鬥爭。與南梁的情形類似，1933至1934年的冬天非常難捱，謝子長在山中睡在稻草上，飽受凍瘡之苦。游擊隊只能在晚上造訪周邊的村子，白天，謝向部下宣講陝北造反的歷史和江西的蘇維埃革命，這都是他在上海受訓時學到的。他回顧了黨的歷史和其遭遇的諸多挫折，無數次地重複他最喜歡的那句口號：「失敗是成功之母。」⁶⁰ 春天來了，白天，謝和他的士兵像農民一樣在田間勞作，晚上則搞夜襲，這樣慢慢建立起一支由年輕人組成的赤衛隊。⁶¹ 謝子長等人在陝北東部重新點燃武裝鬥爭的星星之火時，他們的武器量少質劣，不足以對抗正規軍，於是，衙役、稅吏、「惡霸」就成了他們的打擊目標。⁶² 不過，這是他們從事階級鬥爭，克服陝北黨過去的「富農」錯誤、正確執行中央路線的表現，謝子長部因此得到了上級的表揚。⁶³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低層次小規模的革命運動既是階級戰爭也是家族事務。陝東北部農村人口稠密且穩定，在這裏，親緣關係比西部那些移民村子起到更大作用。激進分子從信任的熟人中招兵買馬，他們首先找的就是本家人。所以謝子長讓他的侄子當副手就沒甚麼可奇怪的了。事實上，謝家人深深地捲入了革命，他有26名親戚為革命做出過貢獻，其中9人為革命獻身。⁶⁴ 謝家並

60 劉明山和劉青山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22-128。

61 馬佩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60。

62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34-39；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72-75。

63 陝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12月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28-429。

64 劉明山和劉青山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30、271；強鐵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83-391。

不是孤例。安定縣的另一個村子有五家兄弟或叔侄一起參加革命，從當地黨員的名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姓氏和字輩所體現的緊密的血緣關係。⁶⁵ 家族情感和革命信念並駕齊驅。回到陝北後，謝子長採取的最激動人心的革命行動是大膽進攻安定縣城，以解救數十位被監禁的共產黨員。他們中的很多人是1934年初在游擊隊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中被捕的，這些人的家人希望游擊隊能解救他們。1934年7月，謝帶領六名游擊隊員攻入守備空虛的縣城監獄——然而謝被監禁的哥哥可能死在這次營救中。⁶⁶ 當然，這只是家庭與革命事業的血肉聯繫的一面。為了搜捕共產黨游擊隊員，政府曾逮捕他們的家人，讓全家為家裏年輕人的激進行為負責。共產黨人則綁架富裕地主的兒孫並索要贖金，那些出自最遭痛恨的土豪家庭的人質常常被撕票。⁶⁷ 家族的紐帶和政治的忠誠就這樣纏繞在一起。

劉志丹和謝子長：對手和盟友

劉志丹和謝子長這兩位陝北革命的英雄就像同一支籃球隊裏不太合拍的兩個明星。他們的成功有賴於對方，如果能結合劉的

65 子長縣柳樹溝秀延縣蘇維埃政府舊址；《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子長縣組織史資料（1925.春—1987.10）》，頁21—60。

66 劉明山和劉青山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63—264；賀晉年1942年11月13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強鐵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87）稱，謝的哥哥在這次營救中死在安定的監獄裏，不過其他人的說法沒有把其兄長的死和謝的營救行動聯繫在一起。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66）說閻紅彥的父親在這次營救中獲救，謝的哥哥是在另一次行動中被捕和遇害的。

67 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78—95。

軍事謀略和謝的組織紀律性，應該大有作為，不過，兩人真正的合作好像總是差一口氣。1934年夏天，他們做了最後的嘗試。劉志丹邁出了第一步，給「陝北」送了一批武器，希望對方能為他在南梁的隊伍提供一些糧食。⁶⁸ 安定營救行動之後不久，謝子長帶着幾百人到南梁投奔劉志丹。謝子長的游擊隊在劫獄後面臨極大的壓力，南梁自然是一個現成的避難之地。米脂青年郭洪濤與謝同行，他和劉、謝都畢業於榆林中學。郭在山西的監獄裏坐過六年牢，他的革命經歷雖算不上豐富，但他對列寧主義相當熟稔，被委以在「陝北」從事黨建工作的重任。⁶⁹ 郭和謝都是北方局派出的，出發前，組織簡短地向他們交代了黨長期以來如何批評二十六軍的「機會主義」，比如躲到山裏、不推行土地改革等等。過去，諸如此類的批評都來自省委，現在被「陝北」支部的同志帶到了南梁根據地。組織的意圖很清楚：加強黨對二十六軍的控制，將其與「陝北」游擊隊整合，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強大的蘇維埃，以控制從關中地區的三原縣到內蒙綏遠的廣大區域。⁷⁰

考慮到劉和謝過去的芥蒂，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面。⁷¹ 1932年在三嘉原，謝曾下令把劉志丹的朋友及幹將趙二娃槍斃。自那之後，劉志丹手下絕大多數土匪武裝被先後清理出革命隊伍，謝取得了游擊隊的指揮權。現在，謝仍為自己的行為辯護。1935年1月，「陝北」黨在一份文件中寫道：「因劉的部下完全是土匪行動被

68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50。此事發生在謝進攻安定之前，這些武器對他的行動應有所幫助。從王世泰的敘述中看不出劉志丹有沒有收到糧食。

69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2-22。

70 陝甘邊特委，1934年7月，《六大以來》，上冊，頁662-666。

71 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27-29、48-49有出色概括。

繳械。」⁷² 儘管有這些不愉快的歷史，在1934年夏天，劉志丹仍然以豬、羊肉的大餐款待了謝的部隊，又給了些武器。⁷³ 謝似乎並不領情。在給上級黨組織的報告中，他用新番號稱呼劉志丹的部隊，指責「四十二師一貫的是軍事亂竄，不能在艱苦的群眾工作中完成西北蘇區的任務。」⁷⁴ 兩人間的分歧之大一如既往，不過，分歧的背景卻發生了變化。陝西省委被破壞後，劉志丹獨立行動，已沒有上級對他指手劃腳；而謝子長卻攜上海中央及北方局的指令而來，這個指令就在郭洪濤帶來的兩封信裏。

兩封信是基於多年來陝西省委對陝甘游擊隊的土匪成分和「機會主義」錯誤的批評報告。⁷⁵ 北方局的批示用隱形墨水寫在一本閒書的字裏行間——這是當時傳遞高層機密和敏感信息的常用辦法。⁷⁶ 將密信破譯和謄錄後，郭洪濤把它們帶到了南梁並轉交二十六軍。⁷⁷ 兩封信究竟寫了甚麼現在已不得而知，不過，從這一時期類似的信件中不難猜測其主要內容是對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心。儘管短短兩個月之後，毛將率部放棄中央蘇區，但這一時期的黨內文件仍反覆引述共產國際的決議和王明的文章，以批駁江西中央紅軍正在遭受失敗的「謠言」，及論證發動城市起義仍然可行。小規模

72 陝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5年1月2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44。

73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34。

74 謝子長致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9月5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33。

75 賈拓夫曾坦言，他在1933年12月以這些報告及自己在省委的工作為依據寫過一篇文章。賈拓夫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76 楊和亭是信件的謄抄人，見《西北革命根據地》中他的回憶，頁250。

77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45-47。

的游擊戰略被斥為「右傾機會主義」和殘留的「農民意識」的產物。陝甘游擊隊那種在敵人進攻之時堅壁清野、跑到山裏的做法遭到批評，「防守是革命的死路」。陝西紅軍應採取與此相反的做法：做好進攻城鎮的準備，肅清反動派的老巢，與此同時還要「積極爭取蘇區的領土不使每一寸為敵人蹂躪」。最後，此類信件還號召向四川和陝南一帶擴展蘇維埃運動，與活躍在那裏的黨的軍事力量連為一體——這些寫於1935年的信件並沒有意識到，當時四川和陝南的紅軍正準備向陝北撤退。⁷⁸

此類信件顯示，身在沿海城市的黨的領導人可悲地脫離於內陸地區的革命現實。就在一年之前，因為遵從了省委的類似指示，劉志丹的部隊遭受了毀滅性的失敗。劉在南梁山重新建軍的努力剛剛有了一點起色，就又被批評為右傾機會主義、躲在山裏、忽視城市中心等等。對於劉的很多追隨者來說，這些信件帶來的消息是「攔頭一悶棍」。⁷⁹大多數人把憎恨之情指向年輕的、說話頭頭是道的郭洪濤，說他是「欽差大臣的派頭」，但也有一些人感覺到是謝子長在給25歲的郭洪濤撐腰，在與劉部的關係中，謝子長表現出了「宗派主義」的態度。⁸⁰後來，陝甘的革命者找到了一個報復的辦法，他們控告「陝北」黨犯了極左的錯誤：黨只號召土地

78 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給陝甘邊特委及陝北特委的指示信，1935年5月10日，北方代表給陝甘代表和西北工委的指示信，1935年5月25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8-51。已出版的郭洪濤給二十六軍的指示（1934年7月及9月，《六大以來》，上冊，頁662-668），以及張策關於這批信件的回憶都包含類似的批評。《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17-918。

79 《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87。

80 習仲勛1942年11月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張秀山1978年10月8日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改革，他們卻已經着手建立集體農場。⁸¹ 兩派似乎都在為各自的立場辯護，不過謝仰仗着郭洪濤的支持以及他本人與北京更高一級黨組織的關係。⁸² 當事人的回憶和當年的文件都沒有關於南梁爭論的記錄。不過很清楚，謝子長和郭洪濤先聲奪人，抨擊二十六軍犯下那些所謂錯誤。考慮到劉息事寧人的性格和他對黨組織的一貫遵從，他不大可能激烈回擊。在一件事情上，他很快就做出了讓步：高崗被免去政委的職務，取而代之的是謝子長。謝子長和郭洪濤都對高崗特別反感，郭批評高崗「品質惡劣」，謝則要求他辭職。高曾是陝西省委派出的第一位批評二十六軍的代表，儘管他後來地位大增並與劉志丹站到一起，但他與遭人憎惡的老省委的淵源卻無疑讓謝子長心有戒備。高崗在西安躲過了省委的減頂之災，又跑到山裏加入了劉志丹的部隊，這很可能也加重了謝對他的猜忌。就像1933年的謝子長一樣，高被命令到上海接受再教育，但他拒絕前往。⁸³ 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劉和他的部下在抵制上級命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

在一件事情上，劉和謝是有共識的：繼續進攻關中是愚蠢的行為。這卻是黨中央的一貫主張，被視作進逼西安、發動城市無

81 張秀山向任弼時的彙報，1941年6月10日，見西北局高幹會議文件。當時密集的階級鬥爭令不少土地拋荒，這些「集體農場」是游擊隊在耕種這些土地時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崔田民1945年6月28日、李景林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82 張策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17-918（這一更早版本比張策1997年出版的回憶錄中的說法更加直接），參看《我的歷史回顧》，頁49-50。回憶錄中刪去了對謝子長的尖銳批評。

83 謝子長致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9月5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32-233；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45-47。謝子長很快就把政委一職讓給郭洪濤。高崗在1934年被撤職，解釋了1942至1943年整風運動中他對郭洪濤發起的猛烈攻擊。

產階級革命的最好辦法。謝當時更希望在陝北從事他的革命運動，他認為不久前的失敗使部隊士氣低沉，很難繼續對關中發起進攻。⁸⁴ 劉則主張黨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陝西北部。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央仍然號召進攻中心城市，「陝北」黨只得說自己仍在為「平原戰」做準備。⁸⁵ 具體來說，南梁會議的成果之一是劉志丹派王世泰帶領一支實力較強的隊伍到安定縣去支持謝子長的武裝鬥爭。幾個月後，王和他的部下好像回到了南梁。此後直到1935年，劉和謝的隊伍基本上是各自為戰。但無論如何，在實現雙方聯合的過程中，劉對「陝北」的援助是一個有實質意義的姿態，也驅散了一些7月會師中的敵意。⁸⁶

南梁會議之後，謝子長回到安定縣，在王世泰從陝甘帶來的人馬的支持下重新發動武裝鬥爭。⁸⁷ 同月早些時候那場戲劇性的劫獄事件，讓人們重新注意起壓抑已久的反政府情緒。教員和學生一如既往地是激進青年的核心，老師可以利用知識分子的威信和他們在當地的人脈關係保護黨組織。當時，大眾的訴求主要集中在反抗沉重的賦稅，這使得黨的活動有相當的民意基礎。在安定，教師和地方治安官員一直以來的良好關係，也使國民政府重建保甲制的政策實施起來困難重重。共產黨也利用國民政府整頓腐敗和

84 謝子長致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信，1934年9月5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32-233。

85 北方局給二十六軍的指示，1934年9月，《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239-240；關於陝北會議的報告，1934年（無確切時間，推測是1934年下半年），《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34。

86 賀晉年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75-676，《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81；〈西北革命根據地概述〉，《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

87 崔田夫在1943年的說法將安定革命形勢的上升歸功於二十六軍的到來，但當時高崗還在任上，這種說法未必完全可靠。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118。

禁食鴉片的努力驅除了一位縣長。⁸⁸ 在農村地區，黨組織從幹部或進步教師所在的村子向外擴張。⁸⁹ 謝子長的影響力在家鄉安定西部山區尤其大，1934年秋，赤源蘇維埃就建在那裏。在安定縣東北部較為富裕的平原地區，教育系統相對發達，1935年年初建立的秀延蘇維埃便以當地師生為骨幹。但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更具優勢，他們控制着縣城及周邊區域，並把縣城設在當地的商業中心瓦窯堡。⁹⁰

按照當時的文獻，安定縣及其鄰縣清澗有一半的村子是「赤色」的，周邊其他各縣則有10到50個不等的「赤化村」。革命運動在鄉村的推進使鄉村陷入「無政府」狀態。隨着黨的力量不斷增長，赤衛隊被建立起來，他們可以為當地的游擊隊站崗放哨。⁹¹ 不過，需要提起注意的是，黨組織的擴展是以它所控制的村子的數量來衡量的。這不是那種把農村內部劃分為地主與貧農兩大陣營的階級運動，而是一地的革命形勢取決於共產黨和保守士紳哪一方佔主導地位。有時候，革命的進程也與地形有關係：交通不便（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與外界連通）、遠離主要城鎮的山區容易成為共產黨的根據地。此外，學校多、來自精英家庭的激進青年多，也是革命的有利條件。類似三原縣武字區的大地主黃家，安定縣東部一個大家族的兒子既是國民政府的區長，又是中共地下黨員，黨支部就建

88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67。

89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43–44。

90 子長縣柳樹溝秀延縣蘇維埃政府舊址；《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子長縣組織史資料（1925.春–1987.10）》，頁37–39；中共子長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安定（今子長）縣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1988年5月30日。

91 團陝北特委向團中央的報告，1934年7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385–386；常子建向中央的報告，收件日期1934年3月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339–340。

在他家大院的學校裏。⁹²種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陝北農村各地出現了一小塊一小塊的共產黨據點。

到那一年的年底，「陝北」地區至少活躍着七支游擊支隊。它們的規模較小，一個縣大多只有三五十人，大約三分之二的成員才有充足的武器彈藥。⁹³然而，與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游擊隊不一樣，「陝北」革命得到了當地黨組織的有力支持。⁹⁴當時的報告顯示，1933年7月，「陝北」有1,153名黨員，1934年6月的數字不太精確，但黨員應該超過1,900至2,000人，到這一年的年底，黨員人數已逾2,200。最大的一批——約三分之一的黨員集中在黨組織相對獨立的神木縣；其他黨員比較多的縣包括謝子長的家鄉安定縣、與安定相鄰的清澗縣、綏德縣、吳堡縣和葭縣。⁹⁵一般來說，黨從學校中招募農村青年以擴充隊伍，又通過反對苛捐雜稅和腐敗吏治獲得大眾的支持。與此同時，上級黨組織並未放鬆土地改革的要求，過火行為時有發生。在清澗縣，農民的小本生意都在禁止之列，地方幹部強迫農民組織「集體農場」。⁹⁶諸如此類的舉措雖然表明黨可以對某些村莊實行有力控制，但卻不能為黨組織贏得廣泛的支持。

92 《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子長縣組織史資料(1925.春-1987.10)》，頁23-24；任家砭革命舊址；參看李赤然：《李赤然將軍回憶錄》，頁18。

93 陝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6月27日、1934年12月8日，《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第7冊，頁381、423-426。

94 黨的一位新領導人對陝甘游擊隊的主要批評是當地黨組織的領導太過薄弱。〈中共陝甘晉省委對於進行游擊戰爭與游擊隊突擊的決定〉，1935年9月15日，《歷史檔案》，1986年第4期，頁56-59。

95 陝北特委給北方代表的報告，1933年10月20日；陝北特委工作報告大綱，1934年6月27日；陝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12月8日，見《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頁133、379-381、423-425。

96 團陝北特委向團中央的報告，1934年7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88。亦可參見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54。

儘管「陝北」革命運動的長項在農村黨組織，謝子長卻自視為一位軍事領導人，他一回到安定，就立刻恢復了游擊隊的活動。⁹⁷他回來不到一個月，就向黃河河口一個防守森嚴的據點發起進攻。在戰鬥中，他胸口受了傷，用了一件大概是從當地富戶家裏沒收來的女式袍子包紮傷口，靠衣服的顏色（紫色）掩蓋傷口的血跡。放棄攻打河口後，他繼續帶兵打仗。9月，因為大部分兵力移駐鄰近的瓦窯堡，安定縣城守備空虛，游擊隊輕鬆將其攻下。這是游擊隊第一次攻下一個縣城，謝子長因此名聲大震。⁹⁸到了冬天，他的傷口感染開始擴散，謝不得不從戰場上撤下來，家人和同志們一直照顧着他，直到1935年2月21日他在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山洞裏去世。⁹⁹謝子長臨終前，劉志丹來與他告別。兩人在這次會議中做出了統一陝北游擊隊編制的決定。據說，在由誰來擔任游擊隊領導人一事上，兩人互相推讓，到底誰的意見佔了上風，不同的回憶錄說法不一。最終似乎決定由謝來擔任最高指揮官，不過在他養傷期間由劉代行職責。劉很有可能已看出謝將不久於人世，便頗為大度放棄了眼前的一把手的榮光。¹⁰⁰

謝死後沒有葬禮，儘管這有悖家屬的意願。黨擔心謝的去世會對游擊隊士氣造成打擊，也不願給國民黨一個宣揚勝利的機會。這

97 被委任為四十二師政委的時候，謝推說自己是軍人，不適合政治任務，把這一職務讓給了郭洪濤。謝子長給北方局代表的報告，1934年9月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233。

98 《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102；〈謝子長〉，《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252–253。

99 2018年6月，我參觀了燈盞灣村的那個山洞，位於子長縣西部的深山裏。

100 高朗亭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51；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58–65；《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105–106；《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6年第8期，頁29–30。

一招管用了很長時間，直到1935年8月，國民黨的內部文件裏仍不時提到謝的名字。¹⁰¹ 儘管安定縣直到1942年才正式更名為子長縣，不過地方黨的領導人從1935年就有這個想法，現存文件顯示，當時在安定縣西北就有一個「子長縣」。¹⁰² 毫無疑問，謝子長在其老家安定及周邊地區享有極高的聲譽，不過其由來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從外表上看，謝子長沒有甚麼英雄氣概。在保存至今的照片上，謝是一個消瘦而面色蒼白的年輕人，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學生而非游擊隊的指揮官。在同志們的回憶錄裏，他個子不高，身材瘦小，背微駝，長着一張年輕的臉。¹⁰³ 推卻政委一職時，他自詡軍事領導人而非政治領導人，在其革命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謝子長也確實是一位軍人：他曾是安定民團的團總，也在甘肅的軍閥部隊裏作過軍官，還曾指揮過游擊隊。他似乎認為，在陝北，一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取決於他的軍事實力——在這點上他倒沒錯。不過他在軍事上並無過人之處。1932年，因攻打有圍牆拱衛的甘肅山河鎮失利，謝子長被撤了職，那年年底他的部隊在保安也吃了敗仗。一位黨史專家

101 《子長陵資料》，第1冊，頁106、136；謝紹明（謝子長養子）的說法，見《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15-316；井岳秀給邵力子的信，1935年6月1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08；高錦尚、王玉麟、孟履誠給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書節錄，1935年8月1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9。

102 謝紹明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16。1935年8月10日的一份陝北蘇維埃文件（陝北省臨時蘇維埃政府關於擴紅工作的通令，《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列出了子長縣的招兵名額，不過同一份文件中也有赤源縣和秀延縣的名額，這兩個縣都是從安定縣分出去的蘇維埃新縣。更令人困惑的是，子長縣此前一度叫仲遠縣，是以另外一位本地烈士楊仲遠命名。《安定（今子長）縣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1988年5月30日，頁5-6。

103 馬佩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40-141。

承認，「有人說謝子長從來沒有打過勝仗」。¹⁰⁴ 回憶錄一般避免直接的批評，但也提到了由於頻繁更換指揮官造成部隊士氣低落，這樣的抱怨多集中在謝子長被任命為指揮官的時候。¹⁰⁵ 最後，當然，令他身受重傷的河口之戰也只能說是莽夫之舉。

國民黨的報紙倒是經常提到國軍與劉志丹游擊隊交手，其中的一篇文章以「陝北匪魁劉子丹」為題。¹⁰⁶ 政府最懼怕的「共匪」是劉志丹，在報紙上謝子長的名字幾乎不被提及。很難不去猜想，謝子長對於劉志丹這位黨內競爭對手不斷的批評，至少部分出於他對其聲望的妒意。謝深信自己在政治上完全正確，似乎覺得有必要證明一下軍事實力。儘管勇氣可嘉，但他努力的結果恰恰證明了他這方面能力的欠缺。謝更善於與上級保持一致，在陝北的最後一年，他得到了黨組織的全力支持。然而現在，謝子長走了，在黨內再也沒人挑戰劉志丹的指揮權，由是開啟了游擊隊的發展壯大之路。另一方面，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也開始真正注意起陝西。

國民黨的圍剿與紅軍的應對

1930年代初，蔣介石對中共的圍剿集中在長江流域那些更靠近國家政治軍事中心的蘇維埃根據地。這一階段的軍事行動因1931年日本人佔領東北而短暫中斷，但到了1932年秋天，蔣的軍

104 受訪者18。

105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539、543–545；馬佩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153–156；馬雲澤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253–254。

106 衡之：〈陝北匪魁劉子丹〉，《中外問題》14冊3號（1936）。衡之可能是杜衡。亦可參見《西京日報》，1933年6月3日、6月7日、6月9日及10月16日，這些報道中均以劉早年的名字「劉子丹」稱呼他。

隊已經把張國燾趕出了鄂豫皖蘇區，兩年之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被迫放棄江西的中央蘇區。處理完華中地區的共產黨，蔣把注意力放到了陝西。

對陝北蘇維埃的大舉圍剿始自1935年，第二次在2月，第三次在7月。第一次圍剿以20個師的兵力包圍並瓦解了位於陝西東北角、相對獨立的神木縣和府谷縣的根據地。¹⁰⁷在其他地方，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不那麼成功，7月的第三次圍剿動用了超過十萬人，以近乎10比1的兵力與紅軍對決，其策略是先包圍，然後逐漸扼死陝北游擊隊。甘肅—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的回民部隊從西邊打，閻錫山從山西出兵跨過黃河從東面打，榆林軍閥井岳秀從北邊向游擊隊施壓，張學良的東北軍與楊虎城的西北軍從南邊的關中地區向北進逼。¹⁰⁸為了加強當地的兵力，蔣介石還派高桂滋帶領一師進駐陝北。高是陝北人，不過他的部隊是從華北平原拉過來的。高桂滋在綏德建立了指揮部，並修了一個軍用機場以加快與外界的聯繫，必要時實施偵察與空襲。¹⁰⁹

圍剿陝北的總兵力是空前的，但內部競爭和各部之間微妙的猜忌卻有損於其實效。井岳秀稱雄陝北多年，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國民政府染指他的地盤。西安的主政者對井岳秀的獨立傾向也有察覺，試圖加以控制。高桂滋是本地人，他是被井逼出陝北的。現在，他被派回來箝制前上司。不過，高是南京派來的，自1933年邵力子被任命為省政府主席後，南京對陝西的影響已明顯

107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1-12；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36-45。

108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3-15；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60-761；各國民黨軍官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19-641，及國民黨的電報，頁699-722。

109 中共陝甘邊特委決議，1935年8月5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3-64；高桂滋部軍官高建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95-598。

增強，這是盤踞在西安的楊虎城所不樂見的。此外，馬氏兄弟和閻錫山對於陝西的圍剿並不怎麼上心，陝西人也把他們視作外來的入侵者。國家、省、地區和本地的力量構成一張相互競爭的網絡，任何需要協調一致的軍事行動都頻遭掣肘。¹¹⁰

儘管協調性欠佳，但政府的加倍關注以及不惜血本的圍剿，仍給陝北的環境帶來了真正的變化。蔣介石在嘗試新的反共政策：以防守堅固的碉堡構成網絡，包圍、蠶食敵人。為了把這些軍事據點連綴起來並保證各個據點之間交流順暢，就得修路、架設電話線。他們把人口從閉塞山村遷到有戰略意義的、更大且守備更堅固的村莊。建在綏德的指揮部負責協調指揮這一切，那裏已經建起一個新機場。¹¹¹ 國民黨實施「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政策，其具體內容包括稅收減免，向站在自己一方的老百姓發放通行證，加強軍事紀律、避免軍隊濫用民力等。¹¹²

對劉志丹及南梁根據地來說，最大的威脅來自甘肅馬鴻賓部。之前已經交代，南梁地區人口稀少。1935年從湖北來的二十五軍及毛澤東的長征隊伍過此地時，都曾提到他們一連行軍數天，沒有看到一個村子，沒有找到一點糧食。¹¹³ 現在，馬鴻賓的部隊佔領了那些有防禦工事拱衛的鄉鎮，把分散的農村人口遷往有戰略據點性質的村莊，劉的紅軍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群眾基礎。俗話說

110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8、83；吳鴻賓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2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344。

111 高錦純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95；王英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823；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93-94。

112 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給陝甘邊特委及陝北特委的指示信，1935年5月1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0。

113 徐海東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50；劉華清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59。

竭澤而漁，如果說游擊隊是魚，圍剿無疑就是在竭澤。游擊隊唯一的應對手段是把一些閉塞的小村子裏的村民連同他們的食物、家畜一起遷到山區，以在敵人大舉進逼之下保護這些游擊隊的支持者。¹¹⁴ 即便如此，馬鴻賓仍佔領了劉志丹的家鄉保安縣的絕大部分村鎮。一隊士兵挖了劉家的祖墳；劉父從不贊成兒子所參與的革命活動，現在他跟着部隊轉移到了南梁山，那裏生存條件惡劣、鴉片也沒得抽，他為此大光其火，痛罵他的「賊娃子」。¹¹⁵

被馬鴻賓的騎兵打敗後，隴東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只得棄守，紅軍殘部撤退到洛河流域的安塞下寺灣。安塞是當地最窮的一個縣，縣政府之無能在當地臭名昭著。¹¹⁶ 敵人佔據着守備堅固的市鎮，但是洛河以南是一片林地，這為游擊隊提供了掩護，也讓馬鴻賓的回民騎兵無法發揮優勢。平時游擊隊在村莊裏活動，敵人進逼的時候就躲進樹林裏。游擊隊組織農民的手段也改進了，年輕的赤衛隊為他們提供情報和站崗放哨。¹¹⁷ 像在這一地區慣常的情況一樣，很多游擊隊員原本是土匪或哥老會弟兄。蘇維埃政府的

114 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44；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給各級黨部各級政府黨團的緊急通知，1935年4月，《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這種清空村子的做法被稱作「堅壁清野」，清政府和國民黨都用過。不過紅軍並沒有真正做到「堅壁」：清空村子只是為了保護人口。這種政策曾在前文引用過的1935年5月10日的文件中，被北方局批評為過度防禦。《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2。

115 張策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17；王世泰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44；志丹縣的受訪者6、7、8、11。

116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54-57。

117 劉景範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35-336；王英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45-346、820-825；高錦純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18及《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95；國民黨軍官馬培清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00-901；《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2期，頁14-33。

財政依賴於劫富，這使得一些人將蘇維埃視為一個土匪政權，而本地土匪也時不時聲稱自己是紅軍游擊隊。實際上，當時共產黨已經在堅決地擺脫土匪出身對部隊的影響，一些以「共產黨」自稱的土匪組織被真正的共產黨人滲透進去並遭到清除：匪首被殺，其他人被繳了槍或遣散。¹¹⁸

在陝甘交界地帶，洛河流域的保安—安塞地區足以支撐劉志丹游擊隊建立穩定的政權並開展土地改革。上級黨組織長久以來一直批評劉志丹忽視土改政策，最初確實如此。土改委員會的主席是一位橫山來的外來戶，他已在革命中發家致富，認為富農是那些克勤克儉攢下家底的人。連劉志丹都認為這種觀點太寬大了，這名幹部很快被撤。¹¹⁹到了1935年，劉本人在其他地方帶兵打仗，他的弟弟劉景範則在當地任黨委書記並負責土地改革。劉景範本人的回憶反映出當時他採取了相對溫和的政策。從「回亂」開始，「地廣人稀，是陝甘邊地區的一個特點……長期處於兵荒馬亂之中……造成了人少地多的現象。因而當時老百姓對土地的要求並不很迫切，最迫切是廢除債務、分配財產。」地方黨組織把工作重點放在開荒、貸種子和分糧食、耕畜、羊及其他財產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僅涉及川地，沒收的土地一般就交給佃戶。沒有灌溉條件的山地分也沒人要，仍歸原主。¹²⁰

原本洛河流域的小片蘇維埃還可以在險中生存，馬鴻賓部的到來徹底改變了陝甘交界地區的權力平衡。多年以來，這裏一直

118 李培福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66–968，
《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2期，頁14–33。

119 蔡子偉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34。

120 劉景範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12–413；劉志丹和習仲勛，〈陝甘邊根據地「十大政策」〉，1934年11月，《劉志丹文集》，頁35–36。亦可參見《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2期，頁22–23；高崗1945年8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講話。

是三不管地界，它離西安的陝西當局、榆林的井岳秀、蘭州的甘肅軍閥都太遠，因而沒人留意。蔣介石的介入改變了這一切，劉志丹的紅二十六軍不可能在此地繼續生存下去了。就在此時，謝子長在安定離世。這為劉提供了新的機會和新的發展空間。1935年初，劉志丹轉戰陝西東北部的謝子長家鄉，陝西革命從此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劉志丹在「陝北」

劉志丹轉戰陝東北的同時，統一陝北黨的新的組織架構也在搭建中。在1934年，陝北有兩個互相獨立的黨委：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1935年2月在安定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奉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建立起來。惠子俊被任命為西北工委的書記，他曾經是西安兵工廠的工人並在照金參加過游擊隊，負責那裏兵工廠的工作。不過，惠同時也是陝甘邊特委書記，他回去之後，「陝北」農民崔田夫代理書記之職。這兩人的任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的，是為了滿足上級黨委關於工、農應掌握領導權的要求。實權落在委員會其他成員的手中，並在兩派之間實現了大體的平衡：五位出自陝甘，四位出自「陝北」；因為謝子長離世，「陝北」派的實力大減，不過又因郭洪濤被任命為秘書長及組織部長，掌握了幹部任免權而得到彌補。¹²¹

陝甘派真正的實力在於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建立起來之後，對劉志丹的二十六軍和謝子長剛剛成立的二十七軍都有領導權；委員會主席的位子本來是謝子長的，但他將不久於人世，由劉

121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5。新的工作委員會成員包括惠子俊、崔田夫、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馬明方、郭洪濤、張秀山和高崗。關於惠子俊，參見張秀山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384-385。

志丹代為主持工作，高崗擔任劉志丹的副手。這樣一來，劉志丹和陝甘派就掌握了軍隊的領導權。軍委會命令劉志丹率部轉移到「陝北」，劉志丹也樂於如此，因為馬鴻賓部在他的老根據地陝甘蘇區已是步步緊逼。¹²² 與此同時，新的西北工委也支持抗日政策（代替了更為寬泛的「反帝」政策），批評當時國民黨對日本的綏靖態度，譴責綏德的新指揮部是「帝國主義西北代理人」。¹²³ 這明顯加強了劉志丹一貫主張的廣泛的抗日聯合戰線。

在陝西東北部，劉志丹找到了蔣介石所部署的圍剿包圍圈最薄弱的一個環節。蔣命高桂滋從華北平原出發，帶領84師駐防綏德並將該地的紅軍一網打盡。陝北人高桂滋曾是井岳秀的部下，他對陝北軍政環境的熟悉是被蔣委以此任的重要原因；不過這一調遣還是顯示出蔣對於地方政治之複雜生態的理解太淺薄。首要的一條，高與井長期的競爭關係使得兩位指揮官的合作問題重重。¹²⁴ 此外，高的家鄉在陝西西北部毗鄰內蒙的定邊，他對此地頗為重視，派遣部隊駐紮，這樣一來就削弱了東北部的守備，那裏本來是最需要他去充實的地方。¹²⁵ 可能更重要的是，雖然高是陝北人，但他的部隊來自華北平原，他們並不習慣在山區作戰。¹²⁶ 最後，由於給養很差，這支隊伍被迫依靠鴉片貿易的支撐。按照一位國民黨督查專員的說法，陝北的軍事狀況危機重重：

122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郭洪濤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46–247；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64–65。

123 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給各級黨部各級政府黨團的緊急通知，1935年4月，《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27。

124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8；陝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5年1月2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第7冊，頁440–441。

125 高建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96–599。

126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07–108；張達志1978年的訪談，志丹縣黨史辦。

公務員不敢下鄉，行路必須軍隊護送。商販裹足，稅收銳減。警報頻來。反觀軍隊，或則播種鴉片，或則搬運煙土，或則護送行旅得報酬以為樂，各謀其私利。雖連排長亦帶眷駐防，團營長與兵士終年不見，散漫頹唐，毫無朝氣。師為首腦之部，剿匪毫無方案。部隊各不相謀，遇事諉卸。重要僚屬，嘯傲煙霞，粉飾承平，諱言匪禍暗在。¹²⁷

面對這股龐大但無能的軍事力量，劉志丹可以依靠「陝北」頗具實力的農村黨組織。前面說過，劉志丹的陝甘根據地有一支強勁的游擊隊，但黨的基礎薄弱。而在「陝北」，基於學校的黨組織較為發達。在國民黨部隊佔領城鎮、修碉堡以守護較大村鎮的同時，共產黨仍堅持在鄉下活動。¹²⁸ 1935年底永平等鎮被佔領前，「陝北」黨甚至把領導機關都設在鄉下。¹²⁹ 黨逐步加強其在縣、區和鄉的各級組織。¹³⁰ 不過應該強調的是，中共並無完全控制陝西東北部農村的實力，那裏散落着一小片一小片的「赤化村」，黨的影響力依託於地方上的左翼教師或著名黨員的聲望。¹³¹ 按照一份頗為可信的回憶錄的說法，事實上只有十分之一的村子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¹³² 在共產黨佔優勢的區域，一些新的縣建立起來了。在謝子長的家鄉安定縣，縣城西邊設立了赤源縣，東北邊則成立了

127 杭毅給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7月1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11。

128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07-108。

129 楊和亭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49。

130 受訪者2。

131 團陝北特委給團中央的報告，1934年7月15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85-386。陝西南部也是同樣的模式：關於陝西南部地區工作的報告，1934年11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16。

132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43。

新的「秀延」縣。¹³³ 如上所述，像謝子長或地區書記崔田夫這樣有極高威望的領導人的家鄉，往往是中共的實力最強的區域。¹³⁴ 安定縣周邊無疑是中共的勢力範圍。據一位國府官員的報告，「敬日由〔瓦窯〕堡赴安定。自清澗以西為匪化……沿途共匪標語甚多，出城數里即不能通行……安定情形較清澗更為嚴重，匪之實力原不甚厚，而人民匪化盲從甚眾，組織嚴密。」¹³⁵ 在這些共產黨控制的區域，新兵組成赤衛隊，為紅軍充當哨兵。敵人進逼之時，地方黨組織可以清空村莊，帶領村民撤退到山裏，使一方民眾免受稅吏和軍方的橫徵暴斂。¹³⁶ 雖然這種防禦方式常遭上級批評，但它能使民眾免受當局徵斂，無疑在基層深得民心。

1935年劉志丹帶領紅軍進入陝西東北部的時候，革命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上的實力使得共產黨人的控制區域在農村不斷擴展，並大力徵召新兵。1935年6月的一份文件稱當地百分之七十的成年男子已加入紅軍，「黨員約七萬左右」。¹³⁷ 這些數字都是略數，肯定有誇大的成分，不過也表明當時的黨員集中在東北部，因為當年年底的另一份報告又提到，劉志丹領導的紅二十六軍僅有200名黨員，而陝甘蘇區總共才有3,000名黨員——不到陝北

133 陝北省臨時蘇維埃政府關於擴紅工作的通令，1935年8月1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安定蘇維埃政權》，頁4-5、31。

134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43-44。

135 杭毅給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1月24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99-700。

136 陝甘晉革命委員會，1935年10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92-93；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7。

137 陝北蘇維埃的報告，1935年6月3日，現藏中央檔案館，見《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1018。

數字的百分之五。¹³⁸黨員的擴招成為紅軍徵兵的基礎。陝北蘇維埃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徵兵計劃，要求12縣以15天為一周期，每一周期平均發展42名戰鬥員。¹³⁹而陝北蘇維埃每月的徵兵任務是3,000人。¹⁴⁰1936年一位造訪該地區的記者寫道：「多數能生產的壯丁，都隨紅軍作戰。」¹⁴¹

儘管地方黨組織可能完不成這麼高的徵兵任務，但確實有很多農民在1935年加入了共產黨。延長縣檔案館有一批1947至1948年的農村幹部檔案，79個農村幹部是1937年陝甘寧邊區建立前的黨員，這中間有73人（佔94%）在1935至1936年「鬧紅」期間入黨，其中又有65人（佔82%）是1935年入黨。他們大多是30歲以下的貧農和中農，在1935年時不過十來歲。¹⁴²黨的領導人大多來自能提供良好教育的家庭，僅以當地最著名的領導人為例，謝子長、馬明方、安子文等都出自有名望的家庭，也都受過教育。¹⁴³黨承認，地方幹部全部由知識分子構成，教師發揮了關鍵作用。不過1935年

138 陝北摘記，1935年12月1日，現藏中央檔案館，見《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1020。

139 陝西省臨時蘇維埃政府關於擴紅工作的通令，1935年8月1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

140 西北工委關於徵兵突擊月的報告，1935年9月，《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9。

141 〈陝北收復赤區視察記〉（三），《大公報》，1936年11月27日。

142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40 (December 1994), pp. 1071–1074.

143 另一例北平某大學的學生及中共黨員，參見李紹堂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第613–616頁對趙仰普的介紹。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三十三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160，趙仰普即趙通儒。——譯者註。

突擊發展黨員的運動採取了不加選擇大撒網的辦法，可以想見，有些新黨員是土匪出身。¹⁴⁴ 此外還有很多常常只有十幾歲的年輕男子，入黨多出於純粹個人的原因：父親去世，與繼母關係緊張，或是被人收養後遭虐待。有一點可能值得深究：我們搜集到的領導人傳記中，有好幾位傳主在小小年紀失怙。¹⁴⁵ 不過也有一些年輕人是被游擊隊刺激的生活所吸引而加入革命隊伍：「是趕時髦」，一位受訪者稱，當時有一支小游擊隊經過他住的村子，游擊隊員的生活看起來十分新鮮、刺激。還有一些人吃不飽飯，發現游擊隊員因為常常襲擾地主，生活比普通農民好很多，甚至能宰羊吃肉，大打牙祭。¹⁴⁶ 不過，黨需要新成員表現出一定的革命信仰，因此（據當時一份黨內文件）在一些地區「勞苦群眾來找共產黨，殺豪紳為他們加入的條件。」¹⁴⁷ 後來有人回憶：「左的總比右的好。每個人下去工作，必須要殺人，以殺人為標準，如果不敢殺人，起碼的限度是『右傾』，不然就是動搖，或者戴個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¹⁴⁸

其結果是1935年間出現了頻密的內鬥，敵我陣營大致按照階級路線劃分，但黨派、村莊和家族構建的複雜關係網也有一定的影響。黨組織曾長期批評陝北的「富農路線」，現在終於起到了效

144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36。

145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u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p. 1058; 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15-16；強鐵牛的回憶，《子長陵資料》，第2冊，頁383-384，關於謝子長。

146 Joseph W. Esheri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Up: Shaan-Gan-Ning," 美國歷史學會年會報告，1989年12月。

147 陝南報告，收件日期1934年11月9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10。

148 李景波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果。¹⁴⁹過去，劉志丹在陝甘蘇區主要的革命行動是綁架富戶索要贖金，現在，豪紳和本地的稅吏在群眾大會上被公開處決。¹⁵⁰據一位左派人士回憶：

安定，當過區長、紳士的人，土豪劣紳，全部在土地革命中殺光了，只有逃走的和以前死去的才免了。地主和部分富農、個別富裕中農，也在戰爭、土地革命、肅反、分田地中搞光了。全國，恐怕只有安定一縣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地主，絕跡了。¹⁵¹

這種說法無疑誇大了陝北階級鬥爭的作用，或者把後來各階段的階級鬥爭與1935年的混為一談。不過，還有一份來自《大公報》的報告則聲稱，所有的官員、教師、士紳、商人和放高利貸者都被處決了。¹⁵²儘管如此，階級差異並不完全能左右革命的鐵拳所向，也有政治上的考慮。本地幹部是從中學和高小學生中選出來的，他們大多來自富裕的家庭，支持其革命的家人受到了免於分地的優待。即便有這樣的回憶，參與者郭洪濤也承認存在着「亂燒亂殺」的左傾錯誤。¹⁵³一位當地農民是這樣解釋一位有鴉片癮的破產地主因何被處決的：「當時只要有人告狀就殺。」¹⁵⁴

149 陝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12月8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29。

150 陝北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5年1月24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448；中共西北中央局宣傳部：《固臨調查》（延安，1942），頁99。

151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68。

152 《大公報》，1935年7月23日。

153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頁55-57。

154 受訪者21。關於「陝北」左傾和濫殺的其他敘述，參見李鐵輪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崔田民1945年6月28日、馬文瑞1945年7月1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當地一度陷入殘忍的仇殺中——「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冤冤相報。在一起留下詳細記錄的仇殺事件中，當過稅吏、在眾人頭上作威作福的三兄弟被指控強姦了本地的婦女，群眾把他們抓住，用一把鐵鍬把三人打死。行刑手段之殘忍令人震驚，之所以用鍬，是因為激進分子當時沒有刀，又擔心用槍會引起當局的注意。¹⁵⁵ 在游擊隊相繼處決了一批地主、民團首領和一個有民憤的土豪的幾位家人之後，由高桂滋率領、駐守在綏德的國民黨軍隊進行了反擊。一位出身富裕家庭的共產黨員叛變，他提供的情報導致12名赤衛隊員被捕，並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被公開處決。這一殘忍的舉動激起了公憤，共產黨要復仇，他們抓了近兩百個村莊的保長並殺了其中的32人。¹⁵⁶ 在這種兇殘的鬥爭中，俘虜通常都被處決了，共產黨承認，部隊「所常犯的錯誤」主要包括「無故打罵勞苦群眾」、強姦、私吞沒收的財物。¹⁵⁷ 國民黨也不諱言，正是由於國軍的虐待和搜刮，許多貧苦農民才投入共黨的陣營。他們對共產黨也毫不手軟，經常割下被處決的「共黨分子」的頭顱，懸掛在城牆上。¹⁵⁸

政治暴力風潮的擴散與紅軍實力的增長是聯繫在一起的。在一些黨沒有掌握軍權的地方，地方幹部不願發動土地革命。農民害怕地主回來，分來的地會被拿走，很可能還會遭到報復。¹⁵⁹ 可以說，不斷升級的社會衝突與紅軍在戰場上的勝利密切相關。1935年夏天，徐海東帶領從湖北撤出的二十五軍結束了在川陝邊境的逗留，向甘肅挺進，最終跟陝北的紅軍會合。徐的行動吸引

155 《陝西黨史資料通訊》的三篇回憶，1984年第4期，頁37-47。

156 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90-95。

157 赤衛隊省委規定，1935年8月15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5-76。

158 〈陝甘寧調查專報〉，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馬佩勛的回憶，《陝甘革命根據地》，頁473。

159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56。

了進攻南梁根據地的馬鴻賓部的部分兵力。¹⁶⁰ 洛河蘇區的壓力因之緩解，劉志丹得以把力量集中到陝西東北部的戰場上。不過，劉並沒有徹底放棄他在陝甘交界處經營已久的基地，他的騎兵仍不時遠襲隴東富戶，以籌措錢糧、物資。¹⁶¹

在陝北，只要駐紮在綏德的高桂滋部隊敢到鄉下活動，劉志丹的部隊就會展開偷襲。這個策略的目的是把對方箝制在其駐地及碉堡附近，把農村的廣大腹地向共產黨的軍政力量敞開。隨着赤衛隊哨兵的網絡不斷擴大，這個辦法越來越見效，一旦有敵來犯，赤衛隊馬上向游擊隊通風報信。¹⁶² 被困在碉堡裏的高桂滋部只能依靠運輸隊運送給養，而運輸隊又極易成為伏擊的目標。幾次伏擊事件及補給、彈藥遭受慘重損失後，一些據點被棄守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定那座小小的縣城，安定縣政府撤退到附近的大鎮瓦窯堡。共產黨就此拿下了他們在陝北的第一座縣城。¹⁶³ 與此同時，瓦窯堡又成了一座孤鎮，為其輸送給養的運輸隊遭到游擊隊的伏擊，好幾位軍官的太太成了俘虜。為了把人質換回來，國軍被迫向紅軍繳納武器。沒多久，一輛開往延川的貨車中了埋伏，紅軍的彈藥得到極大的擴充。¹⁶⁴

160 馬鴻賓的報告，1935年7月2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12；李培福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65。

161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48。

162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6–267；賀晉年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84；高建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97。

163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53–755；毛侃（1935年5月16日、5月23日）和杭毅（1935年5月19日）向邵力子的報告，《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03–704。

164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9–272；陳克功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07–308；國民黨軍官李少棠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12。

劉志丹部的戰鬥實力隨着他們所取得的軍事勝利而大大增長。過去打仗，他們的兵比槍多，彈藥更是嚴格配給，現在，他們有了足夠的來福槍和相當一批高性能機槍。後者提供了攻克敵人防禦工事所需要的密集火力，迫擊炮更是讓游擊隊第一次擁有了炮兵部隊。這些新武器無疑促進游擊隊向正規部隊轉變，不過其激勵系統仍殘存着過去的土匪印記，繳獲武器的隊伍可以留下這些武器。¹⁶⁵ 對正規軍的勝利也將一些訓練有素的兵員補充到游擊隊中，他們是寶貴的兵源。通常，俘虜有三個選擇：他們可以參加紅軍，可以回老家，也可以回原部，不過得保證一旦再次跟紅軍交手，只能向天上放槍。游擊隊花了很大力氣招收軍醫和會用機槍的士兵。¹⁶⁶ 這種對俘虜的寬大政策部分是條件使然：紅軍沒有能力關押並養活大批戰俘。這種政策也產生了正面的政治效果，歸隊的俘虜使國民黨士兵相信紅軍不以普通士兵為敵。¹⁶⁷ 不過，被俘虜的軍官就不會得到這麼寬大的待遇了，很多人被徑直槍決。一位黃埔軍校同學成了劉志丹的階下囚，他向劉求情，劉卻毫不猶豫地命部下：「拉出去，把這狗日的砍了！」¹⁶⁸

這些成功令劉志丹信心大增。他準備攻下幾座縣城，在陝北建立一個更統一的蘇維埃政權。他的第一個目標是延長縣城，那裏有寶貴的油田但守備空虛，當時油田規模很小，且原油外運的交通極為不便。攻打延長縣城時，先由赤衛隊和當地游擊隊把駐軍引走，然後劉志丹率主力部隊發起進攻並拿下了縣城。5月下旬，紅軍在延長城裏當了四天主人，他們處決了縣長和幾位土豪，搶走

165 賀晉年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85。

166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71-272。

167 高建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06。

168 高錦純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77-778。

大筆現款。¹⁶⁹ 6月，紅軍迅速取得了更多的勝利。國民黨部隊棄守了與延長縣相鄰的延川縣，紅軍短暫地取而代之。¹⁷⁰ 從延長縣，劉部向北突進，再次佔領安定；之後轉移到安塞，輕鬆拿下那座守備空虛的小縣城，又照例處決一批縣官和士紳。¹⁷¹ 接下來，紅軍在古長城邊的靖邊縣打了一場惡仗，縣城雖然被攻了下來，但損失極為慘重。就是在打這一仗的時候，劉志丹第一次讓當過土匪的郭寶珊帶兵。儘管傷亡慘重，郭寶珊還是完成了劉交給他的任務。靖邊是北方重要的軍事據點，一旦拿下，保安和定邊也擋不住共產黨的進攻。¹⁷² 吃了一連串的敗仗之後，陝西政府向山西軍閥閻錫山求救，籲請和勸誘之下，閻派兵跨過黃河，遭遇的卻是迎頭痛擊。7月，晉軍在定仙（此地位於通往綏德路上）被包圍，來解圍的援兵又被劉志丹成功伏擊。晉軍死200人，被俘1,800人，包括50挺機槍和數門迫擊炮在內的大批武器被紅軍繳獲。吃了這次敗仗之後，閻錫山的大部分部隊乖乖撤回了他們的山西老巢。¹⁷³

169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74；賀晉年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85-287。

170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74；毛侃的電報，1935年6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06。

171 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75；賀晉年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88。

172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55-756；張達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76-277；賀晉年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91-292；李亦然：《李亦然將軍回憶錄》，頁64-67；《大公報》，1935年7月29日，報道了六個縣，漏掉了定邊。

173 高朗亭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57-258；賀晉年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94-296；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頁98-99；閻錫山部軍官于浚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19-621。

在1935年夏天短短兩個月的時間裏，劉志丹攻下陝北的七座縣城，儘管有些縣城的據守時間非常短暫。到了1935年秋天，共產黨宣佈他們在陝北和隴東的二十多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或革命委員會。¹⁷⁴一位國民黨官員在1935年8月的一份報告也表明，伴隨劉志丹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連串軍事勝利，共產黨勢力大增。這份報告估計，劉志丹的游擊隊大約有兩萬人（對主力部隊人數肯定有所誇大），有四五十挺機槍，大多數人平時蟄伏在山區，不時出山襲擾國民黨部隊，不過他們的勢力範圍令人不敢小覷：

保安、安塞、安定、清澗、膚施、甘泉、延長、延川、富縣等，幾全為匪區。以安定為中心，偽首府所在地。匪區已實行將土地分給貧農，教育、文化、經濟、糧食均已實行統制。榆、橫、綏、米、神、府、佳、吳、中、洛、定、靖等縣，半為匪區半為游擊區。韓、澄、白水、宜川、宜君、同、耀、旬、淳等縣，均為匪之游擊區。匪區人民均已從匪，有少年先鋒隊、赤衛隊、宣傳隊、慰勞隊、炊飯隊、洗縫隊等等組織。¹⁷⁵

現在，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把延安牢牢地包圍在中間。當地的國民黨官員承認他們已經落敗：「軍隊無力保護人民，信仰已失。」¹⁷⁶國民黨內部也產生了分化。文職官員指責軍人。劉志丹攻佔延長之前不久，延長縣長抱怨道，吃過幾次敗仗後，高桂滋把部隊撤回鎮上，對地方上的求助置若罔聞。「自高師入陝北後，增加

174 陝北蘇維埃關於第三次圍剿的命令，1935年10月，《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20。應該注意的是，其中很多是新成立的小縣。

175 高錦尚、王玉麟、孟履誠給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書節錄，1935年8月1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30。

176 杭毅給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9月23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18–719。

匪之槍枝為數總達兩千。從前匪毫無精器，現在機關槍輕步槍均有，此均為高師所失去。」¹⁷⁷ 軍隊一方也指責地方上的行政官員：「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狼狽為奸，魚肉鄉民，遂致工農大眾苦不堪命，一經共黨之誘惑而匪化矣。」¹⁷⁸ 隨着共產黨贏得一場又一場戰鬥，國民黨陷入慌亂，劉志丹處於他一生中最順風順水、揚眉吐氣的時候。但很快，他不得不再次承受黨內的批評。

黨取得指揮權

1935年7月，劉志丹在陝北攻城略地之時，上海黨中央派出的兩位代表到了陝北。發揮了關鍵作用的是28歲的江蘇南通人朱理治。他1927年在清華大學經濟系讀書的時候，加入了中共。朱帶來五封中央來信，這五封信寫於1935年1月到5月。一到陝北，朱就跟北方局代表郭洪濤交換了意見，向郭了解當地情況。朱來自長江下游，是一位在北京接受教育的知識分子，郭是陝北人，對當地情況自有一番想當然的理解，他們的合作日後被稱作「欽差大臣」與「土皇帝」之間的聯盟。¹⁷⁹ 朱給年輕且野心勃勃的郭洪濤壯了膽，他告訴郭，據他在上海了解的情況，大膽批評同志是獲得黨內提拔的重要途徑。¹⁸⁰ 在三天半的時間裏，朱理治通過一系列的談話傳達出中央來信的鬥爭鋒芒，一言以蔽之，信中充斥着對劉志丹所領導的陝甘蘇區空前嚴厲的批評。之前的「右傾機會主義」升級成「右

177 延長縣長董印支給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5月14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4。

178 高錦尚、王玉麟、孟履誠給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書節錄，1935年8月1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30。

179 賈拓夫1942年11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180 郭洪濤1942年11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傾取消主義」，即意圖取消黨的領導地位——列寧曾經給孟爾什維克扣上這頂帽子。4月的那封信以布爾什維克的腔調稱：「陝甘黨內存在右傾取消主義；他們的陰謀已經被暴露……對於右傾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自由主義，便是對帝國主義富農路線的仁慈，對革命的殘酷。」中央來信還號召陝北黨與陝南—四川蘇區合併，以便「打通新疆和內蒙古的國際路線」，向蘇聯求助以挽救革命的思路再次表露出來。¹⁸¹

在取得夏天的一系列軍事勝利之後，劉志丹對上級黨組織展現出與往常不同的自信。此前，他順從地聽命於上級，率部徒勞地向關中平原發起進攻，甚至跨過了渭河，最後以慘敗收場。現在，針對黨中央對他的右傾錯誤的新一輪批評，他開始抵制。中央嚴厲地批評陝北黨「忽視城市佈置暴動工作」的行徑是「不可容忍的錯誤」和「對革命的罪惡」。¹⁸² 儘管遭受了這樣尖銳的批評，劉志丹及其部下還是拒絕了朱做出的進攻延安、瓦窯堡和其他幾座有城牆拱衛的陝北城鎮的命令。他們提出部隊的裝備不足以打攻城戰。¹⁸³ 當朱提出在北方開闢一條通往蘇聯的通道時，劉擔心東北軍會趁虛而入從南邊打過來。有人對中央這些教條主義的、缺乏地方知識的命令表達了公開輕蔑。黃子文曾在三原發動革命，在劉志丹的部隊裏當過政治部主任，這時他公開批評1931年全會之後的黨中央是「把一些小娃娃提到中央負責」——「小娃娃」明顯指

181 朱理治在〈往事回憶〉一文中曾引用中央來信。參見張文杰等編：《紀念朱理治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頁552。關於朱的背景，可參閱朱理治小叢書編輯組編：《朱理治回憶錄：往事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182 中共陝甘邊特委決議，1935年8月5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6–67。

183 高朗亭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56–257；朱子休1942年11月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的是年輕且沒甚麼經驗的王明。朱把劉志丹部表現出來的這種抵觸情緒當作右傾錯誤的證據。不過在當時，他還沒有採取行動的實力。¹⁸⁴但局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9月，徐海東的二十五軍從湖北來到陝北，這樣一來，朱理治和郭洪濤欲對劉志丹採取的行動就有了軍事上的依靠。徐和他的部隊來自鄂豫皖蘇區，他們曾親見共產革命最血腥的一面，包括夏天對內的肅反。¹⁸⁵1936年斯諾見到徐的時候，將其描述為「我所遇到的共產黨領袖中『階級意識』最強的一個人。」¹⁸⁶徐接觸到的第一位陝西黨員是一位在楊虎城軍中擔任軍官的中共地下黨員，他曾向劉志丹的游擊隊提供大量幫助，也曾向二十六軍提供軍用子彈，幫其購買藥品等急用物資。二十五軍途經陝南時，此人奉命「阻擊」，儘管阻擊部隊的中共組織有約在先，如果兩軍遭遇，黨團員要「槍朝天，打空彈」，徐海東還是起了疑心，他將阻擊部隊擊潰並審訊了這位地下黨員，懷疑他不可靠，就把他槍斃了。這是徐對陝西黨的判斷力持懷疑態度的一個明顯信號。¹⁸⁷

1935年9月，徐部到達位於延安西北的永平鎮，這裏是紅軍的新司令部。二十五軍的規模不大，可能只有兩千人，但裝備精良

184 朱理治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1。

185 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92–319.

186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 299.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307。——譯者註。

187 此人是張漢民，他曾以耀縣軍事指揮官的身份幫助劉的部下。參見二十五軍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50–451；張化民、拓宏偉：〈「陝北肅反」起因再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4期，頁81–82。後來，張被處決的事情使得西安事變前後中共與楊虎城軍的關係變得複雜。

且經過實戰的考驗。¹⁸⁸ 據該部政治部副主任回憶，二十五軍與劉志丹部最初的相遇並不愉快。

二十五軍本身是勝利達到陝北了。由於勝利的到達陝北大家以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這種思想生長起來，同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匯合後，由於二十五軍在武裝方面有很多輕機關槍，槍枝很好，穿的好，因為剛從白區來的，打了土豪，穿的很闊氣，吃得也很好，大家長的又紅又胖，子彈也很多。碰見我們的兄弟部隊二十六軍、二十七軍，認為「他們是甚麼部隊！」看不起別人，說他們子彈沒有幾顆，衣服不整齊，不但沒有好鞋子穿，而且沒有鞋子穿，沒有服裝，並且頭上用一塊白布纏起來。二十五軍同志一看，呀！這是甚麼兵呀！對於這個部隊僅僅從外表上看他們，看不起他們。¹⁸⁹

不消說，這支南方來的部隊對當地兄弟部隊的意見一點也不感冒。在永平，徐海東更樂於聽命於中央代表郭洪濤和朱理治。在9月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他們對劉志丹所率二十六軍做了嚴厲批評，這些會議全盤重組了陝北革命運動的領導結構。¹⁹⁰

188 二十五軍確切的規模是一個謎。我們在下一章將會看到，毛澤東對二十五軍很尊重，尤其欣賞徐海東，這或可解釋對該軍實力的估算為何如此含混。當時的一份國民黨的報告估計二十五軍約2,000人（井岳秀給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9月2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17），高崗1945年說二十五軍僅1,400人（高崗1945年8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最近的黨史出版物稱二十五軍有3,000人。中共志丹縣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志丹歷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9），第1冊，頁37。

189 郭述申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190 高朗亭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63–264；戴季英1942年11月（7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以朱理治為首的西北工作委員會被新成立的中共陝甘晉省委所取代，朱理治任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新省委組建了軍事委員會，以上海委派的另一位代表聶洪鈞為一把手。最後，劉、徐和謝子長的舊部被合併為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徐的部下記程子華任政委。¹⁹¹ 陝北的部隊對新領導人非常不滿。考慮到南方部隊的自大以及他們滿口陌生的湖北方言，這種反感是很自然的。更重要的是，陝北的部隊已經習慣了官兵之間親密的關係，習慣了士兵委員會討論軍中的大事小情，習慣了以「老劉」直呼劉志丹這個級別的領導人。但現在，他們所面對的紅軍在裝束、做派上都更像他們過去的敵人，軍官打罵普通士兵的現象尤其令他們反感。¹⁹² 當朱理治命令二十六軍把他們剛剛繳獲的、性能最好的機槍上交徐海東部時，排擠陝北部隊的一連串動作走到了最後一步。¹⁹³ 在湖北徐海東部隊的支持下，朱理治和郭洪濤徹底把劉志丹邊緣化了，現在他們已準備好對劉志丹所造成的「機會主義」因素發動清洗。

對劉志丹那些不正統的做法的抨擊由來已久。陝西省委的布爾什維克們不斷地批評他讓土匪混進紅軍隊伍，批評他在陝甘交界處打游擊，批評他不發動土改。出自陝西省委的批評早就在上海中央傳開了，肯定又下發到了北方局。郭洪濤和朱理治先後被派來糾正陝北黨的錯誤，他們的駐地位於陝西東北部。在那裏，謝子長等更正統的「陝北」黨成員對劉志丹的批評進一步強化了關於陝甘游擊隊的那些負面意見。過去，對劉志丹的批評大同小異，

191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7；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66-767。

192 賀晉年1942年11月13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崔田夫1945年6月28日、高崗1945年8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值得注意的是，來自謝子長二十七軍的此類批評和來自劉、高二十六軍的一樣多。

193 朱理治1945年7月1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不外乎通過哥老會、民團，甚至國民黨的關係來發展革命運動。¹⁹⁴然而從1934年開始，一項新的指控被加了進來。有人說劉志丹跟張慕陶的人合作。張曾經是陝西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負責人，也出席過黨的「六大」。1928年與省委吵翻後，他轉移到北方，從事包括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在內的地下工作。在察哈爾，張慕陶再一次跟同志們鬧翻並被驅除出黨，之後便去山西組織「新共產黨」，主張抗日反蔣，與中共競爭。1935年，張回到西安。當時正是陝西省委舉步維艱的時候，他似乎與其他左派，與楊虎城那些有進步傾向的隨從們以及對黨有不滿情緒的前中共黨員共事過。儘管中共並不清楚張慕陶要組織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具體從事過哪些活動，但中央派出的代表對此很關切，劉志丹與這些日益活躍的左翼愛國人士有合作的傳聞引起了特別的疑慮。張慕陶膽敢以獨立左派的面貌，在黨組織之外活動，他被貼上「托派」的標籤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儘管不準確）。¹⁹⁵從劉志丹這一方來說，他在

194 〈中共陝甘晉省委對於進行游擊戰爭與游擊隊突擊的決定〉，1935年9月15日，《歷史檔案》，1986年第4期，頁56–59。

195 朱理治：〈往事回憶〉，頁550–556；朱理治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1–432；聶洪鈞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4–435。關於張慕陶，可參閱當時一些批判張慕陶影響的文件，如〈陝甘邊區特委關於陝甘邊區黨的任務的決議〉，1934年7月；〈西北政治危機與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1934年9月，《六大以來》，上冊，頁662–668；以及張軍孝：〈一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關於張慕陶的幾個問題〉，《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1期，頁142–149。張慕陶一直堅持抗日反蔣立場，在西安事變時反對釋放蔣介石，後於1941年被蔣介石殺害（張軍孝，前引文，頁144）。值得注意的是，班國瑞（Gregor Benton）關於托派運動的書*Prophets Unarmed*沒有提及張慕陶。另一位來自上海的地下黨員也引起懷疑，他穿着西裝、戴着眼鏡，以教授的身份來到陝北，他帶的證明文件也無法證明真偽，直到中央來到陝北，周恩來證明了他的身份。他叫張慶孚，又被稱作「張胖子」。上海黨組織暴露後，他在脫困之後被派到陝北從事技術（顯然

1933年省委被破壞之後與中央失去了聯繫，為重建聯繫，他曾求助各路看似有門道的中間人，並致力於在陝北發起更廣泛的革命運動。劉從來就不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教條主義者，他不介意與各種歷史不那麼清楚的盟友共事。張慕陶等人也在劉志丹部下的接觸之列。劉廣泛聯繫各方勢力的工作方法將讓他再次陷入麻煩。

不過，首要的考慮還是軍情。在這方面，徐海東和劉志丹有共識。一些黨的代表想向北方的神木地區發起進攻——其意圖可能是取道內蒙打通國際路線；但徐和劉都意識到，最直接的威脅來自張學良龐大的東北軍，張部已經佔領了延安且正在鞏固一條通往西安的供應線。¹⁹⁶ 隨之而來的勞山戰役非常關鍵，雖然嚴格說來徐海東是總指揮，但他似乎仰仗劉志丹對當地地形的出色把握。通往延安的路經過甘泉，東北軍在那裏遭到了第一次包圍。解圍部隊必須從延安出發。途中有一個地點顯然適於伏擊，劉準確地預測到敵人行進到那裏時會有所準備。他選擇了更南一點的勞山作為設伏地點。不出他所料，東北軍平安無事經過第一個地點後就放鬆了警惕，毫不遲疑地向甘泉開進，結果在勞山遭到了紅軍的伏擊。一場持續了六個小時的惡戰讓國軍損失了一名師長，另有數百人傷亡，至少三四百人被俘。共產黨還繳獲數百件新武器和

是無線電)和文化方面的工作。在批評朱理治之後，他遭到了批判、逮捕和刑訊。參見張慶孚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7-439；李鐵輪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40-449；張慶孚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朱理治1945年7月1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有意思的是，埃德加·斯諾被他的線人(可能是故意的)所誤導，認為是張挑起了對劉志丹的批判。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pp. 202-203.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210。——譯者註。

196 徐海東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51；劉華清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61。

大量彈藥。¹⁹⁷ 這是張學良部遭遇的一次重要失敗，其直接後果是東北軍放棄了瓦窯堡，更深遠的影響則是張學良因此對國民政府剿匪不抗日政策在政治上、軍事上是否明智產生深刻的懷疑。¹⁹⁸

勞山戰役是劉志丹打的最後一個勝仗，後人寫了很多文章讚美他的戰術之高超。但這個故事還有另外一面。儘管戰術上的細節由劉負責，徐海東才是真正的指揮官，徐安排自己的部隊攻打側翼並殿後，讓劉負責正面進攻。這一仗持續的時間比計劃的長（肯定長過劉部以前打的那種快速阻擊戰），劉手下的一些軍官認為，徐海東這是在故意消耗陝北部隊——考慮到兵力的部署以及徐對陝北軍隊的輕蔑，這種抱怨是有道理的。結果，勞山一役令劉的部隊損失慘重：12個連長有7人犧牲，一個團的700人中只有200人沒受傷。¹⁹⁹ 國民黨的報紙甚至發佈了劉本人已死的假消息。²⁰⁰ 當徐海東威脅要處決一位他認為不夠勇猛的軍官時，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雖然其他人阻止了這個決定，但傷害已經造成，陝北的部隊中開始有人叛變甚至自殺。戰鬥結束後，繳來的性能最好的來福槍分給了徐的二十五軍，而陝北的部隊則被派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地區，在飯都沒吃上的情況下，受命向一個守備堅固的敵方據點發

197 可以預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於東北軍有多大損失的說法大相逕庭。

《西北革命根據地》第14頁聲稱俘獲東北軍二千多人；王以哲1935年的報告，《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1027；周祖堯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25；高錦純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74-376。

198 關於棄守瓦窯堡，參閱高建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08。紅軍1935年佔領瓦窯堡後，在1936年棄守，由湯恩伯佔而據之，紅軍司令部遷到保安。同前書，頁609-610。

199 賀晉年1945年7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58-59；〈陝甘寧調查專報〉，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200 《中央日報》，1935年11月18日，1935年11月30日。

起進攻。這加劇了陝北方面的不滿。²⁰¹ 他們當時沒有意識到，最糟糕的局面還沒有到來。勞山之戰後不久，劉志丹被召至瓦窯堡，之後被投進監獄。當時，逮捕令誤發給了他本人，他讀了之後，像往常一樣服從了命令，去了瓦窯堡，把自己交給黨組織。²⁰² 他手下的多位軍官被調離或逮捕。還有些人則受到威脅，繼而被派去打一些無準備之戰，結果當然是傷亡慘重，抱怨叢生，一些人就此脫離革命隊伍。²⁰³ 在整個陝北地區，肅反瘋狂地蔓延開來。

革命與反革命

1935年夏末和秋季的肅反是對劉志丹領導的陝甘蘇區的全面批判。他所有重要部下均遭逮捕：高崗、他的弟弟劉景範、紅軍指揮官張秀山、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勛。總計百餘位軍官和幹部被捕，主要領導人則遭監禁，戴上腳鐐，關進瓦窯堡寒冷、陰暗、蟲子成堆的窯洞裏，只能睡在稻草上。²⁰⁴ 中央代表朱理治和郭洪濤此前對陝甘革命者「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已經為肅反運動打下了基礎。肅反的實際執行權掌握在二十五軍幹部的手中。在瓦窯堡，二十五軍的政委戴季英是審訊官，他曾親自領導

201 李赤然：《李赤然將軍回憶錄》，頁77–81；〈陝甘寧調查專報〉（約1937），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202 我本人很懷疑這種典型的頌揚故事。但兩位敵對一方的參與者——戴季英1942年11月〔7日〕、聶洪鈞1942年11月1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證實了這種說法。

203 黃羅斌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26–429；李赤然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68–373；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169。

204 黃羅斌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鄂豫皖蘇區的暴力肅反運動。他的方式直接且殘忍：「戴季英是兇神，愛打人。湖北話罵人：『媽拉八子』。弄一根棒子，一進門就罵就打。」²⁰⁵ 戴的第一個施暴對象是劉志丹的部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供給部部長張秀山。幾經折磨後，張相信折磨他的人才革命的敵人，他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坦白，要麼死。他好像指認了劉志丹，不過一旦折磨結束，他就翻供。這種模式一再重複，就連朱理治和郭洪濤都開始懷疑逼供的可靠性，要求到場觀看審訊，不過，他們並沒有任何阻止清洗的舉動。²⁰⁶ 這是最殘酷的派系鬥爭。謝子長的舊部無一人受到影響。²⁰⁷ 最終，被監禁領導人的「供詞」基本上都被認定為嚴刑拷打之下的偽供，遭到推翻。²⁰⁸ 不過在當時，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囚犯們聽到有人在關押他們的窯洞外面挖大坑，被告知那將是他們的葬身之地。²⁰⁹

在陝甘根據地領導人被逮捕、囚禁於瓦窯堡的時候，肅反擴展到他們在陝甘蘇區的下級及地方幹部中。所有縣級以上的地方

205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60。

206 郭洪濤1942年11月12日、程子華1942年11月14日、聶洪鈞1942年11月1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郭洪濤1945年7月5日、朱理治1945年7月1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207 程子華1942年1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最著名的「陝北」黨領導人——閻紅彥和賀晉年此後在黨內平步青雲。1960年代，在審查一本歌頌劉志丹的小說時，閻紅彥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David Holm, "The Strange Case of Liu Zhid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 (Jan., 1992): pp. 91–94; 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16–24。

208 王首道被派去檢查並糾正肅反錯誤，《王首道回憶錄》，頁169–170；習仲勛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16。

209 《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26；《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05–451，有關於肅反的一系列回憶。

幹部和營以上軍官都是運動的目標。²¹⁰ 執行這一級清洗運動的是徐海東部的保衛幹部。暴力升級了，一些回憶錄提到，穿黑色制服、說南方方言的年輕軍人抓捕、折磨甚至處死陝北黨的地方幹部。²¹¹ 有時候，他們能在當地找到幫兇，這些人多因個人恩怨而對同事大打出手，或者乾脆就是流氓。一些地方還會召開群眾大會，如果有人在會上對當地幹部提出批評、抱怨，後者會被立刻處決。多份材料提到有人在肅反清洗中被活埋。²¹² 據官方數字，在當地的肅反運動中，共有200人被指控為「反革命」並死於非命。²¹³

當時，新建立的蘇維埃正處於國民黨部隊的包圍之下，紅軍士兵需要以一當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揣測共產黨人為甚麼與自己的同志反目成仇並陷入如此血腥的內訌與屠殺。不過，這並不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孤例。在1930年的富田事變中，毛澤東的盟友以懷疑對方對革命不忠為由殺了幾千名持異見者。²¹⁴ 更直接相關的是鄂豫皖蘇區的「大肅反」，幾千名地方幹部在這次運動中喪生。²¹⁵ 陝北肅反運動的執行者正是指揮湖北大清洗的那些人，陝北肅反的套

210 趙啟民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23。

211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57-61、66；張策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23。

212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72-73；馬仰西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50；〈志丹革命歷史發展的幾個時期〉，志丹縣檔案館。

213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

214 Stephen C. Averill,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pp. 79-115;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9-54；以及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 即將問世的新書。

215 Rowe, *Crimson Rain*, p. 310. 羅威廉以麻城縣為研究對象。

路也與湖北如出一轍。²¹⁶當時革命的危急形勢並沒有阻止他們內鬥。相反，似乎還增加了他們對奸細或那些懷有異心的動搖分子的疑懼。大多數情況下，中央派出的代表疑心更重，而地方的革命者則成為犧牲品。陝甘根據地的情況正是如此，那裏的清洗由朱理治等黨中央派出的代表發動，由湖北來的徐海東部執行。

一些地方因素無可避免地影響了肅反的發展。作為背景的是「陝北」和陝甘派不斷累積的矛盾。「陝北」黨與北京聯繫，也對陝甘派與西安省委的關係有所不滿。²¹⁷「陝北」因此對任何來自省委的影響都持懷疑態度。然而，1933年省委因大逮捕被破壞後，劉志丹一直竭盡所能地重建與西安的聯繫。他與隱藏在楊虎城部的中共地下黨員來往，自然引起「陝北」派的懷疑，又將這種懷疑傳遞給朱理治等中央代表。結果，「西安來的人都有問題」這一觀點就擴散開去。²¹⁸實際上，陝甘革命者一直從西安以及關中其他城鎮招募工人和學生參加革命，但現在這些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受到了懷疑。²¹⁹被中共開除，並組建「新共產黨」的張慕陶就是重點懷疑對象，劉志丹嘗試與西安黨建立聯繫時，接觸到張慕陶的一些熟人，其中之一便是黃子文。黃領導過三原的革命，曾公開批評王明和自1931年起把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年輕領導人。黃參加過陝甘游擊隊，儘管劉對他也不無懷疑，但對肅反運動的領導人來說，劉與黃這樣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共事本身就是不能接受的。²²⁰

216 戴季英1942年11月〔7日〕、郭述申1942年11月10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217 陝北特委代表崔瑞生給中央的報告（第四號），1933年12月6日，《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7冊，頁309。

218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67。

219 朱理治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1–432。

220 《郭洪濤回憶錄》，頁73–74；聶洪鈞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4；高崗1945年8月2日、郭洪濤1945年7月5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每當左傾大潮湧來，黨內重新注意階級成分，重提清理內部階級敵人之時，知識分子總是首當其衝。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自小康之家，受過不錯的教育，造成了他們與一般大眾之間的社會距離。在平時，這些人可以因此受到尊重，黨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與一些受人尊敬的教師為其代言有很大關係。然而，一旦階級路線成為優先考慮，知識分子就該遭殃了。幹部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成為打擊目標。²²¹ 在陝甘肅反中，這一點又與性別因素摻雜在一起。很多參加革命的女性曾經是城裏的洋學生，她們在運動中似乎受到了特別的懷疑，有相當數量的死者是年輕女性。²²² 地方上也有一些婦女因為私生活方面的名聲不太好而遭到懷疑。事實上，如這樣一場波及面甚廣的清洗常將游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的一大批人群列為打擊對象。按照郭洪濤自己的說法，「由於上面這樣做，下面就照樣做下去了，對土匪、流氓、妓女、衙役、乞丐多採取殺的辦法。」²²³ 殺人多在夜晚，秘密進行，不留痕跡。²²⁴

暴力清洗的託詞是擔心敵人的間諜和階級異己分子混進革命隊伍。不過，劉志丹在發展革命、推行土改上不重視階級成分也是黨所要矯正的意識形態偏差。劉志丹是軍人，軍旅生涯始自馮玉祥和

221 1959年對25位紅軍士兵的調查，《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5年第12期，頁33；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81。

222 王世泰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752、767。這是一個尤為悲傷的故事：一位年輕的女性曾照顧一位傷兵，在為他清理傷口時，他很害羞，扭扭捏捏不願脫下褲子，她嘲笑了他。蔡子偉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36；李景波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223 郭洪濤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亦可參見馬文瑞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高崗1945年8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224 李景林1945年7月4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和其他人的插話。

馬鴻逵麾下，後在甘肅小軍閥的部隊裏供職，利用軍官身份策動兵變。在1920年代國共合作期間或之後不久，這一策略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也正是朱德在江西創建紅軍時所用的方法。然而到了1930年代，左的路線在黨中央佔主導地位，在國民黨及軍閥部隊中開展的地下工作被想當然地視為應以普通士兵為目標——策動他們起來反抗那些暴虐的軍官。劉志丹卻認為這種辦法不切實際，繼續物色可以合作的軍官。他也樂於用自己在哥老會中的人脈接近當地的民團團總。在其開創的陝甘蘇區，他甚至起用了一位同情革命的前國民黨的公安局長。²²⁵ 劉志丹的這些做法，贏得了聲勢日壯的抗日媒體、學生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隊的認同。可以說，在黨中央正式認可之前，他已經開始推行統一戰線的政策了。

在肅反運動中，劉志丹的所有這些努力招致了懷疑。1945年，朱理治就他與劉志丹的衝突做過一番冠冕堂皇的總結：

現在想起來，我當時和劉志丹在路線上有很大的分歧，因此才有很多的鬥爭……他們對富農只沒收其封建剝削部分，主張聯合富農，把大地主小地主分別開。但是我們呢？對富農一定分壞地，對地主則肉體消滅，甚至將部隊裏的地主富農出身的官兵都趕出部隊。對白軍，劉志丹他們不僅要爭取兵，而且要爭取軍官，我們罵他們與楊虎城、孫殿英搞統一戰線是「上層軍官勾結」。對土匪、哥老會，他們採取爭取的政策，我們罵他們是「土匪政策」。對外來知識分子，他們採取爭取信任的態度，我們就說他們「忽視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²²⁶

225 習仲勛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226 朱理治的回憶，1945年7月1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1—432。當然，這是朱理治在1942至1943年西北局高幹會議上遭到高崗的嚴厲批評之後的表態，字裏行間反映出他已經承認了1935年的「錯

從朱的表述可以看出，階級意識是所有政策分歧的關鍵所在。因為劉缺乏正確的階級觀點，所以才會與國民黨軍官勾結，吸收背景可疑的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拉攏出身於地主家庭的民團分子入夥，在土地改革中制定有利於富農的政策。肅反運動就要糾正所有這些「錯誤」。

這場運動自然是以對劉志丹本人的進攻開場的。因為他家裏有地，並且有家人在民團做事，劃分階級成分時，劉家被定為「官僚地主家庭」。很多經劉動員參加革命的民團頭領出身於類似的家庭。²²⁷ 1934至1935年，陝甘蘇區在黨的壓力之下推行了土地改革，不過做法相當溫和。當地土地充足，一份抗戰時期的文件稱「大部分農民是富農或中農，貧農寥寥無幾」。²²⁸ 土地革命沒有動山地，因為這些地沒法灌溉，也就没人要。重新分配的只是租佃出去的川地，並且給地主留下了足夠過活的田畝。這些做法在湖北和中央來的肅反幹部的眼中，都是十足的機會主義。為糾正過去的錯誤，他們發動了「查田運動」，號召「集中火力對付豪紳、地主」。²²⁹

誤」。不過，他對兩人意見分歧的總結還是相當準確的。藍田人蔡子偉是一個例子，他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員，在潛伏於楊虎城部的時候與劉志丹合作，後來成為被懷疑的對象，見蔡子偉的回憶，《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621-629；聶洪鈞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34。蔡被指控為張慕陶的奸細；西北工委決議，1935年7月2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4。當時能準確體現朱對陝甘游擊隊的批評意見的文件是〈中共陝甘晉省委對於進行游擊戰爭與游擊隊突擊的決定〉，1935年9月15日，《歷史檔案》，1986年第4期，頁56-59。值得注意的是，對劉游擊政策的這份嚴厲批評沒有被收進任何一本關於陝北革命的文獻集。

227 受訪者9。

228 〈志丹革命歷史發展的幾個時期〉（約1943），志丹縣檔案館。

229 陝甘晉工委對於查田運動的指示，1935年10月3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95。

當一般農民用陝甘俗語說他們「有二，三座山的地」的時候，湖北來的幹部根本不懂，他們專斷地裁定只要有超過100畝的地，都是地主。²³⁰這類地主的土地被沒收，全家被掃地出門——要麼去為政府做工，要麼去山上「吃草」。²³¹有一項尤其糟糕的政策，把地主的羊分給僱農，而後者或者不想要，或者不會養，於是，無人看管的羊四散到山坡上，被狼吃掉。²³²

我們不能假定激進的「查田運動」在地方上沒有支持者。陝甘兩省交界處的土地並不是平均分配的。在保安縣，幾乎所有土地都掌握在「老戶」們手中，所謂「老戶」即19世紀回亂倖存者的後代，不過他們在當地佔少數，大約90%的人口是因饑荒從東邊人口稠密的縣份逃過來的移民。²³³絕大多數新移民要麼租地種，要麼給「老戶」幫工，查田工作隊可以從中動員一些心懷不滿、希望自己擁有土地的人。²³⁴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對眾口一詞地支持官方敘事（陝甘群眾普遍反對激進土改云云）的回憶錄和當地受訪者應抱持一定程度的懷疑。但顯然，外來的肅反工作組逮捕劉志丹、處死本地幹部以及推行激進土地革命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1935年9月開啟的清洗很快引發了反彈。之前講過，陝甘蘇區的幹部對徐海東從湖北帶來的部隊相當反感，對勞山及其後一系列戰鬥中的損兵折將也很有看法。當地士兵開始枕戈待旦，有

230 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72–73；受訪者12。

231 劉景範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36；《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412–413；受訪者13。

232 受訪者14。

233 受訪者12、15。

234 習仲勛1945年7月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說，肅反工作隊讓流氓、機會主義者、壞幹部或者受過處分的幹部擔任他們在地方上的幫手。

人趁着夜色開了小差。²³⁵ 在蘇區南部靠近關中的地方，清洗尤為殘酷，很多農民聽信徐海東已經殺了劉志丹的謠言，逃離了蘇區。²³⁶ 劉志丹的家鄉保安縣的反彈最為激烈。其誘因是肅反工作隊逮捕並處決了一批民團出身的幹部，這些人要麼出自地主家庭，要麼曾在榆林念書。他們被劉志丹吸收到革命隊伍中，現在卻成了肅反的審訊對象並以活埋的方式遭到處決。11月，又一份逮捕令落到了逮捕對象的手裏，此人原是保安北部的一位民團團總。他帶領部下起而反對革命，並於12月初召集了群眾大會，之後投奔洛河流域一位曾以山頂堅固的防禦工事抵擋過革命部隊的民團首領。很快，又有七八支與民團或哥老會有來往的游擊隊脫離革命隊伍。在洛河流域靠近劉志丹家鄉的地方，十個紅區中有六個變了色。冬天劉景範返鄉之時，之前的1,000名保安縣黨員只剩下了150人。²³⁷

在其他地區，由於地方幹部被捕，黨組織陷入癱瘓。²³⁸ 根據國民黨的一份報告，陝西西北部有四個縣的縣政府被推翻。²³⁹ 肅反極端的做法招致這些反彈並不出奇。因反對苛捐雜稅和地主剝削，劉志丹無疑在地方上有相當一批追隨者。更重要的是，他是

235 李仲英1942年10月12日、黃羅斌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236 朱子修1942年11月5日、聶洪鈞1942年11月15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237 〈中共陝甘晉省委對於進行游擊戰爭與游擊隊突擊的決定〉，1935年9月15日，《歷史檔案》，1986年第4期，頁56；《中國共產黨志丹歷史》，第1冊，頁44-49；劉景範的回憶，《劉景範紀念文集》，上冊，頁61-75；劉景範1960年8月7日的回憶，志丹縣黨史辦；受訪者9、13、14。

238 馬文瑞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21。

239 〈陝甘寧調查專報〉，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陝北本地人，出身於一個受人尊重的家庭，與在當地頗有勢力的哥老會關係又不錯。現在他被免職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被一群不知道哪裏來的、操着難懂方言的南方佬弄得瀕於癱瘓。陝北革命陷入了危機。

在危急時刻，毛澤東和中央紅軍於1935年10月中旬抵達陝北蘇維埃的西路。從當地幹部口中聽說清洗的擴大化之後，毛發出了那道傳奇般的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²⁴⁰ 至少，這是官方的記錄。不過，也有理由存疑。肅反運動引發了陝甘蘇區對不知根底的南方軍隊的普遍懷疑。勞山之戰後，有人認為「二十五軍是白軍，化裝成紅軍來消滅二十六軍的。」²⁴¹ 當毛率部抵達保安縣西部的小鎮吳起時，鎮上的居民躲到了山裏，直到本地幹部做工作，勸人們出來歡迎那支衣衫襤褸、穿着草鞋，也自稱是紅軍的隊伍。²⁴² 一個半月之後，逮捕和處決仍在繼續，毛和黨中央路過下寺灣的陝甘蘇區司令部，收到清洗運動的規劃師們提交的報告，還會見了徐海東。直到11月底、12月初，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到達瓦窯堡的時候，才下令釋放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和其他被逮捕

240 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頁166；逢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第1冊，頁374。關於「刀下留人」，我只見到一條接近事發當時的敘述——毛澤東1942年11月2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長篇大論，他也沒說這是他下的命令。在下寺灣的陝甘蘇維埃司令部，毛聽了郭洪濤所做的長篇報告，似乎並沒有表示不同意見（楊雨亭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之後，毛去前線與徐海東一起指揮了直羅鎮戰役。周恩來到瓦窯堡（那是劉和其他幹部被羈押的地方）之後，陝北的肅反才停下來。石川禎浩認為是張聞天結束了清洗。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33-34。

241 張策的回憶，《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第2冊，頁923。

242 《中國共產黨志丹歷史》，第1冊，頁39。

的陝甘蘇區領導人。²⁴³ 儘管毛或多或少知道肅反中有濫殺的行為，但他肯定更讚賞徐海東的階級覺悟，他的同情心不會倒向被劉志丹吸收進革命隊伍裏的那些民團團總和哥老會弟兄。

一個調查肅反的委員會建立起來了，給出了一個各打五十大板的決議：肅反運動確實有必要，也確實犯了擴大化的錯誤。該決議聲稱，「張慕陶反革命小組」已經滲透到陝甘蘇區，其「右派取消主義」成為革命的最大威脅。更重要的是，二十五軍的戴季英成了替罪羊，肅反運動的關鍵人物、上海中央派出的朱理治和郭洪濤卻絲毫未受影響，反而還升了官：「陝甘晉省」被「陝北省」和「陝甘省」取代，郭洪濤和朱理治分任兩省的省委書記。走馬上任後，他們在人事安排上對陝甘派的幹部仍另眼相看，認為他們犯有自由主義、調和主義和地方觀念的錯誤。²⁴⁴ 對劉志丹本人的定性也仍然是「極端右傾」，扣着這頂帽子，劉志丹被邊緣化了。²⁴⁵ 他雖然回到了部隊，但不再擔任要職：歸他指揮的二十八軍不是他的老部隊，而是一支小得多的新隊伍，在接下來的一年中，這支部隊跟他配合得極差。²⁴⁶

243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上冊，頁481-48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上冊，頁301；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頁166-172。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對於日期一絲不苟的《毛澤東年譜》裏沒有關於毛下令「刀下留人！」的條目，只間接提及11月3日他接見朱理治和聶洪鈞，「在此之前」曾命令停止肅反運動（頁484），如果他確實下達過這道命令，肯定也並沒有被切實執行。

244 〈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1935年11月26日，《六大以來》，下冊，頁372-37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上冊，頁370-373；《西北革命根據地》，頁9-10。

245 馬文瑞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246 受訪者8、16。

榮光一閃，劉志丹的時代倏而開始又倏而結束了。他再次獲得了自由，但已經沒份塑造陝北革命的未來。陝北來了新主人。

第五章

意外的聖地

陝北革命運動的元老習仲勛曾在一篇短文中，將陝北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實際上為此後相關的官方歷史書寫定了調。這篇慷慨激昂的文章融合了比喻和黨的套話：

陝甘邊區的黨組織、紅軍戰士和人民群眾，經歷了長期而殘酷的反革命「圍剿」和來自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干擾，歷遭險阻，幾經起伏，終於使紅日驅散烏雲，勝利的曙光映紅陝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蘇維埃的種子傳播到中國西北部，在全國成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失敗後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以後發展成為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抗日戰爭的出發點，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¹

此語概括了陝北在中國革命史中的傳奇地位。從1935年10月到1948年春，由勇敢的革命者所創建的陝北根據地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落腳之地，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裏，長久處於危機之中的革命運動

1 習仲勛：〈歷史的回顧〉，《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頁1。《西北革命根據地》第1頁也有與此基本一致的總結。

開始了勢不可擋的發展壯大。與之同時，紅軍從一支約13,000人、裝備簡陋的小部隊發展成百萬雄師。以陝北為根據地，中共走上了奪取全國性勝利的道路。

從1937年年初開始，中共中央搬到了延安，因此在中國的革命史上，這個時期就被稱作延安時期。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取得了黨內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他論述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新民主主義、持久戰、文藝、黨的組織和領導方法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文章，以及〈矛盾論〉、〈實踐論〉、群眾路線等後來編入《毛選》的文章都是在這一時期成文的。² 1940年代初，毛澤東在中共內部發動了激烈的「整風」運動，將批評與自我批評制度化，在此後幾十年的時間裏形塑了黨內生活。這一系列的文本和實踐塑造了被稱作「延安道路」的中國革命的基本樣式。³ 今天，延安被奉為「革命聖地」，對戰爭年代黨的領導人住過的窯洞做了仔細的修復，並興建了大型革命歷史紀念館，使之成為中國新興的紅色旅遊的主要景點。

2 Stuart R. 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9–2005), vols. 5–8; also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Boyd Compton, e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Raymond Finlay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Joshua A. Fogel, *Ai Ssu-c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3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Mark Selden,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Socia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Armonk: M.E. Sharpe, 1995);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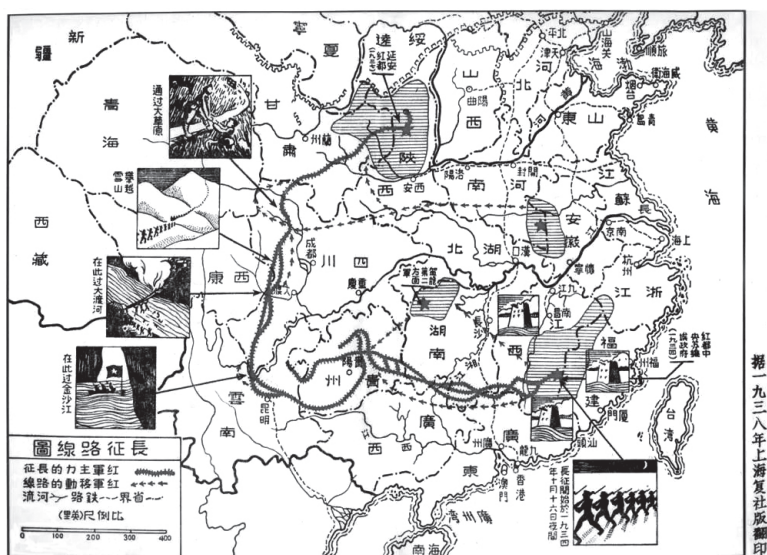


圖5.1 1930年代的紅軍長征地圖，顯示長征的終點是以延安為中心的成片的陝北蘇維埃。圖片來源：愛特伽·斯諾：《西行漫記》（上海：復社，1938；即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舊譯）。

戰爭年代的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以及陝甘寧邊區首府，不過，我們有必要了解，延安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突出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出自意外。官方的歷史敘事多強調歷史的必然，將陝甘寧邊區的歷史塑造造成艱難創設根據地，在長征結束時為紅軍提供了落腳之處。常見的長征路線圖，其終點多落在以延安為中心、輪廓清晰的陝北根據地。但事實上，陝北只是長征行軍途中若干擬定目的地中的最後一個，1935年四散在陝北各地的一小塊一小塊的蘇區也並不像圖中顯示的這樣是一大塊整嚴的根據地。事實上，除了安定以外，劉志丹創建的陝甘蘇區裏沒有一座縣城，「所有的縣城都由政府軍駐守」。⁴更重要的是，毛無意在陝北常駐，他認為此地過於貧窮，人口也太少，支撐不了他的革命抱負。本章將要探討

4 《北華捷報》，1936年1月27日。

的是陝甘寧何以意外成為長征的終點，以及中共中央到來之後，陝北革命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黨中央來到陝北

從江西中央蘇區開啟的紅軍大撤退，後來被命名為長征，這是一個史詩般的故事：它實現了軍事上的轉移和政治上的圖存，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從江西出發的八萬名官兵在長征結束時只剩下了不到十分之一。長征中有孤注一擲的戰鬥，充滿尖銳的政治衝突和疲憊不堪的長途跋涉——翻山越嶺、穿越泥濘的草地。圍繞着長征倖存者發展起來的一套神話長期以來形塑了黨的歷史。⁵對本書的主題來說，關鍵是毛部最終是怎麼來到陝北的。早在1930年代初，斯大林已經對靠近國民黨和帝國主義勢力大本營的長江流域是否適宜建議蘇維埃表示懷疑，他建議中共往西部開闢根據地。⁶1932年年中，張國燾被迫放棄鄂豫皖大蘇

-
- 5 最早記錄長征這一史詩般故事的著作是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此後關於長征的英文著作包括Dick Wilson, *The Long March,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有些地方不太可靠的Harrison E. Salisbury,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學術考察Benjamin Yang (楊炳章),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Ed Jocelyn and Andrew McEwen, *The Long March: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Legendary Journey That Made Mao's China* (London: Constable, 2006) 重新走了一遍紅軍的路線; Shuyun Sun, *The Long March* (London: HarperPress, 2006) 則提供了豐富的敘事。楊得志等人編的《紅軍長征文獻》(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1995) 是一套關於紅軍長征的文獻集，價值非凡。
 - 6 王樹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頁93。

區，向四川方向撤退。⁷當毛澤東及其同志被迫放棄江西蘇區的時候，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去面積略小的湘西蘇區與賀龍會合。這一計劃失敗後，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黨的軍事領導權，新一屆的中央領導集體決定向北行軍，與張國燾在四川的紅四方面軍會師。⁸

1935年夏天，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會師，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爭議最大、且對未來造成持久影響的一次會面。毛和張都是中共元老，自1921年「一大」以來就是黨組織的核心成員，都有在未來統率全黨的抱負。張國燾曾是北京大學學生，與中共的創立者關係密切，領導過上海的工人運動，還曾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他的學歷背景以及在共產國際的資歷優於毛澤東；但是毛及其同志開創了江西的中央蘇區。1935年，毛澤東攜中共中央的支持和授權而來，此時張國燾帶領的紅四方面軍已充分休整，又在自己的地盤之上，規

7 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38*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2), pp. 290–365.

8 在很多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往來信函中，四川被稱作「西北」，令該詞含義略有些混亂。王樹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頁91–92；〈施特恩關於支持四川省蘇區和發展中國西北革命運動的建議〉，1934年9月1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第14冊，頁239–240。《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係大型文獻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中的一卷，原為俄文，由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合作編輯，中文版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據2003年莫斯科版譯出，凡三冊，收為《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3、14、15冊。

模幾乎是紅一方面軍的五倍。這是決定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重要關頭，兩人就長征下一步的去向發生了激烈爭論。⁹

兩人的共識是應該在中國的西北部、一個距離蘇聯足夠近的地方建立根據地，這樣紅軍就能得到社會主義祖國的軍事援助。蘇聯對於中國最西端的省份新疆的政治、經濟滲透廣為人知，也是當時的一個考慮因素。¹⁰ 在8月政治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蘇聯在這區域影響大，他在新疆做的工作，可以看到很多。地理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張國燾傾向往西走，取道青海抵達新疆；而毛希望往北、往東走，只「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¹¹ 張計劃先把部隊帶到川西的藏區，毛認為那裏人口稀少，沒多少糧食解決紅軍給養，而徵糧又勢必與當地藏民發生衝突。毛和其支持者主張在人口更為稠密的甘南與川、陝兩省交界的地方建立蘇維埃。¹² 9月10日，兩支部隊分道揚鑣。毛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和紅一方面軍的部分兵力留給張國

9 Stuart Schram and Nancy Hodes,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Armonk: M. E. Sharpe, 1999), vol. 5: *Towar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January 1935–July 1937*, “Introduction,” p. xlii; Benjamin Yang,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pp. 129–161, 292. 楊炳章引用了關於兩軍相對規模的五份數據估計。關於兩軍兵力，如果不看埃德加·斯諾所提供的二手信息，其他來源的數字平均下來差不多剛好1：5。

10 關於蘇聯對新疆的影響，參見Justin M. Jacobs, *Xinjia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pp. 89–126.

11 轉引自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頁269。我要感謝楊奎松指出這一關鍵的信源。參見《西安事變新探》，頁16、23。

12 周恩來等給張國燾等的指示，1935年9月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院、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1冊，頁364–365。

燾，率部向北進入甘肅，而張很快率部向南前往川西。兩天之後，在甘肅俄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他的戰略目標：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團，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對的，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不然就永久打游擊戰爭。¹³

如果這一計劃成為現實，中國革命的道路就很可能是北朝鮮的模式。北朝鮮的共產黨領導人金日成就是帶領一隊人撤到蘇聯，在那裏受到蘇聯紅軍的訓練，然後與蘇聯紅軍一道回朝鮮。¹⁴我們很難想像毛會提出這樣的戰略。他歷來以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應走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著稱，如此直白地提出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非同尋常的。不過，就1930年代中共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性質以及它對共產國際的堅定信念來說，毛的主張也不足為奇。事實上，它符合當時的一般論調。不過很快，一個轉折性的意外改變了長征的方向——並最終改變了中國革命的路徑。幾天之後，毛在一張報紙上讀到陝北有個蘇維埃，如我們大家所知道的，紅軍就此調轉方向，開向陝甘兩省北部交界

13 轉引自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頁271–272。

14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7–66.

處。紅一方面軍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於10月與陝北的革命者會合。¹⁵

到達陝北後，中共中央的安全在這塊由當地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內獲得了一定程度的保證。當然，陝北蘇維埃的地盤遠沒有報紙所宣稱的那樣，有八個赤化縣和十個半赤化縣那麼大。事實上，中共只拿下了安定這一個縣城，他們的勢力局限在鄉下。如前文所述，即便在鄉下，劉志丹新建立起來的根據地也因肅反而元氣大傷。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時，劉志丹本人以及與他往來密切的幹部還關在瓦窯堡；延安、榆林等陝北主要的城鎮都在敵人手中；陝北蘇維埃處在國民黨強敵的環伺之下。陝北革命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紅軍手中，軍事問題將成為下一階段鬥爭的重中之重。毛在甘肅讀到的那張報紙上寫道，陝甘蘇區有70萬人口，20萬赤衛隊，2萬紅軍。¹⁶真正到了陝北之後，毛的失望可以想見。

一般認為，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離開江西之時約有8萬人。紅一方面軍在四川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時還有多少人馬，則眾說紛紜，有人說1萬，有人說3萬，前一個數字可能更接近實際情形。¹⁷過草地的時候人員傷亡不少，在甘南打的幾仗也損失慘重，還有不少開小差的。到達陝北之時，紅軍的一個連已經從原來的

15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冊，頁473。《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上冊，頁297–298。

16 《大公報》，1935年7月23日。

17 張國燾自傳 (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 379) 給出的就是1萬這個數字。而官方的《周恩來年譜》(上冊，頁287) 則給出3萬這個數字。亦可參看註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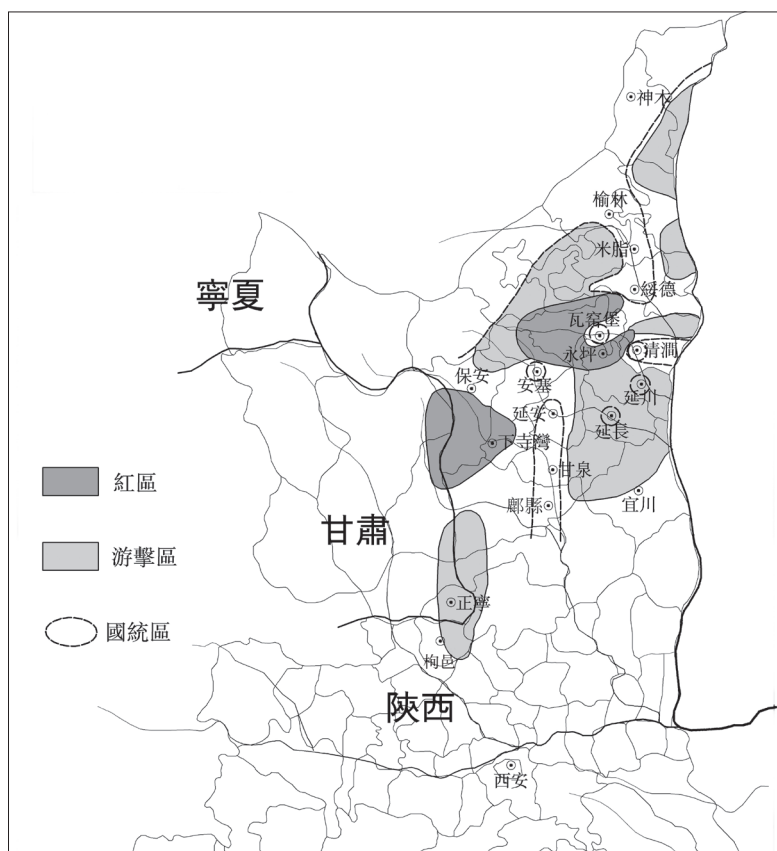


圖5.2 1935年秋天毛澤東和長征倖存者到達之時，陝北的紅色根據地和游擊區。當時中共的政治中心永平和下寺灣都不是縣城。此圖係作者根據本章及前章提到的國共雙方的材料繪製。

120人左右減少到75人。¹⁸同樣，對這支部隊的總兵力也歧見紛出。據曾於1936年到訪根據地的埃德加·斯諾說，長征倖存者「只

18 林彪和聶榮臻給毛澤東、彭德懷的報告，1935年11月7日，《紅軍長征文獻》，頁750；關於甘肅的「嚴重」傷亡和開小差的情況，參見彭德懷給毛澤東的報告，1935年10月13日，《紅軍長征文獻》，頁721。亦見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27。

剩下了二萬人不到」，這是一個誇大的數字。¹⁹ 據毛的競爭對手張國燾說，他聽到的數字是紅一方面軍只剩下「不到四千人」，這肯定是一個過低的估計。²⁰ 在當時的記錄付之闕如的情況下，彭德懷回憶文章中提到的數字看起來最合理：7,200人，其中包括數百名非戰鬥人員。²¹ 我認為，毛抵達陝北時，手下充其量還有6,000人，但其核心是堅韌強悍、紀律性強、身經百戰的老兵，這支隊伍堅定服從黨的領導，不過裝備僅有從敵人那裏繳獲的步槍和幾挺機槍。還應強調的是，很多抵達陝北的士兵是不久之前從四川等地新招入伍的，這樣算來，江西老兵的傷亡率遠高於90%，最有可能活下來的是高級軍官。

陝北另外一支較大的外來部隊是徐海東的二十五軍，其確切兵力同樣難以估計。這支隊伍當然實力強勁，經驗豐富。如前所述，這支部隊先後與劉志丹的二十六軍、謝子長的二十七軍合併，成立由徐海東任軍長的新編紅十五軍。按照報紙上的說法，二十五軍在陝南打仗的時候只有1,500人，但「裝備很好，使用的是新式武器。」²² 當時國民黨的一份報告說徐海東帶來一支2,000人的隊伍；高崗在1945年的說法是徐部有1,400人；對別人的實力一貫估計過低的張國燾則說，紅十五軍一共「不到兩千人」，其中大多是

19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p. 194. 關於此書各版的修改存在不少爭議，因此這裏引用了1938年版，而不是更容易找到的1961年格羅夫出版社 (Grove Press) 版。相關爭議可參見下文註175及176。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201。——譯者註。

20 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 445.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1974），第3卷，頁1197。

21 彭德懷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81。

22 《北華捷報》，1935年9月25日。

湖北官帶的四川和甘肅兵。²³ 綜合眾說，徐海東自己的部隊有2,000人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估計。至於當地的兵力，當時朱德的一份電報和徐海東後來的回憶都稱，徐海東和劉志丹的人馬加起來一共7,000人。²⁴ 這與國民黨方面的報告大體一致：劉志丹的二十六軍有兩千多條槍，謝子長的二十七軍則超過三千條。²⁵ 考慮到陝北的部隊總是人比槍多，而國民黨的這條材料是傷亡慘重的勞山之戰之前的，再加上劉志丹在肅反運動中被捕之後紅二十六軍有很多人開了小差，我們可以推想1935年10月，毛澤東到達之時，陝北部隊有大約5,000人，徐海東部約2,000人。把幾支部隊與毛所帶的6,000人加起來，當時陝北紅軍僅13,000人。

抵達陝北後，中共中央首要的考慮是新根據地的安全。9月，蔣介石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總。這個新的指揮機構統率30萬大軍將共產黨最後一塊根據地團團圍住，雙方的兵力之比為20：1。²⁶ 蔣軍的裝備也好很多，有重機槍、大炮、運輸車隊，還配有一支空軍的偵

23 井岳秀給邵力子的報告，1935年9月2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17；高崗1945年8月2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 463.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卷，頁1218。

24 朱德等致林彪等電，1935年10月26日，《紅軍長征文獻》，頁801。徐海東：〈會師陝北〉（1959），蘆振國、姜為民編：《紅二十五軍長征紀實》（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156。徐也提到，他的二十五軍在陝南時有3,000人，但在跨過渭河前往陝北時損失慘重（頁152）。應強調，當時朱德仍與張國燾部在一起，他的信息應來自已到陝北的其他官員。

25 高錦尚、王玉麟、孟履誠給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的調查報告書節錄，1935年8月1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729。這份報告也提到楊森部有槍千餘挺，楊是神木的一名共產黨員，他的部隊很快就被消滅了，因而此處沒有將其計算在內。

26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76–477；晏道剛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37–638。

察機部隊。蔣介石意識到紅軍因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的分裂元氣大傷，決心鞏固自己的優勢。²⁷ 毛澤東最初的應對是發起一輪緊急擴紅運動，以彌補這一軍事劣勢。擴紅運動招來了千餘名新兵，在陝北，這已是前所未有的成績。²⁸ 新政權對當地人口的索求比以往積極得多，不過這些未經訓練的新兵頂多能承擔一些搬運性質的工作。

接下來，毛澤東和彭德懷立刻趕赴陝北南部的前線穩定軍心。駐紮在此地的國民黨部隊是張學良的東北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軍被迫離開家鄉，現在成了蔣介石打內戰的馬前卒。1930年代中期，伴隨日本入侵和中國國內抗日愛國情緒的高漲，東北軍對於蔣的剿共內戰並不百分百認同。毛澤東想迎頭痛擊，迫使他們與中共停戰、調轉槍口打日本人。接下來，一場發生於陝甘交界處郿縣（富縣）直羅鎮的關鍵戰役，證明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所帶來的全新的作戰水平。劉志丹的戰術靠的是他對陝北地形的深入了解，毛則在戰前準備了繪製精確的軍事地圖。²⁹ 冬天即將來臨之際，他為部隊準備了過冬的棉夾襖，只是數量上缺了約2,000套，許多人還是凍病了，不得不送醫療治。³⁰ 以前陝北紅軍在劉志丹的領導下，善於打短平快的仗，多是幾小時的伏擊，而直羅鎮戰役卻是一場持續了幾天的正規戰。最終紅軍取得巨大勝利。東北軍第109師被殲滅，師長朱元峰被擊斃。當時的軍事報告稱，紅軍俘虜5,367人，繳獲3,400挺步槍、176挺機槍、8門迫擊炮和22萬發子彈。東北軍共約1,000人傷亡。紅軍方面的傷亡也相當慘重，死傷648人，考慮到當時紅軍的規模，這樣高的傷亡率肯定是難以為繼

27 王樹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頁102。

28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87。

29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86、49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380-393（1935年11月6-24日）。

30 聶榮臻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90。

的。³¹不過，直羅鎮戰役達到了其政治目的：打擊張學良所部東北軍的士氣，重新喚起其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興趣。

陝北的新領導人

1935年11月3日，統一指揮陝北紅軍的新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建立，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其他成員還包括從蘇聯回來的中央委員王稼祥，紅一軍的將領林彪，二十五軍的徐海東、程子華，以及兩位上海中央派出的代表——聶洪鈞和郭洪濤。³²原陝北革命領導人無一人進入軍委。委員會中唯一一位陝北人是郭洪濤，他1933年回到陝北，發起了對劉志丹二十六軍的批評。當地的游擊隊也被置於外來者的領導之下——新領導人蕭勁光是毛的湖南老鄉，參加過長征。³³經過這樣的人事安排，南方來的黨中央全面掌控了陝北的軍事力量。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構成反映了陝北新的政治現實，其中徐海東及其親信的突出地位尤其值得重視。在毛抵陝之前，徐已經獲得了新成立的、囊括陝北全部兵力的紅十五軍團的指揮權。毛急於讓自己的部隊給徐海東的部隊留下好印象，特命所部在兩軍見面之前洗澡並換上乾淨的軍裝。兩軍見面時，紅一方面軍的士

31 毛澤東、彭德懷致張聞天、周恩來電，《紅軍長征文獻》，頁775；聶榮臻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90–393。前國民黨軍官給出了非常誇張的數字，其中一人說東北軍損失了兩萬人（彭竹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38）。毛澤東11月30日關於此次戰役的講話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398–407。

32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令，1935年11月3日，《紅軍長征文獻》，頁745。

33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92。蕭勁光，部分材料亦作「肖勁光」。——譯者註。

兵應該說甚麼也是事先精心安派的。³⁴ 徐海東是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的老部下，僅一個月前，張另立中央，把毛澤東、周恩來等來自江西的競爭者排除在外，他與黨中央的矛盾隨之升級。³⁵ 毛不希望這樣的分裂影響到徐海東的忠誠，因此對士兵該說甚麼、不該說甚麼的指令，肯定包括該以甚麼樣的口吻談論與張國燾的齟齬。在9月於甘肅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張國燾被嚴厲地批評為「機會主義」和「軍閥主義」，但為黨的團結計，中央抵陝北後的策略變為既往不咎。³⁶ 對徐海東來說，避免重揭與張國燾分裂的傷疤，無疑是相當重要的。

毛澤東與徐海東之間的紐帶之一是雙方各自經歷了艱難險阻，長途跋涉來到陝北。甫一抵陝，毛就開始宣揚長征的傳奇色彩。直羅鎮戰役前夕，他勉勵部下，長征的倖存者都是「中國革命的精華」，經歷了如此艱苦的考驗之後，他們「不僅要以一當十，而且要以一當百、當千。」³⁷ 留下來的長征精英會受到特別的保護和提拔。「陝甘支隊〔紅一方面軍〕和二十五軍經過遠征的戰士，原則上每人都要使之成為幹部，不應該使之當作一個兵去消耗掉。」³⁸ 可以想見，在此後的戰鬥中被「消耗」的將主要是在西北新招的普通士兵。令毛極為不安的是，一些因過去的錯誤而被降職的軍官，因職銜較

34 毛澤東、彭德懷給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指示，1935年11月2日，《紅軍長征文獻》，頁743。

35 張國燾的命令，1935年10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頁840。徐海東與張國燾的密切關係，見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p. 461–466.

36 關於1935年9月政治局會議對張國燾的批評，見《紅軍長征文獻》，頁681–686；關於摒棄前嫌的新路線，參見《紅軍長征文獻》，頁845–846、940–941。

37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85。

38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03。

低被派去前線，暴露於敵前，死在戰場上。³⁹同樣的原則，他也在徐海東部推行。毛澤東了解到徐部仍有一些部隊的元老因湖北的肅反運動受到懷疑，提出這些幹部經受住了（自湖北而來的）長征的考驗，已足以證明他們的忠誠並洗清從前的懷疑。⁴⁰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長征倖存者都立刻得到「中國革命的精華」這一殊榮。從江西出發後，由於士兵死亡和脫隊，紅軍減員嚴重，因此長征路上中共一直在補充兵員。黨對這些新招士兵的信任程度要低一些，在貴州、雲南、四川入伍的士兵要經過特別的教育。⁴¹

在毛和徐結成聯盟後，原陝北劉志丹的部隊成了輸家。如前章所述，徐海東的副手領導了針對劉志丹及其戰友的肅反。在10月的勞山戰役前後，陝北部隊和湖北部隊的關係明顯緊張，徐貶低陝北部隊，說他們「一切顯得落後」，無視蘇維埃和紅軍的規章制度。⁴²毛不得不提醒徐的手下不要自大，不要輕視或過度批評陝北的部隊。⁴³毛也意識到了劉志丹的陝甘游擊隊和謝子長的「陝北」派之間的舊怨，他指示，因兩支部隊過去的不愉快，不能把它們編入同一戰鬥單元。⁴⁴不過，一段時間之後，黨中央開始接受徐對於陝西士兵的大部分負面評價。陝北被視作鴉片和土匪窩子，陝北紅軍中有許多人來自匪幫和民團尤其令中央不能介懷。哥老會的影響是一大顧慮：「在陝甘寧群眾中有一普遍現象，即過去加入哥老會的人佔很大數量，因此紅軍中亦有不少哥老會員。」⁴⁵

39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36。

40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66。

41 《紅軍長征文獻》，頁733。

42 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p. 464–46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卷，頁1219。

43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01。

44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84。

45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3–1105，引文見頁1105。

中央同樣急於控制陝北蘇維埃的「制高點」。中華蘇維埃成立了新的、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西北辦事處來指導地方工作，博古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⁴⁶在黨委組織方面，原陝甘晉省委被朱理治領導下的陝甘省委、郭洪濤領導下的陝北省委所取代。這樣一來，這兩位在肅反運動中整肅劉志丹的領導人就控制了地方黨委。兩人上任後在幹部任用上繼續歧視劉志丹系幹部，這一事實在很久之後才得到承認。⁴⁷

在中共漫長的內部鬥爭史中，持續時間最長、也最難解決的是中央與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地方黨員參加革命運動多是出於自己的物質和政治利益，比如獲得土地、地方上的權力，免受國家徵斂，或者在爭奪匱乏資源的無休止的競爭中取得些許優勢。而高一級的黨的領導幹部則有更大的革命抱負，他們經常號召基層的積極分子為革命而獻身。基層黨組織的任何抵觸都可能被視作反革命的陰謀，黨的歷史上一些最血腥的衝突——從江西的富田事變，到湖北或陝北的肅反運動——都是外來黨組織權威與地方黨支部的鬥爭。⁴⁸如今，外來者牢牢掌控了陝北革命，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是實實在在的。國民黨試圖火上澆油，（不無道理地）將紅軍渲

46 蘇維埃公告，1935年11月，《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28。

47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上冊，頁373–376；《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1。此後，在1942至1943年的整風運動中，涉及對西北革命運動的重新評價，高崗採取了報復，攻擊朱理治和郭洪濤尤力。

48 Stephen C. Averill,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9), pp. 79–115; 關於鄂豫皖，見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pp. 269–319.

染成外來的入侵者。⁴⁹ 剛剛從南方來的領導人清楚地意識到這方面的危險，遂明令紅軍與當地的赤衛隊建立起緊密的關係，在工作中依靠本地幹部，協助地方建立革命委員會。⁵⁰

然而衝突仍不可避免，有時還相當尖銳。毛澤東關於不要「打人罵人，強迫執行」的告誡，恰恰表明此類行為已構成問題。⁵¹ 即便對命令主義發出警示，中央也並未放鬆對陝北黨的改造，一條指示警告當地游擊隊不要犯「保守主義與地方觀念」的錯誤，⁵² 另一條針對當地農民協會的指示則強調地方主義和親戚氏族觀念的危害。⁵³ 與此同時，周恩來規定，在給養方面優先照顧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⁵⁴ 紅軍為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而沒收富農財產的違紀做法在當地引發了衝突。⁵⁵ 有時，這些衝突可能發展成對新的革命政權的公開反抗，從劉志丹被捕後其家鄉保安縣發生的赤安事件中就能看到這一點。抵抗持續到1936年，至少一位長征老兵在平息騷亂時被殺。⁵⁶ 同年到過陝北的一位《大公報》記者寫道，約二千個劉志丹的追隨者在陝甘兩省交界處公開反對毛澤東和徐海東。⁵⁷

49 馬明方：〈游擊區域內的蘇維埃工作〉，1936年7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87。

50 陝甘支隊關於政治工作的指示，1935年10月23日，《紅軍長征文獻》，頁732-734；《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81-482。

51 毛澤東：〈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04-405。

52 中共中央，1935年11月2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29。

53 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1936年2月8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46。

54 《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01。

55 陝甘寧省委給慶陽縣委的指示，1936年7月12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27。

56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頁376。

57 《大公報》，1936年12月4日，這篇報告反映的很可能是赤安事件最後階段的情況，保安的「反水」行為是因肅反而起。

1935年下半年劉志丹懸而未決的命運讓問題更嚴重。雖然黨中央已經叫停逮捕和處決，劉及其部下仍被關在瓦窯堡，直到12月初才被周恩來釋放。⁵⁸ 即便獲釋，劉的「歷史問題」仍沒有定論，而對他發動肅反的郭洪濤和朱理治這時反而得到提拔，情形已經再明朗不過。一開始，劉官復原職，重掌二十六軍，這似是毛對他的考驗，毛派他從瓦窯堡向北去榆林消滅當地的軍閥井岳秀。⁵⁹ 榆林防禦堅固，是陝西東北部的政治和軍事重鎮，當地的中共部隊從不敢進攻這樣的城鎮。劉的軍隊裝備很差，顯然沒有能力完成這一任務，進攻以失敗告終。12月30日，劉志丹轉而擔任新成立的二十八軍的指揮官。⁶⁰ 到1935年年底，劉不僅在政治上動輒得咎，也丟掉了自己經營多年的軍隊。現在中央來了，陝北的大事小情皆由中央決定。陝北革命不再是地方事務。新領導人肩負的使命遠遠大過劉志丹，涉及更多的利益方，涉及更多的競合與妥協，這是劉志丹力有未逮的。然而，諷刺的是，不久後來自莫斯科的新指令要求中共中央對可能合作的盟友採取更為靈活的政策，日後將要實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非常接近劉志丹長期以來所實行的——也是長期以來最遭詬病的。

瓦窯堡位於延安東北，是安定縣周邊蘇維埃根據地最重要的鎮子。1935年12月中旬，政治局在這裏召開了為期一週的重要會議。11月底，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從莫斯科歸來。為安全起見，他沒有攜帶文件，只是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會議精神。⁶¹ 1934年9月上海的一系列搜捕行動切斷了與莫斯科的電訊

58 《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01。

59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5年12月17日，《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10。

60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01。

6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頁374–375。

往來，自那之後，中共中央就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整個長征以及紅軍抵達陝北後的幾週之內，中共中央都是在沒有外來指令的情況下單獨行事。⁶² 在瓦窯堡，中共中央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的一手信息。這一政策旨在抵禦德國納粹以及法西斯對全世界的威脅。中共調整了路線，以建立一條由「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己任。其結果，工農蘇維埃被重新命名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的政策也作出了調整：允許富農的「資本主義」剝削，但不允許地主的「封建」剝削。⁶³

瓦窯堡會議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關鍵一步，而這一政策在1936年之後將變得日益重要。就在中共在這個陝北小鎮上召開會議之時，北平的學生參加了激情澎湃的遊行，抗議日本所鼓吹的華北「自治」以及蔣介石的妥協態度，此次學運很快以「一二·九運動」著稱。⁶⁴ 瓦窯堡會議甫一結束，劉少奇就被派到天津去組織平津的左翼學生。⁶⁵ 不過，考慮到當時陝北蘇維埃幾面受敵的處境，瓦窯堡會議的首要議題還是軍事。結論也很明確：紅軍需要再次向蘇聯邊界進發。

62 王樹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頁92。

63 瓦窯堡政治局會議，1935年12月25日，《六大以來》，上冊，頁734–745；中央關於土地改革的政策，1936年7月22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60–161；《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96–497。

64 關於「一二·九運動」，參見John Israel,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John Israel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65 《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02。

東征：長征的繼續

毛澤東反對張國燾把長征隊伍從毛兒蓋向南帶往川西，理由很清楚：這一擬議中的目的地「人口八千餘，糧本極少，懋、撫糧已盡，大軍處此，有絕食之虞。」⁶⁶ 抵達甘南後，毛在一篇誇大其詞的報紙文章中讀到陝北有一大塊蘇維埃根據地——這提供了更好的出路。但黨中央一到陝北，便為此地的貧瘠和人煙之稀少而深感失望。一份報告說，陝北的人口密度還不到江蘇省的百分之五。⁶⁷ 1936年提交給共產國際的一份報告使用了直白的字眼描述這塊新根據地：

地形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鬆，人戶少，交通運輸極不便……人口極稀，總計不過四十餘萬，除沿黃河西岸外，一般村莊少超過四五十家以上的，即在大道上亦常三四十里無人家……農產除小米外，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⁶⁸

川西建不了根據地的那些不利條件，陝北正好都具備了。

毛素來主張打進攻性的運動戰，當其地盤受到威脅時便轉移到敵人的後方去「打外線」。他在江西時就提倡這種戰法，現在又把它搬到了陝北。⁶⁹ 他的第一個想法是往南打，打到渭北幾個富裕些的縣份，在那「擴紅」並與抗日的愛國學生建立聯繫。⁷⁰

66 周恩來等給張國燾等的指示，1935年9月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364。

67 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1937年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65。

68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2。

69 Benjamin Yang, *Revolution to Politics*, pp. 117–121.

70 陝甘省委1936年1至2月工作計劃，1935年12月，《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92–198；毛澤東對軍隊的講話，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00；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5年12月17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10–411。

與此同時，如上文已經交代的，他還派劉志丹去攻打人口較為稠密的榆林地區。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這倒並不出人意料。陝西省委的布爾什維克們早就敦促劉志丹向關中地區擴充地盤，其結果是慘敗。在中央軍委的成員中，林彪似有放棄陝北之念，他提議紅軍轉移到陝南，在與他的家鄉湖北交界的地方想辦法。毛澤東當時否定了這一提議，命林到瓦窯堡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⁷¹

前文提到，瓦窯堡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林育英從莫斯科回來之後召開的。在政治上，林帶回的主要信息是中共應調整路線，與共產國際新的統一戰線政策接軌。在軍事上，林表示他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林認為，紅軍最好的策略應該是「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成為）真正的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⁷² 關於抵達蘇聯或蘇聯控制下的外蒙邊境的最佳路線，當時有很多爭論。張聞天明顯傾向於取道寧夏，走西北路線，但毛澤東堅持在往北走之前，先東征山西。東征顯而易見的優勢是可以假託奔赴抗日前線的名義。⁷³ 彭德懷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提出不能放棄陝北根據地，毛保證東征的部隊將會保持與陝北的聯繫。彭和周似乎心存疑慮，拿不準紅軍能否穿過閻錫山部在山西的防守，之後向北，經過今內蒙境內的綏遠到達

71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98—499。

72 林育英等致張國燾等電，1936年2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頁862—863。

73 毛澤東致張聞天電，1935年11月30日、1935年12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396、408—409。

外蒙，並得到蘇聯的援助。⁷⁴ 最終，毛的意見佔了上風，會議決定打通山西，長征啟動了以與蘇聯會合為目的的新階段。⁷⁵

毛表現出相當的自信。他那首著名的〈沁園春·雪〉就寫於此時。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⁷⁶

其中提及紅軍很快將要跨越的黃河和根據地以北不遠處的長城，也提到自秦始皇到成吉思汗等歷代偉大帝王，流露出毛本人及中共問鼎中原的抱負。今天，億萬中國人都會背誦這首詞。東征的實際目的是打通前往蒙古邊境的道路，但對外卻以抗戰為號召，正與〈沁園春·雪〉傳達的意境吻合。東征部隊被命名為「抗日先鋒軍」，首當其衝的敵人閻錫山，和蔣介石一道，被貼上了惟日本人

74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08；《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05。關於這些爭論，楊奎松在《西安事變新探》一書頁30–34、41–43、54–58提供了清楚可靠的敘述。

75 鄧野（鄧小平的侄子）對東征的研究是最精彩的：〈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5月，頁49–68。亦可參見王樹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頁99–100。

76 英譯參看：Mao Zedong, “Snow,” in Hua-ling Nieh Engle and Paul Engle, *Poems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Dell, 1972), p. 78. *The Poems of Mao Tse-tung*, trans. Willis Barnstone (New York: Bantam, 1972), pp. 84–86.

之命是從的「賣國賊」的標籤。⁷⁷ 平津學生參與的「一二·九運動」的影響力已傳播至大半個中國，國內抗日熱情高漲，紅軍做了各種努力，使這種愛國熱情能夠為己所用。

新的統一戰線政策最重要的成果是與張學良的東北軍達成停戰協議，這樣一來，陝北根據地的南沿就安全了。稍後我們還會詳細分析中共怎樣利用直羅鎮等戰役的俘虜向東北軍宣傳抗日愛國的主張。在暗中籌備東征之時，李克農開始與張學良會晤，商討建立統一戰線事宜。雙方很快就達成了事實上的停戰，張學良保證不會支援閻錫山；據說他還向中共提供了山西、河北和綏遠的軍事地圖。⁷⁸

解除了南側的後顧之憂，中共把工作重心又放回招兵之上。1935年11月，毛把紅軍迅猛的擴招稱作全黨工作「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⁷⁹ 一則命令要求在1936年年初擴招7,000名新兵，到3月再擴招2,600名。⁸⁰ 此外，紅軍還從綏德地區徵召了3,000名抬擔架的民夫。⁸¹ 這些新丁多半來自少年先鋒隊和赤衛隊。1935年10月，陝甘晉蘇維埃曾發令要求「凡14歲以上至23歲以下者，無論男女將一律加入少年先鋒隊。23歲以上至35歲者，一律加入赤衛軍。」⁸² 上述徵兵動員令幾乎相當於將陝北紅軍的規模擴大一倍，

77 關於東征的軍事指令，1936年2月1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42-444；抗日先鋒軍宣言，1936年3月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70-471。

78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34-50；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頁67；鄧鏡元的回憶，見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頁45-46。

79 毛澤東，1935年11月30日，《紅軍長征文獻》，頁777。值得注意的是，這本關於長征的官方史料集收入了東征山西的內容。

8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頁377-378。

81 毛澤東，1936年2月21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49。

82 〈陝甘晉省蘇維埃革命軍事委員會赤衛軍少先隊組織大綱〉，1935年10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92。

李維漢承認，要完成這些指標極其困難。⁸³ 陝北農民願意為保衛家鄉而戰，但他們還沒有參加抗日遠征的覺悟。⁸⁴ 徵兵過程中也存在欺騙的行為，比如以「訓練」的名義把地方幹部召集到一起，實際上是讓他們參加紅軍。⁸⁵ 在南方時，紅軍徵兵多伴以強大的政治壓力，地方幹部為完成指標常不得不採取脅迫的辦法。⁸⁶ 現在，這些操作模式被帶到了陝北。

1936年2月20日，紅軍主力跨過黃河，迅速在山西西部的呂梁山區建起一個指揮部。毛澤東估計，由於閻錫山和蔣介石之間的衝突由來已久（兩人曾在1930年的中原大戰中兵戎相見），閻錫山不會向蔣求援，引狼入室。⁸⁷ 他錯了。蔣介石的部隊在汾河流域的鐵路沿線建立起一條火力強大的封鎖線，紅軍衝不過去。東征受阻，前線指揮員很快向後方發出傷亡慘重的報告。⁸⁸ 毛澤東向林彪施壓，要求打一場有決定意義的勝仗，不過直到紅軍在4月間撤回陝北，這一要求也沒能實現。⁸⁹

就在東征部隊回撤之前，陝北革命遭受了最後一擊：陝北革命的英雄劉志丹犧牲了。為協助東征，劉志丹所部、駐紮於陝西東北

8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頁378。

84 李赤然：《李赤然將軍回憶錄》，頁88-90。

85 陝甘晉省委關於徵兵工作的指示，1935年10月5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08-109。

86 Sun Shuyun (孫書雲), *The Long March: The Tru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s Founding Myth* (New York: Doubleday 2006), pp. 14-22, 29-30.

87 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頁55-58；《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34-535。

88 毛澤東給林彪等的報告，1936年4月1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17。

89 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頁52-65；《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34-53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21-527。

的新編二十八軍受命跨過黃河，進入山西，之後南移去保護紅軍撤退時要經過的渡口。這是一支僅由五六百名前游擊隊員組成的弱小部隊，用劉志丹生前的同志的話說，是一支「爛部隊」。⁹⁰ 4月13日，毛澤東和彭德懷命劉去攻打防禦堅固的三交鎮。進攻陷入僵局之時，劉志丹親往戰鬥前線指揮作戰，中槍犧牲。他手下幾個重要的軍官也在這場戰鬥中殞命。⁹¹ 劉志丹之死一直充滿爭議。直到今天，很多陝北人仍然認為毛對此負有責任。⁹² 現有證據無法支持毛和黨中央直接下令、讓劉自我了斷的揣測，不過有一種頗為可信的說法：1935年劉及其部下受到批評並受命去指揮一支較差的部隊，他們急於用「在戰場上拼命」來證明自己、重獲信任，並付出了最終的代價。⁹³ 在中央檔案館向獨立的研究者開放之前，我們將永遠不知道這一懸案的答案。不過，如此多的陝北人相信黨中央應為劉志丹之死負責，這本身就意味着對黨中央的質疑是一直存在的。

紅軍從山西撤回後，做了種種積極的努力，試圖變軍事上的失敗為政治上的成功。中共譴責蔣介石和閻錫山阻擋紅軍奔赴抗日前線。⁹⁴ 黨大力宣稱，紅軍招到了8,000名新兵，從官倉和富人手裏沒收了30萬現款。⁹⁵ 但在對軍官的講話中，毛澤東更加嚴厲。

90 賀晉年1942年11月13日、馬文瑞1942年1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值得一提的是，賀和馬都是「陝北」派的。

91 〈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191–228；《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10–511、535。

92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pp. 49–54. 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51–52。1988至1989年我在陝北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也從受訪者口中聽到過類似的猜測。

93 郭洪濤1945年7月5日在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

94 毛澤東，1936年4月5日，《六大以來》，上冊，頁752–753。

9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45，註1；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頁68。

他批評了「自由主義」以及軍官只關心自己所帶部隊，忽視更大的革命目標；批評有些人因害怕損失而不積極進攻。⁹⁶ 在陝北農民中，他們長久以來的領袖劉志丹之死，以及紅軍不露底牌的擴紅規模引發很多懷疑：聲勢浩大但以失敗告終的這場短暫的東征是否值得？目前沒有證據表明毛對此有一絲懊悔。

艱難時世

劉志丹在1935年取得的軍事勝利將陝北東部大部分鄉村和幾個鎮子置於中共的控制之下。紅軍東征之時，閻錫山被迫撤回部署在黃河西岸吳堡、葭縣一帶的部隊，這一片很快就為中共所佔。⁹⁷ 陝北大部分地區一度是共產黨的囊中之物。東征失敗後，蔣介石部隊一路追擊紅軍到陝西，陝北受到了威脅。陝北的黨委書記彙報了陝北東部紅區的損失，徵兵的困難以及關於「紅軍打了敗仗回來了，將來不得了」的「造謠」。⁹⁸ 6月，因給養枯竭，共產黨放棄瓦窯堡，將指揮部移駐到更靠近陝西東北的保安縣。中共中央希望接手瓦窯堡的是業已與之建立起合作關係的東北軍，但蔣介石卻派他所信賴的將領湯恩伯攻下此鎮。⁹⁹

96 李赤然：《李赤然將軍回憶錄》，頁98–99。

97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36年2月17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440。

98 郭洪濤關於徵兵計劃的報告，1936年6月13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82。

99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5年5月29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40–941；〈我軍決定出瓦窯堡準備作戰〉，1936年6月14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44；《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18–319；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116–118。

1936年秋天，《大公報》的一位記者參觀了陝北東部的原中共佔領區。他發現湯恩伯正大肆修路，以連通榆林的國民黨據點與陝南諸縣及橫跨陝晉的各個渡口。一位昏庸的縣長被解職和逮捕，一位販賣鴉片的腐敗軍官被槍斃。很快，所有主要的城鎮和交通線都掌握在了國民黨手中。然而共產黨仍控制着農村的大部，這位記者稱，曾為中共控制的地區內大部分成年男子現在都參加了紅軍。¹⁰⁰ 即便在瓦窯堡這樣已落入國民黨之手的城鎮，共產黨也留下了他們的痕跡。《大公報》的記者不得不承認，在被中共短暫佔據之後，該鎮居民的政治參與度非常之高。¹⁰¹ 不過總體而言，革命處於退守的狀態，陝北蘇維埃的東部此時變成了游擊區。¹⁰²

1936年初起，中共加強了他們在農村的組織。參加少先隊和赤衛隊被宣傳成「每個蘇維埃公民神聖的責任」，婦女、富農、知識分子也包括在內——不過也並未放鬆對階級異己分子的警惕。所有這些年輕人都有武器（不過沒幾個有槍的），在行列式和踢正步之外，他們所承擔的軍事職責還包括站崗放哨、偵察、檢查路條等。在國民黨已經佔據城鎮的情況下，這些年輕人組成了一個活躍的重要網絡，在敵人下鄉突襲時通風報信。¹⁰³ 每回國軍冒險來犯，共產黨就清空村子，帶領農民和他們的微薄財產躲到山

100 〈陝北收復赤區視察記〉（二）、（三）、（四）、（五），《大公報》，1936年11月27日、12月2日、12月3日、12月4日。本章所引述的《大公報》內容都出自這篇系列報道。

101 《大公報》，1936年12月4日。

102 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1937年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64；中統：〈半年來陝甘寧及川康邊境赤匪之竄擾概況〉，1937年3月，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103 陝北省委關於赤衛隊的指示，1936年1月1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76–179。

裏。共產黨人還發動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地方幹部和游擊隊被賦予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們可以對懷疑為間諜或叛徒的人處以極刑。¹⁰⁴ 為協調這些工作，中共的組織逐步職業化：區黨委幹部和鄉長成為「脫離生產的人」，意即他們成為新生的共產黨政權的領薪僱員。¹⁰⁵

國民黨以更強的兵力重返陝西東北的綏德、清澗、瓦窯堡，加劇了當地農村的階級鬥爭。一些富農要求歸還他們在此前一年的土改中被沒收的地，此舉受到中共大力抨擊。雙方的衝突相當激烈，如前章所述，在一些中共的根據地，「當過區長、紳士的人，土豪劣紳，全部在土地革命中殺光了。」¹⁰⁶ 與此同時，階級鬥爭也不是社會變化的唯一形式。如同在許多社會革命中的情形一樣，兩性關係成為一個重要導火索。那位到訪陝北的《大公報》記者就注意到「男女關係弄得很混亂，同族同村的老少男女互相結合。」¹⁰⁷ 估計他所指的是年輕人在婚姻大事上自己拿主意，跟認識的人結婚。這些變化的速度相當之快。因為少先隊和赤衛隊裏有男也有女，這些新型的組織就為適婚年齡的青年男女提供了彼此認識的機會。再者，很多男人去當兵，年輕婦女需要承擔更多農活，得以離開父母的監督，有機會展開社會生活。¹⁰⁸

儘管共產黨在農村的力量一直存在，到1936年夏末，比較穩固的根據地只剩下陝西西北部與甘肅、寧夏交界處的一小片。這年8月中共提交給共產國際的一份報告最清楚地勾勒出這一時期陝

104 馬明方：〈游擊區域內的蘇維埃工作〉，1936年7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85–187。

105 中共中央組織部給陝甘寧省委，1936年8月15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37。

106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頁168。

107 《大公報》，1936年11月27日。

108 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1936年5月9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56。

甘寧邊區的樣貌。在陝西東北部也有一些據點，不過已經被國民黨的封鎖線和剿共部隊切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在延安以南的一些縣份，國民黨控制着城鎮和交通幹線，共產黨控制着農村地區。同樣，甘肅東北部的鄉村也由共產黨控制。報告稱，僅有四個縣完全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甘肅環縣，陝西的保安、安塞、安定。不過，安定一說肯定不實，因其境內的要鎮瓦窯堡在6月剛剛棄守。此外，中共還稱佔據了四座較小的縣城（這是比較可信的），包括寧夏的鹽池、豫旺（預旺），陝西的定邊、靖邊。「除定邊外，餘均不足兩百家城市。」¹⁰⁹ 陝北主要的城鎮——延安、榆林、綏德、瓦窯堡——都在國民黨的手裏。¹¹⁰ 位於保安的中共首府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全國性運動的中心。前面提到，1920年代，因易於成為土匪攻擊的目標，地方政府一度放棄縣城，躲到永寧山。到了1936年，保安縣城仍然比長江下游一般的鎮子要小，並且「房屋多已倒塌」。¹¹¹ 埃德加·斯諾在那年秋天抵達保安，對毛澤東做了那次著名的訪問。斯諾的妻子形容保安是「一個勉強能維持溫飽的地方」。¹¹² 圖 5.3 重現了1936年8月的中共控制區和游擊區：

109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2。報告還稱中共佔據了延川縣城，不過《大公報》的記者曾到訪那裏，據他說，中共佔據此城的時間是1935年5月到1936年9月。也就是說，在中共向共產國際提交報告後不久，就丟掉了這個縣城。《大公報》，1936年12月3日。

110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43-44、229、264-266、276。

111 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p. 474-475.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卷，頁1231。

112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 p.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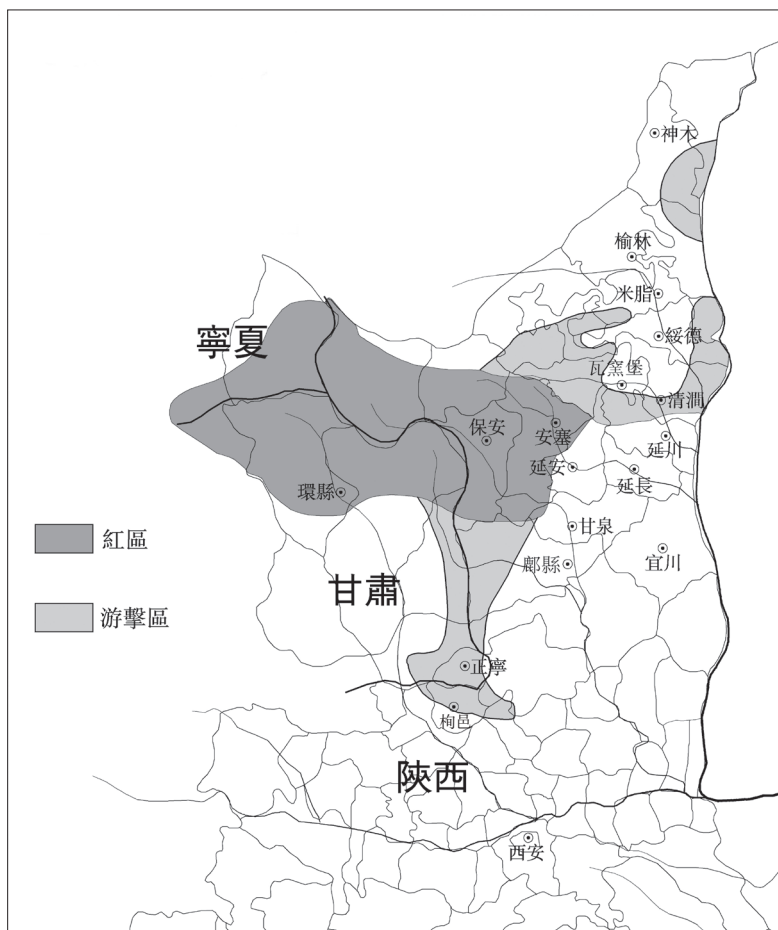


圖5.3 1936年秋、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的紅色根據地和游擊區。與第257頁圖5.2比較可見，中共根據地已經被趕到西部更貧困的地區。資料來源：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2；中統：〈半年來陝甘寧及川康邊境赤匪之竄擾概況〉，1937年3月，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中共宣稱，在他們控制區域內有40萬人口。假設其中一半為男性，男性的一半是健全的成年人，也就是只有10萬成年男性。據說當時紅軍有3萬人（但這個數字很可能包括了地方游擊隊），則當地適齡人口的參軍比例比江西時期還要高，長此以往，這樣高的

徵兵比例是難以為繼的。¹¹³ 另一份報告稱，中共陝甘省（位於兩省交界處的貧困地區）有6萬人口，在15,000名成年男子中，5,000人已經參加了中共的地方組織或游擊隊。一些將領認為紅軍已經無望進一步擴軍了。¹¹⁴ 事實上，黨也承認，高徵兵率削弱了地方上的自衛力量。¹¹⁵ 陝北革命處境之窘迫最清楚的體現，也許是關於西北革命的主要文獻集對1936年8月到1937年春這一大段時間諱莫如深。¹¹⁶ 不大可能是因為這個時期的報告都沒有留下來；更可能的是，沒有好消息可供革命史家們彙報。

統一戰線的多重面相

在陝北的形勢對中共危如累卵之時，全國和世界的形勢卻在朝着有利於革命的形勢發展。新的中央領導層在挽救陝北危局方面發揮了關鍵的作用。與劉志丹相比，毛澤東的人脈更廣，戰略視野也更宏大，事實證明，他非常善於適應新的形勢。毛的競爭對手張國燾曾記述毛與他的一次生動交談，這次談話發生在張吃了敗仗從甘肅回來之後：

他笑着向我說：他是「買空賣空」，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他根據他所知道的材料作各種推測，主要說到日本侵略東北和華

113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2。

114 蕭勁光的武裝行動計劃，1936年2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02-203。

115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年7月23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58。

116 《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62-164。

北，破壞了遠東的列強均勢，引起英美蘇的不滿。國內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國民黨軍隊裏去了，看來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很難維持下去。¹¹⁷

毛的判斷正確，不過中共對這些新機遇的應對必然是多方面的，在與所涉各方打交道時，也勢所難免要用些檯面下的手段。在這方面，毛主要依靠周恩來，周在外交上素有八面玲瓏的能力。

需要強調的是，日本的侵略仍是當時最大的威脅，其他一切都退居次位。繼1931年佔據東北之後，日軍步步為營，繼續蠶食內蒙和華北。南京國民政府寄希望於國聯，用各種外交手段試着減緩侵略步伐；與此同時，蔣介石整軍備戰，他也知道中日之間必有一場更大的戰爭。但國民政府的一再妥協讓日本欲壑難填，到了1935年，又提出建立華北「自治政府」的主張——等於將中國的故都北京及其周邊地區從南京的控制之下切走，另立一個聽命於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對於日本人提出的撤軍及取締北平地區反日行為的要求，南京再次遷延敷衍，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草草簽下協議，答應了上述要求，北平學生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進而激起全國上下的愛國抗議。1936年6月，反蔣的南方實力派人物組建「抗日救國軍」，開始北上挑戰蔣介石，迫其抗日。¹¹⁸

日本的侵略為紅軍在「抗日先鋒軍」的旗號下東征山西提供了理據，同時，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中央遂派劉少奇前往平津地區，

117 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 478.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卷，頁1235。

118 Parks M. Coble,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7–137.

將五花八門的學生運動整合到共產黨的指引之下。¹¹⁹ 為抗日統一戰線贏得更廣泛的支持計，需要緩和階級鬥爭。在瓦窯堡會議之後，土地改革的政策就調整為保護富農；之後又有保護地權、鼓勵生產，引進鏵犁等政策出台。也有促進貿易、保護商業活動的政策。¹²⁰ 到1936年9月，中共對黨員仍堅持明確的階級標準，但將革命的短期目標進一步修改為建立民主共和國。¹²¹

此時，國民黨方面在陝西有兩支實力較強的軍隊。楊虎城的西北軍自1931年佔據陝西，在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中亦曾與中共合作，其手下軍官中有好幾位中共的地下黨員。軍隊系統的黨組織是獨立於省委的，因此這些重要的左傾軍官能躲過對省委機關一輪又一輪的搜捕。這樣，到了1934年秋天，他們才能向劉志丹的二十六軍和途經陝南的徐海東部偷偷提供槍、彈藥、藥品、電台、書籍和軍事地圖。楊虎城的年輕妻子受過教育，似乎是共產黨員，1936年年初，北平地下黨派人帶着一部大功率的電台到楊虎城軍中工作。¹²² 但當時，楊的部隊在規模、影響力和武器裝備方面都不如張學良的東北軍。張學良是中共的統一戰線最緊迫、

119 劉少奇：〈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關門主義冒險主義〉，1936年4月10日，《六大以來》，上冊，頁754-759。

120 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1935年11月25日、1936年1月24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31-132、134-135。

121 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戰線的決議，1936年9月17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74。

122 軍事支部組織調查表，1933年，《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乙篇，第1冊，頁426-428（支部成員許多是軍官）；趙仁夫，1936年11月23日，《陝西革命歷史文獻彙集》，乙篇，第1冊，頁499-509；Tien-wei Wu,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pp. 22, 51-53; Edgar Snow,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pp. 3-4.

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目標。這個過程始自1935年年底，直羅鎮戰役一結束，毛澤東致信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代軍長董英斌，痛斥他「自殘同類而任四萬萬同胞魚肉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並承諾，「東北軍不打紅軍，紅軍亦不打東北軍」。¹²³ 很快，在早前的戰役中被俘的東北軍軍官表示願意合作。彭德懷找來高福源商談，發現高認同統一戰線的主張。高曾就讀於北平的輔仁大學，是東北軍的一名團長，也是一位進步的愛國者，他歸隊之後在軍中散佈信息，說被俘期間受到了優待。之後，彭德懷又安排甘泉縣被圍的東北軍購買糧食和柴火等必需品。到了1月，高福源把東北軍與中共的這些局部往來告訴了他的上級，後者又將這一消息傳遞給了張學良。¹²⁴

此前，中共一直致力於在國民黨內部和軍閥部隊中做地下工作，不過，其目的是發動兵變以顛覆國民黨政權。現在，顛覆行為被明令禁止：「我們在東北軍中的工作目標，第一，不是瓦解東北軍，分裂東北軍……也不是把東北軍變為紅軍，來擁護共產黨的基本政綱，而是要使東北軍變為紅軍的友軍，把共產黨所提出的關於抗日救國的綱領變為他們自己的綱領。」¹²⁵ 一封寫給東北軍軍官的公開信呼籲聯合抗日，反對「賣國賊頭子蔣介石」。¹²⁶ 與此同時，地方上也努力消除與東北軍的衝突。市場開放，原先的兩個敵對陣營開始互通有無，太太平平地做起生意。細心的幹部發現，年紀較大的婦女常常最善於向集市上的年輕士兵傳播黨的思

123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490。

124 周祖堯的回憶，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頁16–20。

125 中共中央關於對東北軍工作的指示，1936年6月20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48。

126 毛澤東等致東北軍軍官，1936年1月25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02–906。

想。年輕人則通過排演愛國戲劇向東北軍士兵宣傳抗日主張。¹²⁷到了晚上，地方上的積極分子會在前線組織青年男女唱歌，並邀請「白軍」兄弟參加。¹²⁸中共鼓勵東北軍成立抗日救國會，但不得不承認，這類公開的政治活動較為困難，因此支持者們便以同學、拜把兄弟、秘密會社或鄉情鄉誼為聯絡，傳遞愛國主張，即「以舊式的外表加上抗日討蔣的內容」。¹²⁹俘虜受到了優待，打罵被禁止，負傷官兵得到醫治。東北軍的被俘士兵聽了關於中共愛國新政策的報告，受邀參加公開的紀念活動，這些人獲釋歸隊後，大多帶回了關於中共地區內生活的正面信息。¹³⁰一些人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在開啟東北軍與中共的合作上起到關鍵作用的高福源就是一例。¹³¹

所有這些工作在推進時都十分謹慎和機密。1936年年初，紅軍計劃東征山西，為保證其後方及蘇區南沿的安全，與東北軍達成停戰就至為關鍵了。1月20日，張學良會見了中共的聯絡人，雙方商定就地停戰，重啟貿易。¹³²中共嚴令從事貿易者皆着便服，雙方的協議都採取口頭形式，所有安排不得公開。¹³³雙方不時虛張聲勢地打幾仗，東北軍放空槍，以向反共軍官或者南京政府觀察員有個交代。¹³⁴中共與張學良的這些早期接觸促成了此後幾個月雙方之間一系列複雜的協商過程。

127 張策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10；楊醉鄉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67-568；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133。

128 Snow, *Random Notes*, p. 123.

129 中共中央西北局關於軍事工作的指示，1936年2月3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40-141。

130 國民黨軍官高建白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40-141；《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03。

131 王恩收：〈高福源：紅軍和東北軍的重要牽線人〉，《檔案天地》2014年第6期，頁16-19。

132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07。

133 毛澤東等，1936年3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17-918。

134 張策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511。

在彼時中國西北角錯綜複雜的競合網絡中，張學良無疑是要角。其父張作霖是響馬出身，一路廝殺直至攀升為統帥一方的東北軍閥。1928年日本人炸了他的專列，張作霖身亡。張學良繼承了父親在東北軍中的統帥地位，對蔣介石拿下中國北方功不可沒。不過，風流的名聲和極深的鴉片癮限制了張學良的作為，在他任上，日本人佔了東北，這讓張學良廣受詬病。1933年，戒毒成功的張學良開啟了他的歐洲之旅，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改革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張學良在歸國時堅信只有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¹³⁵ 蔣介石命他執掌西安剿匪總司令部，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身陷兩難：一邊是對蔣介石與國民政府的忠誠，一邊是從日本人手裏收復家鄉的熱望。1935年秋天，東北軍和紅軍交手時吃了一系列敗仗，張學良在蔣介石處遭到冷遇，那些支持抗日統一戰線的左翼愛國者卻頻頻向他示好。接到陝北停火的提議後，張學良會見了中共的代表，之後於1936年4月9日在延安的一座教堂裏與周恩來舉行了秘密會談。¹³⁶

張學良與周恩來深夜長談，他明白地表示，自己不會反蔣，只能勸說這位全國最高統帥積極抗日。問題在於蔣堅信必得首先清除共產黨，一貫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¹³⁷ 張學良從字面理解這句話，認為其含義是：「在抵抗外侮之前，必須先消滅國內的敵人。」蔣介石日記顯示，這正是其本意，他批評張學良不懂得「作

135 何柱國、戴鏡元的回憶，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頁3、52；Tien-wei Wu, *The Sian Incident*, pp. 1–6.

136 何柱國、申伯純的回憶，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頁1–5、54–62；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74–86。楊奎松的書無疑是關於這一時期的張學良最好的研究，此書尤其強調不可過分依賴當事人的回憶，這些回憶常常受後來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走樣」。〈自序〉，頁10–11。亦可參見Edgar Snow, *Red Star*, pp. 16–24.

137 Coble, *Facing Japan*, pp. 56–59.

事應有段落，俟告一段落，始可換另一段落。」¹³⁸ 在陝北和紅軍交過手之後，張學良相信即便共產黨的主力部隊被打敗，他們也一定會繼續打游擊；而只要「安內」沒有完成，抗日就會無限期地拖延。¹³⁹ 這是張學良所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除非蔣徹底向日本人投降，他也不願意公開反對這位全國最高軍政領袖。他告訴周恩來，儘管他同意局部停戰，但如果蔣命令他打共產黨，他也只好從命。¹⁴⁰ 針對中共的「倒蔣抗日」，他提出一個代替性的方案：「逼蔣抗日」，這一建議不久就被中共所採納。¹⁴¹

張學良在兩種心思之間搖擺：一邊是對蔣介石的忠誠，一邊是共產黨抗日愛國主張的感召，為此他要考慮很多具體問題。首先，他時年36歲，相對來說是一個年輕的將領，比起那些為陝北達成停戰而居中協調的軍官，他手下的將帥年紀更大、想法更保守，也更認同國民政府的反共主張。¹⁴² 再者，東北的兵工廠曾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彈藥庫之一，東北軍被迫離開東北後，其武器、給養完全依靠南京政府。如果跟蔣介石鬧翻了，張學良需要找到一個新靠山，那只能是蘇聯。儘管這看上去很冒險，但張知道蔣介石也在跟蘇聯人談判（下文將提到），所以他覺得自己也不妨壯起膽子一試。¹⁴³ 與

138 蔣介石日記，1936年11月28日，轉引自孟廣涵主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上冊，頁249。

139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66–67。

140 《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10–311。

141 李海文：〈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接觸和談判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4年，頁355；《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33–534；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的決議，1936年9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70–971。

142 毛澤東等致賀龍等電，1936年9月8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頁162–163。

143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89–150；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 451. 李海文：〈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接觸和談判的歷史過程〉，頁354。

周恩來在延安會面後，張同意幫一位中共代表取道新疆前去莫斯科，他自己也派出代表，從歐洲走；同時，中共的聯絡員進駐到了張學良在西安的司令部。¹⁴⁴到了6月，張和中共合作無間，甚至提出加入共產黨。這個要求上報後令莫斯科十分不安，讓一位背景有問題的軍閥入黨，這實在超出了共產國際的預期，張公子的請求被直截了當地拒絕了。¹⁴⁵軍閥申請入黨看似不同尋常，但要考慮到當時本來就是非常時期。蘇聯檔案中有一封新疆軍閥盛世才寫來的冗長信件，收件日期是3月中旬，盛在信中譴責蔣介石抗日不力；吹噓自己遍覽馬克思、列寧及斯大林著作；要求加入共產黨並許諾：如果斯大林批准他的請求，他將協助蘇聯秘密地向甘肅的紅軍輸送軍事援助。¹⁴⁶所以張學良並不是唯一一個迫切想要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的軍閥。

中共與東北軍這個計劃中的聯盟，具體的實施辦法是秘密籌建西北國防政府。這個新政府將「打通蘇聯，同蘇聯及蒙古訂立抗日互助條約」。¹⁴⁷其目標是「在中國的西北建立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與蘇聯外蒙打成一片」。¹⁴⁸1936年6月，陝北與莫斯科之間的電台恢復，中共中央得以將自己的計劃傳遞給共產國際。在6月26日的一份長

144 《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10–311；《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34、536。

145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1–7、121–123。對這一精彩事件，楊的分析最徹底，也最令人信服。目前公開發表的相關材料相當稀見，關於莫斯科的反應，可參閱季米特洛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36年7月27日，見Alexander Dallin and F. I. Firsov, eds.,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2.

146 盛世才給王明的電報，收件日期1936年3月1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168–177。

147 林育英等致張國燾等電，1936年5月20日，《紅軍長征文獻》，頁865。

148 林育英等致張國燾等電，1936年7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075。

電報中，中共中央回顧了此前與張國燾的分歧，提出西北國防政府是重新統一全黨的舉措。這時張國燾正準備前往陝北（據稱在朱德的敦促下）。按照設想，甘肅省會蘭州將成為以張學良為首的新政府的首都。電文總結了與張學良之東北軍和楊虎城之西北軍的統一戰線談判，之後提出「東北軍每月的軍餉達200萬元，完全仰仗南京，一旦東北軍移駐他處，南京將停止供餉。」連東北軍、西北軍、紅軍在內，中共要求蘇聯提供每月300萬元的經費援助。電文接着寫道：「除了經費問題，軍事問題也很關鍵。我們希望得到飛機、重炮、炮彈、步槍，高射機槍、浮橋平台等。請考慮以目前的政治形勢，國際是否可能提供這些援助，能援助多少。」¹⁴⁹ 如此大額的援助自然要經過蘇聯最高層的批准，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於7月初把這封電報提交給斯大林。

保加利亞人季米特洛夫自1929年執掌共產國際的西歐局。他一度因「國會縱火案」在柏林被捕，經過一場充滿戲劇性的審判後被釋放，回到莫斯科，擔任起共產國際的領導職務。希特勒的得勢讓季米特洛夫確信，黨將社會民主黨和納粹等而視之的極左政策是錯誤的。在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共產國際的國際路線有了根本性的調整。1935年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已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生存構成威脅，各國共產黨必須與資產階級政黨組成統一戰線或人民陣線等聯盟，以抵抗全球面臨的法西斯主義的威脅。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以毛澤東和朱德的名義起草了〈八一宣言〉，這份宣言於當年10月在法國發表。這是中共第一次發出組建統一戰線的呼籲，至1935年年底林育英抵達陝北，〈宣言〉的發表與內容才被中共中央知悉。¹⁵⁰

149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王明電，1936年6月26日，見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 96–99.

150 編者的介紹，《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3–9。

長期以來，〈八一宣言〉被視作中共轉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個關鍵節點，不過近年才證實王明是起草者，而毛本人對以其名義發表的這篇宣言一無所知。¹⁵¹ 我們不應忽視擬議中的統一戰線的局限性。〈宣言〉仍在譴責「南京賣國政府步步投降」，呼籲反對「日寇蔣賊」。¹⁵² 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經常被拿去跟團結進步黨派、對抗納粹德國的法國人民戰線做對比，不過王明在起草〈八一宣言〉時更多想到的是德國，即怎樣才能把中國國內的各種勢力全部團結起來反蔣，就像德國人應該團結一致反對希特勒一樣。¹⁵³ 因此，毫不出奇，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上接到林育英的報告後，把統一戰線擴大到包括「一切愛國的分子團體、階層、階級、黨派、生產的與企業的、文化的與教育的、學生的與教員的、城市的與農村的、新式的與舊式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武裝的等等力量」，而把蔣介石和日本人一起列為敵人。蘇聯則被明確為「中國革命最有力量的幫手」。¹⁵⁴

151 Stuart Schram, "Introduction," in Stuart Schram and Nancy Hodes, eds.,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5: *Towar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January 1935–July 1937* (Armonk: M. E. Sharpe, 1999). 范力沛 (Lyman P. van Slyke) 關於中共統一戰線的經典論述錯誤地將〈八一宣言〉視為長征途中所撰。Lyman P.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56–57.

152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頁290–291。英譯全文參見“Message to Compatriots on Resistance to Japan,” in 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 ed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pp. 692–698.

153 王明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35年1月9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352–354。

154 瓦窯堡會議的政治決議，1935年12月25日，《紅軍長征文獻》，頁887；《六大以來》，上冊，頁734–745。

在1935年，不止是中共領導人注意到共產國際的政策轉變，南京政府也開始調整中蘇關係。希特勒掌權危及德國對南京的軍事援助，蔣介石也在嘗試與蘇聯結成抗日的盟友。儘管國民黨與共產黨連年交戰，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贊助是有先例可循的。1920年代，蘇俄曾向國民黨提供重要援助，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就是在那時候武裝起來的。蔣曾赴蘇了解紅軍的治軍經驗，他的兒子在蘇聯念書後留在那裏，娶了個當地太太。1932年，國民政府恢復了與蘇聯的外交關係，駐南京的蘇聯大使積極鼓動抗日情緒。¹⁵⁵ 共產國際七大召開後，蔣開始尋求重與蘇聯結盟的途徑。1935年秋，他與蘇聯大使舉行了會談，接着，在次年1月，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武官又與王明兩次長談，商討解決內戰的途徑。據王明關於第一次談話的詳盡記錄稿，這位武官在談到南京政府政策轉變的動機時相當之坦率。南京方面預計，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將在9月爆發，但「蔣介石說，我們子彈和炮彈很少，我們的全部儲備僅夠三個月戰爭使用，因此我們必須找到軍事裝備的來源。」英美願意提供幫助，但他們離得太遠。「一旦中日戰爭爆發蘇聯能提供援助嗎？」¹⁵⁶ 第二次會談開始觸及實現統一戰線的具體條件，雙方矛盾變得尖銳起來。王明認為：蔣介石不消滅蘇維埃就不罷休，會把弱小的紅軍派去最危險的前線跟日本人打。武官表示需請示上峰，會談因此中斷，王明由此得出結論，蔣方會談只是為了刺探紅軍的信息，蔣介石並無合作誠意。¹⁵⁷

155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約1979），頁191–193。John W. Garv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Xi’an Incid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6 (1991.7), pp. 145–153.

156 王明與鄧文儀的談話記錄，1936年1月17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89–102（引文見頁94–95）。

157 王明與鄧文儀的談話記錄，1936年1月22日；以及1月23日就談話的彙報，《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104–110。

事實上，中蘇談判在更高層級上繼續進行。不過，國民黨內部的分歧已昭然於天下。對毛和中共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挑戰，他們需要判斷誰說話算數。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一直對共產黨抱有同情，她是國民黨左翼，但孤掌難鳴，只能受亡夫身份的庇佑，妹妹宋美齡是蔣介石夫人這一點也有保護的作用。1936年1月，宋慶齡捎信給陝北中共，此舉顯然是與其弟、前財政部長宋子文商量過的。與此同時，蔣介石命實力強大、行事保守的CC系的首腦及中統負責人陳立夫與蘇聯談判。陳最初擬去莫斯科談判，中途告吹；之後，他直接在南京與蘇聯大使接洽。此外，陳還通過中共的地下黨員與陝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聯繫。各方代表於1936年2月抵達瓦窯堡，此後毛和中共中央批准剛從莫斯科回來的潘漢年到上海與陳立夫談判。¹⁵⁸

毛知道，像宋慶齡這樣的左派在國民黨內部是沒有影響力的。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很多愛國的國民黨人希望與蘇聯結成聯盟以抗擊日本侵略者，民眾也越來越希望結束內戰，集中力量打日本。關鍵問題始終是對蔣介石應持何種立場。共產黨的宣傳一直稱蔣介石是「賣國賊」。在延安會談中，張學良表示，他不願意反蔣，敦促中共緩和對蔣的態度。到了4月，毛和中共領導層承

158 李海文：〈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接觸和談判的歷史過程〉，頁351–354；毛澤東等致博古電，1936年3月4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頁180–181。Hans J. van de Ven,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pp. 172–188. 對這一系列多方談判做了細緻研究。又見Sidney H. Chang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 116–125. 陳立夫的回憶錄並不可靠，尤其是，他在回憶錄中轉錄了一封9月1日來自周恩來的信件，落款日期和正文中都說是1935年，是錯誤的。該信寫於1936年。《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25。

認，繼續反蔣與中共停止內戰的主張是衝突的。¹⁵⁹ 6月，中共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繫恢復，共產國際以其權威進一步促成了中共的立場轉變：反蔣被視作對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錯誤理解。¹⁶⁰ 到了8月，毛寫信指示他的談判代表潘漢年，明確提出「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¹⁶¹ 中共的電文如雪片一樣飛向國民黨的政治人物、進步知識分子、地方軍閥，其內容無外乎宣傳中共的統一戰線新政策，呼籲停止內戰以便全國一致為即將到來的對日戰爭做準備。這些電文之所以能順利發出，當然是因為中共的重要領導人進駐西安的張學良司令部並利用了其與全國各地便捷的電報網絡。¹⁶² 各地的左傾國民黨員，心懷不滿的地方軍閥和進步的輿論領袖開始接觸地下黨，與陝北紅軍和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取得聯繫。¹⁶³

159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33–534；中共致全國各黨派的公開信，1936年4月25日，《六大以來》，上冊，頁760–761。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的內部文件中，蔣介石仍被稱為「賣國賊的頭子」。中共中央關於對東北軍工作的指示，1936年6月20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47。

160 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1936年8月15日，見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 101–105. 如上文已交代過的，中共的反蔣態度與王明在七大上的權威發言是一致的，並不是中共曲解了共產國際，而是共產國際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161 毛澤東給潘漢年的指示，1936年8月23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頁159。

162 毛澤東的信，《文獻和研究》1983年，頁12–17；《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40、569–571、590；《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10、322–323、325。英譯見Schram, *Road to Power*, 5: pp. 295, 311–321, 338–339, 344–347, 356–358, 362–369.

163 見1936年的各種電文，《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112–113、193–195、210–221；毛澤東致張國燾等電，1936年9月27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頁182–183。

10月，毛澤東已就如何組建統一戰線起草了一份致國民黨的倡議書，希望周恩來能夠赴南京提交。倡議書的主旨是建議「實現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為實現這一目標，南京政府應停止對中共的軍事進攻並「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便紅軍有條件抗日。在不變更其領導權的情況下，紅軍接受「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制」，並「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在政治上，中共要求國民政府實行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釋放政治犯並保證今後不會破壞中共組織。至於中共方面，倡議書承諾「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¹⁶⁴ 南京似乎能接受這些一般性的原則，不過在此後的談判中，紅軍及蘇區的規模，政府對中共開支的負擔程度以及中共戰區的劃分，成了雙方爭論的焦點。¹⁶⁵ 與此同時，蔣介石繼續發動對中共的強勢進攻，意在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甚至消滅對手。但無論如何，對於已經交戰十年之久的國共兩黨來說，這份倡議書顯示出日本入侵帶來的新的環境，統一戰線呼之欲出。

向世界打開一扇窗

當各種交錯複雜的談判進行之時，一個新角色突然走上前台：這是一位試圖從紅色中國挖到獨家新聞的年輕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年31歲的斯諾已在中國工作了八年。日本軍國主

164 〈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640–642。英譯見 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5: pp. 399–401.

165 國民黨給張沖的指令，1936年10月5日，見秦孝儀等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台北：中國國民黨，1985），第1冊，頁63–64。

義的崛起和法西斯給全世界帶來的威脅令一批左傾的外國記者和活動家有所警醒，斯諾從很早就是其中一員。1935年，斯諾在燕京大學教授新聞學，攜妻子生活在北平。斯諾的很多學生都是抗日積極分子，他的家就是那些組織「一二·九運動」的年輕人的集會場所之一。年輕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熱衷，斯諾有切身的體會，他聲稱（以其特有的誇張風格，不過有事實根據）在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中，「列寧幾乎受到崇拜，斯大林是最受愛戴的外國領導人，社會主義被視為理所當然是中國未來的社會形式……」¹⁶⁶ 斯諾一直想造訪中共的根據地並寫一本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書。1936年，他在北平的聯絡人和宋慶齡的牽線搭橋最終促成了這一願望的實現。他坐火車到了西安，在張學良司令部見到了他的聯絡人，之後坐東北軍的卡車抵達延安。從延安徒步走到安塞，7月在安塞見到了周恩來。他靠着一匹驚馬和步行走了幾天，來到保安，在那兒他將待到10月份，期間他去了一趟位於寧夏回民聚居區的彭德懷指揮部，進行了大量採訪。¹⁶⁷

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他對毛澤東的長篇採訪，這篇訪談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信源，每一本涉及毛早年經歷的傳記都會引用它。斯諾的到訪給了毛「第一次向全世界發言的機會」，這個來自美國密蘇里州的年輕記者斯諾成了毛的傳聲

166 Edgar Snow, *Red Star*, p. 369. 斯諾最好的傳記是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亦可參見斯諾自傳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關於193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學生中的流行，見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275–280, 310, 364.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381。——譯者註。

167 Snow, *Journey*, pp. 150–182; *Red Star*, p. 25 ff.; Thomas, *Season*, pp. 126–147.

簡。¹⁶⁸ 通過他，毛不僅向世界發言，也向中國發聲。斯諾離開保安後，他的幾篇訪談或報道先發表在《京津泰晤士報》(*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等英文報刊上，之後在中文媒體上翻譯和轉載。這些文章的影響力之大，不亞於單行本的《紅星照耀中國》。此書第一個中譯本出版於中日戰爭爆發前夕的1937年，此後又於1938年出了一個更完整的譯本。¹⁶⁹ 抗戰期間，進步學生紛紛投奔延安，他們中的許多人對毛澤東和中共的了解正是來自斯諾的這本書。

考慮到當時的歷史環境，斯諾的報道也是令人震驚的。1936年，毛的紅軍被困於中國最貧困省份的西北角。保安是中共的「小王國」，一片廢墟，灰塵僕僕，是條件極差的藏身之所。¹⁷⁰ 但在這個環境中，斯諾發現了毛——「這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家」，如同「一種天命的力量」。毛的「天生精明」給斯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保安的窯洞裏，斯諾發現了一位「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在毛身上，斯諾也發現了「在必要時候有無情立斷的魄力」和「『長期觀點』的辯證法」。¹⁷¹

168 Snow, *Journey*, p. 161. 斯諾自稱是毛的博斯韋爾 (p. 150)。傳記作家鮑斯韋爾 (James Boswell, 1740–1795) 曾為作家塞繆爾·約翰遜作傳，令後者家喻戶曉。——譯者註。

169 Snow, *Journey*, pp. 183–184; Thomas, *Season*, pp. 156–159.

170 Snow, *Journey*, pp. 159–160.

171 Snow, *Red Star*, pp. 66–67, 69–70, 72.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69–70、73–74、76。「在必要時候有無情立斷的魄力」一則，係綜合董樂山譯本和作者意見後譯出。——譯者註。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毛在名義上還不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其時中共中央的總書記是張聞天，他是這一時期中共文件的第一簽署人。但不管是斯諾還是其他人，都認為毛在中共內部的權威地位是無可置疑的。這個時候斯諾還沒有發現「英雄崇拜」的存在，這是後來才有的。當時在黨的領導人之間仍有激烈的辯論，斯諾也曾聽說毛有時大發雷霆，但他並沒有親見。爭持確曾發生，但俟一結束，四面受敵的黨組織會再次團結起來，直到下一次的紛爭再起。¹⁷²

斯諾無疑對中國革命充滿同情，此後他以玫瑰色的筆調描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活，招致廣泛的批評。其中一條最具影響力的批評把《紅星照耀中國》斥為「有意識的宣傳品」，¹⁷³ 另一位批評者稱該書是「文學想像的巨著」。¹⁷⁴ 但無論如何，儘管斯諾在政治上同情中共，他仍是一位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多年的資深記者，是唯一一位在西安事變和中共移駐延安之前採訪毛澤東並記述「紅色中國」詳情的外國記者。因此，《紅星照耀中國》為陝北革命中短暫卻重要的保安時期提供了一扇獨特的窗戶。如果結合其他文獻的語境仔細研讀，就會發現此書對這一特殊歷史時刻的洞察還是有借鑒意義的，其中斯諾個人的實地觀察尤為珍貴。

斯諾曾遊歷中國的大江南北，但他仍然發現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唯一一條通汽車的路到延安就中斷

172 Snow, *Red Star*, pp. 68–70,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72。——譯者註；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pp. 482, 517–520.

173 Anne-Marie Brady,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p. 46.

174 John Pomfret,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n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enry Holt, 2016), p. 231.

了；從那開始他只能走小路。他抵達的第一個鎮子是安塞，這是中共控制的為數不多的縣城之一。十年前的一場洪水已經把鎮子「完全沖毀……到處都是斷壁殘垣。」延安以北的這個窮縣也是東部戰線的指揮部所在地，此時蘇區規模已縮減，東北邊丟掉了大片根據地。即便到了此地，斯諾也不得不快速向保安行進，因為當地民團從南往北一路尾隨着他。蘇區沒有機器工業，也沒有電力；照明靠菜油點燈。在蘇區的「工業中心」吳起鎮，機器包括車床、旋床、衝床、鑄模、縫紉機等——這些機器要麼是長征路上帶來的，要麼是在山西繳獲的戰利品。兵工廠僅能製造地雷、手榴彈，再就是修理一下舊武器。機械師都是外地人，大多來自長江流域。黨的宣傳工作者稱陝北「非常落後」。他們的參照系是江西蘇區，那裏的人口識字率也只有10%，不過相比之下教育還算發達。¹⁷⁵

斯諾在報道中提到護送他的那支小衛隊成員多是陝北人，但令人意外的是，與他談話的都是外地人。當他講述某個人的經歷時，通常從受訪人在湖南、福建、江西，以及間或在四川度過的青年時代說起。在隨後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所收31篇訪談中，僅有一位受訪者是本地幹部。¹⁷⁶ 能夠與外國人交談的多是那些有信心、有權威，經歷過長征、現在陝北革命中主持大局的老革命。雖然沒有機會講述自己的經歷，陝北當地人也並未缺席。比如，檢查過往行人的兒童哨兵；比如以「長矛短槍和幾支步槍」裝備的自衛隊，他們平時操練震耳欲聾的吶喊，據說這個辦法在夜襲民團的時候非常有效。宣傳無處不在：村莊的牆壁上「用醒目的黑字」

175 Snow, *Red Star*, pp. 39, 57, 230, 248–252.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42、61、252。——譯者註。斯諾的原始記錄更直白，他稱黨的宣傳工作者對陝西的工作「幾近絕望」，認為「當地群眾的基礎太差，幾乎無法開展工作。」(Snow, *Random Notes*, p. 49)。

176 Snow, *Random Notes*, passim.

寫着譴責地主、民團和漢奸的標語；以及斯諾認為「一點也不精緻」但無疑相當有效的活報劇。共產黨的宣傳對兩個群體的效果最顯著：一是年輕人，二是婦女。斯諾寫道，「我深入蘇區以後，我就會在這些臉頰紅彤彤的『紅小鬼』——情緒愉快、精神飽滿、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發現一種令人驚異的青年運動所表現的生氣勃勃的精神」，我們不妨推測這些年輕人是因上級的指示才在一個外國訪客面前表現得這樣歡欣鼓舞。但如果無視年輕人響應中共主張的大量證據，恐怕也失之偏頗。大概與男人大量參軍有關，婦女也獲得了更多工作和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¹⁷⁷

新興蘇維埃的吸引力中有一些重要面相，與新民主政權的畫面並不那麼協調，這一點在斯諾的報道中也有所體現。無論如何，這是一場革命運動，建基於革命的權力之上。大部分稅被免了，這當然大快人心，但這很可能是因為革命政權的收入主要來自沒收富人的家財。¹⁷⁸ 斯諾來到剛被解放的寧夏回族地區，聽到了更多抱怨。民眾深受此起彼伏的戰爭之苦，哪支隊伍都予取予求，其要求往往相互衝突，即便沒有稅，光是餵養共產黨的戰馬就已經耗光了當地寶貴的草料。當地人對禁種鴉片也深惡痛絕，而蘇維埃發行的紙幣在市場上一錢不值。斯諾不無根據地懷疑回民不大會相信中共關於民族自治的承諾；彭德懷坦率地承認，在當地民團未被消滅之前，根本不可能發動群眾。斯諾在寧夏期間目睹了一位國民黨的稅吏經群眾審判後被處以極刑的過程，這一事件令他極為不適，但他並沒有隱去這一見聞。¹⁷⁹

177 Snow, *Red Star*, pp. 38–41, 43, 57, 101–102, 246. 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38、43–44、46、105。——譯者註。

178 Snow, *Red Star*, pp. 225–226. 這一點在《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04、571–572也有佐證。

179 Snow, *Red Star*, pp. 323–324.

當他的報道基於耳聞而非親見時，斯諾比較容易受到共產黨宣傳的影響，有誇張之虞。比如，他寫到1932年劉志丹控制了陝北11縣，1935年控制了22縣，這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¹⁸⁰他太過輕信中共所聲稱的軍隊規模和轄區範圍。陝甘寧蘇區從來不是最大的蘇區；毛澤東到達陝北的時候紅軍也沒有兩萬人；東征頂多實現了8,000人的擴紅，不可能是15,000人。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抵達陝北之後，紅軍也不可能有9萬人。¹⁸¹斯諾說陝北人是中國「最自由、最幸福」的判斷也太過天真。¹⁸²不過他的報道有力地證明，即便經歷了長征的傷亡和東征的無可爭辯的失敗，毛和其他中共的領導人對於他們所佔據的這一小塊貧窮的根據地仍保有樂觀，令人印象深刻。黨內秘密文件和斯諾對毛澤東的長篇訪談中所流露出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毫無二致。

斯諾在陝北所做的一系列訪談以及他的那本書有幾重作用。它們無疑提高了毛澤東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聲譽，毛自己講述的早年經歷也提供了大多數共產黨領導人傳記所缺少的人性色彩。¹⁸³斯諾對長征的描述激動人心，恰恰符合毛所急於確立的長征敘事。前文提到過，毛賦予長征倖存者黨內精英的身份，在與斯諾的交談中，他不失時機地提出打算就長征出一本書。¹⁸⁴最重要的是，斯諾成了毛澤東向國內外宣傳廣泛建立抗日愛國統一戰線這一新主張的管道。在斯諾的五次正式採訪中，毛回答了新統一戰線政策的使命、措施、緣由等諸多問題。他的大多數回答是面向國內讀者

180 Snow, *Red Star*, pp. 201–202.

181 這一組數字見Snow, *Red Star*, pp. 6, 39, 194, 261, 386.

182 Snow, *Journey*, p. 177.

183 Stuart R. Schram, *Mao Tse-tung*, Pelican Books (Baltimore: Penguin, 1967), 註19稱斯諾的報道「是關於毛早年生活最重要的獨家史料」。

184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66。這條記錄的日期是8月5日，剛好在斯諾造訪期間。

的，其主旨是國共合作，但他也向斯諾強調日本對其他太平洋沿岸國家的威脅，並希望「有遠見」的美國人民最終能和中國人民一道抗擊日本法西斯。¹⁸⁵ 對於國際輿論的作用，毛無疑了然於胸。

爭取蘇援的最後一次嘗試

在斯諾在為他那本關於陝北革命的樂觀報道搜集信息的時候，中共發給共產國際的一份報告卻呈現出另一種調子。正如毛澤東在長征途中坦然承認的那樣，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黨員在其面前不能矯飾。像在任何一個分支眾多的大型組織中一樣，下級的報告也會根據其目的做一些事實編排。不過，各國黨組織都承認蘇聯的領導地位和寶貴經驗，以及斯大林的智慧，所以在向莫斯科彙報時都謹守事實。更何況，儘管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此時基本已經「靠邊站」，但他還在保安——有時候還跟斯諾打網球。¹⁸⁶ 中共在給共產國際的那篇長長的報告中請求大量軍事援助，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共不敢報告任何李德會認為不實的內容。

8月28日的報告開頭就毫不諱言地交代軍事上的嚴峻形勢。陝北東部已被湯恩伯佔領，他控制着通往山西的渡口和所有重要城鎮，包括中共先前的指揮部所在地瓦窯堡。湯恩伯手下有七個師和一個旅，正忙着修公路和碉堡。在西部和西北部，回族軍閥馬鴻逵強悍的騎兵佔領了寧夏境內富饒的河套地區，東北軍的保守派在蘇區南邊與馬遙相呼應，互為支援。在西南方，對蔣介石忠心

185 參見“Interview with Edgar Snow on Foreign Affairs,” 1936.7.15, Schram, *Road to Power*, 5: pp. 249–257, 訪談中的很多內容在 *Red Star*, pp. 80–83 有所體現。

186 Snow, *Red Star*, pp. 365–366.

耿耿的將領胡宗南早已開始在甘南修建碉堡鏈，以阻擋賀龍部和張國燾部北進與中央紅軍會師。1936年6月，胡曾被派到湖南處理西南事變，現在他已趕回，阻截賀龍和張國燾軍穿過甘肅。在南邊，紅軍與東北軍勉強維持着停火狀態，總體而言，國民黨以150團、15萬兵力包圍着共產黨的根據地。¹⁸⁷

中共手中較為穩固的根據地現在縮減為陝甘寧交界處的幾個縣。同時期的報道在提到這個小根據地的範圍時會列舉不同的地名，不過大致包括陝西西北角的保安縣、靖邊縣、定邊縣，寧夏的鹽池縣和甘肅的環縣。¹⁸⁸ 中共向共產國際彙報說其轄區內有40萬人口——這個數字肯定包括了更東邊的游擊區，其中3萬人已經參加了紅軍，軍民比例比在江西時高。¹⁸⁹ 當地的武裝力量在東北軍和南部地方民團的進逼之下節節退卻；紅軍軍事上的挫敗被渲染成紅軍已被消滅的謠言；黨的農村幹部被批評犯下敵前逃跑的錯誤。¹⁹⁰ 軍事上的失利影響了士氣，一些士兵和黨內同志出現了「動搖」，當繩索在他們小小的根據地周圍越套越緊的時候，這些人的

187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0。似乎與楊奎松在《西安事變新探》第151至154頁引用的蘇聯檔案是同一份。

188 毛澤東致彭德懷等電，1936年10月10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76、625；《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17。《大公報》記者稱當時中共的根據地僅包括保安—豫旺堡地區（1936年12月8日）。

189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2。國民黨情報部門稱中共游擊區在安定、清澗、恆山、鄜縣一帶。中統：〈半年來陝甘寧及川康邊境赤匪之竄擾概況〉，1937年3月，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190 唐立如的回憶，1936年10月12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05–206；陝甘寧省委給慶陽縣委的指示，1936年7月12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25–226。

堅定信念就受到了考驗。¹⁹¹ 從土豪手中收上來的糧食三分之二給了中央政府和紅軍，地方機構能夠仰仗的資源少之又少，更談不上任何發展了。¹⁹²

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有關於紅軍當時兵力的詳細彙報。毛的紅一軍有8,000人，徐海東的紅十五軍有6,000人。在陝北當地新招的部隊有二十八軍(1,400人)、二十九軍(1,200人)、三十軍(1,300人)。此外還有步兵、騎兵、炮兵、警衛和交通員共計3,350人。幾項合計，常規作戰部隊共計21,000人。這個數字比6月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繫剛剛恢復時中共彙報的25,000人略少，體現出夏季戰事中士兵傷亡和開小差的情況。¹⁹³ 除此之外，還有約6,000民兵和游擊隊。不過，這些人並不都有武器。紅軍擁共有一萬多條步槍，正規部隊大概每兩名戰士有一桿槍；民兵大約五人有兩把槍。其他武器更少：只有100挺重機槍，250挺輕機槍(倉庫裏還有200挺，可能是缺乏彈藥)，16門迫擊炮和2門山炮。不止武器緊缺，一旦戰鬥時間拖得久一點，彈藥也會是個大麻煩。正規軍的一挺步槍配大約四十發子彈；民兵則只有十發。紅軍的武器來源高度依賴戰場繳獲——這是毛澤東主張打殲滅戰的原因之一，在殲滅戰中，敵人的一個建制單位要麼被俘虜、要麼被全殲，他們的武器彈藥就歸了紅軍了。¹⁹⁴

191 李富春：〈陝甘寧蘇區的形勢與黨的任務〉，1936年7月2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28–229。

192 中共中央關於收集新糧食的計劃，1936年8月1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163。

193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6月26日，引自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 96–97. 6月彙報的蘇區人口為50萬，比8月報告彙報的40萬人要多。

194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年12月，《毛澤東軍事文集》，頁693–694、717–720。

提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還包括紅軍的招兵數字，但這些數字有很大問題：招兵數字大，但紅軍的規模卻沒見明顯增長。中共報告說他們從陝北招了10,000人，從山西招了8,000人，從西部(可能是甘肅、寧夏)招了1,000人。¹⁹⁵這意味着在紅軍主力部隊的21,000人中有19,000人是新招的。兵員總數顯然更可靠。如果紅軍確實招了19,000人，那意味着很多人入伍後不久就因為年老、體弱、生病或其他不適於作戰的因素被刷了下來。畢竟，當時的家庭都不願意把年輕的壯勞力送進軍隊。此外還有一種可能：那些沒有因身體原因被淘汰的年輕人也很快就找到了開小差的門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¹⁹⁶最後，像在任何一支部隊中的情形一樣，戰鬥減員、病、死等也是兵員減少的一大原因。不管出於何種原因，顯然，大規模「擴紅」並不意味着人們踴躍參加革命，也沒有帶來紅軍在規模和戰鬥實力上的大幅度增加。

中共向共產國際提交這份報告的目的是為了申請軍事、財政上的緊急援助。前文已經交代，至少在一年的時間裏，毛一直希望向中蘇邊境靠攏，提高紅軍的軍事及技術條件。春天，紅軍被困於陝北，士氣低迷。在革命信心遭遇危機的時刻，毛以其特有的辯證思維提出，黨固然應該相信自己，但為此拒絕來自朋友的幫助也是不對的。¹⁹⁷4月，當東征陷於膠着之時，他要求黨中央與蘇聯軍委聯絡，弄清楚對方「能否接濟步槍、步槍彈、輕重機關槍、高射機關

195 軍委參謀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8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04。

196 開小差的實際比例遠比黨所願意承認的高。長征中的生動例子，參見 Sun Shuyun, *The Long March*, pp. 67–69.

197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25。

槍、步兵炮、新式架橋設備、無線電器材等。」¹⁹⁸ 提到新式架橋設備，表明毛當時已經考慮沿河套西界跨過黃河，抵達中蘇或中蒙邊境。從甘肅的渡河點，紅軍要麼西進，經河西走廊抵達新疆；要麼向北抵達寧夏定遠營，他們希望能在那裏接收蘇聯援助。1927年馮玉祥和鄧小平從蘇聯回國時，曾經走過寧夏線。中共中央被迫離開瓦窯堡、進駐保安之時，就已經在着手設計具體計劃。

然而走西線對於紅軍的後勤保障和軍事能力都是巨大的挑戰。兩條路線都要經過貧瘠的沙漠和大片草地，沿線為數不多的城鎮無不守備堅固。即便有裝備較好的紅一軍加盟，陝北紅軍打攻城戰也力有不逮。6月，紅軍開向陝西西北角，他們希望拿下四省交界處的定邊和安邊。為此，能夠打透城牆的爆破火力是必不可少的，毛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向外面設法」解決——估計指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¹⁹⁹ 不過，比起前往外蒙邊界需要經過的那些城鎮，安邊和定邊只是兩座小城。西線計劃建立在與東北軍合作及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基礎上。不過，當這項計劃提交給莫斯科時，對方未表贊成態度。

6月，紅軍提交了最初的打通國際計劃。8月，在軍事委員會的那份長篇報告之外，紅軍又提交了一份更為詳盡的計劃，這回的求援清單裏又添上了飛機和重炮，以備沿途攻城之需。²⁰⁰ 自然，這些軍事計劃制定之時，中共和莫斯科正在分頭推行統一戰線計劃，兩者相互配合，同時又互相矛盾。莫斯科否定了西北國防政

198 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頁262。楊說這份於4月2日發出的電報出自《毛澤東年譜》，但此書對應的時間與頁碼上並無此條記錄。

199 毛澤東、周恩來致彭德懷電，1936年6月6日，《紅軍長征文獻》，頁944。

200 《毛澤東年譜》，1936年8月25日條，上冊，頁573。

府的計劃，因為這有悖於它所希望的廣泛的全國性抗日政府，這個政府最好也包括蔣介石。共產國際也拒絕了張學良這樣的軍閥入黨的請求，但鼓勵中共繼續與之合作。²⁰¹ 儘管莫斯科極力主張中共與蔣介石組成統一戰線，但它也知道，只要蔣介石仍堅持剿共政策，莫斯科就只能繼續向紅軍提供援助。中共直到9月才收到共產國際對軍事援助的批示。蘇聯提供的援助物資中沒有飛機和重炮，取道新疆的西進方案也被否決了。不過，蘇聯提出，如果紅軍能打通寧夏到定遠營的通道，他們將提供15,000到20,000支步槍，18門迫擊炮及配套的彈藥。²⁰² 這遠低於中共領導人的期望，不過當時他們還沒有跟蘇聯討價還價的實力。

中共立刻着手制定寧夏戰役的作戰計劃。不過眼下，中央還得處理毛的對手張國燾的問題，張的紅四方面軍將會極大擴充紅軍的戰鬥實力。1935年毛張分道揚鑣，毛北進，張南下入川西。到那一年的年底，張國燾已經意識到自己的選擇是錯誤的，他開始與毛的盟友朱德一道向北移動，途中與賀龍的紅二方面軍會合。當時，共產國際的代表林育英已經到了保安，他給張發了幾次電報，告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已經批准了打通蘇聯的方案。不過，張國燾對寧夏計劃心存疑慮。他一如既往地認為走西線取道新疆是打通蘇聯的更好選擇。至於理由，現在他正好可以援引林育英5月電報裏的說法：「國際盼望紅軍靠近外蒙、新疆。」²⁰³ 毛澤東短暫考慮過讓紅四方面軍往西走，他的紅一方面軍單獨打寧夏，不過他手下

201 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指示，1936年8月15日，見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 102–104; 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頁264。

202 卡岡諾維奇和莫洛托夫給斯大林的報告，1936年9月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251–252。

203 林育英致朱德等電，1936年5月25日，《紅軍長征文獻》，頁867–868。

的將領應該是說服了他，他們認為兩支部隊都無法獨立完成打通國際交通線的任務。²⁰⁴ 兩軍必須相互配合，具體方案是冬季進攻寧夏，等到黃河結冰的時候再渡河。

像中共和莫斯科一樣，當時蔣介石也採取打打談談的策略。1935年年底，他的代表已經與中共取得了聯繫，1936年9月，他們邀請周恩來到香港或廣州面談。10月，中共提議，蔣在視察西安期間與周會見。²⁰⁵ 與此同時，雙方繼續採取凌厲的軍事攻勢以求在談判中佔據有利地位。1936年6月，西南地方實力派反對蔣的對日調和政策，原本駐紮在甘南阻擋紅軍第二、第四方面軍北上的胡宗南部隊被調到西南。夏季西南事變結束，毛敦促紅二和紅四方面軍趁胡宗南尚未返甘，迅速北上，與紅一方面軍一道投入寧夏戰役。毛殷切盼望三軍勝利會師，甚至命令其部隊換上乾淨的軍裝，得體地歡迎兄弟部隊的到來。²⁰⁶ 然而，1934年年底通車的隴海線使蔣介石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調動軍隊。到了9月中旬，胡宗南的部隊已經回到西安，並着手準備沿西安—蘭州公路向西行進。²⁰⁷

毛急電張國燾和朱德，告知兩人寧夏是關鍵；中央已向蘇聯請求包括飛機和大炮在內的軍事援助，蘇方答應如果紅軍能抵達寧夏就提供這筆援助（他沒提莫斯科的批示中已經刪掉了飛機和大

204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年8月22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72。

205 毛澤東等致張國燾等電，1936年9月27日、1936年10月8日、1936年10月17日，《文獻和研究》，1985年，頁182–184、191。

206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69；經盛鴻：《胡宗南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頁73–98；林育英的電報，《紅軍長征文獻》，頁845–846、862–863、865–868。

207 經盛鴻：《胡宗南大傳》，頁97–98。關於隴海線，參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頁222–223。

炮)。²⁰⁸張國燾不相信，三天之後他表示他的部分兵力要留在甘南阻擊胡宗南的部隊，主力部隊將跨過黃河，從河西走廊打到新疆。10月，紅四方面軍25,000人渡過黃河，向西橫穿荒原。這是一個致命錯誤。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西路軍暴露於曠野之中，缺糧缺水，遭青海回民騎兵「馬家軍」的痛擊，其將領拋棄了前方部隊，潛回延安。1937年5月，西路軍幾百人的殘部抵達新疆，莫洛托夫卻不允許他們進入蘇聯。最終，407名倖存者獲允入境，到蘇聯接受軍事訓練。整整兩萬人，紅軍一半人馬，在西進行動中折損。²⁰⁹

1936年秋末短短一段時期內，毛曾試圖挽回寧夏戰場上的失利。寧夏的人口大多是回民，統治寧夏的是與中共勢不兩立的回族軍閥馬鴻逵。中共從夏季開始向寧夏的民眾發起宣傳攻勢，許諾將按照蘇聯的民族政策使回族和蒙古族取得民族自決權。²¹⁰ 這

208 毛澤東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9月1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92。

209 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頁267–275；Benjamin Yang, *Revolution to Politics*, pp. 228–236;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109–110n;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86–588。其中涉及的關鍵電報往來，見《紅軍長征文獻》，頁1109–118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72–618；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第1冊，頁358–369。基於口述材料所寫的激動人心的敘述，參見Sun Shuyun, *The Long March*, pp. 219–244.

210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49、582；李富春：〈陝甘寧蘇區的形勢與黨的任務〉，1936年7月20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30；王首道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408–412。Snow, *Red Star*, pp. 319–324以樂觀的筆調描述了中共如何致力於令「民族宿怨」「逐步蛻化為階級仇恨」（譯文從董樂山譯本，頁329–330。——譯者註）。關於毛對蒙古自治的承諾，劉曉原的敘述可資參考，不過對1936年大環境的分析不夠。Liu Xiaoyuan,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Press, 2006), pp. 94–99.

個地區也有大量哥老會弟兄，劉志丹在其早年的革命運動中曾利用他自己在哥老會的身份和人脈關係。現在，中央「為團結哥老會開了香堂」，以藉其滲透馬鴻逵的部隊。²¹¹ 沒有跡象顯示這兩項政策奏效，儘管毛讚揚了彭德懷部隊的「英勇犧牲的戰鬥」，這支部隊始終無法擊破馬鴻逵的防線。²¹² 不久之後，彭不得不抽調精銳部隊到南方接應正在向北行軍的紅二及紅四方面軍的餘部。然而此時，胡宗南已經奪取了黃河的渡口，把紅四方面軍困在甘肅，之後又命其部隊搶先佔據了定遠營。²¹³ 與此同時，蘇聯發現日軍已進入綏遠，定遠營已有日本間諜，此時再在此地向中共提供軍事援助太過冒險。這成為壓垮寧夏計劃的最後一根稻草。11月，寧夏計劃流產了，毛澤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接受莫斯科5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首批援助款15萬美元於12月間通過宋慶齡送到保安。²¹⁴

即便有第二方面軍和第四方面軍的加入，現在，蔣介石的對手規模已大大縮小，且困於荒瘠的陝北西北角。其全部兵力不足四萬人，很多人沒有武器。而且，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長

211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7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頁381；陝甘寧省委給慶陽縣委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23-224。

212 毛澤東致彭德懷等電，1936年7月27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560。斯諾曾被送到彭德懷所在的西部戰線，不過9月胡宗南大軍進駐甘肅，他又被帶回保安。Snow, *Red Star*, p. 365.

213 經盛鴻：《胡宗南大傳》，頁104。

214 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頁268-271。除了楊引用的檔案材料，亦見宋慶齡致王明電，1937年1月26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286-287；彭德懷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84-385；毛澤東致朱德等電，1936年11月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652-653；《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02-605。這一流產的寧夏計劃的軍事史，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冊，頁342-354。

征倖存者很多是年邁或者受傷的士兵、幹部，還有兒童。毛在一份報告中提到，光四方面軍就有640人是這類情況。²¹⁵ 與此同時，陝西的關中腹地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開發。1931年，從西安到陝西東部邊界的公路與從河南靈寶到陝西潼關的隴海線連到了一起，把去北平的旅程縮短到76小時。²¹⁶ 從「落後」的陝西到故都北京一路上花的時間，一度比從倫敦到北京還久，這樣的日子已成過去。到了1935年，鐵路已修到西安，蔣介石得以從南方快速調遣部隊赴陝。鐵路通車，公路跑卡車，商業得到快速發展。得益於新的灌溉工程以及商業機會的刺激，棉花成為關中的主要作物，被賣到沿海的紡織廠，再從華北平原購入糧食。自來水、電燈、新式旅館、平整的馬路讓西安的面目煥然一新，最早一批工廠也建立起來。西安和關中平原發展迅速，在戰爭時期成為西北經濟中心。²¹⁷

關中的迅速發展和陝北紅軍的劣勢，使得蔣介石在談判中採取了強硬的態度。陳立夫堅持，紅軍兵力削減到3,000人，軍官去

215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599。楊奎松估計，一方面軍的有效戰鬥力量是18,000人，四方面軍是12,000人，二方面軍是10,000人（《西安事變新探》，頁264）。這個估計可能太樂觀了。自從8月報告中說陝北所有正規軍加起來共有21,000名士兵之後，這支部隊已經打了好幾場惡仗；9月紅二方面軍在甘南彙報所部有13,300名士兵之後，這支部隊也傷亡慘重。賀龍致毛澤東電，1936年9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頁1164。國民黨對於1936年紅軍所吃敗仗的詳細記錄，可見中統：〈半年來陝甘寧及川康邊境赤匪之竄擾概況〉，1937年3月，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216 《北華捷報》，1931年4月14日。

217 Eduard B. Verme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Central Shaanxi since 1930*, pp. 28–55, 70–88; 《北華捷報》，1935年2月13日、1935年8月7日、1936年1月29日、1936年5月20日。

職，且與受處分的國民黨員一樣，必須出國。²¹⁸ 1936年的大部分時間裏，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加強了中共的力量，使得蔣介石處於守勢。現在情形扭轉了。胡宗南受命發起壓倒性的攻勢，欲一舉殲滅中共勢力。胡宗南自以為勝利在望，在隴東荒無人煙的群山間快速推進，那裏的村莊十室九空，河水鹹澀難以飲用。他的士兵在又饑又渴的狀態下在山城堡遭到彭德懷部的伏擊，損失慘重。胡的部隊只得退回重組，儘管紅軍也傷亡慘重，但至少暫時，毛的革命度過了一劫。²¹⁹

在西安得救

自從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匪副司令，他的命運就和中共革命的命運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毛在陝北打的第一仗就是跟張學良交手。中共在最初的戰役中俘獲的東北軍官兵在第一次停火協議的談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張學良的中立態度對於紅軍的東征至為關鍵，兩軍此後的談判催生了西北國防政府籌組方案和寧夏計劃。作為一個一貫忠於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將領，張學良與中共合作之深非同尋常。有關雙方合作的文獻檔案沒有甚麼爭議

218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07–608；關於此次談判的具體內容，參見《文獻和研究》1985年，頁179–199。

219 經盛鴻：《胡宗南大傳》，頁105–108；彭德懷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385–386；彭竹林的回憶，《西北革命根據地》，頁635–636；於憑遠、羅冷梅：《胡宗南上將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4），頁72–75。根據這份以胡宗南視角寫的報告，他的計劃被東北軍將領王以哲透露給了中共。這可能言過其實，不過王確實沒有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佔領山城堡以便胡部進軍鹽池。蔣介石致張學良電，1936年11月23日，轉引自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250。

性可言，但研究這段歷史的優秀歷史學家楊奎松令人信服地指出，張學良在台灣遭軟禁期間，官方的歷史學家出於保護其聲譽的目的，不厭其煩地封存了不少重要檔案。²²⁰

張學良並不是唯一一個響應中共統戰主張的國民黨將領，考慮到這一點，他與中共的合作就容易理解了。南方的軍閥，國民黨的高官，甚至蔣介石的妻姊和內弟也向莫斯科或保安派了聯絡人。尤其1935至1936年南京政府抗日派和親日派的分裂加劇，華南和西南不少人均有反蔣之意。在愛國熱情高漲的情況下，蘇聯被各方視作最有可能提供抗日軍援的勢力。張與中共的接洽，乃至他要求加入共產黨這件事，必須與如下訴求結合起來考慮：如果他不得不與南京政府切割，那勢必需要新的軍事支持。如上文所述，張學良知道蔣介石也在通過他的代表與蘇聯接洽。張沒有理由不同樣行事。最後，我們知道，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時，向中國提供實質性軍事援助的確實就是蘇聯。²²¹

然而，在1936年12月，紅軍的寧夏計劃已經告吹。在西北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以及打通蘇聯、受其武裝等方案已經泡湯。中共紅軍在規模和實力上都大為削弱，且集中於陝甘寧三省交界處的一個小小的根據地。毛澤東曾試圖最後一次激起蔣介石的愛國心，譴責他在日本人進逼熱河、綏遠之際卻將大部人馬用於剿共。²²²但這一呼籲沒有換來任何回應。蔣手下的將領胡宗南和湯恩伯分別在東西兩個方向施以箝制。往北是戈壁沙漠，且日本正經綏遠向西行進。唯一一個無戰事的前沿陣地是與東北軍接壤

220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4-6、11-14。

221 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52.

222 毛澤東致蔣介石電，1936年12月1日，《文獻和研究》1983年，頁16-18。

的南線。1936年12月6日，蔣介石飛抵西安，向張學良施壓：要麼全力剿共，要麼移駐他地。六天之後，張學良的士兵制服了蔣的衛隊，並俘虜了蔣介石本人。這一決定性的行動改變了陝北的歷史。在隨後數週的緊張談判中，蔣口頭同意停止內戰，在日軍步步緊逼之下，打開了全國聯合抗戰的大門。

很多人講過西安事變戲劇性的經過，此處不再贅述。這一事件無疑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²²³ 不過，它的發生，並不僅是陝北的種種事件所造成，而是全國局勢發展的結果。在陝北，革命岌岌可危，但從全國來看，蔣介石剿匪的軍事行動也處於危機之中。1936年，報紙連日的頭條是日軍入侵及前方將士在熱河、綏遠的英勇抵抗，²²⁴ 日本人鼓吹的華北自治運動招致中國人對分裂國家的激烈反對。隨後國民政府於11月22日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位領導人，引發全國範圍內更加猛烈的示威抗議。三天之後簽訂的《日德反共產國際協定》使得這一逮捕行為更顯得失策。²²⁵ 在輿論日趨激烈的情況下，蔣介石卻為了追剿共產黨親赴西安督戰，遇到剛剛遷來的東北大學的學生遊行請願也就毫不出奇了。蔣介石要求以武力彈壓愛國學生的示威遊行，促使反對派於12月12日對他實施了兵諫。²²⁶

223 陶涵認為，即便沒有西安事變，蔣也會接受統一戰線。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pp. 136–137. 我並不贊同這個看法。蔣的軍事部署清楚無誤地表明，他更傾向於軍事解決中共問題。

224 散見於1936年9月至12月的《大公報》。

225 Coble, *Facing Japan*, pp. 325–342.

226 James M. Bertram,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38) 出版年代很早，收入許多當事人的陳述；此外，Tien-wei Wu,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補充了很多回憶錄及口述訪談。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第298至320頁集中討論了事件本身。

陝北最初的反應是喜出望外。保安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毛澤東主張對蔣介石進行公審。²²⁷ 在其指揮部所在地，高崗在群眾大會上宣佈了西安事變的消息，與會者熱情高呼「槍斃蔣介石！」²²⁸ 中共向莫斯科提交了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由紅軍、張學良、閻錫山和其他地方實力派組成統一戰線，如果可能的話再拉宋子文等抗日力量入夥，由蘇聯提供必要的援助。²²⁹ 莫斯科嚇了一跳。共產國際懷疑中共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密謀，蘇聯的報紙將綁架蔣介石視為日本的陰謀。在斯大林時代的蘇俄，這些擔憂難免變成猜疑，認為托派也脫不了干係。²³⁰ 在斯大林與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和莫洛托夫磋商之後，發出了授意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電文，周恩來被派到西安參加談判。²³¹

西安的密謀者不僅抓了蔣介石，也綁架了國民黨的幾位重要將領以及陝西省主席邵力子。西安城完全掌握在兵諫者手中，城內結束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氣氛高漲。然而，就全國來

227 Snow, *Random Notes*, p. 1 引用了馬海德 (George Hatem) 寄來的一張明信片。馬海德和斯諾一起到保安，餘生一直與中共共事。

22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頁383。

229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1936年12月12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322–323。

230 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的指示，1937年1月19日、1937年1月28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271–272、278–280。對托派勢力的疑懼與莫斯科當時的拉狄克(Radek)審判密切相關。在中國，張慕陶被開除黨籍、在山西另組「新共產黨」後加入了楊虎城麾下，這是一個大問題。Snow, *Random Notes*, pp. 9–11. 張慕陶的情況詳見第四章。另一問題是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她通過西安的一個電台為這裏發生的政變做宣傳。在莫斯科的眼裏，她太過獨立，因而與托派無異。Bertram, *First Act*, pp. 154–178.

231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pp. 106–108;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321–335；Chang Kuo-t'ao,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2: p. 480.

看，卻是另一種氛圍。西安事變引發了全國對張學良及其西北軍盟友楊虎城「兵變」的聲討，蔣介石幾乎獲得了舉國一致的支持。然而，就如何營救最高統帥，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分裂。開始，爭論的主動權掌握在親日派的國防部長何應欽手中，他調動軍隊赴西安，準備攻打兵變部隊。南京政府的軍隊從東而來，忠實於蔣的胡宗南在甘肅扼守西線，張學良只好從隴東、陝北撤回自己的部隊，並要求共產黨南下接管東北軍的防區。當時，毛及中共的軍事將領陷於舉棋不定的電報磋商中，有人主張利用西安事變的機會再次推動寧夏計劃，毛澤東則一如既往地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方案：紅軍迅速穿過國民黨的防線，抵達河南，進逼南京——這再次體現了毛急於從陝北的窮山惡水中脫身的願望。為實現這一計劃，徐海東部被派去陝南做軍事部署，1934年他們路過此地時曾留下一小支游擊隊。不過，紅軍主力部隊只移到了三原縣，佔領了人口較為稠密的關中地區，這裏已能獲得給養和兵源。²³²這意味着蘇區面積大為擴展——相較於一個月之前中共所面臨的危如累卵的局勢，這是一個極大的改善。

12月20日，宋子文飛抵西安，很快他的姐姐蔣宋美齡也前來，國民黨的政治格局發生變化。他們代表南京政府中的「親英美」勢力，是何應欽等親日派的競爭者，後者對西安的軍事進攻反而置蔣介石於危險之中。宋接手了與張學良、周恩來的談判，最終獲得蔣介石關於結束內戰、改組政府、聯合抗日等一系列問題模糊的、原則性的口頭表態。楊虎城和西安的激進派軍官將信將疑，他們認

232 康永升：《徐海東大將畫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頁160–164；蘆振國、姜為民：《紅二十五軍長征紀實》，頁302；宋毅軍：〈中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軍事戰略防禦〉，《軍事歷史研究》，1992年第4期，頁15–25；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36年12月19日，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電，1936年12月25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686、688–689。

為如此模糊的口頭承諾不足為憑。但張學良堅持到此為止，他自己在1936年的聖誕節那天，陪同最高統帥及夫人飛離西安。²³³

虎口脫險的蔣介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聲望，他回到南京時一片歡騰。張學良是最大的輸家。他以為自己頂多和蔣以往的政敵一樣受些懲戒（比如被逐出核心權力圈，送回原部隊），沒想到，這回蔣以「對上官暴行脅迫」的罪名把他送上了法庭，他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此後直至國民黨敗走台灣，一直被軟禁家中。對張學良的審判和懲罰引發了西安城內的又一輪危機，東北軍中的激進派主張對南京採取報復，溫和派則主張平息衝突以換得南京的原諒，使張重獲自由。中共急於鞏固在陝北獲得的地盤並推進統一戰線，因而站在了溫和派一方。

12月西安事變爆發之時，東北軍撤出了延安，紅軍佔據了這座縣城，在此後的十年裏，延安成了中共政權的心臟。西安大戲的最後一幕發生在1937年2月，蔣試圖將陝西收歸南京的牢固掌控之下，遭到了東北軍將領的抵抗，他們要求蔣釋放他們的統帥。伴隨衝突的升級，激進派軍官暗殺了一年之前最早與中共擬定停戰協議的將領王以哲等人。西安兵諫者內部的分裂給了南京一個重新把持西安和關中地區的機會，許多激進派軍官逃亡，加入了共產黨。²³⁴

在陝北，革命進入了新階段。北邊的軍事威脅大大減少。西面的胡宗南與宋子文派親近，而宋是支持統一戰線的；原本把守東線的湯恩伯率主要兵力開赴綏遠抗日前線。南京的親信部隊佔

233 Song Ziwen (宋子文), "T.V. Soong Sian Diary," T. V. Soong papers, Box 59, folio 21, 胡佛檔案館；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339–393；周恩來致毛澤東電，1936年12月22日、12月25日、12月29日，見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261–263。

234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367–455；Tien-wei Wu, *The Sian Incident*, pp. 113–185; Bertram, *First Act*, pp. 159–236.

領了西安，楊虎城退守三原，成為陝北中共勢力與關中國民黨勢力之間的緩衝。²³⁵ 為獎勵中共在此次危機中的合作態度，大概也因未向甘肅的西路軍伸出援手而心存愧疚，莫斯科將給中共的財政援助增加到80萬元。²³⁶ 陝北革命當然並沒有徹底轉危為安，國民黨仍控制着絕大多數主要城鎮，地方民團對共產黨仍心存敵意，游擊隊從土豪手中搶糧支援革命的時候，武裝衝突也時有發生。²³⁷ 但西安事變打斷了蔣的剿共計劃，使中共重新與城市裏的愛國學生運動建立聯繫。很多學生發現，原來從西安步行就能抵達紅軍在三原的駐地。他們對紅軍的觀感與斯諾在保安的所見所聞沒甚麼不同。用一位外國記者的話說：「那是一個歡快的地方，充滿同志的情誼，人們在生活上不拘小節，紅軍戰士的平均年齡可能還不到二十歲；那裏有堅強的意志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傳統家庭中成長起來的中國人當中，這樣的精神氣質並不常見。」²³⁸ 也有人對當時的場景給出了更為灰暗的描述，在那裏看到「花言巧語和危言聳聽、怡然自得與陰險狡詐混雜在一起。」²³⁹ 讀者諸君可以想見，這樣一種朝氣蓬勃與堅定信念的結合，會在熱情洋溢的年輕人中產生怎樣的反響。但陝甘寧邊區要成為一塊安穩的根據地，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235 經盛鴻：《胡宗南大傳》，頁109–115。

236 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電，1937年3月2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283。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頁273提到另一筆80萬元的資助，總額高達200萬，但尚無法確知這筆錢究竟有沒有匯到。

237 李維漢關於關中工作的報告，1937年4月4日，《西北革命根據地》，頁212–215。

238 Bertram, *First Act*, p. 241.

239 《北華捷報》，1937年1月27日。

第六章

延安時代的開端

1937年1月初，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移駐延安。在此後的十年間，這座陝北小城成了中國另一種未來的象徵。毛澤東在此崛起，成為中共領袖。在這裏，他寫了一批後來被統稱為「毛澤東思想」的文章，有些文章生動、富於鼓動性，有些晦澀而有學究氣。在延安，中共發展出包括自力更生、整頓三風、群眾路線在內的完整工作方法，確定了中共革命未來的方向。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改造了這個地區，並最終改造了全中國。他們帶着愛國的熱情，在物質條件極為匱乏的情況下投身於創建新中國的事業，這在日後被冠以「延安精神」。今天，中外游客到延安參觀中共領導人的故居，在宏偉的革命博物館重溫延安的光輝往昔。但今時今日的延安遠非毛澤東在1937年進駐的那個只有3,000居民的灰塵撲撲的邊地小城。當年一位到訪者曾稱其為「一座古香古色、風景如畫的邊陲小城」，不過也有人說它是一座蒼蠅嗡嗡的骯髒小鎮。當地沒有樓房，只有挖在山坡上的窯洞；沒有機動車，土路上到處是牛馬的糞便，遇雨即成泥漿，幾乎無法通行；穿城而過的延河上只有一座搖搖欲墜的橋。¹

1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76；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頁85–86、104、108、232–233。楚雲：《陝行紀實》（漢口：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頁2。

紅軍到來的時候，當地商戶就像對任何一個會威脅到地方秩序的軍閥部隊一樣，立刻交出了口糧。地主大多逃走，中共領導人住進他們的宅子。²

延安是座小城，環繞着它的陝甘寧邊區也不大。西安事變發生之時，紅軍僅控制着保安（斯諾曾於1936年造訪那裏）以及與之相鄰的安塞（與保安一樣，也是人口稀少的窮縣），再就是寧夏的鹽池，逶迤在保安以北的長城腳下。此外，還有陝甘交界處的一些老游擊區以及賀龍部結束長征後落腳的隴東環縣。西安事變後，東北軍撤出防區，紅軍佔據了延安及與之相鄰的甘泉、延長。³ 這塊區域比最終成型的陝甘寧邊區要小得多，和西安事變之前一樣，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並不想偏安於地瘠民貧、人口稀少的中國西北角。經過一系列複雜的談判，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下，毛和中共才不得不在延安的窯洞裏安頓下來。

重啟西安停戰協議的談判

黨中央進駐延安後，陝西變化中的軍事形勢成為中共與蔣介石及南京政府談判的焦點。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和楊虎城將部隊從荒僻的陝北撤去拱衛西安，同時邀請紅軍南移。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受命跨過渭河，奔赴陝南，整合1934至1935年間紅二十五

2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301–303、310。

3 侯家國：《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79），頁38；顧祝同：〈「西安事變」憶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43；T. A. Bisson, *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3), p. 30. 此外，彭德懷領導下的紅軍支隊在西安以北的三原縣也拉起一支隊伍，不過不怎麼涉入政治，也沒有嘗試把蘇區擴展到富於戰略意義的關中地區。

軍路過此地時在四處安插的紅軍游擊隊。⁴毛澤東希望把紅軍主力也移駐到此，這裏比陝北富裕得多，向外擴張的選擇也更多。⁵然而，這樣就會把中共帶到漢水上游，那裏有水路可以通航，越往下游走，經濟越發達，直抵長江邊的大城市武漢。出身寒微的劉邦初封漢王時便定都於此，這裏也是李自成對明王朝發起最後一擊的地方。蔣介石當然熟知這些在陝南發家的英雄，他堅決反對中共移駐此地。⁶不過，蔣提出的替代方案中至少有一個也同樣不現實：他想把隴西的不毛之地劃給中共，張國燾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就是在那裏慘敗於馬步芳軍隊的。中共自然不同意把根據地落到這樣一個荒涼且遠離抗日前線的所在。⁷一些軍事將領主張重啟之前的計劃：趁冬季黃河結冰之時，取道寧夏抵達中蘇邊境。為了跳出延安，當時所有這些方案都被認真地考慮過，直至蔣介石承諾為整編過的紅軍提供軍費，也就是在此刻，第十五軍才放棄了那些進攻性的計劃，撤出陝南。⁸中共勉強接受以陝北為根據地，但仍設法讓部隊留在關中北沿，這裏相對富裕，籌措給養相對容易。以陝北為根據地的另一明顯的好處是為顛沛流離的西路軍殘部提供了很好的落腳之地。當初在甘肅跨過黃河，向西奔赴新疆的西路軍是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的精銳，幾乎佔了紅軍一半的兵力。1937年初，黨急於最大限度地恢復其核心建制和骨幹力量。⁹

4 康永升：《徐海東大將畫傳》，頁160–164。

5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40–644；毛澤東致周恩來等電，1937年1月7日；毛澤東致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1月8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冊，頁775–778。

6 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專家唐曉峰啟發我注意這些前朝舊事與陝南地理位置的關係。

7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45。

8 宋毅軍：〈中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軍事戰略防禦〉，頁22–25。

9 《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50–683。

在西安事變之前的幾個月裏，中共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培養與張學良所部東北軍、楊虎城所部西北軍的關係，以期在中國的西北部建立穩固的抗日同盟。在西安事變的整個談判過程中，中共一直以三方聯盟為目標。¹⁰ 蔣介石獲釋後，南京政府飭組高等軍法會審，裁定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罪成，上述設想全部破滅了。東北軍被調撥到河南和安徽。¹¹ 同時，蔣告訴楊虎城，他不能容忍一支不聽中央招呼的部隊駐紮在西北。蔣麾下的將領稱楊虎城是「粗魯武人」，是一個在地方上遭人痛恨的「封建集團」。到了4月，楊被革職並流放海外，他在陝西的勢力被瓦解。蔣介石派心腹駐紮西安，中共在西北再次孤立無援，不得不力圖自保。¹² 在軍事上，他們的處境比西安事變之前還要危險。

政治上也好不到哪裏去。1936年12月，為解決西安事變，宋子文和他的姐姐、蔣夫人宋美齡飛抵西安調停，在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奔走斡旋。對於中共，宋子文代表親英美派，是國民黨中最有希望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勢力。蔣介石堅拒「在脅迫下答應任何條件」，但宋向中共保證，委座已同意停止剿共，並改組南京政府，把親日派排除在外。儘管宋子文聲稱他參與調停並非出自任何私心，但他顯然希望通過營救蔣介石為自己在新政府贏得一個更顯要的職位。

10 周恩來的電報，1936年12月22日，引自孟廣涵主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261–263；中央關於釋放蔣介石的指示，1936年12月27日，《六大以來》，上冊，頁795。

11 秦孝儀等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1978），卷4，上冊，頁1049–1052、1069。

12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55–1059、1081；顧祝同：〈「西安事變」憶往〉及此後陳誠等人的報告，《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36–242、263–267。

蔣回南京時，歡迎的人群一片歡騰，宋子文從蔣介石那裏得到的任何妥協承諾都煙消雲散。據宋說，蔣曾向張學良和楊虎城允諾「雖然他們是叛亂行為，但他會原諒」。宋還說，蔣同意讓張學良留在西北，並且不派中央政府軍進駐陝甘。然而這些口頭承諾一樣也沒兌現。¹³顯然，宋的承諾超出了他的兌現能力。蔣介石對他在搭救自己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毫不領情。蔣本人與這位妻舅的關係一直鶯鶯扭扭，宋子文畢業於哈佛大學，是個英語流利、溫文爾雅的金融家，蔣在有需要的時候對他頗為器重，但也忌憚他鋒芒太露。¹⁴此後政府改組，蔣沒有為宋安排任何職位，直到1940年，他需要仰仗宋子文的翩翩風度和商界人脈為中國爭取盟國援助，才讓他重回權力圈。因宋出面調停，中共本以為西安事變能加強南京政府中抗日派的勢力，但事實上實力大增的是親日派。日後在南京組建親日傀儡政府的汪精衛於1937年1月結束流放、回到上海；被毛澤東視作「中國的弗朗哥」的親日派頭目何應欽不但留任，很快又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¹⁵在長江流域，蔣加緊了對中共游擊隊的清剿，這是沒有參加長征的紅軍殘

13 Song Ziwen (宋子文), "Sian Diary," 中譯從邵銘煌：〈宋子文西安事變日記〉，12月25日，《近代中國》（台灣），第157期，頁190。對「陝、甘不再派駐中央政府軍」的承諾見12月23日的日記。——譯者註。

14 Joseph W. Esherick, "Prologue: China and the World in 1943," in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tthew T. Combs, 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15), pp. 33–36.

15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265;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52；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pp. 82–84.

部，不久之後被編為新四軍。¹⁶3月初，蔣介石會見了日本大使，聲稱：「我國政府對共產黨之政策，並未有何變更。」¹⁷

西安會談時達成的協議全部瓦解，中共的盟友被趕出了西北。1937年年初的幾個月間，中共的處境一片黯淡。西安事變看起來並不像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然而，在水面之下，中共與國民黨的尖銳對立在悄無聲息地消融。在1937年2月國民黨的中央全會上，國民黨通過了「根絕赤禍」的政策。對中共來說這當然不是好消息，不過他們注意到蔣介石在講話中強調優先以政治方式而非軍事方式解決中共問題。¹⁸3月，為回應國民黨的政策調整，蘇聯答應送回自1920年代起在蘇聯學習、工作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他將於4月回到中國。¹⁹最重要的是，西安的磋商尚在進行時，針對中共根據地的軍事行動停止了，且蔣同意向改組後的紅軍提供軍費。²⁰

16 Gregor Benton,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432–433.

17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69–1070。

18 〈根絕赤禍決議〉，1937年2月21日；國民黨中央全會公告，1937年2月22日，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295–303。關於中共的反應，參見《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5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致中共中央電，1937年3月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頁15冊，頁284。

19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71、1079。一些歷史學家推測，蘇聯讓兩蔣父子團聚的承諾是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因素。Steve Tsang, “Chiang Kai-shek’s ‘secret deal’ at Xian and the start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2015.1, pp. 1–12.

20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顧是西安新的軍政首腦），1937年1月31日、2月8日、2月16日；顧祝同致蔣介石電，1937年2月13日，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61–264；《北華捷報》，1937年1月27日；據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頁429–430，國民政府給紅軍的經費將通過楊虎城部轉遞。

最初的談判焦點並不是後來的陝甘寧邊區——那從來不是中共領導的首要關切——而是紅軍的規模及其領導權。蔣介石認為他在紅軍規模上的讓步能令對手滿意。在西安事變前的談判中，蔣的代表陳立夫曾提出國民政府可以把3,000名紅軍士兵納入編制並提供軍費。1937年2月，蔣表示他可以把這個數字提高到5,000人，後來又提高到兩個師共計15,000人。3月增加到27,000人，7月又增加到45,000人。²¹ 與此類似，當談到後來的陝北邊區時，蔣介石告訴周恩來，他不想討論這塊地方包括幾個縣，他更在意這一地區政權的性質。²² 對蔣來說，問題從來不是紅軍的規模也不是其地盤的大小，而是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聽從國民政府的號令。

在諸多方面，西安事變並未撼動蔣的方針。蔣自信地認為，小小紅軍不足為患，其威脅還不如1936年春被迅速平息的西南實權派叛亂大。宋子文在西安曾擔保重組南京政府，蔣卻矢口否認做過這方面的承諾。他繼續使用「安內攘外」這樣容易引發爭議的口號。²³ 更重要的是，蔣強調他的政策不是「容共」而是「編共」，軍官需由中央任命，紅軍必須聽從國民政府的指揮。²⁴ 紅軍的待遇參照1927年

21 參見第五章，頁308–309。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37年2月16日，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64；《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61；周恩來致蔣介石電，1937年7月16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70–271。

22 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紀要，1939年6月10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4冊，頁219–220。

23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92；蔣介石演講，1937年2月18日，出處同前，頁1063–1065；《大公報》對蔣介石的採訪，出處同前，頁1062。

24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37年2月16日，及同日蔣介石日記，《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64–265。

北伐以來中央軍所收編的軍閥武裝。至於統一戰線，蔣心目中的模式是1922年的〈孫文越飛宣言〉，該宣言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共產國際承認共產主義尚不適合中國。²⁵ 這種模式很早便被中共斥為「右傾機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中共不大可能再走回頭路。最後，中共要求釋放政治犯，蔣表示如果犯人有悔改之意（這相當於背棄共產黨），他可以釋放他們。²⁶

蔣介石以自己的嫡系部隊包圍了陝西的紅軍，對中共來說，局勢已相當明朗：離開陝北到一個更理想的地方立足已不太可能。這時，陝北政權的地位就成為談判中的焦點。對此，蔣的態度同樣很明確：中共控制的蘇維埃必須重組為特別行政區，服從國家法律，由國家任命官員。在這一點上，他的立場毫不動搖，國民政府也從未給予獨立運作的邊區以正式承認。²⁷ 用蔣的話說，「為保持軍事與政治之統一，即不容自劃區域而形成割據獨立之形態。」²⁸ 這一立場的核心是堅信任何一個現代國家不能有兩個分立的政府。他一貫認為國家不統一是「封建」的表現，是一種新式的軍閥主義。²⁹

25 蔣介石致顧祝同電，1937年2月8日，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62。

26 蔣對中央社的談話，1937年2月21日，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59-260。

27 侯家國：《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頁31-37。

28 蔣介石致楊虎城函，1937年1月19日，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58。

29 把中共堅持獨立稱作「封建」，可能最早是陳誠提出的。參見陳誠致蔣介石的信，1937年2月15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63-264。蔣對這個說法的運用，參見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093。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他也用它來攻擊中共。參見Chiang Kai-shek, *China's 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trans. Philip Jaffe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p. 130.

從紙面上看，中共的立場並無變化。在致國民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中共號召停止內戰，保護言論自由，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共同救國，積極為抗日做準備，提高人民生活。如果國民黨能採納，中共將做出四大讓步：(1) 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武力活動；(2)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3) 在特區實行普選的民主制；(4)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³⁰ 從表面上看，第二條原則與國民黨的立場一致。

細節見真章，信然。從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開始，中共獲知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之後就把關注點放在了黨和軍隊的獨立性上。毛澤東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強調此次國共合作和1920年代國共合作之間的區別：黨現在有了自己的軍隊和革命根據地，絕不會輕言放棄。這一主張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全力支持。³¹ 在對新政策的解釋中，中共強調會繼續保障從前蘇維埃政權下的工農權益，以及黨對紅軍「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³² 在另一份文件中，中共領導保證不會「放棄工人農民已經獲得的政治權利」。³³ 中共似乎認為，既然蔣在把其他地方武裝編入國民革命軍時沒有改變其指揮

30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電，1937年2月10日，《六大以來》，上冊，頁798。中共在1937年2月15日將該政策解讀為「一個大的原則上的讓步」，《六大以來》，上冊，頁800。

31 季米特洛夫致王明電，1936年11月2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262。沈強、王新華：《抗戰時期蘇聯援華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158。

32 西安事變後中共的宣傳原則，1937年2月15日，《六大以來》，上冊，頁800。

33 〈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宣傳解釋大綱〉，1937年2月15日，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上冊，頁83–85。引文來自第85頁。

架構，應該也能循此舊例，容許紅軍的軍事、政治指揮官留任。但這不是蔣的意圖，即便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夜，他的態度也沒有改變。

1937年6月，周恩來飛抵蔣在廬山的夏都官邸，開始了又一輪談判。這次蔣介石提議重新啟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成立的政黨「同盟會」之名，把兩黨改組為「國民革命同盟會」。兩黨在這一機構中佔有同等數量的「幹部」，意見不統一時，蔣介石有最終決定權。他提出，這樣的制度設計是為了讓「同盟會」在未來合二為一，這也讓人回想起1920年代的模式。蔣同意紅軍保留45,000人的編制，但軍官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在這個問題上，蔣介石使出最毒的一招：改編後的紅軍沒有中共的政治指導，毛澤東和朱德需調任他職。³⁴ 可以預見，周恩來絕不會接受這樣的條件，毛澤東則在會見外國記者的時候，稱統一戰線的未來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³⁵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際，國共關係就處於這樣脆弱的狀態中。

抗戰前夜的陝甘寧邊區

在國共兩黨高層尚在進行曲折談判的時候，陝北已建立起看似平靜的雙重政權。1937年6月來訪的美國記者畢恩來寫道：「延

34 中共中央致共產國際電，1937年6月17日，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336–337；《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73–374。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得到的情報是毛、朱將去國外。中統：〈各邊區赤匪流竄概況〉，1937年9月，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35 周恩來致蔣介石電，1937年7月16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70；T.A. Bisson, *Yenan in June 1937*, p. 57.

安以及中國其他地方似乎處於某種政治上的停頓狀態。」³⁶ 很多縣仍有國民黨的縣官留任，傳統的保甲制度也絲毫沒變。³⁷ 在延安及其以東以南的三個縣的縣城裏，國共雙方都派了縣長。³⁸ 舊的行政機構幾乎存留於邊區全境。為了爭取民心，國民政府向居民下發救濟糧，其代表稱除了中共控制下的保安，政府對各縣都實施了救濟。³⁹ 處於競爭關係的國共軍隊有一些友好的互動。5月，南京派出的視察團在陝北受到了熱烈的歡迎。⁴⁰ 牆上刷着支持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標語。此時，中共控制相對穩固的核心區域仍十分有限。西安事變爆發時，中共手上只有保安周邊的幾個縣。賀龍部結束長征後佔據了隴東幾片人口稀少的地區。東北軍在西安事變期間撤出陝北，中共進佔了延安和鄰近的甘泉縣、延長縣的大部。⁴¹ 比起邊區最終據有的23個縣，這時的地盤要小得多，西北方無定河畔的幾個富裕縣份一個都未收入囊中（參看下圖6.1）。

在建立新「特區」的過程中，中共的首要關切是安全。在陝甘老蘇區時期，中共維護安全的方式是「剿匪」。1936年夏天剿匪開始了，一年後中共領導人認定蘇區有43股土匪，匪眾2,608人，據

36 Bisson, *Yenan in June 1937*, p. 24.

37 侯家國：《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頁35；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92.

38 高崗1943年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延安的三個鄰縣是甘泉、延川和延長。

39 《大公報》（上海），1937年1月1日。

40 何紹南：〈陝北視察報告書〉，1937年4月10日，國史館檔案，002-080104-00001-004；Bisson, *Yenan in 1937*, p. 46.

41 侯家國：《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頁38；顧祝同：〈「西安事變」憶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43；Bisson, *Yenan in 1937*, p. 30. 三原縣也有彭德懷領導的紅軍支隊（參考本章註釋3）。

稱，他們剿滅了其中的31股及2,147名土匪。⁴²兩年之後，蘇區仍有超過40股，匪眾約4,000人，其中很多人是季節性的土匪，他們在大半時間裏是安分守己的農民。中共宣稱在1938年共剿滅26股，或殺或俘約1,500名土匪。⁴³顯然，革命並沒有消除陝北地方性的土匪問題。同樣明顯的是，中共延續了此前政權把政治對手定性為「土匪」的做法。用「延安五老」之一、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話說：

在新的局面之下被革命所推翻的豪紳地主回家來了，反革命組織在民主制度下，更多機會活動了，這些反動勢力的企圖復活與武裝的破壞是不會停止的，因此肅清土匪是進行轉變各種工作中之主要的一環。⁴⁴

過去劉志丹經常用他的個人關係、尤其是他在哥老會中的身份來贏得當地民團的支持，但新的領導人對當地土豪遠沒有這麼客氣。事實上，原先的「共匪」現在開始清除「民團土匪」了。

保安的張廷芝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張廷芝在離劉志丹老家不遠的洛河流域一個村莊裏統領着一支民團。張家在洛河上游擁有兩大塊肥沃平坦的川地，靠着地產和殷實的家底，豢養門客兩百之眾。這份家業是廷芝的高祖創下的，他從甘肅流浪而來，精通賭博和其他半犯罪性的營生。據說，他的老婆就是收賭債時討來的，之後他又在鄰縣的衙門裏混了一個衙役的差事，這份微不足道的官差為他掙足了在保安買地的錢。他的兒孫都通過了清朝的武

42 毛澤東朱德致各兵團首長及地方機關電，1937年7月7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69-270。

43 肖勁光：〈關於剿匪問題〉，1938年11月18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74-275。

44 林伯渠：〈由蘇維埃到民主共和制度〉，1937年5月31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96。

舉考試，在貧窮的邊地，沒法通過儒家教育取得文科功名，武舉自然是當地後生獲得社會地位的常見途徑。張家毫無疑問是保安的望族，劉志丹家與之聯姻也並不出奇。劉志丹本人也曾短暫加入張廷芝的民團，並希望將之改造成一個革命隊伍，不過這個努力失敗了。1935年，張成為革命的頑敵，在當地軍閥部隊中謀取了一個職位。到了1937年，他已經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土豪」，提出了一個既反對共產黨也反對統一戰線的口號：「打倒紅軍，打倒白軍，黑軍萬歲。」最終，他被趕出保安，但在北方的國民黨統治區活了下來，帶領一小支反共武裝分子在陝北的幾個縣搶掠，1937年甚至在瓦窯堡挑起了短暫的兵變。他後來投靠國民黨部隊，一直到1950年才被以「反革命」的罪名鎮壓。⁴⁵

在與原已存在的國民黨機關共治的地方，黨對於地方精英的政策要溫和、靈活得多。政權組織以救國為根本原則，廣泛地團結友軍，團結同情中共的民團、婦女、青年群體。中共黨員帶頭反對苛捐雜稅，鼓勵富人為抗戰出錢，只把最頑固的分子視作賣國賊。儘管黨員可以公開參加愛國的政治和宣傳活動，但黨組織仍非常隱蔽，在遴選新黨員的時候也相當謹慎和嚴格。⁴⁶ 西安事變前

45 《新中華報》社論，1937年6月24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73-274；陝甘寧黨委關於剿匪的指示，1937年，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出版地不詳，1994），頁112-113。受訪人20。Xu You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 "Heroes, Martyrs, and Villains," pp. 265-268 討論了張廷芝，不過他們使用的回憶性材料似乎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敘事的影響較大。這個精英家族在陝甘交界處發家的過程，與雲南邊境的情況非常相似。Chow Yung-teh,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tus Careers Among the Gentry in a Chinese Community*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6).

46 中共中央1936年12月20日及1937年春天的指示，《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59-166。

後，黨員數量迅速增加，到1937年5月已有32,418人。⁴⁷ 黨員成分也發生了變化。1939年的一項系統調查顯示，71%的黨員是1935至1936年入黨，上文已交代過，1936年東征失敗後黨組織處於收縮狀態，也就意味着，其中的大部分黨員都是在1935年劉志丹領導下的陝北根據地急速擴張中入黨的普通農民，僅有10%上過小學，41%不識字。⁴⁸ 到了1937年，黨希望招攬紀律性更強、文化水平更高的幹部，因此叫停了大規模入黨，新黨員需「個別吸收」，且不能僅從現黨員的親朋中招收。⁴⁹ 最後這一項顯示出以往當地黨組織在發展黨員時主要是利用社會和私人關係。

伴隨着學生抗日情緒的增長，中共越來越注意吸收年輕人參加革命。甚至在西安事變之前，共產主義青年團已發展成一個主張「民主自由」的「非黨的青年組織」。在國統區，中共要求共青團取消自己的獨立組織，團員參加各種合法的愛國組織。在蘇區，青年團被要求改造為以文化、教育、體育、軍事為重心、「教育訓練青年」的「聯合組織」，並繼續進行馬列主義教育。⁵⁰ 赤衛軍變成抗日自衛軍，無疑有大批年輕人響應這一號召，自衛軍一類的組織招收了數目可觀的成員。⁵¹ 到訪延安的客人總會注意到那些十幾歲

47 《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0。

48 組織報告，1939年10月27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326、330。亦可參見第四章（頁220–221）關於1935年黨員發展的敘述。

49 蘇區代表會議組織報告提綱，1937年5月17日，李富春關於黨的工作的報告，1939年11月，《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冊，頁491–492、498–499。

50 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議，1936年11月1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41–143。

51 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關於改造赤衛軍的決定，1937年8月25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75–177；國民黨中統報告，1939年4月10日，BOI 256.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的士兵，或者「小鬼」的獨立和勇敢。熱情的作家陳學昭稱延安是「青年的搖籃」。⁵² 國民黨人則指責中共利用跳舞、戲劇表演等誤導「未滿十五六歲」的「無知」兒童，這剛好印證了中共正在贏得年輕人的心。⁵³

國共之間最常見的衝突在於稅收。陝北是貧苦之地，1936年收成不好，穀價騰貴，很多人沒有足夠的口糧。⁵⁴ 不過，依靠節儉高效的地方行政機構和國民政府每月為紅軍提供的30萬到50萬軍費，⁵⁵ 中共政權得以取消大部分的舊稅種，只保留了可觀的鹽稅。中共徵收的是累進稅，相當於強迫富人捐獻。⁵⁶ 然而，在實行國共雙重統治的地方，國民黨的行政機關也要收稅以維持運轉，地方性的兩黨「磨擦」往往因誰有權收稅的爭持而起。⁵⁷

在爭取地方支持和國家層面的合法性方面，中共的一大法寶是其「民主」訴求。在21世紀的今天，很難想像共產黨政權會奉行民主。一黨專政，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這與任何一種民主

52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97–107;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頁45–47、267–272，引文見第269頁。

53 陝北二十三縣請願書，1939年2月2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76。

54 何紹南：〈陝北視察報告書〉，1937年4月10日，國史館檔案，002-080104-00001-004。

55 當時，1美元約等於3.3元中國法幣(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xvi–xvii)，因此，國民政府每月提供的軍費相當於9萬到15萬美元。

56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1939年1月，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第1冊，頁141；Bisson, *Yenan*, pp. 32, 44; 陝甘寧邊區政府佈告（第一號），1937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18–27。

57 毛澤東朱德致高雙成電，1937年7月2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70–271。

的定義都不相符。然而在1937年，中共發起廣泛的宣傳運動，推行村級、縣級及邊區參議會的民主選舉。西安事變後，共產國際號召中共將蘇維埃轉變成「人民革命政府」。⁵⁸ 民主政治被標舉為邊區政府的「神聖的民族使命」，其目標是把「落後的、愚昧的」邊區變成全國的模範。⁵⁹ 中共援引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關於一省自治的理論，將之視為實現全國憲政的重要步驟。1937年春天，在與外國記者的談話中，中共領導人經常以這些民主選舉為例，向客人介紹邊區政權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之間的區別。⁶⁰

選舉在秋天舉行，首先是鄉級選舉，當選代表再通過間接選舉選出區代表、縣代表乃至最後的邊區參議會代表。各級議會推選出鄉、區、縣行政官員。⁶¹ 雖然這一切顯得極為民主，但黨的目標也相當明確：「徹底地實施民主共和制度並保證在這個實施之中我們黨的領導作用。」⁶² 相關規定只把賣國賊排斥在選舉之外，但對這個詞的解釋就非常寬泛了。如黨所闡明的，「不使一個壞人混

58 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1937年1月20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冊，頁274。

59 李富春關於黨的工作的報告，1937年11月，《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冊，頁492-493；邊區參議會的聲明，1939年2月3日，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第1冊，頁21-22。

60 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1939年7月7日，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831；《毛澤東年譜》，上冊，頁675；Bisson, *Yenan*, p. 45;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208-217. 尼姆·韋爾斯（埃德加·斯諾當時的太太海倫·福斯特·斯諾〔Helen Foster Snow〕的筆名）持左傾立場，懷疑用新的民主形式代替蘇維埃有何意義。

61 陝甘寧邊區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1937年5月12日；選舉規定，1937年5月31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89-190、194。

62 蘇區代表會議組織報告提綱，1937年5月17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冊，頁486。

入紅榜」至為重要，黨責成地方黨政組織利用整理選舉名冊剔除「可疑的分子」。⁶³參選各方也沒有自由和公平可言。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強調「在農村中一定要把政權掌握在黨的手中」。⁶⁴中共控制着選舉過程，候選人名單是由基層黨組織擬定的。鄉級選舉先在模範區做試點，如果感覺到選舉結果可能會不理想，選舉就會被推遲，結果是否理想很容易就能看出來，因為這一級選舉的投票方式通常僅為簡單的舉手表決。⁶⁵在更高層級、更重要的選舉中，黨的主導地位更加突出。在延長縣，黨自豪地宣稱中共提名的縣長候選人全票當選，「因為全體議員都是黨員的結果」。⁶⁶但不管怎麼說，過去在選任官員上沒有任何發言權的普通農民現在可以參加選舉了，這畢竟是一種進步。國民黨的支持者在反對中共新政權時表達的主張值得注意，他們強調：「即使邊區人民真屬擁護中共」，獨立的中共政權與建立一個統一現代化國家的理念也是衝突的。⁶⁷

然而，這恰恰就是選舉的目的。選舉可以幫助新政權贏得民心，但遠比這重要的作用在於保障邊區相對於南京的獨立性。蔣介石仍堅持邊區的領導人應由國民政府指定，7月，他提名親英美

63 陝甘寧特區黨委關於選舉的指示，1937年7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18-24；房成祥、黃兆安：《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63。

64 林伯渠1942年10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

65 陝甘寧特區黨委關於選舉的指示，1937年7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18-24；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215.

66 陝甘寧特區黨委關於選舉工作的報告，1937年12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103。

67 陝北二十三縣請願書，1939年2月2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88。

派的宋子文等國民黨要員出任邊區長官，以為中共會接受。⁶⁸ 中共以邊區正在進行參議會代表選舉為由，拒絕了蔣介石的建議，並聲稱由國民政府任命官員有違民主共和國的信念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⁶⁹ 由此可見，邊區選舉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建立民主政體，不如說是為建立一個自立於南京政府之外的政權提供理據。

不過，1937年春天的一次選舉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生態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5月，中共選舉出新一屆陝甘寧黨委，成員既包括當地黨員也包括林伯渠這樣的外來者，他不久將當選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像中共的任何一次選舉一樣，此次選舉的候選人是事先指定的，擬定名單的人是時任中組部副部長、1935年肅反的關鍵人物郭洪濤；遭到肅反的幾個人，包括高崗，沒有出現在候選名單上。然而在這次選舉中，地方幹部以強悍的姿態實行了一次黨內民主：在所有候選人中，高崗得了最高的83票，比林伯渠本人還多一票。若非中央出面干預，郭洪濤這位曾將高崗下獄的大員險些不能當選。4月，他就被打發去領導山東黨組織的活動了。⁷⁰ 直到這時，中共高層內還沒有陝北代言人。沒有跡象顯示高崗以陝北的代表自居，他在當地的聲望也肯定沒法與不久前犧牲的劉志丹相比。然而，高崗無疑是陝北人，他在上述選舉中從當地黨員

68 周恩來致蔣介石電，1937年7月16日，回應了蔣的提議，《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1冊，頁270–271。

69 陝甘寧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與國民黨關係的報告，1938年5月，《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90–294。

70 陝甘寧黨委選舉結果，1937年5月16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3；黃羅斌1942年11月，朱子休1942年11月5日，高崗1942年11月17至18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關於郭洪濤問題的小組討論決議，1944年11月13日，於1945年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提交；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頁80–81。

中獲得的強勁支持，反映了他們對於肅反以及隨後陝北幹部受到的排擠一直心有不滿。此次選舉後，高崗很快就掌握了實權，升任邊區保安司令、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後出任西北地區最重要的職務——西北局書記。1953年他遭到黨內清洗，隨後自殺，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畫上句點，但至少在當時，他是位於延安權力核心的一個陝北人。

戰爭和統一戰線

1937年7月7日，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在北京以南的盧溝橋附近發生衝突，迅速升級為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抗日戰爭就此打響，第一階段的戰爭逐漸發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並無跡象表明此次衝突將會擴大，蔣介石的幾位軍事顧問曾設法尋求地方性的解決方案。中共立即號召國民政府採取有力的軍事對策，到7月底，蔣介石也下定決心：已絕無可能對日本再做退讓，戰爭不可避免。⁷¹不過，他仍不打算接受中共關於統一戰線的各項條件。

戰爭一爆發，周恩來飛到上海，之後在「美廬」與蔣介石會面。與上次一樣，周蔣會談沒有達成共識，焦點問題仍是紅軍整編後的指揮權和邊區的領導權。周恩來發現，蔣提出的條件比戰爭爆發前的6月更差。8月，雙方似乎達成了一個初步方案，但又

71 Yang Tianshi (楊天石),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attles of Shanghai and Nanjing” (〈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 Mark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43–145; 中共中央的公開信，1937年7月8日，《六大以來》，上冊，頁843。

被蔣的一位反共顧問改得面目全非，令中共無法接受。⁷² 7月，蔣一度建議由相對進步的國民黨人士如宋子文或于右任（1920年代陝西共產黨的一位左翼同盟）出任邊區公署主任；現在他提名被毛澤東稱為「過去反共首領」的丁惟汾。⁷³ 顯然，戰爭的爆發並未消除國共雙方關於統一戰線具體條件的分歧。

1937年8月，兩起相隔甚遠的事件打破了僵局，並再次顯示陝北不能獨立決定自己的命運。8月13日，上海局勢持續升溫，演變成日軍和蔣的嫡系部隊之間的一場大戰，戰爭迅速蔓延到中國的經濟中心以及國民政府的心臟地帶。至此，與日本的全面戰爭已避無可避。⁷⁴ 與此同時，蔣介石的代表在急切地尋求國外的援助；對日本的敵意早有戒備的蘇聯成了最有可能的援助國。8月29日，中蘇之間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與此同時，蘇聯開始安排軍事援助，頭一批援助物資於11月抵華。在抗日戰爭最初的幾年中，蘇聯是國民政府唯一的軍事援助國，總共提供了超過1.73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用來交換中國的原材料和農產品。這些對中國至關重要的軍援包括924架飛機、82門坦克、1,516輛卡車、1,140門炮、9,720挺機槍、50,000支來福槍以及配套的彈藥。⁷⁵ 與之對比，蘇聯向中共

72 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兼談所謂「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方針的真實性問題〉，《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頁10。

73 《周恩來年譜》，上冊，頁380；毛澤東致葉劍英電，1937年8月30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84。

74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Philadelphia: Casemate, 2013).

75 沈強、王新華：《抗戰時期蘇聯援華史論》，頁51–87；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頁1152。較早的論述參見John W. Garver,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pp. 15–52.

提供了80萬美元的經濟援助，實際到賬15萬美元，沒有軍援。⁷⁶ 眼下中日之間勢必有一場全面戰爭，國民政府又得到了蘇聯的庇護和支持，蔣也就甘心接受中共關於統一戰線的各項主張。

在7月與蔣介石的談判中，周恩來就中共在2月提出的四項原則做了修正。新版本開頭便提出奉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就等於說中共認可國民黨的指導思想；中共還將「民主共和國」這一共產國際提出的字眼改為「民權政治」——這是孫中山的主張。與此前一樣，中共承諾紅軍將聽從國民政府調遣，但最為關鍵的軍事指揮權和政治領導權問題依然沒有解決。⁷⁷ 8月，國民政府最終同意由中共的軍事將領朱德和彭德懷統領整編後的紅軍，雙方的協議確定了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紅軍將被改編為中央政府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在西安等大城市建立負責聯絡及募兵的辦事處。作為國民革命軍的一支，八路軍每月可獲得50萬元軍費；此外，陝甘寧邊區每月可有10萬元撥款。⁷⁸ 9月23日，中央通訊社發佈了中共起草的〈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於次日發表談話，讚揚中共的改弦更張之舉，媒體為國共兩黨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下再次合作而歡呼。⁷⁹ 但事實上，國民政府從未正式批准這一協議，也從未就其中的模糊條款的具體含義達成一致。因此，國民政府一直堅稱它從未認可陝甘寧邊區的合法地位。不過，現在總算有一份官方文件宣告陝甘寧邊區成立。接下來的問題是：邊區的四至怎樣劃分？⁸⁰

76 參見第五章註釋236。

77 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宣言，1937年7月15日，《六大以來》，上冊，頁844–845。

78 James P.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pp. 278–279;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 pp. 90–99.

79 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398–411。

80 侯家國：《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頁3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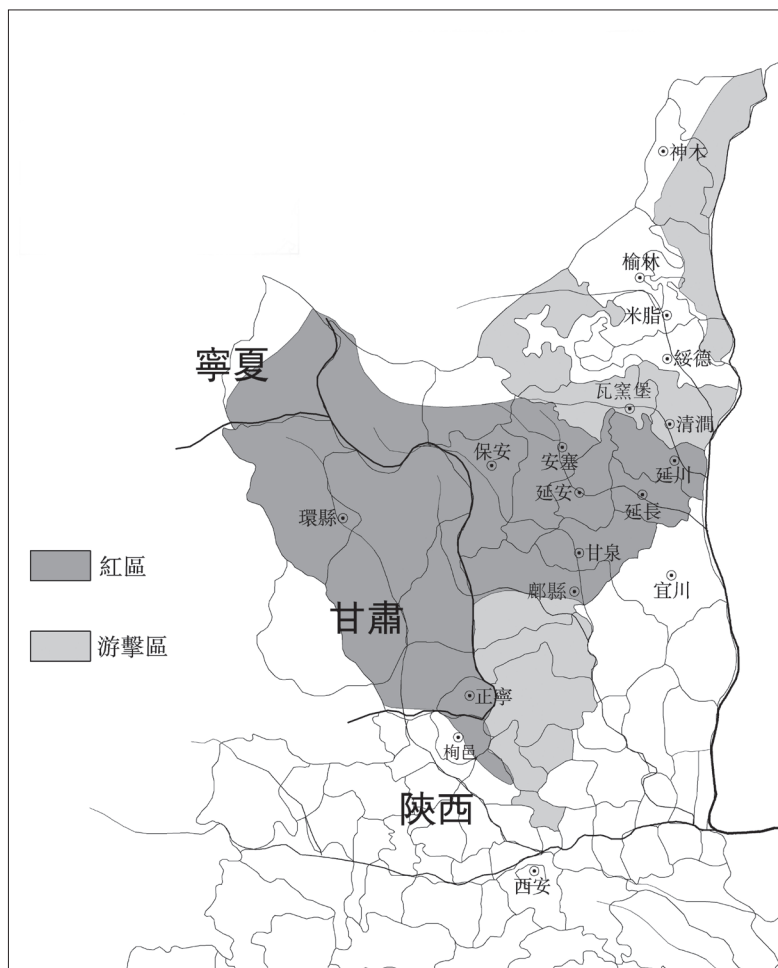


圖 6.1 1938 年 6 月的陝甘寧邊區。據〈邊區調查專報〉，1938 年 6 月 8 日（國民黨中統調查局檔案，270.15/810）等資料繪製。

劃定邊區的邊界

統一戰線的實施方案公佈後，各方都認為中共領導的「特區」應當存在，但圍繞其規模和範圍卻有很大爭議。中央政府將延安周邊六縣劃為核心區，部署在黃河西岸的中央軍赴山西參戰之時，

陝西省政府主席又在核心區周圍劃了一塊地方歸八路軍募兵。⁸¹當時一份國民黨的情報相當準確地給出了陝甘寧邊區事實上的範圍：延安附近有6個「赤化」縣，以之為核心，在其北方和南方有5個「半赤化」縣，此外還有13個「部分赤化」縣，隴東還有4個縣有中共的組織。

圖6.1中有兩塊區域是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才佔據的。賀龍所率二方面軍結束從湘西出發的長征、與紅軍大部隊在西北會合，主力仍留在隴東；西安事變期間，張學良的東北軍撤出防區，紅軍成為當地的主要部隊。⁸²在1937年年末，這些地方劃為八路軍的徵兵區。中共控制此區是一個從上到下的過程。正如隴東書記所說：「紅軍是先創造了蘇區後才建立黨組織的。」⁸³中共的政治影響力逐步擴大，到了1937年秋天，隴東五縣（環縣、河水、慶陽、正寧、

81 關於國民政府和陝西省為八路軍劃定的地盤包括哪幾個縣，不同材料的說法略有出入。王建民認為延安、保安、安塞、延長、延川、甘泉是核心區域，定邊、靖邊、安定、葭縣、清澗、甘泉、鄜縣、柁邑、鹽池是八路軍可以招兵的地方。王建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香港：中文圖書供應社，1974–1975），第3冊，頁256–257。何紹南認為核心區域也包括靖邊、定邊、安定（〈陝北視察報告書〉）。毛澤東稱，南京答應給中共20個縣，除了上述王建民所列各縣，還包括陝西的淳化、米脂、綏德，甘肅的慶陽、合水、正寧、寧縣和環縣。毛澤東肖勁光通命，1937年10月17日、1937年11月3日、1937年11月25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87–289；陝甘寧省委關於招兵工作的指示，《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152。

82 國民參政會視察團視察報告，1940年4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105；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頁6。

83 馬文瑞關於隴東問題的報告，1942年4月13日，張君勱等編：《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頁118。

寧縣)已徹底處於中共的控制之下，國民黨任命的縣長根本不能到職。⁸⁴另一塊區域是渭北。西安事變後，中共部隊進駐，這才將勢力擴展至此。東北軍撤退時，要求紅軍派兵南下支援，彭德懷帶領一支部隊進駐三原縣。上文已提到，黨一直想在富裕且具戰略意義的關中區域找到一塊根據地，但其軍事實力還遠遠不夠。現在這塊位於關中北沿的地盤成了邊區的南方前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這裏既是部隊開往前線的集結地點，也是傷兵的休整之地。⁸⁵它為八路軍在西安新建的辦事處提供了一條可靠的交通鏈條，在這塊相對富庶的區域，富裕地主的「捐助」成了中共部隊一項重要的給養來源。⁸⁶

中日戰爭給國共軍事關係帶來了戲劇性的改變。中共一貫主張積極抗日，統一戰線初建之時，中共的軍事指揮官熱切地希望在戰爭中展示己方的殺敵決心。毛澤東則謹慎得多，他有理有據地指出，八路軍的裝備差，不宜在華北平原與日本人硬碰硬，應該限於在山區開展游擊戰。1937年9月，在山西平型關對日本輜重部隊的成功伏擊大長了中國人的士氣，也是國共兩黨為數不多的一次密切協作。當時，國共雙方的部隊均對統一戰線報以真誠的熱情。⁸⁷但是後來雙方的關係漸漸地緊張起來。在中共與閻錫山配合無

84 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致蔣介石電，1937年11月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68–69。

85 國民參政會視察團視察報告，1940年4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105、109–111；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62–63.

86 楊尚昆的發言，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87。

87 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頁10–20。平型關大捷發生於統一戰線宣言發表僅三天之後。

間，把活動範圍擴大到山西之時，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卻在淞滬會戰中大敗，首都南京被棄守，軍事失利繼之以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接下來武漢保衛戰失敗，這個華中戰略重鎮也被迫棄守。到1938年年底，日本已佔領了沿海及長江中下游的全部城市，這是中國現代工業、金融和基礎設施的集中之地。蔣介石撤退到了位於內陸不發達省份的戰時陪都重慶。⁸⁸此時，局勢已逐漸明朗：抗日戰爭將曠日持久且代價高昂。蔣介石及其國民黨內的支持者也意識到，在國軍接連敗退之時，中共卻在北方積蓄着力量，已經到了再次聚焦中共這一潛在威脅的時候。

1939年春天，國民黨發佈了「防制異黨」的新政策，之後又進一步把「共黨問題」明確列為「處置」目標。前者提出，強有力的組織使得中共得以對邊區實施徹底控制，它要求國民黨「以組織對付組織」；後者強調中央政府「絕對否認共黨所謂『陝甘寧邊區』之組織」。⁸⁹這些政策與陝北二十三縣匿名代表的請願遙相呼應，請願者反對中共的稅收政策，認為中共「破壞教育」，「誘惑學生」，在很多方面違反了「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立國之本。⁹⁰顯然，在當時的情勢下，中共雖然已承諾其「特區」受中央政府的直接領導，在一些縣份與國民黨的縣長共治，但現在陝甘寧儼然已經成為國中之國。中共領導人阻止一切在政治、軍事、經濟、文

88 Lloyd E. Eastman,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47-565.

89 〈防制異黨活動辦法〉，1939年4月；〈共黨問題處置辦法〉，1939年6月（該文件的三個版本之間略有不同），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冊，頁644-670。引文見頁644-645、651。

90 陝北二十三縣請願書，1939年2月2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72-89。

化上挑戰新政權宗旨的企圖——此類表現被歸為漢奸和托派的陰謀。⁹¹ 在國民黨一方，情報部門抱怨中共嚴控陝甘寧地區的行人出入，再加上其內部嚴密的道路檢查系統，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根本派不進去。⁹² 現在蔣介石下定決心：凡是沒有明確劃給共產黨的地區，國民政府都要拿回來，並隨即下令派駐有能力的縣長，去加強地方保甲的徵稅和治安力量。⁹³

與此同時，中共也調整了自己的統一戰線政策。1930年代初中共上海中央局年輕的領導人、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於1937年11月底從莫斯科回國。因常駐莫斯科也能代表共產國際，王明到延安後曾短暫挑戰毛的領導地位。1938年，王明成為國共統一戰線政策在黨內最重要的支持者，並被派到武漢指導長江流域的工作。武漢陷落後，王明的政治根基和推行統一戰線政策的大半理據都沒了。與此同時，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來共產國際主張由更富經驗的毛澤東擔任中共領導人的消息。在11月的中央全會上，毛澤東公開批評王明提出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口號，重新強調黨應維護自身的獨立地位。⁹⁴ 到1939年，毛澤東重新掌權，國共

91 陝甘寧邊區政府決議，1938年6月9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72-73。

92 戴笠給蔣介石的報告，1938年8月24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70-71。

93 蔣介石對1939年2月7日朱紹良電的批示，《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354-355；蔣介石致蔣鼎文、朱紹良電，1940年3月5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102。

94 郭德宏：《王明年譜》，頁346-439；Thomas Kampen,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0), pp. 88-98, 此書第88頁有一張相當傳神的照片，即1937年「十二月會議」合影，那時候王明剛回國，志得意滿地坐在與會者正中央，而毛澤東則站在最邊上。

兩黨都開始觸碰統一戰線的底線。在鄰省山西乃至全國，雙方關係日趨緊張，衝突不斷爆發，八路軍的指揮員指責國民黨「槍口對內進攻邊區」，毛澤東向國統區的報紙發出警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⁹⁵

這些措辭無不體現了事實上久已存在的矛盾。抗日戰爭促使國共結成統一戰線，但兩黨均無政治容忍方面的經驗，要實現共存不那麼容易。在陝甘寧邊區的南部邊界，中共以統一戰線團體救國會為掩護，發展自己的組織。國民黨從其據點宜川發起反擊，宜川縣長被派到江西接受反共訓練。國民黨試圖向附近的延長和延川安插自己的縣長，但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共產黨發動了猛烈的反抗，最終以有組織的暴動把國民黨縣長驅除出境。中共指控國民黨任命教育督察，干涉邊區教育，把一些共產黨的叛徒派來當間諜。⁹⁶ 伴隨雙方矛盾不斷升級，邊區政府命令各縣的縣長掌握主動權，尋找機會製造「磨擦」。文件是這樣說的：

從今以後，一旦你方與「友黨」政府之間有任何事端，你方需儘快通知本辦公室，並提交一份正式報告。你方需在合理範圍內，儘量誇大爭端，甚至可以製造一些事實。另外，你們需準備一份對真實情況的說明，與報告一起上交。這樣，我們就可以一面把你們的正式報告遞交給友黨政府，一

95 朱德等，1939年12月25日，《六大以來》，上冊，頁1078-1079，其中列舉了發生「磨擦」的邊區23個縣；毛澤東與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選集》，第2冊，頁580。英譯見：Schram, *Mao's Road to Power*, 7: p. 204. 施拉姆指出毛澤東的立場是基於儒家思想中的「禮尚往來」，但這一段在官方中文版裏被刪去了。

96 陝西省檔案館中有對此類衝突的大量記載。尤其是趙建國的報告，1938年9月20日，SA 2-1-274-11；〔1938年〕12月16日，SA 2-1-274-17。

面了解真實的情況。如若不然，對方將一直製造事端，而我方則疲於尋找證據，在輿論的交鋒中敗下陣來。⁹⁷

有一份縣級報告收入了一大批事件的真實情況，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大多數爭端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其中不少（總計18起）發生在安定。此地共產黨控制的「赤色」村與「白」村之間的革命鬥爭由來已久。安定的西南部山區、革命烈士謝子長老家棗樹坪一帶是中共控制區，相對富裕和平坦的東北部是國民黨控制區。安定大鎮、新縣城所在的瓦窯堡位於兩黨勢力範圍的交界處，是矛盾集中爆發的地方（參見圖6.2）。瓦窯堡有抗大的分校，有幾次「磨擦」起因於強佔民居用於學生宿舍。雙方都想在對方的地盤裏發展自己的組織，於是糾紛、控告和逮捕在所難免。一般來講，雙方派出的人員一旦遭到逮捕，就會被扣上土匪、哥老會或者漢奸的帽子。雙方爭奪着抗日愛國組織的領導權，有些賓客雲集的宴會演變成他們互相指責與謾罵的場合。有時中共對國民黨的宣傳發起猛烈回擊，不過有些「宣傳」是事實——比如說中共領導人在西安事變後曾主張處決蔣介石，但被蘇聯阻止了。中共充分意識到信息的力量，決心在自己的地盤內牢牢地掌控輿論。⁹⁸

97 譚生彬的報告，〔1939年〕5月11日，SA 2-1-293-3。不用說，這份文件很難不讓歷史學家對邊區政府報告的真實性存疑。同樣來源的這批文獻已無法查對，引文均係據英文譯出並經作者確認，下同。——譯者註。

98 陝甘寧邊區周圍磨擦事件調查材料，1939年4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468-485。儘管文件的落款是1939年4月，但內文卻有跡象顯示其編纂時間不會早於1939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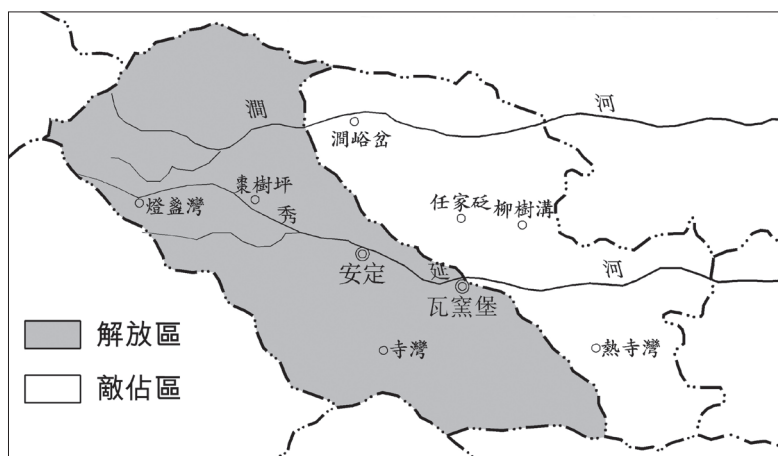


圖6.2 安定縣國共各自的管轄區(1937–1940)。縣城瓦窯堡位於圖中央的分界點上。據子長縣任家砭秀延縣蘇維埃政府革命舊址紀念館所藏圖片繪製。

雙方真真假假的指控和反駁你來我往，「磨擦」不斷加劇，最終於1939年初升級為真刀真槍的武裝衝突。枸邑是邊區最南端的一個縣，緊靠西安，是邊區最富裕的縣份，也是重要糧倉。國民黨對於這樣一塊地方落在共產黨手裏始終耿耿於懷。之前的一份耕地調查顯示，全邊區87%的水澆地集中在枸邑一縣。⁹⁹ 此地 in 陝甘兩省的交界處，離以前陝北黨建立的照金老根據地不遠（參見第三章），但地方黨組織的力量已不像過去那麼強大。中共在當地僅設一所幹部培訓學校的分校，和一個八路軍傷兵借駐休養之地，不過後者在1938年底就搬到別的鎮子上去了，據稱是為了躲避日軍轟炸。當地的國民黨政權對於轄區內嵌進這樣一塊共產黨的地盤以及由此帶來的負擔非常不滿，雙方小規模的衝突不斷。1939年

99 〈土地行政〉（約1940），《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2冊，頁9。共產黨佔據的地區被更名為新正縣，「87%」指的是新正縣的情況。

春天，國民黨聲稱調駐而來的很多人並不是傷兵，而是受訓士兵。很快，一位八路軍戰士神秘死亡，雙方都指控對方為元兇，由此釀成真刀真槍的衝突。中共組織了示威抗議，逮捕了國民黨的保安人員，佔領了縣城。國民黨則以武力回應：驅除轄區內的中共黨員，造成對方傷亡107人，己方傷亡16人。中共部隊撤退到照金老據點附近的一塊人口稀疏的新根據地，這樣一來，邊區向南擴到枸邑及鄰縣淳化的地盤即告喪失。¹⁰⁰

另一起衝突發生在鄜縣，其縣城正好落在國共勢力分界處，雙方對該縣都是寸土必爭。1935年毛澤東率部在陝北打的第一個大仗——直羅鎮戰役，就發生在小小的鄜縣縣城西面的丘陵地帶。那次勝利對於保護此地以北的中共蘇維埃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有一條大路穿縣城而過，可以通達延安乃至更北邊的榆林國民黨據點。在統一戰線的語境下，國共雙方都希望保持這條交通動脈的暢通。1938年，鄜縣既有國民黨部隊也有中共部隊，兩黨有一度在官方的抗敵後援會中合作。在兩黨勢力範圍的交界處，中共的策略是利用公開的抗日組織吸引愛國青年加入己方組織，並削弱地方精英主導的稅收和保甲組織。以此為出發點，中共的重要幹部進入這類組織，並

100 對於此次衝突最詳細、最令人信服的陳述來自國民黨的調查報告，1939年5月25日，華統：《陝甘寧邊區全貌》，頁251–253；另一份類似的概況報告，見國民參政會視察團視察報告，1940年4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109–112。相比而言，中共的報告就不那麼具體了，參見習仲勛1940年4月15日及1940年6月18日的報告，《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317–318、323–324；《新中華報》，1939年2月25日，孟廣涵：《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上卷，頁717–719；房成祥、黃兆安：《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150。上述地方的領導是習仲勛，他因為失地而遭到了批評。高崗等致習仲勛等電，1940年5月18日，1940年6月5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40–1941）》，頁106–107、121。

漸漸取得了主控權。在農村，中共派出幹部挑戰着地方保甲在稅收上的權威。地方精英無疑曾利用保甲組織斂權、自肥，但邊區政府也曾因同樣的事由批評自己任命的地方幹部，並提醒他們在批評國民黨時態度盡量緩和，「以少寫信為好，派代表交涉為強」。¹⁰¹ 在地方控制權的爭奪中，「磨擦」愈發暴力，漸漸發展成武裝佔領，雙方互有傷亡，互相逮捕對方人員並迫其認罪。最終在1940年初，八路軍佔領了鄜縣，逮捕了縣長並將其帶到延安審判。國民黨一方擔心這一事端將會阻斷通往榆林的公路，主動求和，只要求贖回縣長（為此繳納「罰款」七千元），事實上把鄜縣的控制權讓給了中共。¹⁰²

中共在鄜縣已活動了很長時間，很明顯，他們在當地的根基是取得這次勝利的原因之一。隴東的情況有所不同，結果也大相逕庭。除了與陝西交界的地段，隴東的中共政權基本上是由外來者從上到下建立的，所謂外來者主要是經歷長征來到此地的南方人。他們首先建立縣政府，之後是區政府，最後建立鄉級組織。因起主導作用的是不了解當地情況的外來幹部，招收新人的時候往往泥沙俱入，很多地痞流氓和投機分子借機混入黨組織。在毛指示可將當地頗有勢力的哥老會視為可以「爭取」的對象後，大批弟兄加入黨組織。¹⁰³

101 林伯渠、高自立致習仲勛函，1940年5月9日，林伯渠、高自立致羅成德電，1940年6月1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315–317、318–320。

102 王建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3冊，頁258–260；羅成德的報告，1940年5月20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321–322。

103 馬文瑞關於隴東黨的工作的報告，1942年2月14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118–119。毛關於哥老會問題的指示，參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宣言》，1936年7月15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53–155，英譯本見 Schram, *Mao's Road*, 5, pp. 245–247.

統一戰線一建立，中共又將目光對準地方上的軍官和學生，實踐證明，兩者都不是可靠的盟友。¹⁰⁴

中共在這一地區遇到的最大問題是當地人極端保守。這一時期的黨內報告經常寫到當地的男人仍留着辮子，幾乎所有女人都綁小腳。¹⁰⁵ 當地人絕大多數是文盲，因此黨沒可能依靠學校的教師和學生發展地方黨組織。中共開始推廣教育之後，一個縣報告當地僅有400名學生，其中女學生更是只有寥寥4人。¹⁰⁶ 回亂和自然災害導致當地人口減少，地廣人稀，中共的土改政策沒甚麼吸引力。讓當地深受其害的是政府的無度徵收，這對中共開展工作很不利。黨政機構要發展，大部隊也需要給養，黨的幹部難免要向當地人民提出不小的索求。軍隊必然跟地方幹部一條心，自肥和貪污也就成為一個問題。抗日戰爭需要不斷補充兵員，為完成上級指定的徵兵指標，地方幹部的強迫行為就在所難免。¹⁰⁷ 當上級要求開荒自給的時候，地方幹部便以「動員」或出借糧食等方式，迫使群眾為公家種田。¹⁰⁸

104 陝甘寧省委給隴東的指示，1939年1月14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70–71。

105 馬文瑞關於隴東黨的工作的報告，1942年2月13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118；寧縣工作報告，1939年5月21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276；Edgar Snow, *Random Notes*, p. 110, 引用了他在訪問甘肅期間的1936年8月5日寫下的旅行日記。

106 環縣政府工作報告，1939年1月31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174。

107 環縣報告，1938年11月5日，張軍洋等編：《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政權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頁28–32；寧縣工作報告，1939年2月28日，以及邊區政府的批覆，1939年3月1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185–193。

108 陝甘寧邊區政府給關中的指令，1939年6月8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273–274。

來自一位黨內高層的報告嚴厲地譴責了地方上的武裝同志，說他們穿着制服、騎着高頭大馬、在軍隊的護駕之下執行任務，頤指氣使的派頭活像一支佔領軍：

隴東工作就不僅不接近民眾，而且與民眾對立；不僅不了解情形，而且有民眾聚而謀我還不知道；強迫命令、拉人罰款、貪污腐化現象隨處發現；「佈置工作一般化，且隨即打折扣，到人民中，不論工作重輕、工作大小，一二句話，就向群眾要東西」；「只聽一面之詞來處理問題，致有含冤不得已而當土匪」；「個別下層政權機關握在壞分子手裏，對窮人鎮壓」；「方式是硬要，徵糧給你攤四斗，你如推諉，就變八斗，不出不行；擴兵，逢人問：『你情願打日本嗎？』你說情願，就要你當兵，不當不行。」¹⁰⁹

1939年國民黨做出處置「共黨問題」的決議後，隴東的小規模「磨擦」迅速增加。因國民黨在甘肅維持着一套民政機構，兩黨之間的衝突常表現為國民黨的民政部門和八路軍之間爭奪糧草。¹¹⁰ 蔣介石堅信軍事麻煩就得軍事解決，於是往該地區調撥裝甲車和大炮。¹¹¹ 1939至1940年的那個冬天，國民黨部隊在沿涇河連接西安和寧夏的大路集結，很快就攻佔了正寧、寧縣、鎮原縣的縣城。哥老會站在國民黨一邊，中共的部隊和基層政權撤退到人煙稀少的

109 謝覺哉關於隴東黨組織，1940年5月18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83。值得注意的是，已公開出版的《謝覺哉日記》中，沒有1940年的內容。

110 中統：〈中統在甘肅之組織與活動〉，〔1940年〕7月，BOI 279.16.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111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10），第43冊，頁9。

北部山區。¹¹² 大批商業機構、甚至大批從其他地方投奔中共的愛國學生都撤到了國統區。¹¹³ 這些「磨擦」的結果是中共在隴東損失了其治下一半以上的人口。¹¹⁴

最大的打擊於1940年春發生在環縣。環縣位於邊區西北角，縣內大片土壤鹽鹼化嚴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12.7人，不及涇河流域縣份的四分之一。與邊區其他地方一樣，這裏的地方黨組織和國民黨的基層政權爭奪稅收權，也都得與當地土豪打交道。比如趙老五，他家在環縣西部有一塊地盤。中共一開始想與趙合作，後又將他及其民團定性為「土匪」，這很可能是因為趙相當成功地把農民對中共稅收政策的不滿轉化成對中共政權的不滿。¹¹⁵ 在1940年的衝突中，國民黨當局把這位地方上的土豪籠絡到自己一方。¹¹⁶ 趙

112 程潛致蔣介石電，1939年12月21日，賀耀組、戴笠致蔣介石電，1941年1月1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359-360、363；耿飆、賀晉年的回憶，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185-186；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151；袁文偉：《反叛與復仇》，頁144-145。

113 慶陽報告，1940年3月10日；王維舟致林伯渠電，1940年3月30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政權建設》，頁77、79。

114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1941年4月，《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1冊，頁11-14；國民黨區的人口數字見甘肅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甘肅省志人口志編纂委員會編：《甘肅省志·人口志》（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1），頁198。

115 毛澤東等致劉景範等電，1936年7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致馬錫武電，1940年1月30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68-269、275-276。「趙老五」是他的諱名，真名說法不一，如趙思忠、趙恕忠等。

116 朱紹良致蔣介石電，1940年4月2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3冊，頁433-434。

加入推翻中共環縣政權的陣營之後，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據一份可靠的報告說，趙老五的隊伍中有290名共產黨員，80%的地方幹部叛變。¹¹⁷然而那年8月，趙待在他的環縣老巢，遠離了涇河流域的國民黨主力部隊。共產黨的部隊端了他的窩。¹¹⁸不過，他們不得不承認，在環縣「老百姓對我們造反。」¹¹⁹此後不久，包括大批長征老兵在內的1,280名前共產黨員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聲明加入國民黨，隴東革命政權的脆弱由此可見一斑。¹²⁰

諸如此類的事件使得共產黨在邊區南部和西部的勢力大受損失。據這一地區的八路軍指揮官的回憶，他們損失了5座縣城和43個鄉。¹²¹一份關於邊區規模的1944年的總結報告給出了更大、更精確的數字：在兩黨「磨擦」的過程中，邊區6個縣、村鎮幾千處，總計30,64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50萬人口（大約是邊區面積及人口

117 謝覺哉關於隴東黨組織，1940年5月18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80–81；參看邊區黨委對隴東工作的指示，1940年4月1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40–1941）》，頁47–48。

118 高崗致毛澤東電，1940年8月5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40–1941）》，頁152–153；參看林伯渠、高自立致羅成德電，1940年6月1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319；陝甘寧省委關於隴東問題，1940年4月1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76–77。

119 陝甘寧省委給隴東黨委的指示，1940年5月8日，《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頁78–79。

120 鹽池報告，1939年11月24日到1940年3月12日，BOI 270.544/824，斯坦福圖書館抄件；1,280名中共變節分子的公開信發表於1940年12月，見《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379–380。

121 耿飆、賀晉年的回憶，《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頁188。

的四分之一)落入了國民黨手中。¹²²不過，國民黨收穫的地盤大多在邊區西邊的甘肅省，而中共鞏固了更具戰略意義的東部。

自晚清以來，無定河一帶一直是陝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這一地區相對的繁榮程度從每平方公里47人的人口密度就可以略見一二，這個數字比邊區其他地方(每平方公里11人)的四倍還要多。¹²³此地是陝北唯一一個有士紳階層的地方，相當一批人有功名。民國初的十年間，當地軍閥井岳秀駐紮在榆林。1930年代中期中共革命運動蓬勃開展之際，國民黨部隊以綏德為指揮部和大本營，對其發起攻擊。這裏有陝北最好的學校，學生總數等於1940年前老邊區學生的一半。陝北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就出自井岳秀所創辦的榆林中學和綏德師範。榆林和綏德之間的米脂縣有強大的士紳階層，他們有地、有功名、熱心教育，到民國時期，當地還建起了地方上最好的女校。¹²⁴1920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中共在這一帶很活躍，但到國民黨和地方士紳重掌權力的1930年代，共產黨的勢力大部分已被清除。八路軍在此立足是抗戰爆發之後、中央軍開赴山西抗日前線的時候，黃河邊上的五個縣——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被指定為八路軍的警備區。¹²⁵

儘管這一地區由八路軍部隊駐守，並可以從當地徵兵，民政管理權卻掌握在國民黨手中。最關鍵的官員是駐綏德的行政督察專員

122 〈陝甘寧幅員的說明〉(1944)，《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1冊，頁10，以及第11–14頁的表格。

123 根據西北局的數字計算，〈邊區財政經濟情況簡述〉，1948年2月19日，《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1冊，頁15。

124 王震、劉靜波的報告，〔1940年〕5月9日，SA2-I-164-1。關於這一地區亦可參見Joseph W. Esherick,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24.4 (1988): pp. 339–377.

125 國民參政會視察團視察報告，1940年4月，《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115。

何紹南。他此前在陝北從事救濟工作，曾為當地積極謀求中央政府的救濟款。在他看來，向地方上提供救濟是對抗中共土改政策最有效的辦法。¹²⁶ 他也控制起了教育系統，分派教師「在陝北二十三縣巡迴施教」——此舉被中共視為間諜活動。何還重啟了保甲體制，使其發揮治安功能。¹²⁷ 當他發現中共派員到駐防區發展組織，就馬上籲請中央政府提供軍事援助。¹²⁸ 無疑，何紹南是中共的一個勁敵。學校師生被組織起來，加入國民黨的反共團體；共產黨的叛徒被招募到「特種工作團」，指認、出賣從前的同志；地方保安官員破壞中共的稅收工作；地主被鼓動收回1935至1936年被沒收的土地；商人和富農受其指使，拒向八路軍賣糧。這些都表明，在何紹南治下，陝北國民黨成功地抵制了中共在地方上的滲透。地主豪紳的抵抗是中共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國民黨能夠動員學生和青年參加它的反共事業，卻令中共尤為不安。¹²⁹

在1939年底，這一切都改變了。日軍攻佔了太原，威脅到晉省的八路軍，王震的359旅以保衛黃河為名撤回陝西，佔據了綏德。開始有2,700人，後來增加到5,000人，最後八路軍18,000人渡河進入陝西。¹³⁰ 這樣一來，中共可謂失之桑榆收之東隅，他們

126 何紹南，陝北報告，1937年4月10日，國史館，002-080104-0001-114。

127 邊區政府關於巡迴教師問題給陝西省政府的公函，1938年7月5日；邊區政府給安定縣政府的訓令，1939年5月2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74-77、261-262。

128 何紹南致蔣介石電，1938年5月23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69。何的報告由康澤轉呈蔣介石，這說明何是通過國民黨的情報系統做彙報。

129 陝甘寧邊區周圍磨擦事件調查材料，1939年4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524-539；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142。

130 中統：〈陝甘寧邊區中共軍事概況調查〉，未注明時間，約1940年，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在邊區西部貧瘠、偏遠的甘肅丟了地盤，卻在黃河沿岸獲得了富裕得多的地區。事實上，1939年初邊區政府就曾向國民政府提出過類似的交換方案，理由是甘肅各縣太偏遠，邊區政府鞭長莫及。¹³¹現在，因王震部後撤，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大增，對於王部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擅自撤退的行為，國民政府除了抗議也沒有別的辦法；同時何紹南組織學生示威，抨擊八路軍大部隊給地方財政帶來負擔。¹³²共產黨幹部和國民黨的保甲機構之間發生了一系列衝突，互相指責不守規矩，之後，八路軍要求國民政府調離何紹南。一位由何紹南開具通行證的官員因走私鴉片的罪名被抓，何隨即被控貪腐並遭革職。在卸任之時，他縱火燒了軍火庫。很快何紹南的繼任者也被趕跑，這一地區就此處於中共的牢牢掌控之中。¹³³

在這個過程中，王震扮演了微妙的雙重角色。他看出地方士紳中有一些進步分子對中共政權有好感。日軍在黃河對岸的大舉進犯引起普遍關切，而八路軍是地方上唯一的抵抗力量。1938至1939年的冬天，日軍轟炸了延安，此舉既造成了相當的破壞，不出意料也激起了地方民眾的愛國決心。¹³⁴何紹南的積極反共政策

131 邊區政府給國民政府行政院의 簽呈，1939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166。

132 何應欽—葉劍英談話紀要，1940年1月4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4冊，頁222—223；陝甘寧省委關於統一戰線問題，1939年12月，《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302。

133 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158；何紹南的公開電報，1940年1月13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361—362；陝北各縣民眾代表泣訴，《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368—369。

134 延安縣政府報告，1939年11月4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428—429。

並沒有獲得一致支持，用一位中共領導人的話說：「我們利用士紳階層中的反對派掃除他的腐敗黨羽。」因為需要有能力官員籌集資金、運作新政權，王震新組建的基層政府中留任了上屆政府中一些進步、甚至是「中立」的人士。並不是所有的基層黨員都為此高興：那些貧窮、沒有經驗、沒念過書的地方積極分子擔心前政府機構中的這些精英分子「太能幹」，「工農幹部和舊官僚、舊知識分子無法共事。兩者之間的裂痕很大。」在農村地區，出於稅收和安保的考慮，中共確保對機關領導的控制，重新任命了80%的區聯保主任，其中三分之二是黨員。另一方面，90%的基層保長仍由舊人擔任，他們大多是地主或富農。¹³⁵

到了1940年夏天，陝甘寧邊區已基本定型了。7月，周恩來在重慶會見了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就經年「磨擦」中形成的邊區四至，雙方達成了基本共識。對於北部和西部邊界，雙方做了一點微小的調整，但中共根據地的大致規模現在確定下來了。¹³⁶ 與此前的情形一樣，蔣介石從未正式批准這一協議，國民政府也沒有通過必要的立法，但雙方確實達成了協議。¹³⁷ 國民政府承認邊區既有現實，在其西邊和南邊建立了嚴密的封鎖。在蔣介石愛將胡宗南的指揮下，建成了一道包括六層防禦壕溝和碉堡、寬30公里到50公里的封鎖線，把中共牢牢地控制在他們的西北避難之地（邊區的界限及國民黨封鎖線參見圖6.3）。¹³⁸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國際上開始批評蔣介石將本該抗日的重兵用於封鎖中

135 劉景範工作報告，1940年5月9日，SA 2-1-164-2。

136 何應欽致蔣介石電，1940年7月16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4冊，頁227-228。

137 王建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3冊，頁257、261-263。

138 毛澤東：〈國民黨向陝甘寧邊區進攻的近況〉（1941），《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330-333。這篇文獻並未收入施拉姆所輯毛澤東選集。

共。¹³⁹但在1940年，關注點已轉到了別處。至那年夏天，長江流域的中共新四軍不斷發展壯大，一場危機正在醞釀。1941年1月，雙方的矛盾以事變的形式爆發出來，在皖南事變中，國民黨大舉圍殲，新四軍全軍覆沒，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隨即遇害。¹⁴⁰隨着國共矛盾轉移到其他戰場，陝甘寧邊區的形態穩定了下來——但在封鎖線之內，新政權的性質又是怎樣的呢？

新政權

1941年的時候，陝甘寧邊區的面積約為13萬平方公里，人口135萬。¹⁴¹當時中國約有四億人口，陝甘寧佔0.3%。陝北的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10人，而全國平均數字是39.5人，此地之貧窮可見一斑。¹⁴²儘管人少、地盤小、以及人所共知的貧窮，這個地區的情況卻沒法一概而論，要了解陝甘寧邊區，其內部的社會、經濟多樣性與其「落後」的聲名同樣重要，不僅地區和地區不一樣，不同時期的情況也會迅速變化。就邊區的社會、政治變遷這一主題，曾有過許多精彩的研究，1941年之後的多方面變化不在本書

139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136–144;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150–151.

140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pp. 511–616.

141 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608–611；王建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3冊，頁225。房成祥、黃兆安關於陝甘寧人口的估計（50萬）並不準確。正文引用的數字來自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1941年4月，《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第1冊，頁11–14。

142 房成祥、黃兆安估算的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6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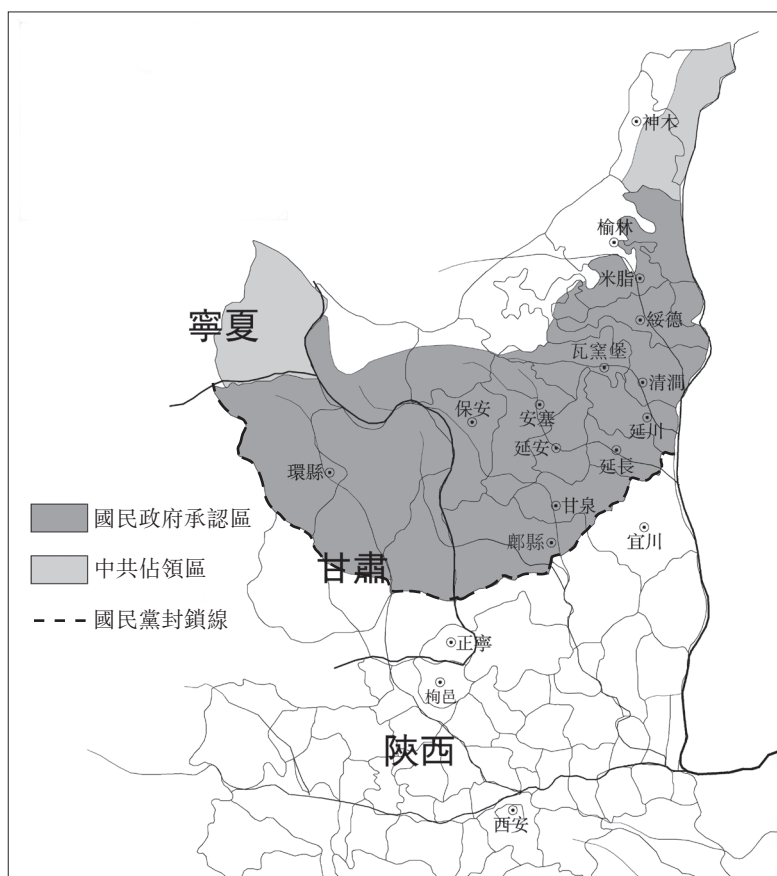


圖6.3 1940年7月的陝甘寧邊區。據何應欽1940年7月16日給蔣介石的函呈繪製。資料來源：《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4冊，頁227–228。

探討的範圍。¹⁴³ 本書的重點是陝甘寧邊區的創生，因此有必要在全書臨近結尾的時候簡要勾勒這一最終成型的新政權。

143 英文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Pauline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Apter and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必須強調的是，相對於陝甘寧邊區來說，延安是另一個世界。儘管不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學術研究的角度，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延安都備受關注，但延安並不是陝北。在1937年中共中央移駐此地之前，延安只是一個邊陲小鎮，比起東邊的榆林、綏德都相形見绌。在抗戰年代，榆林一直在國民黨手裏，何紹南被王震趕跑之前，綏德是他的公署所在地。延安因為不怎麼受關注才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它幾乎是一塊白板，任由中共在其上勾劃新國家的輪廓。此前，在陝北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黨在延安的活動並不活躍。抗戰期間，延安的人口至少增長了十倍，所增加的主要是中共幹部、官員、士兵，以及成千上萬奔赴延安、到抗大或其他學校求學的學生。¹⁴⁴絕大多數是外來者，許多是受過教育的年輕人，與當地人之間有明顯的距離。用尼姆·韋爾斯的話說：「陝北農民被認為是中國最落後的人群。」¹⁴⁵她的丈夫斯諾曾問過中共宣傳幹部吳亮平，得到的印象是「他對於陝西的革命前景幾近絕望，（認為）當地群眾的基礎太差，幾乎無法開展工作。」¹⁴⁶大多數湧向延安的年輕人都會在那裏就讀於某一所學校。抗大是最有名的一所，不過最初它只是面向紅軍士兵的為期六個月的短訓班，1938年之後才開始接納更多軍隊之外的年輕人。而幾乎所有在抗大受訓的年輕人日後都會被派到前線從事軍事、文化或後勤工作。這些延安的過客來了又走了，跟陝北沒甚麼關係。對於陝甘寧來說，陝北公學更重要一些，它的畢業生有一半留在邊區工作。¹⁴⁷

因有大批外來人口，延安在抗戰初期的公開面目是全力支持統一戰線。牆上刷着標語，公共建築內懸掛孫中山和蔣介石的畫

144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5。

145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79.

146 Snow, *Random Notes*, p. 49.

147 華統：《陝甘寧邊區全貌》，頁227-230、233。

像，團結抗日的愛國主義宣傳是延安話語的主流。但邊區內其他地方的情況卻並不盡然。抗戰初期志丹縣（原保安縣）的一份報告寫道：「志丹縣是老邊區中心地帶，沒甚麼統戰工作要做。」接着，報告開始描述對於地方「頑固勢力」的強力鎮壓。¹⁴⁸ 作為外來者，相比維護統一戰線，中共更關心清除政治上的對立派。這個過程的展開，很容易與日常的公共治安工作結合在一起。

在邊區的南北邊界，安全從來都是問題。在腹地諸縣，法院審理的主要是民事案件，尤其是婚姻和土地糾紛。但在邊界各縣，刑事案比民事案多15倍：土匪、賭博、販賣鴉片、偷盜、打架鬥毆等等不一而足。¹⁴⁹ 其中很多是久已有之的痼疾。在可以輕鬆逃到山區或者鄰近的其他轄區的地方，匪患便容易滋生。八路軍在邊區南部黃龍山區剿滅的兵匪無疑就屬這種類型。¹⁵⁰ 還有的土匪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像保安的張廷芝、環縣的趙老五，如前文所述，這些反共的土豪往往會躲到附近的國統區。儘管劉志丹早年曾在土匪中發展黨的隊伍，黨在理論上也一度把土匪看作受壓迫的農民，因貧困鋌而走險，參加犯罪活動；但一旦掌了權，他們對土匪的鎮壓像任何政府一樣毫不手軟。一般來講，土匪在民間也不受歡迎：農民視其為禍害和不肯踏踏實實幹活的懶漢。¹⁵¹ 因此不足為奇，共產黨事實上將「土匪」一詞政治化了。他們把所有的反對者都描繪成土匪，把邊界地區的土匪行為說成國民黨或日本特

148 志丹縣兩年半工作報告書，1940年8月22日，SA 2-1-157-1。

149 王震等：綏德工作報告，1942年2月29日，SA 2-1-221-3；志丹縣兩年半工作報告書，1940年8月22日，SA 2-1-157-1；固臨縣1942年工作報告，1943年1月30日，SA 2-1-216。

150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8年4月5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24-225。

151 陳仲良1942年11月14日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的發言。袁文偉：《反叛與復仇》，頁77-84、120-125、157-174。

務所為，或者說成是共產黨控制區以外的舊社會普遍存在的犯罪習氣。這一時期的黨內文件中充斥着對「漢奸土匪」的警告。¹⁵²

中共對於哥老會的政策變化尤其值得注意。在陝北，哥老會很難說是「秘密會社」，誰是哥老會弟兄旁人大都心知肚明，中共也一直在對哥老會做工作。毛澤東到了哥老會勢力相當活躍的保安和陝甘邊之後，曾發表一篇著名的宣言，盛讚哥老會在辛亥革命中的突出作用及其對中共革命的支持，稱劉志丹和謝子長為「哥老會中的模範」。他認為哥老會「打富濟貧」的宗旨與中共的主張有相通之處，宣佈哥老會可以在蘇維埃政府下公開存在，並成立專門的哥老會接待處，以招待「在白區立不住腳的英雄好漢，豪俠尚義之士」。¹⁵³這是黨公開的姿態。一年之後，中共發佈了一項關於哥老會工作的內部指示，稱哥老會「帶着極濃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與反動的色彩」。在國統區，黨繼續向哥老會示好——「採取爭取的策略」，「團結其中進步的革命的分子」，但在蘇區，哥老會的組織均被禁止，「最後達到無形中消滅哥老會組織的目的」。¹⁵⁴

實踐證明，消滅哥老會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在一些地方，哥老會做鴉片生意，雖然邊區已禁止鴉片貿易，但在陝北，鴉片仍是常用的鎮定劑。¹⁵⁵更棘手的是黨內有相當數量的哥老會弟兄。在

152 例如參見：關於改造赤衛軍的決定，1937年8月25日；林伯渠：〈由蘇維埃到民主共和制度〉，1937年5月31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75-177、196。

153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哥老會宣言〉，1936年7月15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153-155；英譯見 Schram, *Mao's Road*, 5: pp. 245-247. 在其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中 (p. 169)，施拉姆引用了這篇文獻，用於論證毛澤東「對於江湖豪俠的賞識」。

154 陝甘寧邊區黨委關於哥老會工作的指示，1937年7月15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9-13。

155 固臨政府報告，1939年6月27日，SA 2-1-141-11。

固臨一個區內，已知的115名哥老會弟兄中有64名是黨員；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其中有35人是入黨之後加入哥老會的。¹⁵⁶ 另兩個村子的34名黨員中，32人是哥老會弟兄。¹⁵⁷ 後一例說明當時黨組織就是在哥老會的人際關係網之上建立起來的；而很多人入黨後又加入哥老會，則說明更成功的是哥老會對黨的滲透，而不是反過來。事實上，在陝甘寧邊區草創階段，陝北農村的地方勢力網絡比中共的基層組織更有競爭力。

最初幾年，中共面臨最嚴峻的挑戰是如何建立可靠的農村組織。新政權的地方幹部多是參加革命的普通農民，他們身上有很多黨不樂見的習氣。在國民黨情報系統搜集到的一份可信的報告中，縣一級幹部的賭博和流氓行徑受到了批評，但文件也承認農村幹部紀律嚴明、工作賣力。¹⁵⁸ 新政權為消滅它所反對的不良生活習慣而大費周章。「鋤奸」運動特別針對的一部分「違法行為」，正是賭博、鴉片販賣以及拐騙婦女兒童。¹⁵⁹ 在這些幹部被撤換之前，國民黨官員曾輕蔑地說中共幹部「人才極少，縣蘇縣委概屬農工階級，學識淺薄，腦筋簡單」。¹⁶⁰ 新的中央領導對此評價可能並無異議。中共中央抵達之時，陝甘寧是「落後的、愚昧的三省交界的區

156 劉景瑞（很可能是劉志丹的一個堂兄弟），1939年10月21日（這是目錄上寫的時間，但很可能有問題，因為報告提到了11月的事情），SA 2-1-292-15。

157 劉景瑞，〔1939年〕11月10日，SA 2-1-292-16，更多例子參見固臨報告，1938年3月18日，SA 2-1-20-1。

158 中統：〈陝甘寧邊區靖定橫三縣施政調查〉（1940），BOI 270/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159 鋤奸委員會組織條例，1939年3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182–183。參看：固臨縣1942年工作報告，1943年1月30日，SA 2-1-216。

160 何紹南呈蔣中正陝北視察報告書，1937年4月10日，國史館，002-080104-00001-004。

域」。¹⁶¹ 1937年年底，陳雲與王明坐同一架飛機從蘇聯回國，一到陝北就被委以領導組織部的重任，致力於將列寧的革命紀律和「幹部決定一切」這一斯大林力倡的原則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¹⁶² 1939年，陝甘寧邊區組織部掌握了一套縣級及鄉級幹部的調查數據，數據顯示：僅有2.49%的幹部上過中學；10.42%上過小學；45.6%識字且能閱讀報紙；41.26%是文盲。¹⁶³ 關於幹部教育程度的這組數字不甚理想，折射出此前的黨員招收情況：陝甘寧地區71.2%的黨員在1935至1936年入黨，其中大多數又是1935年劉志丹的部隊在陝北攻城略地的時候加入。¹⁶⁴ 新政權繼承下來並要着手改造的，就是這個由貧農積極分子構成的鄉村組織。

中共的農村組織在幾個重要方面與舊政權不同。它規模更大，在向農村社會滲透方面也更為成功。最近對國民黨農村行政體系的一項細緻研究表明，直到戰時，出於處理徵兵等事務的考慮，國民黨的管理機構才延伸到區一級。¹⁶⁵ 而中共政權組織離農民更近，延伸到了鄉和村一級，自鄉一級往上都是領薪水的「脫產」幹部。¹⁶⁶

161 李富春：〈陝甘寧邊區黨的工作〉，1939年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550。

162 陳雲：《陳雲文選（1926–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44–89；關於斯大林的語錄，參見Stephen Kotkin,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London: Penguin Press, 2017), pp. 463–464.

163 邊區黨員幹部情況統計表，1939年10月27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326。

164 邊區黨員幹部情況統計表，1939年10月27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330。《固臨調查》第72頁也有關於中共黨員學歷程度的數據，大體一致。

165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395–438。

166 王震、曹力如，1941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1942年），SA 2-1-191-1。

整個邊區只有179區，但卻有1,063鄉，總共1,242個行政編制。¹⁶⁷事實上，這比國民黨農村行政機構增加了七倍。此外，國民黨的基層機構需自籌經費，地方上的保甲長可以從所收的稅費中抽取一部分，因此，基層官吏更像是獨立的承包商而非政府僱員。中共剛接手的時候，特別在東部那些國民黨組織機構比較完備的縣份，中共僅僅指派幹部到當地已有的機構中任職，並允許他們從稅收中抽取一部分以支付開銷。¹⁶⁸開始時，整個邊區的農村工作都帶有臨時色彩，甚至雜亂無章，是一項「游擊隊性質的工作」，缺乏記錄和監管。在陳雲的組織部發揮效力之後，邊區建立起自己的「會議、報告、現場調查、工作考核、領導分工」等一套工作機制。¹⁶⁹

新政權下機構擴張的原因之一是地方行政管理的範圍拓寬。檔案顯示，在地方，中共相當注重徵糧、徵兵、「鋤奸」、禁鴉片、教育、掃盲、生產、「抗屬」優待、司法事務、婚姻及離婚、合作社等方面的工作。¹⁷⁰高額累進稅收制度和以有超過一個兒子的家庭為目標的徵兵制，要求對每個家庭及其經濟情況有深入的了解。一位地方幹部建議用「串門子」或親屬關係摸清情況，關鍵是把「公開調查和私下查訪」結合在一起。¹⁷¹為了開展這項工作，黨需要一批忠誠的幹部，他們不僅要熟悉地方情況，尊重當地習俗，更要有辦事能力。這就一改從前靠有點聲望的財主把持地方行政的做

167 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頁611。

168 王震、劉景波，工作報告，〔1940年〕5月9日，SA 2-1-164-1。

169 志丹縣兩年半工作報告書，1940年8月22日，SA 2-1-157-1；王震、曹力如，1941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1942年），SA 2-1-191-1。

170 在陝甘寧邊區檔案的工作報告中，這些類別反覆出現。

171 神府〔1941年〕1月-2月工作報告，無日期，SA 2-1-190-2。

法，用一位幹部的話說，過去是靠「面子」工作，「現在邊區只要有本事的人就可作事」。¹⁷²

新政權的職能範圍擴展後，有能力的農村幹部比以往更加重要。蘇區時期的黨員大多不識字，常常不能勝任，因此，擴大教育範圍就非常重要。開始，黨依靠舊式學校的老師，不過他們中的一些人吃過革命的虧，不願意出來工作，其他一些人則傳播了錯誤的政治信息：「最糟糕的是，如果你問小學生共產黨好還是國民黨好，有些孩子會說國民黨好。」¹⁷³ 這是黨所不能接受的。為訓練新一代的幹部，教育網絡的擴展變得十分必要，當時每一份工作報告都會記錄這方面的進展。起點很低，進步緩慢，遇挫是常有的事。但也有推進。1937年，整個邊區只有320所小學和1,600名小學生。到了1939年，邊區有了890所小學，1941年有1,341所，學生43,846人。因與國民黨的「磨擦」以及國民黨停發津貼，一些偏遠村子裏比較小的學校只好關停，1942年學校數量減到723所，學生數量約3萬人。¹⁷⁴ 不過在短短五年中，邊區學生數量就增加了近20倍。儘管進步顯著，但就學率依然不高。1939年，高崗在一份報告中指出，邊區9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入學的適齡兒童不到20%。¹⁷⁵ 女性上學率更是大拖後腿：志丹縣的845名學生中，只有172名女生（不到20%）。¹⁷⁶

172 《固臨調查》，頁187。

173 固臨縣工作報告，1940年3月4日，SA 2-1-29-1；《固臨調查》，頁93。

174 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第102至104頁給出的數字是1942年邊區有847所學校；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頁567-568。

175 高崗在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1939年11月15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377。參看：《固臨調查》，頁86-90、166，給出的數字是大約30%。

176 志丹縣兩年半工作報告書，1940年8月22日，SA 2-1-157-1。

中共對學校教育和大眾掃盲有着相當的熱忱，但黨最緊迫的需求不是對農民進行革命啟蒙，而是教會他們基本的識字和計算能力——這是行政幹部和士兵所需的起碼的智識能力。除此之外，教育的內容主要是灌輸愛國主義價值觀，共產黨的價值觀和馬列主義的階級意識。農民對此心知肚明，在他們看來，學校不外乎幹部和士兵的培訓班。很多家庭因此拒絕把自家子弟送進學校。¹⁷⁷ 農民認為念書是「替公家念」。上學也會帶走農家非常重要的勞動力。在陝北，這個問題尤為突出，因為學生的入學時間晚。一項對115名小學生的調查顯示，其中111人超過了13歲，有一半人已經結了婚。¹⁷⁸ 不過很快，中共政權就在訓練年輕人掌握地方幹部的必備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功，隨着他們的提拔，每年各縣都會派10至20名基層幹部到延安培訓或進修。¹⁷⁹ 新政權就這樣建立起自己的各個職能部門。

實施帶有中共特色的民主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邊區東北部各縣，選舉的參加率非常高，平均達90%，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各個村子要角逐區一級的代表權，而區一級有權評估稅收比例。王震和曹力如的工作報告認為，因為這種新水平的政治參與，幹部的質量提高了。¹⁸⁰ 村級選舉每六個月一次，這使農民有充足的機會評估本地幹部，而幹部更換非常頻繁，說明農民們很注意選舉那些既能履行黨的任務，又能在農村選民中有效開展工作的人。1940年志丹縣的報告顯示，38名地方幹部中有12人被撤換；在頭兩年，有70%至80%的幹部或升官或降職。¹⁸¹ 在綏德，58位

177 趙玉文，1941年志丹縣工作報告，1942年5月11日，SA 2-1-188-1。

178 《固臨調查》，頁87、92。

179 趙玉文，1941年志丹縣工作報告，1942年5月11日，SA 2-1-188-1。

180 王震、曹力如，1941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1942年），SA 2-1-191-1。

181 志丹縣報告，1940年3月3日，SA 2-1-28-1。

幹部中有 50 人調崗。¹⁸² 全邊區的數據顯示，在區級及以上的幹部中，1,354 人得到晉升，5,612 人參加過各種各樣的培訓班。¹⁸³ 中共很在意群眾評價，所以各級工作報告中一般都有一部分專門記錄群眾的「怪話」，這成為改進工作和評價幹部的參考。¹⁸⁴ 組織部的幹部情況統計顯示，被開除出黨的 1,316 名幹部中，301 人（佔 23%）是因為「不工作」；204 人（佔 15%）是因為貪污；93 人（佔 7%）是因為賭博或抽鴉片。¹⁸⁵ 還有一個黨下決心清除的濫權行為是幹部霸佔已婚婦女當小老婆，這一做法被明令禁止，以「消除群眾的不滿」。¹⁸⁶ 顯然，對這樣的情況統計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一方面，它顯示出黨員幹部有濫用權力的嚴重行為，另一方面，又顯示出民眾對此類現象的不滿和黨及時的回應。

在一個沒有民主治理經驗的地方，黨努力建立起自己對「民主」的定義。因民主被標舉成區別於舊政權專制統治的新方式，許多人認為民主就意味着可以隨心所欲。農民把「民主」作為抗稅的理由。在邊區的綏米警備區，王震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農民抗議說：「你既下命令，還說甚麼民主？你們口口聲聲要民主，還在下命令。」另一些人的抱怨聽起來非常熟悉——共產黨的民主要開太多讓人頭疼的會：上有命令，下有不滿，工作很難開展。幹部身

182 王震、曹力如，1941 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 1942 年），SA 2-1-191-1。

183 邊區黨員幹部情況統計表，1939 年 10 月 27 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 321。

184 王震、曹力如，米脂、葭縣工作報告，1941 年 5 月 18 日，SA 2-1-191-2；《固臨調查》，頁 36-38。

185 邊區黨員幹部情況統計表，1939 年 10 月 27 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37-1939）》，頁 331。

186 組織部關於執行婚姻法規的通知，1940 年 3 月 24 日，《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1940-1941）》，頁 39。

上的壓力尤其大：要執行上級的任務，就得把擔子壓在友朋、鄉親的肩上，「怕惹人」是幹部不願開展工作最常見的理由。¹⁸⁷

理所當然，最強烈的不滿是針對新政權施加的日益沉重的負擔。延安的新政權在西安事變之後不久建立起來，地方管理機構的規模較小，又有來自國民政府相當的補貼，同時嚴重依賴對有錢人的「游擊式」索取，把一般老百姓的負擔降到最低。但在此後幾年中很多情況發生了變化。如表6.1所示，在王震部回撤到陝甘寧之後，「脫產」的軍政人員數量激增。國民政府的補貼從1940年7月起就停發了。這些變化使得邊區人口的賦稅負擔急劇上升。

表 6.1 新政權的賦稅負擔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軍政人員數量	14,000	16,000	49,000	61,000	73,000
外來援助佔預算百分比		50.6%	85.8%	74.7%	
公糧（單位：石 [*] ）	14,000	15,000	60,000	100,000	200,000
公糧佔收成的百分比 ^{**}	1.28%	1.27%	4.72%	7.35%	13.8%

* 1石 = 300斤 = 約150公斤

** 百分比的計算基於如下假設：1937–1941年糧食產量增加幅度一致。

資料來源：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頁500–501。

為了彌補赤字和創收硬通貨，好從國統區購買藥品和必需品，邊區政府要求農民用他們的馱畜將鹽從遠在邊區北部的鹽池運到南部的國統區。這項任務耗時耗力，長途跋涉又造成牲口傷病，因此極不得人心。¹⁸⁸ 毫不出奇，抱怨很快隨之而來：

187 王震、曹力如，1941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1942年），SA 2-1-191-1。

188 《固臨調查》，頁35–40；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pp. 132–133. 用強制的辦法運鹽，高崗是主要推動者，而他因對地方情況比較熟悉，深得毛澤東的倚重。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頁111–118。

割韭菜也得等幾天再割新的一茬。現在，負擔來的比割韭菜還快。我們還沒有交完公糧，又來了運鹽借款！我們還沒有交完這些「借款」，又來收合作社的股份、儲蓄證、教育糧和教育費。這些還沒交完，又來收第二輪的運鹽借款了。¹⁸⁹

不少人抱怨部隊的強迫命令。戰爭的需求給陝北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徵兵強度。1938年，八路軍一度制定了在兩個月之內徵兵五千的計劃，而在長征部隊抵陝之前，整個陝北也就只有五千紅軍。¹⁹⁰ 婦女自然會擔心部隊帶走丈夫和兒子，他們既是親人也是家裏的頂樑柱。因此，婦女成為徵兵的動員對象——黨要求她們不要因為害怕失去丈夫和兒子而抵觸徵兵工作。1939年1月，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一份報告中稱，已有三萬名男子經動員上了前線，其中一半人來自地方上的自衛軍，可被視為正規軍的預備力量。¹⁹¹ 每個縣都有徵兵任務，地方幹部在各村四處搜羅新兵。政策強調自願，但很多報告顯示，「強拉壯丁」、甚至「捆綁捉拿」在徵兵中並不鮮見。¹⁹² 地方工作報告顯示，士兵開小差的情況相當嚴重，在抓捕逃兵時使用武力的情況比徵兵時更加普遍。1940年，志丹縣報告182名逃兵已經歸隊，這個數字幾乎是當年徵兵數字的一

189 王震、曹力如，1942年4月綏德工作報告，1942年，SA 2-1-221-5。

190 關於擴大第八路軍留守部隊的決定，1938年11月20日，《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上冊，頁234-236。

191 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1939年1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123。

192 陝甘寧邊區政府給甘泉縣的訓令，1939年4月24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關中專署的指令，1939年11月5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冊，頁246、420。

半。另一縣則報告，為追捕156名逃兵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而抓捕行為又引發其他士兵逃跑，有人被擊斃。¹⁹³

對新政權政策的這些抱怨，老蘇區所在地的處理方式和王震1940年佔領的警備區截然不同。其間的差異體現了地瘠人稀的延安以西、以南地區，與更富裕、教育程度更高、紳權強大的東北綏德—米脂地區各自長期存在的地方特徵。在老蘇區，只要能保證公平，人們一般願意接受新政權的要求。¹⁹⁴但在東邊綏德一帶，心存疑慮的地主和傾向國民黨的士紳帶來更大的挑戰。王震控制了這一區域後着手與進步士紳合作，孤立、進而驅除了國民任命的專員何紹南。1940年，新政權需要有能力進步分子或舊政權中的「中立」人士參與技術性的工作：會計、收稅、林業、水利、發展經濟等。在這些事務上，士紳往往更有才幹，與他們共事，地方上的黨員不無疑慮。開始的時候，日常工作由王震的359旅抽調幹部負責，但長期的解決方案是培養能與舊精英分子共事，並逐漸取而代之的地方幹部。

與邊區其他地方一樣，綏德分區（前警備區）的選舉也是政權合法化的重要一環，但1941年的選舉與1937年老邊區的選舉有很大不同。按照慣例，黨做了精心的準備，甚至推遲了選舉時間以完成宣傳工作。¹⁹⁵選舉的結果一般是好的，尤其是散見於各處的那些在蘇維埃時期已進行過土地改革的地區，不滿主要集中於稅負的分配，參議會上的討論相當熱烈。令當局頗為欣慰的是，經過了選舉和公開的訴苦，地方幹部水平有所提高，同時也有一些人被

193 志丹縣兩年半工作報告書，1940年8月22日，SA 2-1-157-1；王震、曹力如，1942年6月綏德工作報告，1942年7月24日，SA 2-1-221-6。

194 趙玉文，1941年志丹縣工作報告，1942年5月11日，SA 2-1-188-1；神府〔1941年〕1-2月工作報告，無具體日期，SA 2-1-190-2。

195 王震等人的工作報告，〔1940年〕5月9日，SA 2-1-164-1。

免職。縣議會的變化最大。回顧1937年的選舉，黨對議會的控制是毋庸置疑的。但現在，在米脂的縣議會上，國共兩黨的代表爭論激烈。¹⁹⁶ 伴隨邊區的擴大，較為富裕的、素來紳權發達的陝東北地區被囊括其中，統一戰線隨之呈現新的面貌。在西部地區，像張廷芝那樣的土豪成為剿匪的目標。而在米脂、綏德及周邊幾縣，黨把受過教育、技術上有長才的精英人士視作進步分子並與其合作。在不久之後舉行的選舉中，一些這類受過良好教育的進步士紳加入了延安的參議會，其中最有名的是李鼎銘。他是地方知名的教育家、中醫，也是國民黨將領杜聿明的表哥。李鼎銘在延安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成為中共統一戰線政策的一面旗幟。在1942年邊區的財政危機中，由他提議的「精兵簡政」政策成為戰時節儉行政的範本。¹⁹⁷

綏德警備區加入陝甘寧邊區的版圖後，中共不只多了一塊支撐其軍政開支的富庶地盤，此地良好的教育體系也為中共提供了後備幹部，使其治理能力獲得不小的提升。同時，此地的社會結構也與中國北方各地有更大的相似性。原先建立在陝甘交界處的老蘇區地廣人稀，村莊小且分散，居民多為新移民，家族勢力的影響有限。自回亂蹂躪後，那塊苦寒之地從未恢復元氣。土匪和民團橫行，哥老會是各自為政的各種勢力之間最強固的黏合劑，這為劉志丹游擊隊的發展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共中央最初在位於陝甘邊界的劉志丹家鄉保安縣建立根基，西安事變後移駐延安。陝甘寧的疆域最終確定下來，是在把綏德警備區囊括進來之後，中

196 王震、曹力如，1941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1942年），SA 2-1-191-1。

197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pp. 212–216. 關於李鼎銘，參見喬雄波：〈愛國、愛民、愛黨——李鼎銘先生主要歷史功績〉，《米脂文史資料》，1998年第1期，頁27–41。

共自此才開始學習如何與各色各樣的地方精英打交道、將他們納入新政權並實施有效的控制，而這是此後不久中共在山西和華北將要面臨的普遍問題。

綏德分區的加入也使得中共的延安時期呈現出另一面相。東北部諸縣是陝西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的地方，特別是陝西黨的創始人曾經任教的榆林中學和綏德師範，以及學校體系發達的米脂。在革命運動這一早期階段，左翼人士主張對教育系統中的保守和專斷，以及兩性關係上的父權制發起普遍攻擊。如我們在第二章已經提到的，這一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推動年輕婦女獲得更加突出和公開的角色——剪髮、穿裙子、走街串巷去上學，以至於黨內更講政治的一派批評學生們「為肉麻的新詩及戀愛像醉麻住了」。¹⁹⁸因主張婦女受教育以及婚姻自由，陝西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與五四運動的精神一脈相承。不過，性別歷來是中國革命一個敏感的觸發點，正如1920年代的溫和改革激起了保守勢力的抨擊，1939年，抱有敵意的地方士紳對中共的諸多指控之一即是：延安男女混居的生活破壞了古老的兩性倫理，聲稱「自由戀愛」導致了「花柳病」的氾濫。¹⁹⁹當然，延安是另一個世界，1940年代初的男女比例達18：1，人們對婚外性行為的態度也較為開放。²⁰⁰而陝甘寧邊區的兩性關係在整體上受到另一套邏輯的宰制。

此前的研究大多認為，陝北相對保守的價值觀使得中共移駐陝北之後在婦女權益的主張上有所退縮，²⁰¹丁玲1942年那篇著名的

198 參見第二章註釋56。

199 陝北二十三縣請願書，1939年2月28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第2冊，頁86。

200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216–258。

201 Kay Ann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63–83.

〈三八節有感〉，就明確感到黨早年關於男女平等的承諾打了折扣。²⁰² 但是，權力牢牢掌握在長征老幹部的手中，很難說陝北需要為婦女政策的轉變負責。軍事實力是黨的優先考慮。陝北蘇維埃的創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軍事征服的過程，黨認為，陝甘寧邊區的新政權也基於軍事上的牢牢掌控。此前，南方幾省有婦女參加了紅軍，長征時就有一個婦女團；這些女兵此後又參加了以慘敗告終的西路軍，大多數人犧牲，有些被俘，嫁給了西北的回民。²⁰³ 無一人抵達陝北。在陝北，婦女的任務主要是為男性組成的軍隊提供服務：鼓勵丈夫、兒子參軍（或至少不拖他們的後腿），為士兵做鞋襪，洗刷、縫補軍服。軍人配偶不得離婚；雖然未必能夠百分百落實，但邊區名義上有為軍屬代耕的政策。²⁰⁴ 在八路軍中，性侵甚至強姦婦女的行為肯定沒有軍閥部隊中那麼普遍，但也發生過，上文所述，像高崗這樣的重要政治官員的此類違紀行為就只受到輕飄飄的處理。黨對於軍官婚姻需求所表現的關懷頗能體現軍事之於中共的優先地位。八路軍規定，年滿28歲、五年以上黨齡的團級以上幹部才有資格結婚。²⁰⁵ 這項政策明顯偏向高級軍官，很多長征幹部，包括毛自己，紛紛與農村的妻子離婚，從戰時湧向延安的年輕女性中挑選新婦。²⁰⁶

202 丁玲：〈三八節有感〉，《解放日報》，1942年3月9日。

203 Shuyun Sun, *The Long March*, pp. 128–132, 219–243.

204 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pp. 64–71. 檔案文件中常常提到因婚姻法引發的種種問題和為軍屬代耕的政策在落實上的困難，如參見：王震、曹力如，1941年綏德工作報告，無確切時間（可能是1942年），SA 2-1-191-1。

205 黃道炫：〈「二八五團」下的心靈史：戰時中共幹部的婚戀管控〉，《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1期，頁4–22。

206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236–240。

和亞洲其他地區一樣，中國革命運動在最初受到一批國際職業革命家的支持，他們認為避開殖民地情報機構的最佳方式是穿着西裝坐一等艙。²⁰⁷但到毛澤東等中共黨員於中國內陸建立蘇維埃根據地之時，革命運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艱苦樸素成為鐵律。在某些方面，延安的物質生活條件再符合不過，即便按南方蘇區的標準，陝北也相當貧窮。但對在抗戰時期奔赴延安的年輕人來說，土窯洞和粗茶淡飯正是它的吸引力之一。在陝北，樸素的生活、微薄的政府工資和人人均等的貧窮都司空見慣——這是將中共與國民黨區別開來的一大特點。延安之成為革命聖地，根本的一點就在於這種無分貴賤、共同獻身於貧窮生活的愛國主義精神。唯有一個方面是等級分明的：誰能交往女性。左翼知識分子王實味就注意到了這個危險：延安男女比例為18：1，所以接觸年輕女性成為關係緊張的一大緣由。²⁰⁸在這個背景下，黨要確保受器重的領導人優先獲得夫妻生活。他們戎馬多年，在長征中歷遍艱難。到了延安，他們至少安全無虞，有資格讓小姑娘陪着睡個好覺。

在延安的特殊環境之外，這項「二八五團」的婚姻政策對陝東北的影響最大。陝北民諺說的好：「米脂的婆姨，綏德的漢，清澗的石板，瓦窯堡的炭。」這首民諺的年代已不可考，米脂的婆姨究竟「好」在哪裏，從字面上也很難把握，但毫無疑問，民國時期，米脂有陝北最好的女校。這一優勢延續到了陝甘寧邊區時期，甚至有所增強，學校裏男娃的數量減少了，女娃的數量卻有所增加。

207 Tim Harper, *Underground Asia: Global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Empir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2021).

208 王實味：〈野百合花〉，展望雜誌編輯：《展望叢刊14》（香港：自連出版社，1968），頁5。

原因很簡單：念過書的女娃嫁得好。²⁰⁹ 地方工作報告沒有寫女學生都跟誰結了婚，但米脂卻有「丈人縣」的名聲，很多八路軍的軍官都在米脂找到了自己的新娘。²¹⁰ 陝東北在婦女教育上的進步主張就這樣以全新的、出其不意的方式造福於革命。婦女教育到頭來是為軍官準備太太。

* * *

1937年，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訪問了延安。她花了大量的時間採訪中共領導人，對於他們的速寫式報道讓這些人第一次為世界所知。她在書後附了70位中共領導人的小傳，無一是陝西人。²¹¹ 她見到了所有中共高級領導人，他們又進而向她介紹了更多的採訪對象。她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不久將把毛澤東和中共革命的故事帶給全世界。但延安的領導人沒有向她介紹任何一位來自陝北的共產黨員。這是一個由長征倖存者所掌握的新政權，「這些江西來的長征老戰士們，早已成為與眾不同的人物了」。²¹²

抗日戰爭一爆發，陝甘寧遠離前線，安全無虞，成為中共部隊的大後方；延安成了新的政治中心。我們在上文已勾勒了這樣的過程：邊區的疆界如何在與國民黨的「磨擦」和武裝衝突中確定下來；地方政權如何在軍隊的重要輔助下，很大程度上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來，尤其是甘肅的幾個縣和王震所佔據的綏德分區。鞏固

209 王震、曹力如，米脂、葭縣工作報告，1941年5月18日，SA2-1-191-2。

210 受訪者22。

211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p. 329–337.

212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p. 96. 中譯文從陶宜、徐復譯：《續西行漫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頁91。——譯者註。

黨對地方的控制，建立地方行政機構並以黨的紀律加以約束，都需要當地人的參與。總的來說，這些當地人不會是游擊隊員、貧苦農民、前土匪或哥老會的龍頭大哥，儘管他們曾是劉志丹陝甘紅軍的核心；而是念過書的人，哪怕大多只念到中學，他們崛起為黨的幹部或蘇區的官員。習仲勛就被任命為邊區南部關中分區的專員。習出身於附近富平縣一個有名望的家庭，十四歲還在三原念中學的時候，他就加入了共產黨，在地方蘇維埃的行政管理上經驗豐富。²¹³而馬文瑞則是隴東特委書記。馬十六歲在米脂的中學裏入了黨，此後一直積極參加黨的工作，常以鄉村教師的身份為掩護。1938年在延安短期學習後被派到甘肅，在那裏工作了七年。²¹⁴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則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秘書長。²¹⁵他們都是受過教育的本地幹部，也是多年的黨員，能夠在黨中央和地方環境之間起到聯繫、溝通的作用。但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躋身黨中央的領導人。

陝北的革命者中，只有高崗一人升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高位。1940年，在黨內蒸蒸日上的高崗與包辦婚姻的原配夫人離了婚，裹小腳的本地女人是不適合做領導人的妻子的，這標誌着高崗已經有了相當於長征幹部的地位。高崗看上一位19歲的江蘇姑娘，她念過師範學校，加入進步愛國者的大潮奔赴延安。黨安排她給高崗當秘書，毛澤東請他們一起吃飯，席間表揚了高崗的諸多優點。姑娘知道領袖的弦外之音，但她不想跟高崗結婚，畏懼他的暴躁脾氣。幾天之後，王明、王若飛、習仲勛等幾位領導人又請高崗和這位姑娘吃喜酒，還請周圍一些女孩子吃棗，說這就是兩人的婚宴。多年之後，那位姑娘回憶當時的情景：「一聽這話，我撒腿就

213 賈巨川：《習仲勛傳》，上冊，頁300。

214 馬文瑞：《馬文瑞回憶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1-126。

215 《劉景範紀念文集》，下冊，頁1200-1208。

跑，一直跑到了延河邊。但這時王若飛找到我說，你學過黨建嗎？黨員要聽黨的話，這也是黨的安排……就這樣，我們沒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沒戀愛，就結婚了。結婚後，高崗半年內不准我下山，怕我見到同學們。」²¹⁶ 此事體現了中共對高級幹部的關心，也充分證明了陝北人高崗在毛的關照下步步高陞，只顧成全老幹部的心願而不顧及年輕姑娘的情感，是延安出現的新現象。

到了1945年，毛澤東的思想體系已相當清晰——但組織安排的婚姻中暗含的兩性關係並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內。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提醒全黨注意黨內的「山頭主義」：「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閒話。有人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不好……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²¹⁷ 這話再清楚不過地道出了長征領導人和陝北革命者之間的鴻溝。對毛澤東來說，彌合這道鴻溝的方式就是把高崗栽培成陝北革命的代表。

直到1947年國民黨進犯延安，毛澤東才離開了他的戰時首府。此後一年，毛和其他幾位中共領導人在陝北的山溝裏或行軍或隱蔽，官方歷史稱之為「轉戰陝北」。儘管敵軍緊追不捨，但一次也沒有發現他的藏身之所。²¹⁸ 一年之後，毛澤東終於渡過了黃河，當地廣為流傳的說法是，毛一邊回望對岸一邊讚嘆：「陝北是個好地方！」我們找不到毛說過這話的證據，甚至也找不到隻言片

216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頁92–95。

217 轉引自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頁84。

218 參見Joseph W. Esherick, “Tracking an Iconic Photograph,” *The PRC History Review*, 2.2 (April 2017), pp. 1–6.

語能夠證明毛對於在漫長的戰爭年代為他提供棲身之所的陝北心懷任何喜愛之情。離開陝北之後，毛又度過了人生的三十年，且在這三十年的絕大部分時間內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他再也沒有回過陝北。

結語

土地革命並不始自陝北。早在劉志丹於陝甘邊界建立起第一支游擊隊的時候，毛澤東就已在贛南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運動。1933年，江西蘇維埃處於全盛，其面積、經濟水平、所轄人口數量均遠勝於定型後的陝甘寧邊區。中共革命的幾項重要戰略——土地改革、階級鬥爭、游擊戰爭、群眾路線，在江西均有早期的實踐。¹除了江西中央蘇區，在長江流域的山區還有幾塊較小的蘇維埃根據地，但到了1935年，這些蘇維埃根據地都失敗了，只有陝北蘇維埃生存了下來。值得注意的是，江西的中央蘇區並不完全聽命於毛澤東。1931年之後，他數度被排斥在核心權力圈之外——莫斯科訓練的「國際派」取代了他的位置。毛澤東是在長征中重新獲得了領導權。斯諾在保安採訪他的時候，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已經無人能夠撼動。此後，他在延安完成了日後被統稱「毛澤東思想」的一批重要論著；推行統一戰線政策；成功地把抗日愛國和階級鬥爭結合起來，並以此為基礎動員基層窮苦百姓；發動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發展出一套整風運動的模

1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式，既規範黨員的思想和行為，又不挫傷個人積極性。毛澤東時代是從延安起步的。

陝北成為長征的終點完全出於歷史的偶然，隨後延安成為戰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紅軍從江西出發時的目的地原本是湘西蘇維埃。在赴湘西與賀龍部會合的計劃失敗後，毛澤東和張國燾又在四川分道揚鑣，這樣，毛才率部北上，意圖接近中蘇邊境以獲得休整和共產國際的援助。毛澤東在甘南從報紙上讀到劉志丹及陝北蘇維埃的消息，這一偶然事件改變了長征的方向。「假設史學」的反事實思考當然滿是陷阱，但歷史學家也要認識到，如果毛澤東繼續前往中蘇邊境，就不會有「延安時代」，中國歷史的進程也將大不一樣。

眾所周知，毛澤東並沒有到達中蘇或中蒙邊界，但他也確實找到了落腳之地，那就是劉志丹和他的同志們歷盡千辛萬苦在陝北建立的蘇維埃。本書所講述的就是陝北蘇維埃的建立過程。我們的考察始自對陝北歷史及地理的長時段分析，側重點之一是地方的社會結構如何被發生在其他地方的事件所改變。此間的啟示是：地方史不能將視野局限於地方，微觀史的考察有時要借助宏觀的透鏡。明王朝決定在陝北修築長城並駐兵，給地方經濟帶來沉重負擔，也成為最終打進北京、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起義的導火索之一。滿人趁虛而入，有清一代，滿人與蒙古人結盟，長城的作用不復存在，內地與內蒙之間開始了以皮毛、馬匹為大宗商品的貿易往來，這給陝北邊陲帶來了兩百年的和平。到了19世紀中葉，因南來的太平軍殘部攻入陝西，關中地區爆發了漢回衝突與回民起義。回民叛亂者雖然被趕去甘肅，但一再企圖返回故土，陝北因此飽受戰亂，陝甘交界以及延安以西、以南地區受到的衝擊最大。陝北的社會—經濟結構因此被重塑：較為穩定且發達的政治、文化中心位於其東北部，陝甘交界及延安以南地區則人口稀疏，以移民為主，匪患不斷，武裝民團勢力大漲。回亂繼之以自然災害，

進入20世紀時，陝北的社會生態已相當脆弱。東北部的學校孕育出陝北最早的中共組織，飽受匪患之苦的陝甘交界處則為游擊戰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911年，清王朝覆滅，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局勢繼續惡化。1870年代左宗棠平定回亂時，其部隊把哥老會帶進了陝西。從那之後，哥老會成為陝西社會一支頗具影響的勢力，尤其是在軍隊裏面。在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中，哥老會是陝西的領導力量，他們在西安屠殺滿人並將影響力拓展到陝北多縣。大多數研究者將小軍閥的氾濫及土匪的興起歸因於哥老會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和民國時期的大肆擴軍。不過，還可以在更宏觀的進程中理解這一變化。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曾提出，正在推行現代化的國家將注意力和資源集中於沿海地區，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這裏的投資回報都是最大的。其結果是，交通落後的內陸地區被遠遠甩在了後面，由此構建了新的落後「腹地」。² 陝西無疑就是這樣的地區。儘管西安曾經是帝國的首都，關中地區曾是古代中國的文化中心，但進入現代後，陝西和整個西北都成了一潭死水。

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陝西的中共組織也是由知識分子建立的，他們大多曾在政治及文化中心北京學習。主張「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激盪着這些年輕人的心，讓他們渴望自由、民主的未來。他們大多參加過五四愛國運動。回到飽受匪患及軍閥割據之苦的「落後」家鄉陝西，這些在大城市受過新知識、新文化啟蒙的年輕人大失所望。他們認為，是那些自相殘殺的「有槍階級」阻礙了陝西的現代化，而自己的使命是發動開明師生與之鬥爭。漸漸地，一些激進知識分子匯聚到一起，形成了地方黨組織。起初，

2 Kenneth Po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這不過是一個鬆散的師生團體。直至國共第一次合作將他們的行動與孫中山國民革命的目標融合在一起，才有所改觀。不過即便在那時，陝西黨的活動也主要以學校為據點。「基督將軍」馮玉祥從莫斯科回國，帶回蘇聯支持北伐的武器、顧問和軍事援助後，局面又發生變化。1927年，風風火火的激進行動和學生領導的農運戛然而止，蔣介石與中共分道揚鑣，馮玉祥加入了蔣的陣營。不過在陝西，馮玉祥並沒有像蔣那樣血腥「清黨」，而是把中共黨員禮送出境。第一次國共合作給他手下的一些軍官留下了溫暖的記憶，在抗日戰爭中，他們欣然接受了這些從前的同志。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陝西的共產黨組織呈現出兩種面貌。那些在北京受過教育的資深知識分子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捕、被殺，或因與國民黨合作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而被清除出黨。新的陝西省委由新一代的年輕布爾什維克組成，他們依賴黨中央提供的經費，因而是共產國際左傾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他們試圖在陝西弱小的工人階級中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並在省城周邊幾縣的鄉下發動土地改革。這些洋派的布爾什維克把持着黨組織，真正鬧革命的卻是兩支游擊隊，一支活躍在陝甘交界一帶，由保安人劉志丹領導，另一支在陝西東北部，由安定人謝子長指揮，兩人既競爭也合作，共同推動了陝北的革命運動。劉志丹的游擊隊裏有很多土匪、當過兵的人、哥老會弟兄和民團分子——這些一無所有、漂泊不定的年輕人肯在生活條件惡劣的陝北山溝裏打仗。他們的一些行徑有時與土匪無異：綁架勒索，瓜分贓物，攻擊弱小和偏遠的目標，不肯戒掉鴉片煙。

隨着游擊隊力量發展壯大，西安的布爾什維克也加大了黨紀約束的力度。上海的黨中央給陝西省委施壓，要求他們把游擊隊帶出山溝，推行土地改革，在經濟富庶、人口稠密的關中地區建立農村蘇維埃。游擊隊拒絕執行這些不切實際的政策，黨中央就批評陝西黨屈從於「北方落後論」，即認為土地改革和建立農村蘇維

埃只適合於更發達的南方地區。1933年，陝西黨在三原縣北的高原上短暫建立了一個根據地，其建立者是國共合作時期入黨的當地精英家庭的子弟；但向他們提供軍事支持的地方強人很難駕馭，不久就與黨的左傾領導人鬧翻。一系列的挫敗緊隨其後。劉志丹游擊隊被改組為二十六軍，奉西安的布爾什維克的指派前往陌生的渭南地區，遭遇慘敗。之後國民黨當局逮捕了身在西安的省委領導人，在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面前，他們叛變了，西安及周圍的黨組織隨之瓦解。雖然這對中共來說是一個重創，但游擊隊反而從不切實際的指揮中解放出來了。

布爾什維克和省委暫時無法發號施令了，劉志丹得以獨立自主地領導游擊運動，不再受教條主義的束縛。劉放手在土匪、地方民團和從前的士兵中招兵買馬，並與省城國民黨政府中的同情者和左派人士建立聯繫。他對土地改革和黨建工作不甚措意，卻樂於響應日益高漲的抗日愛國熱情。1931年，日本人佔據了東北，中共將其視作對社會主義祖國的威脅，號召「武裝擁護蘇聯」，並認為反帝運動的大目標是所有資本主義列強，而抗日運動偏離了這一方向。這使得中共在1930年代初期的抗日愛國運動中所獲甚微。然而，劉志丹是中共的例外，到1934年，他已對軍人的抗日情感有所回應，好幾支部隊在「抗日義勇軍」旗號的感召下，加入了他的隊伍。

劉的新策略並非暢行無阻。1933年12月，謝子長返回家鄉安定縣，重振那裏的游擊運動。安定在陝西東北部，那裏有陝北最發達的教育系統，中共黨員以農村學校為基礎建立起黨組織的網絡——這與西部劉志丹基於游擊隊的革命運動形成鮮明對比。謝獲得了黨組織的認可，與他一起前來的黨代表帶來了黨中央的信，信中指責劉志丹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滿腦子「農民意識」，逃到山溝裏而不是建立並保衛蘇維埃政權，這些批評反映了陝西北部黨組織中一直存在的「陝甘」與「陝北」兩派的分歧。這種分歧既

源於兩位領導人的個人恩怨，也有兩派分別聽命於西安與北京兩個上級組織這層因素，可能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方法上的對立：劉志丹以游擊隊為基礎，而東北部黨組織以學校為基礎。

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分歧，陝北黨的這兩派仍在1934年夏天實現了聯合，秋天謝子長身受重傷，兩者的合作更加緊密。1934年冬謝子長生命垂危之際，劉志丹將主力移到東部，在中共控制的鄉村得到了基層組織的強大支持。1935年2月，謝子長去世，劉志丹將其軍事力量與農村黨組織結合，於1935年夏天率二十六軍發動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軍事進攻，一度打下六個縣城。此前，劉志丹的游擊隊僅以土豪、地方民團和守備空虛的鄉鎮為目標。現在，他有了奪取縣城、搶錢糧和軍火庫的軍事實力，他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央政府的注意。也恰在那時，蔣介石已經把中共趕出了他們在長江流域開闢的根據地，騰出手來派軍圍攻陝北。但這些部隊不習慣於陝北山溝裏的游擊戰，吃了敗仗，把大量武器撒手扔給劉部。蔣介石又從陝西的鄰省山西派出部隊，但結果是一樣的。

成功往往繼之以內鬥和自傷，這樣的情形在陝北革命史上屢見不鮮。在劉志丹取得了上述一系列軍事勝利後不久，在第五次圍剿中從鄂豫皖蘇區敗走的徐海東第二十五軍與之會合了。鄂豫皖蘇區曾對疑似的反革命分子進行血腥清洗，當年的「肅反」幹將把這一套帶到了陝北。他們與中央代表一起，把劉志丹及其部下列為「肅反」的目標。不過，在「肅反」進行之前，與國民黨軍隊還有過一場惡戰。在那一仗中，擔任總指揮的徐海東命劉部承擔正面進攻，劉部傷亡慘重。仗一打完，劉及其手下數十名高級軍官就被關了起來，其中包括日後擔任過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高崗和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大清洗很快蔓延到基層，據說有兩百名黨員幹部死於非命，這激起了當地老百姓對黨組織的不滿，劉志丹的家鄉保安縣的農民一度反水了。直到毛澤東帶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並制止清洗，這段血腥的騷亂才告一段落。

當毛澤東從四川出發北上之時，他的目標並不是陝北蘇維埃。毛的計劃是打到中蘇邊境，在那裏休養生息並獲得蘇聯紅軍的援助。後來他知道了劉志丹開闢的蘇維埃，這才以陝北為長征的目標。初到陝北，毛相當失望。他認為當地的貧窮和稀疏的人口無力支撐一支大軍，很快就準備離開此地。東征受阻後，吃了敗仗的隊伍回撤到保安，準備取道寧夏前往中蒙邊境。這一計劃也行不通，紅軍被迫留在陝北。因此，延安時代與其說出自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的設計，不如說是在歷史的夾縫中應運而生。

東征開始之前，莫斯科派出的信使到達了陝北，帶來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統一戰線的新政策。自此之後，毛澤東開始通過多個渠道尋找盟友，以使紅軍免遭進攻並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他同時向蔣介石及其在國民黨內的對手拋出橄欖枝。其中，對張學良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東北軍的很多將士認為，與其在陝北的窮山溝裏打共產黨，不如去跟佔領其家鄉的日本人拼命。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保安對毛澤東進行了深入採訪，通過斯諾的報道，毛得以向全世界發聲。斯諾的訪談及其筆下欣欣向榮的紅色根據地譯成中文後，也感召了中國的年輕人。最後，只有對張學良和楊虎城西北軍的示好見效，促成了1936年12月的西安兵諫。西安事變結束了蔣介石對中共的軍事圍剿，也為紅軍贏得了至關重要的軍費，但陝甘寧邊區的處境還說不上穩固。

西安事變是國共關係的轉折點，但關於統一戰線的細則，仍要進行一系列艱苦的談判。中共希望張學良和楊虎城能繼續執掌陝西，充當自己與充滿敵意的南京政府之間的屏障，但張學良離開西安後遭到了終生軟禁，楊虎城很快就被剝奪了指揮權並流放國外。蔣介石任命的官員控制了西安，中共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不過，蔣還是信守了停止內戰的諾言，在雙方接下來的談判中，紅軍（旋即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及陝甘寧邊區的自治程度成為談判的焦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的爆發都沒能打破僵

局，直至那年秋天才達成最後的協議。年底，首都南京淪陷（接着一場恐怖的大屠殺），國民政府在長江下游經歷了一系列慘敗，撤退到華中重鎮武漢。在積極的一面，蔣的政府與莫斯科達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隨後從蘇聯獲得了一系列軍事援助，蘇聯因此成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最可靠的盟友。因斯大林堅定地致力於維護國民政府的戰時合法地位，國共兩黨終於達成協議：中共部隊被編入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接受延安周圍的中共「特區」——不過，它從沒有正式承認陝甘寧邊區的自治權。

在抗戰初期，陝甘寧邊區的行政地位和地盤都沒有確定下來。雖然東北軍撤出了部隊，隴東大部分地區及黃河東岸被指定為八路軍的守備和招兵區域，不過這些地方還不算是陝甘寧邊區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以及在延安等城鎮，國民黨仍然任命縣長、發放救濟、視察教育，至少在名義上維持着國民政府的統治。為了提高邊區的合法地位，共產黨推行了精心控制的村、區、縣級選舉，無一例外由黨員勝出，並因此得以宣稱獲得了民眾的民主支持。與此同時，共產黨的治安隊開始清「匪」，所謂「匪」既包括長久以來危害地方的慣匪，也包括那些對共產黨壟斷的「合法暴力」³構成挑戰的土豪和民團首領。

到了1939年，中共在華北和華中的敵後擴大了他們的控制權並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對此，國民黨採取了強硬措施加以制衡。在西北，這涉及在陝甘寧交界處的爭議地區維護中央政府的財政與軍事權威。國共之間的「磨擦」驟然升級，最終國民黨發起一輪攻勢，收回了甘肅和陝甘寧西南部的失地。作為回擊，中共從山西

3 這是韋伯關於國家的經典定義（係對托洛茨基觀點的生發），參見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1919) in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 78.

調回16,000人的部隊，趕跑了國民黨任命的綏德專員，把陝東北（綏德、米脂）的警備區納入陝甘寧邊區。經過這樣的你來我往，陝甘寧邊區的範圍最終確定了下來。國民黨在其周邊修建了封鎖線，把邊區與中國其他地方隔絕開來，但默許共產黨人加強內部控制。然而，這樣的地盤交換還有最後一項社會—政治影響。中共第一次獲得了對陝西東北部的控制權，這裏教育程度較高，地主居主導地位，且有經年定居的村落。開始時，新政權很難說服地方幹部與統一戰線中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廣受尊重的地方士紳合作共事。但努力是值得的，此間積累的經驗發展出一套工作方法，能以之將革命推廣到山西和華北平原的類似地區。

* * *

對於更為宏觀的中國革命進程而言，陝甘寧的歷史能給我們哪些啟示？首先，研究地方史當然要重點分析這一地區的經濟、政治、社會結構、重要人物及歷史事件，但可靠的地方史卻絕不是全然「地方」的。如果認識不到「陝北」與陝甘交界處這兩個地區根本上的東西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黨內兩派爭執不下，就無法真正理解陝北革命。兩者的差異起自19世紀的回亂，而回亂的根源遠在陝北之外。在陝西早期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陝北游擊隊深受黨內領導人無休無止的教條主義指令之苦，領導人則聽命於共產國際指定的政策。最後，蔣介石在陝甘寧邊區自治權上的讓步，必須置於中日戰爭及蘇聯答應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的語境下理解。地方、地區、國家及國際的大小事件一再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歷史進程。歷史學家在分析這些縱橫交錯的影響之時，需不斷變換焦距，將微觀史和宏觀史結合起來。

在地方、地區、國家、國際因素的互動中，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當地人所起的特殊作用。在任何一個中共根據地，當地的教師、學生、秘密會社成員、土匪、工人、礦工或農民都扮演了重要

角色。⁴ 在陝北，劉志丹起到的作用尤為關鍵。他在當地有身份、有人脈；他受過軍校訓練，有作戰經驗；他熟知當地的地形地貌，這對游擊隊領導人來說尤為重要。儘管此後關於他的歷史敘事多將之聖徒化，但實際上，劉志丹所扮演的革命角色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他的游擊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擺脫了省委不切實際的教條主義指揮；而他之所以能夠如此，也因為他本質上是一位軍人，對黨建和馬列的理論不感興趣。不過，只有在劉志丹將其軍事力量與其東邊的競爭者——「陝北」黨的農村黨組織結合起來後，陝北革命才進入全盛時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1935年秋天黨中央到達後，劉志丹和他麾下所有幹將被新的中央領導層邊緣化了。⁵

地方領導人打下革命根基，卻在中共政權建立後遭到邊緣化，這種模式並不限於陝北一地。這一過程通常伴隨着大量的暴力，如發生在贛閩根據地的富田事變和鄂豫皖蘇區的肅反。⁶ 與此類似，1949年革命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南下幹部也

4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Perry, *Anyuan*;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Hartford and Goldstein, *Single Sparks*; David S. G. Good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The Taihang Base Are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5 劉的歷史地位始終存在爭議。一方面，陝北的革命紀念館為其塑像並稱頌他的貢獻；另一方面，在袁文偉那本關於西北土匪的材料豐富的著作《反叛與復仇》中，劉志丹只被提到過一次（關於他處決一位土匪），而討論中共土匪治理政策變化的九、十兩章沒有任何註釋。

6 William T. Rowe,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排擠了廣東和海南島的地方革命者。⁷這些事件的過程及其邏輯很常見，也不難理解：地方上的革命者了解地方情況，他們有初創根據地所必需的人脈資源，但這些人脈網同時也會讓他們深受各方束縛與影響，使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受到挑戰，並令革命事業複雜化。劉志丹在土匪、哥老會、前兵士和民團首領中建立起廣泛的聯盟，並在陝北創建蘇維埃。但這些人的既有利益和人際關係阻礙了土地改革的開展，也挑戰了黨的權威。從這個意義上說，徐海東的二十五軍發動的肅反運動在威脅劉的地位之外，也服務於更大的革命目標。肅反運動監禁了高崗、習仲勛等未來的領導人，在劉志丹的軍隊中激起不滿，一些人開了小差，劉的一些民團盟友甚至公開反對革命；但與此同時，它也清除了對黨的宏遠目標不夠忠誠的地方精英分子。最重要的是，儘管出於偶然，黨中央及時趕到陝北，阻止了運動。毛澤東不僅坐享已得到肅清的革命隊伍，也獲得了制止肅反擴大化的美名。

第二個必須強調的主題是暴力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正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著名論斷：「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⁸中共不憚以「紅色恐怖」回應敵人的「白色恐怖」。游擊隊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綁架富人，在必要的時候殺掉他們。在革命暴力最為猛烈的時候，革命鬥爭變成了「亂

7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Jeremy A. Murray, *China's Lonely Revolution: The Local Communist Movement of Hainan Island, 1926–195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8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冊，頁17；英譯文見Schram ed., *Mao's Road to Power*, Vol. 2, p. 434.

燒亂殺」。⁹ 在陝北，極端暴力的時期也是黨的隊伍急劇擴張的時期。入伍的新兵大多是居無定所的年輕人——孤兒、與家人有嫌隙的幼子，對他們來說游擊隊是另一種家庭，更確切地說是兄弟情誼。畢竟，他們是那麼年輕。工程師安立森被俘的時候，發現二十六軍的戰士主要是「十五六歲的少年」，裝備很差但鬥志昂揚。¹⁰ 埃德加·斯諾在採訪中得知，戰士的平均年齡是19歲。¹¹ 對其他地方的中共革命所做研究也顯示，這些年輕人心甘情願成為革命暴力的執行者。¹²

邊區建立之後，濫殺濫傷的暴力行為有所克制，但新政權繼續嚴厲鎮壓「土匪」。新政權穩固之後，暴力減弱。信息已經傳遞出去：對反對者絕不手軟。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1942至1943年整風與「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高壓之下，監禁、逼供、甚至拷打都有，但很少有死人的情況。即便有這樣那樣的過火行為，它在本質上與1930年代富田事變中的大規模肉體消滅還是很不一樣。毛澤東似乎認識到早年暴力過頭的情況導致的負面後果，樹立了「治病救人」的新原則。¹³ 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另一個反面教材，很可能也對新政策的出台有影響。無論如何，到此時，與黨中央持不同意見的人已經領受了教訓，暴力的威脅和幾位精心選擇的鬥爭靶子

9 參見第四章，頁223。

10 Sigurd Eliassen, *Dragon Wang's River*, p. 191.

11 Snow, *Red Star*, 1938.

12 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13 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第3冊，頁829–830，英譯文見：Stuart Schram and Timothy Cheek eds.,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vol. 8, p. 33. 關於整風運動，亦可參見前言，註11–16。

已足夠讓人聽話。然而，正如194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鎮反運動所顯示的，當革命擴展到新的領域時，黨仍不惜藉助革命的鐵拳建立自己的權威。

本書的討論截至陝甘寧邊區區劃確定之時。這一研究時限的選擇表達了第三個主題：新政權並不是社會變革的產物，相反，社會變革的前提是黨牢牢確立掌控權。在建立起鐵腕控制之前，黨不可能發動群眾投身於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變革。無數例子表明，除非農民相信紅軍能保護他們，否則他們是不願意冒着被地主、士紳報復的危險去響應土地改革的號召的。¹⁴ 國民黨對邊區的軍事進攻在西安事變後剛一中止，中共立刻把與之作對的小股民團定性為「土匪」，並發動了清剿。直至國民黨的縣長被趕跑，東北邊的縣份納入邊區，四至確定下來後，中共才實現了全面的控制。事實上，共產黨政權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軍事過程，本書試圖以相當篇幅解釋為何一支裝備很差的游擊隊能夠取得勝利。1940年之後，國民政府用嚴密的封鎖線包圍了邊區；陝甘寧與外界人員的往來大為減少，一個真正的自治政權建立起來。¹⁵ 來自外界的新聞少之又少，中共媒體盡可以講述自己的故事：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抗戰中取得的輝煌戰果，蘇聯在歐洲戰場的勝利。之後是整風運動，它要求每個學生、每個同志接受黨的信條。政權的控制繼之以信息的控制，從那之後，黨言「事實」即為「事實」。

這個根基穩固的革命根據地還有另一個重要後果：它使得中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莫斯科。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是共產國際在決定哪個黨是真的共產黨，誰是叛徒或「托派」。1928年的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開的，1945年「七大」召開之前，「六大」的代表即為蘇共官方認可的中共領導人。西安的布爾什維克們，

14 除前述證據外，參見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pp. 63, 499–500.

15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頁49。

像中共所有的地下黨組織一樣，依賴於受共產國際主導的上海黨中央的財政支持，勤勉而機械地重複共產國際的既定路線。事實上，因省委堅持城市鬥爭，在經費來源上他們也指望着游擊隊的搶掠。在江西，當毛澤東一度遭到排擠時，掌權的是受到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支持的「國際派」。然而，我們不應該對傳統的解釋照單全收，即認為中共日趨獨立自主完全因為毛澤東在黨內崛起以及他本人在農村的根基。在長征的最後階段，毛為向中蘇邊境行軍找到的理由是「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¹⁶ 在陝北，他仍然尋求蘇聯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在西安事變中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保護蔣介石的命令。直到抗戰開始後，蘇聯的軍事援助流向了國民黨而非中共，毛澤東的期待才淡了下去。1937至1940年，國民政府為陝甘寧邊區及中共軍隊提供了可觀的支持，中共在戰時獲得的蘇聯援助是很少的。¹⁷ 除了國民黨的經費，是陝甘寧的民眾而非莫斯科，在支撐着中共。

對這一過程的完整考察已超出了本書範圍。在1946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中，毛澤東不想、也確實沒有理會斯大林關於國共劃長江而治的建議，這一點當無疑義。同樣眾所周知的是，在後斯大林時代中共的獨立性進一步增強，最終的結果是中蘇分裂。在我看來，這種日益增強的獨立性恰恰肇端於創建和發展一方穩固的國內政治根據地。在意識形態上，毛一再重申斯大林的教條，1942至

16 毛澤東在俄界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9月12日，轉引自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頁271–272。

17 蘇聯所提供的有限援助在這裏有必要強調一下。在其所撰寫的蔣介石傳記裏，陶涵提到1940年蘇聯的援助涵蓋了「中共軍事及民政開銷的42%」。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p. 171. 這一論斷曾被別的學者加以引用，但陶涵在一次私下交談中坦率地承認，這一數字誤讀了Dallin and Firsov所提供的材料。*Dimitrov and Stalin*, pp. 121–125. 事實上，蘇聯提供了中共經費的3.8%，而非42%。

1943年的整風文件中滿是斯大林的語錄。與此同時，毛也在批判王明及黨內「國際派」的「教條主義」並進而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其關於矛盾論和實踐論的早期文章中，毛已經建立起足夠的理論權威並締造了自己的思想路線，對於中國式辯證法的巧妙運用使得他可以創造性地改造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的是，可以為黨不斷變換的路線辯護。在他自己的地盤上，毛澤東不需要再緊跟共產國際的指令；他可以根據千變萬化的地方局勢做出必要的調整。

本書所要討論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主題，涉及意識形態的傳播，這一意識形態許諾革命終將勝利，並致力於培養對革命事業的信念。在此，不妨回顧清朝官員推行武裝團練的原因：農民「不值與必死之賊拼命，火銃則擊之百步之外，度不能勝尚可爬山而逸。」¹⁸ 清帝國的官員很清楚，農民最希望的是保衛村莊和家人，不可能為天朝犧牲性命。就連劉志丹的游擊隊，常常也只是看在每月二十塊大洋的穩定收入和能從搶掠中分一杯羹的份兒上，才願意打仗，並且，他們更習慣於短平快的伏擊，或者黃昏拂曉時分僅僅持續幾個小時的戰鬥。他們還不是百煉成鋼、願意為革命獻身的無產階級戰士。當徐海東的二十五軍迫使他們在勞山打了一場傷亡慘重的持久戰後，活下來的人滿腹怨恨，不少人就此放棄革命。而長征的倖存者已經在北進途中見過了太多的生死，現在，他們來到了遠離家鄉的陝北，除了繼續為革命戰鬥已別無選擇。如今，紅軍就是他們的家，只有革命勝利才能為他們的人生賦予意義。但這種革命信念要如何灌輸到陝北農民的心裏呢？

尤金·韋伯 (Eugen Weber) 的經典著作《從農民到法國人》強調了軍隊和教育在鍛造新的國家意識方面所起的作用。¹⁹ 一旦對邊區

18 參見第一章，頁 50。

19 Eugen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建立了牢固控制，中共便通過軍事教育強化這一過程。上文提到，許多農民家庭抵制新政權的教育舉措，因為他們認為黨在試圖將他們的孩子變成「公家人」。他們的理解沒錯：黨開設的新課程是為了培養幹部和士兵。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說的很清楚，邊區「實行國防教育的目的，在於提高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強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而且要「培養抗戰幹部，供給抗戰各方面的需要；教育新後代使成為將來新中國的優良建設者。」²⁰ 關於小學教育的指示開篇即是軍事教育的方針：「要實習游擊戰術……第一要行動軍事化。就是在上課時，不一定採取課室……第二要鍛煉爬山野戰。就是每天爬山一次，學習山戰的簡單辦法。」²¹ 由此可見，農民認為新政權讓他們的孩子上學是為了送他們上戰場的看法不無道理。

也有必要讓年輕人相信勝利終將到來，值得為此奉獻生命。這個過程更加漫長，也困難得多。文件中不斷出現的抓捕、遣返逃兵的記錄顯示，很多人仍然嚮往家鄉安定的家庭生活。黨需要為革命賦予意義，灌輸革命必勝的信念。毛澤東對此的認識體現在他寫於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在那篇文章中，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聯繫起來：「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能夠擔負。」²² 完成這篇關於中國革命必然性的文章後不久，他又起草

20 林伯渠在第一屆邊區參議會上的報告，1939年1月，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匯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25。

21 陝甘寧教育局：〈關於抗戰期間小學教育的指示〉，1938年3月6日，《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小學教育部分）（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頁1。

22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冊，頁646。英譯文見：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vol. 7, p. 306.

了一篇關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著名文章，文章認為，白求恩為革命而犧牲，體現的就是這種精神。²³幾年之後，他又在同樣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中再次闡述了這一主題：「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只要他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²⁴

任何革命運動都需要一支具有奉獻精神的幹部隊伍來推行軍事及行政上的指令，對於像中國革命這樣一場漫長的革命就更是如此。最初，中國革命的依靠力量是學生、土匪以及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所稱頌的「痞子」。中共在陝北建立起相對穩定的根據地後，需要一個信得過的組織去傳播和加強革命目標。在革命精英中開展的整風運動發揮了這一效用，它迫使知識分子清洗掉那些源自「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疑慮，代之以對黨堅定不移的信念。對知識分子來說，對黨的信念受到當時普遍認同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推動，即社會主義是歷史潮流滾滾向前的必然結果。²⁵對其他人來說，它更容易與中國的崛起聯繫在一起，亦即一首廣為人知的革命歌曲所傳達的信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²⁶建

23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毛澤東選集》，第2冊，頁653–654。英譯文見：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7, pp. 312–313.

24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3冊，頁1003–1004。英譯文見：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8, pp. 616–618.

25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p. 5.

26 這是曹火星1943年寫的一首歌的歌名。曹是中共宣傳隊的一名年輕成員。「新中國」的「新」字據說是後來毛加上去的。不過這句口號最早來自蔣介石，他在《中國之命運》中宣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參見曹火星：〈譜就經典薪火傳〉，《北京青年報》，2014年9月30日；“Debating *China's Destiny*: Writing the Nation's Past and Future in Wartime China,” in Esherick and Combs eds. *1943: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pp. 192–194.

設新中國是一項很多人願意為之獻身的事業，直到今天它仍是一個廣受推崇的信念。

堅信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的大潮中必將乘勢而起這一信念對黨員有重要的激勵作用，這種信仰的激勵作用與一些宗教教派不無相似之處。幹革命肯定會有犧牲，需要有人為革命獻身。這就是意識形態的用處。不過，此書意在挑戰類似的歷史決定論。較之歷史決定論和歷史必然性，我更願意強調「偶然」/「意外」(accidental)因素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需要澄清，「偶然」/「意外」並不意味着隨機或不明所以，它們也是有原因的。警察會調查交通「意外」的原因，政府會建立規章制度以減少工業「意外」事故的發生。但如上文所及，中國革命這樣的重大事件未必有重大的原因。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有過一篇關於刺猬和狐狸的經典論述，比起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我會堅定地站在了解萬事萬物的狐狸一邊。²⁷ 儘管如此，我亦支持繼續關注那些深刻改變現代社會的重大事件——就中國而言，即是理解中國革命的本質與根源。²⁸

當我們嘗試對中國革命進行分析時，一些已有的模型，如農民革命、農民民族主義、共產黨組織或統一戰線政策等等，均有助於在世界史的比較視野下理解中國革命的宏觀趨勢，但這些模型還不足以拆解歷史的複雜經緯。在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滿清陳舊的帝國結構無疑抵擋不住西方帝國主義的挑戰。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也許並非必然發生，但它建立起一個先例，自此之後，20世紀大多

27 Isaiah Berlin, *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7).

28 關於為何要銘記中國革命，參見裴宜理的有力論述：Elizabeth J. Perry,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4 (November 2008), pp. 1147–1164.

數中國精英深信：中國要想富強，革命是必由之路。²⁹ 國民黨、共產黨和大多數政治精英都認同這套經由革命再造國運的理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革命的必然性有其道理。但革命所採取的具體形式由地方、國內、國際形形色色的偶然性 (contingency) 造就，只能通過對於細節及歷史的「偶然」/「意外」進行實實在在的分析，才能加以揭示。延安時代固然確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坐標系，我們必須意識到：毛澤東從不想留在延安，延安時代本身就是歷史的「偶然」/「意外」——是一系列具體原因在無從預知和預定的情況下所造就。

同樣，雖然延安時代建立了一些模式和先例，影響了中國革命未來的發展，但它並沒有決定中國革命的進程。1957年的反右運動，隨後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都是特定時代、具體條件的產物，並不是延安時代開啟的某種勢不可擋的必然邏輯的延續。關於陝西早期革命運動相對完備的檔案記錄使得書寫陝甘寧邊區的起源成為可能。我之所以把研究的時間下限放在1940年，沒有進一步關注邊區1940年以後的變遷，主要是因為無法獲得此後關於黨內決策及其實施效果的檔案。1989年我在陝北做田野調查和閱讀基層檔案文件的時候，「黨內重要會議」的材料屬明確的禁區。縱觀毛澤東及後毛澤東時代，我們幾乎看不到關於黨內議事的同時期的記錄，只有回憶錄的敘述，帶有一切回憶性文獻所固有的局限。³⁰ 斯蒂芬·科特金 (Stephen Kotkin) 精彩的三卷本《斯

29 Joseph W. Esherick, "Reconsidering 1911: Lessons of a 'Sudden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6.1 (April 2012), pp. 1–14.

30 這方面最著名也最常被引用的，無疑是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上下冊。該書在修訂時也有刪節，見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頁20，註18。

大林傳》向人們展示：如果接觸到極權主義國家黨的最高領袖的書信、筆記、會議記錄和原始備忘錄，會有怎樣的研究突破。³¹目前在中國碰不到類似的資料，這使得我們無法確切地查明中國革命這一歷史大戲中令關鍵人物做出選擇的各方面因素——個人、心理、社會、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這當然並不意味着我們應該放棄對中國現當代史的研究；但這確實意味着，在政治大環境的劇烈變動之下，若要斷言在這長長的一段時期內還存在某些連續性，需格外慎重。

中國素有珍視歷史的傳統。中國古代的經典專闢一類「史」著，搜集古代文獻和對古代的想像。據傳孔子作《春秋》以示後人；司馬遷《史記》中的典故、人物和故事久傳不衰。整個帝國時代，官修廿四史從未間斷。直至今日，中國依然對自己的過去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情感。《人民日報》曾有專門的欄目重溫近代歷史；中國各地都有以官方定調的歷史博物館；現在的官方報告中也常見「歷史趨勢」和「歷史法則」一類的字眼。我們應該記住，官方並不能也不應該壟斷對歷史的運用。歷代的造反者、異見知識分子、現代的革命家和當代的抗議者，也都從歷史的寶庫或者五四運動這樣值得銘記的抗爭劇目中尋求公正。因此，無論對國家還是造反者、異見者來說，在追尋各自的目標時，歷史都是強有力的資源。

但是，我們必須把對歷史的利用和歷史的書寫區別開來，這種區別的代價理應由歷史學家承擔。如果歷史進程由歷史當事人在獨一無二的時空背景之下做出的決定所塑造，既然環境處於無窮的變化之中，也就不太能藉由過去預知未來。過去許許多多細小的發展漸次累積成今日世界的宏觀樣貌。專家們主張社會主義勝

31 Stephen Kotkin, *Stalin, Volume 1: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 Volume 2: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2017); 第三卷即將出版。

利、人民戰爭、極權統治、中國模式或修昔底德陷阱等宏大敘事，可能會引發有益的討論，但除非他們曾細緻研究支配這些歷史進程的具體條件，否則，他們給出的既是刺激也是誤導。這一點同樣適用於那些為了迎合今日的某些情緒而剝離歷史背景討論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的人。歷史不會重演，也沒甚麼迴響。即便它能幫助我們理解今天，也不是通過簡單的類比或神奇的隱喻。歷史最重要的一課是：事物是複雜的。地方環境重要，國家大事重要，全球發展重要，組織紀律重要。關鍵領導人的政治抉擇至關重要；而與之同等重要的是平頭百姓的個人能動性——哪怕是「落後」而「無知」的陝北農民。

受訪者簡介

受訪者1：橫山人，現居志丹(保安)縣，時年67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2：子長(安定)縣人，志丹縣黨史辦主任，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3：志丹縣當地的知識分子，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4：志丹縣芋子灣居民，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5：約1923年嫁到保安縣金湯鎮的一位婦女，時年84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6：志丹縣蘆子溝居民，劉志丹的堂弟，時年75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7：志丹縣居民，時年62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8：劉志丹的近親，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9：二十六軍老兵，時年77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10：宜川縣人，時年79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11：曾就讀於保安縣永寧山高小的學生，時年71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

受訪者12：志丹縣居民，祖上在清代從橫山移居而來，時年68歲，採訪時間：1989年7月3日。

受訪者 13：志丹縣的四位居民，時年分別 61 歲、74 歲、74 歲、80 歲，採訪時間：1989 年 7 月。

受訪者 14：志丹縣芋子灣居民，時年 71 歲，採訪時間：1989 年 7 月。

受訪者 15：志丹縣居民，祖上在清代從神木移居而來，時年 79 歲，採訪時間：1989 年 7 月。

受訪者 16：志丹縣居民，劉志丹的侄女，時年 60 歲上下，採訪時間：1989 年 7 月。

受訪者 17：子長縣黨史學者，時年 82 歲，採訪時間：2018 年 6 月。

受訪者 18：子長縣黨史學者，時年五十多歲，採訪時間：2018 年 6 月。

受訪者 19：子長縣政協委員，時年 82 歲，採訪時間：2018 年 6 月。

受訪者 20：吳起縣黨史學者，時年六十多歲，採訪時間：2019 年 5 月。

受訪者 21：延長縣居民，時年 70 歲，採訪時間：1989 年 6 月。

受訪者 22：米脂縣當地的歷史學者，時年五十多歲，採訪時間：1989 年 2 月。

參考文獻

英文文獻

- Apter, David E.,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Atwill, David G. *The Chinese Sultanate: Islam, Ethnicity, and the Panthay Rebellion in Southwest China, 1856–187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Averill, Stephen C. “The Origins of the Futian Incident,” in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pp. 79–115.
- .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 Barnett, A. Doak.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 Benton, Gregor. *Mountain Fires: 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 1934–193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 ed. *Prophets Unarmed: Chinese Trotskyites in Revolution, War, Jail, and the Return from Limbo*.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5.
- Bertram, James M.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38.
- Bianco, Lucien.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M.E. Sharpe, 2001.

- . with Hua Chang-ming, *Wretched Rebels: Rural Disturbances on the E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rans. Philip Lide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 Billingsley, Phil.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isson, T.A. *Yenan in June 1937: Talks with the Communist Lead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3.
- Borst-Smith, Ernest Frank. *Caught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Record of Risks and Rescue*. London: T. F. Unwin, 1912.
- Brady, Anne-Marie. *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 Chang, Chung-li.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 Chang Kuo-t'ao (張國燾).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ng Kuo-t'ao, vol 2: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8–38*. Lawrence: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2.
- Chang, Sidney H. and Ramon H. Myers, ed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The Memoir of Ch'en Li-fu, 1900–1993*.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 Chen, Yung-fa (陳永發).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 Chiang Kai-shek (蔣介石). *China's Destiny and Chinese Economic Theory*, trans Philip Jaffe.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how Yung-te.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Status Careers Among the Gentry in a Chinese Community*.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1966.
- Chu, Wen-djang (朱文長). *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962–1878: 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ity Policy*. The Hague: Brill, 1966.
- Ch'ü, T'ung-tsu.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8.

- Clark, Robert Sterling, et al. *Through Shên-Kan: the Account of the Clark Expedition in North China, 1908–9*. London: T. F. Unwin, 1912.
- Coble, Parks M. *Facing Japan: Chinese Politics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1931–1937*.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
- Compton, Boyd, e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Dai, Yingcong. *The White Lotus War: Rebellion and Suppress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9.
- Dallin, Alexander and F. I. Firsov, eds.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Eliassen, Sigurd. *Dragon Wang's River*, trans. Katherine John. London: Methuen & Co., 1957.
- Eastman, Lloyd E.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47–565.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Esherick, Joseph W.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 “The CCP in the 1930s,” *The PRC History Review* 2.2, (April 2017): pp. 1–7.
- .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pp. 1052–1079.
- .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24.4 (October 1998): pp. 339–377.

- ,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 (November 1990): pp. 835–865.
- , and C.X. George Wei, eds. *China: How the Empire Fell*. London: Routledge, 2014.
- Fitzgerald, John.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Fogel, Joshua A. *Ai Su-c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 Friedman, Edward,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albiati, Fernando.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 Press, 1988.
- .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Xi'an Incident,”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6 (1991.7): pp. 145–175.
- Goldstone, Jack.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Greer, Tanner. “The Theory of History that Guides Xi Jinping,” *Palladium*, July 8, 2020.
- Guy, R. Kent. *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 Hershatter, Gail.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 Harrison, James P.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 Hartford, Kathleen,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M.E. Sharpe, 1989.
- Hofheinz, Roy.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East Asian Series, 1977.
- Holm, David. “The Strange Case of Liu Zhida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7 (January 1992): pp. 77–96.
- Hosie, Alexander. *On the Trail of the Opium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 Boston: Small Maynard & Co., 1914.

- Ishikawa Yoshihiro (石川禎浩).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 Joshua Fog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Jacobs, Justin M. *Xinjia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 Jacobson, Carl Whitney. “Brotherhood and Society: The Shaanxi Gelaohui, 1867–191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h.D. dissertation, 1993.
- Jen, Yu-wen. *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Jocelyn, Ed, and Andrew McEwen. *The Long March: The True Story behind the Legendary Journey That Made Mao's China*. London: Constable, 2006.
-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Kampen, Thomas.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0.
- Keating, Pauline B.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Keyte, J. C.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
- Kim, Hodong. *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 Stanford: Stanford U. Press, 2004.
- Kotkin, Stephen. *Stalin*. Vol. 1: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 Vol. 2.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4, 2017.
- Lamley, Harry.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under Qing Rule,” in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Albany: SUNY Press, 1990: pp. 27–58.
- Lang, Olga.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 Lattimore, Owen.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 Li, Huaiyin. *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ipman, Jonathan N. *Familiar Strangers: A History of Muslims in Northwest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 Liu, Kwang-ching and Richard J. Smith. "The Military Challenge: 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 in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02–273.
- Liu Ts'ui-jung. *Trade on the Han River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 1800–1911*. Nankang, Taipei: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1980.
- McDonald, Angus W.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Meisner, Maurice J.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Mao Zedong (毛澤東).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1.
- Mi Zanchen (米暫沉). *The Life of General Yang Hucheng*, trans. Wang Zhao.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1.
- Michael, Franz H.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 Murray, Jeremy A. *China's Lonely Revolution: The Local Communist Movement of Hainan Island, 1926–1956*.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7.
- Nichols, Francis H. *Through Hidden Shensi*.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02.
- North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北華捷報》). Shanghai, 1870–.
- Paige, Jeffery M.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 Pantsov, Alexander 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 Parsons, James Bunyan. *The Peasant Rebellions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0.

- Peattie, Mark,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Perry, Elizabeth J.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 .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 “Reclaim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7.4 (2008): pp. 1147–1164.
- Pomeranz, Kenneth.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Pomfret, John.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n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enry Holt, 2016.
- Popkin, Samuel L.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Reynolds, Douglas R. *China: 1898–1912—The Xin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
- Ristaino, Marcia R. *China's Art of Revolution: The Mobilization of Discontent, 1927 and 1928*.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oss, Edward Alsworth. *The Changing Chinese*.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11.
- Rowe, William T. *Crimson Rain: Seven Centuries of Violence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 Saich, Tony, and Benjamin Yang, eds.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Armonk: M.E. Sharpe, 1996.
- Salisbury, Harrison E.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5。
- Schneewind, Sarah. *Shrines to Living Men in the Ming Political Cosmo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 Schram, Stuart R. *Mao Tse-tung*.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7.
-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 ,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chram, Stuart R,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8 vols. Armonk: M.E. Sharpe, 1992–2005.
- Schran, Peter.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6.
-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Scott, James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Selden, Mark.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E. Sharpe, 1995.
- . “The Guerrilla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28 (October–December 1966): pp. 63–81; and 29 (January–March 1967): pp. 61–81.
- .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eybolt, Peter J. “Terror and Conformity: Counterespionage Campaigns, Rectification, and Mass Movements, 1942–43,” *Modern China*, 12.1 (January 1986): pp. 39–73.
- Sheng, Michael.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eridan, James E.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ü-hsi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Snow, Helen Foster. *My China Year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4.
- Snow, Edgar.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 .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71.
- .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 . *Red Star over China*. 1st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Grove Press, 1973.
- Sommer, Mathew H.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Song Ziwen (宋子文). "T.V. Soong Sian Diary," *T.V. Soong papers*, Box 59, folio 21,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 Spence, Jonathan D. *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6.
- Stranahan, Patricia. *Underground: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1927–1937*.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 Sun, Shuyun. *The Long March: The True Story of Communist China's Founding Myth*. New York: Doubleday, 2006.
- Swope, Kenneth M. *The Military Collapse of China's Ming Dynasty, 1618–44*. London: Routledge, 2014.
- Tan, Chester. *The Boxer Catastrophe*. New York: Norton, 1967.
-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Teichman, Eric. *Travels of a Consular 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1.
-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i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3.
- .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M.E. Sharpe, 1990.
- Teng, Ssu-yü. *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 1851–1868*. Paris: Mouton, 1961.
- Thomas, S. Bernard.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Thornton, Patricia. *Disciplining the State: Virtue, Violence and State-Making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Tong, James. *Disorder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Van de Ven, Hans J.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Van Slyke, Lyman P. *Enemies and Friends: 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Vermeer, Eduard B.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ovincial China: The Central Shaanxi since 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Vogel, Ezra F.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The Study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2 (1977): pp. 201–237.
- .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risis,” *Late Imperial China*, 7.1 (June 1986): pp. 1–26.
- Waldron, Arthur.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Wales, Nym [Helen Foster Snow]. *Inside Red China*.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 1939.
- Walker, Michael H. *The 1929 Sino-Soviet War: The War Nobody Knew*.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6.
- Wallace, Harold Frank. *The Big Game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Being an Account of a Journey from Shanghai to London Overland across the Gobi Desert*. New York: Duffield and co, 1913.
- Wang Yeh-chien.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eber, Eugen.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Wilbur, C. Martin,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Wilson, Dick. *The Long March, 1935: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2.
- Wolf, Eric R.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 Wou, Odoric Y. K.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Wu, Tien-wei. *The Sian Incident: 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6.

- Wylie, Raymond Finlay.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Xiang, Lanxin.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War: A Multinational Stud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 Xu You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 "Heroes, Martyrs, and Villains in 1930s Shaanbei: Liu Zhidan and his 'Bandit Policy'," *Modern China*, 44.3 (2018): pp. 243-284.
- Yang, Benjamin. "Complexity and Reasonability: Reassessment of the Li Lisan Adven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1 (Jan. 1989): pp. 111-141.
- . *From Revolution to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Long Mar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文期刊及文獻

- 〈安定(今子長)縣早期黨組織的創建及其主要活動〉。出版地點不詳，1988。
- 《安定縣志》(1846)。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白壽彝編：《回民起義》。北京：神州國光社，1952。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兩卷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
- 曹樹基：《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 柴樹藩、于光遠、彭平：《綏德、米脂土地問題初步研究》(1942)。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出版地不詳：北極書店，1940。
-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 陳忠實：《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 楚雲：《陝行紀實》。漢口：讀書生活出版社，1938。
- 《大公報》。天津，1902-。
-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
- 鄧野：〈閻錫山對紅軍東征的攔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頁49-68。

- 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和研究》，1985，頁266—274。
- 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志》，第7卷：陝西省。東京：東亞同文會，1918。
- 〈杜斌丞〉，《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4卷，頁287—324。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 房成祥、黃兆安：《陝甘寧邊區革命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 《甘泉縣鄉土志》（約190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金沖及：《毛澤東傳》，6卷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 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
- 甘肅省志人口志編纂委員會編：《甘肅省志·人口志》。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1。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英文版：《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translated by Stacey Mosher and Guo Jia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9.
- 《共進》。北京，1921—1926；重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郭德宏編：《王明年譜》。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 郭洪濤：《郭洪濤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 衡之：〈陝北匪魁劉子丹〉，《中外問題》，14冊3號，1936。
- 侯昌銘編：《保安縣志略》，1898年手稿，http://xadfz.xa.gov.cn/difangzhinew/muluFrame.jsp?bookname=gx_baoan_xianzhiluo。
- 侯家國：《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及其運作》。台北：黎明文化事業，1979。
- 華統：《陝甘寧邊區全貌》（1940年9月），載張厚德編：《中共邊區根據地的歷史文件選輯》，《共黨問題研究》11卷1期（1985）。
- 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 黃正林：〈1935年陝甘邊蘇區和紅26軍肅反問題考論〉，《史學月刊》，2011年第6期，頁56—68。

- ：〈同治回民事變後黃河上游區域的人口與社會經濟〉，《史學月刊》，2008年第10期，頁78-88。
- 霍維洮：〈董福祥起家與同治年西北政治形勢〉，《寧夏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頁52-58。
- 賈巨川：《習仲勛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約1979。
- 經盛鴻：《胡宗南大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
- 《靖邊縣志稿》(1899)。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爵秩全覽》(1904)。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 康永升：《徐海東大將畫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
- 匡裕祥：〈陝西膚施縣概況〉，《開發西北》，2期4號，1934年10月，頁70-74。
- 雷雲峰等編：《陝甘寧邊區史》。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4。
- 李赤然：《李赤然將軍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 李海文：〈西安事變前國共兩黨接觸和談判的歷史過程〉，《文獻和研究》，1984，頁350-361。
- 李建國、尚季芳編：《近現代西北社會研究：發展與變革》。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
- 《歷史檔案》。北京，1981-。
- 李泰棻：《國民軍史稿》。出版地點不詳，1930；重印於《西北軍紀事》。香港：1978。
-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 李振民等編：《陝西近現代名人錄》。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88。
- 〈李子洲〉，《中共黨史人物傳》，第7卷，頁77-10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
- 劉米拉、劉都都編：《劉景範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 劉志丹：《劉志丹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劉志丹〉，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191-228。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 路偉東：〈清代陝西回族的人口變動〉，《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頁71-77。
- 蘆振國、姜為民編：《紅二十五軍長征紀實》。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 羅志田：《激變時代的文化與政治——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馬文瑞：《馬文瑞回憶錄》。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
- 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簡史》。上海：東方書社，1951。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4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孟廣涵主編：《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紀實》。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 《米脂縣志》。出版地點不詳，1907。
- 秦孝儀等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五編：中共活動真相》。台北：中國國民黨，1985。
-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出版機構不詳，1977。
- 《秦鐘》。北京，1920；重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三原縣志編纂委員會編：《三原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
- 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陝西省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 〈陝甘寧調查專報〉，國民黨中統局調查報告，日期不詳（疑為1938年），BOI 575.292/815，斯坦福圖書館抄件。
- 《陝西黨史資料通訊》，1983-。
- 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 陝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省志》，第6冊，《氣象志》。北京：氣象出版社，2001。
- 陝西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教育資料》。西安：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
- 《神木鄉土志》（約191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沈強、王新華：《抗戰時期蘇聯援華史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沈青崖、吳廷錫等編：《陝西通志續通志》（1933）。台北：華文書局重印，1969。
- 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日本當代中國研究》（2012），頁16-51。<https://www.waseda.jp/prj-wiccs/wp/wp-content/uploads/2012/07/jscc2012.pdf>
- 宋毅軍：〈中共在西安事變前後的軍事戰略防禦〉，《軍事歷史研究》，1992年第4期，頁15-25。
- 《綏德州志》（1905）。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 《統計月報》。西安，1930-。
- 王建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香港：中文圖書供應社，1974-1975。
- 王金絨：《西北之地文與人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 王謙益：〈回憶六十年前三原學生的革命活動〉，《三原文史資料》，第2輯，1986年12月，頁120-129。
- 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 王樹才：《陝北共產黨的老掌櫃崔田夫》。北京：出版機構不詳，2010。
- 王樹林：〈共產國際、蘇聯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落腳點的確立〉，《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學報》，2017年第2期，頁90-108。
- 王曉中：《中顧委工作紀實(1982-1987)》。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 〈魏野時〉，《中共黨史人物傳》，第5卷，頁131-174。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
- 《文獻和研究》。北京，1982-1987。
- 吳福章編：《西安事變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 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 ：《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回憶錄卷》。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 《西京日報》。西安，1933-。
- 蕭李居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43)民國29年1月至6月》。台北：國史館，2010。
- 《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謝子長〉，《中共黨史人物傳》，第3卷，頁229-258。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 許有成、許曉彬：《于右任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 《延綏鎮志》(1673)。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8。
- 楊得志等編：《紅軍長征文獻》。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
- 楊奎松：〈抗戰初期中共軍事發展方針變動的史實考析——兼談所謂「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方針的真實性問題〉，《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頁4-26。
-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 ：〈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頁254-275。
-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 ：《「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 於憑遠、羅冷梅：《胡宗南上將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14。

- 榆林地區地方志指導小組編：《榆林地區志》。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
- 袁文偉：《反叛與復仇——民國時期的西北土匪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張寶同：〈旅京學生群體與中共陝西早期黨組織的源起〉，《蘇區研究》，2020年第2期，頁13-24。
- 張策：《我的歷史回顧》。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
- 張海鵬、李細珠：《新政、立憲與辛亥革命》，張海鵬編：《中國近代通史》，第5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張君洋等編：《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黨的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
- ：《隴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政權建設》。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7。
-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3版）。長春：吉林出版社，2007。
- 張文杰等編：《紀念朱理治文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 趙通儒：《陝北各縣早期黨史資料》。出版地點不詳：1958。
- 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編：《紅二十六軍與陝甘邊蘇區》，2卷本。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
-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陝西省委》。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 ：《西北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 、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共進社和〈共進〉雜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 ：《渭華起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不詳。
- ：《清澗旬邑等地的武裝起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
- ：《辛亥革命在陝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共咸陽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渭北革命根據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 、中共榆林地委黨史辦、中共神木縣委黨史辦編：《神府革命根據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
- 中共陝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陝西省社會科學院黨史研究室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陝西大事記述》。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
- 中共西北中央局宣傳部：《固臨調查》。延安：1942。
- 中共志丹縣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志丹歷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9。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 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2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北京：軍事科學院、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中共子長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安定（今子長）縣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發展》。出版地點不詳，1988。
- 中共子長縣委組織部、中共子長縣委黨史研究室、子長縣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陝西省子長縣組織史資料（1925.春-1987.10）》。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
-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文獻彙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63。
- 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中統：〈半年來陝甘寧及川康邊境赤匪之竄擾概況〉，1937年3月，BOI 270/815。
- 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編：《陝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出版地點不詳，1991-。
- ：《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文件彙集》。出版地點不詳，1994。
- 《中央日報》。南京，1929-。
-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 竹內實編：《毛澤東集》。東京：北望社，1972。
- 子長縣民政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子長陵資料》。延安：出版日期不詳（序言寫於1991年）。

索引

兩畫

〈七筆勾〉 42

九一八事變 149–151, 189–190, 260

二七慘案 77

人口 15, 39, 44, 47, 50, 55, 60–64,
122, 244, 268, 278–279, 300–301,
350–352, 356, 358, 364

刀客 106

三畫

三民主義 89, 334, 337

三交鎮 273

三原 66–67, 84, 88–89, 91, 96–97, 113,
121, 127, 165, 167, 171–174, 176,
185, 203, 208, 230, 240, 313, 315,
318, 327, 340, 375

渭北蘇維埃 154–162, 171–172, 383

籌賑委員會 155

三嘉原事件 143–144, 162, 203

下寺灣 215, 257

口述材料 7, 306

土地改革/土改 49, 159–160, 162, 178,
203, 209, 216, 233, 241, 243–244,
265, 267, 276, 281, 348, 353, 369,
382–383, 391

土皇帝 81, 84, 128, 229

土匪 2, 15, 20, 54, 55, 61, 69, 83, 88, 121,
124–125, 158–160, 164–165, 167–168,
195–196, 208, 352–5, 369–370

土豪劣紳 99, 110, 126, 223, 229, 276

士紳 46–48, 62–66, 69, 83, 111–114,
123, 127, 147, 155, 158, 160, 174,
195, 208, 223, 227, 352, 355,
369–371, 387

《大公報》 181–182, 265, 275–276, 277,
300, 311, 323

四畫

中山軍事學校 93, 108

中山學院 93

中央蘇區 204, 213, 252, 254, 379

中東鐵路 150–151

中國共產黨

文獻記錄 14, 17–18, 90, 102, 174,
179, 222, 298, 360

回憶錄 18–19, 206, 210–212, 219,
239, 244, 290, 311, 397

早期歷史 20, 71–120, 381–382

八七會議 101–103, 119

交通員 18, 115, 117, 149, 194, 301

教條主義 13, 20, 149, 230, 383,
387–388, 393

- 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 154, 166, 173
 六大 234, 253, 391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 264
 中央—地方矛盾 71, 262, 264
 統一戰線 21, 25, 77, 90, 98, 242, 266–267, 269, 271, 279–292, 298, 303–304, 310–312, 325–326, 329, 335–338, 340, 342–343, 348, 358–359, 370, 379, 385, 387, 395
 意識形態 96, 241, 392–393
 五卅運動 91
 五四運動 71–74, 138, 381, 398
 井岳秀 84, 88, 102, 106, 128, 195–196, 198, 213, 217–218, 266, 352
 內蒙 92, 199, 203, 218, 230, 235, 269, 280, 380
 六盤山 128
 少年先鋒隊 159, 228, 271, 275–276
 尤祥齋 138, 194–195
 屯田 31
 戈壁 21, 26, 28, 195, 310
 日本
 侵略 2, 21, 86, 142, 149–151, 155, 178, 189, 194, 212, 260, 279–280, 284, 290, 292, 310, 341, 383
 (參見抗日戰爭)
 「日弄主義」161
 毛澤東 6–9, 14, 16–17, 21, 26, 72, 91–92, 98, 101–102, 122, 165–166, 181–184, 204, 213–214, 232, 239, 246–247, 250–263, 265–266, 268–274, 277, 279–280, 282, 287–288, 290–295, 298–299, 301–309, 312–313, 317–319, 321, 325–326, 336, 339–340, 342–344, 346–347, 360, 367, 372–377, 379–380, 384–385, 389–390, 392–395, 397
 著述 1, 3, 78, 96, 250, 270, 317, 393–394
 王世泰 170, 203, 207
 王以哲 309, 314
 王尚德 116
 王明 3, 204, 231, 289, 291, 342, 362, 375
 「左傾機會主義」17, 249
 〈八一宣言〉287–288
 王若飛 375–376
 王首道 238
 王泰吉 176, 184–185, 187, 190
 王稼祥 261, 342
 五晝
 北京/北平 14, 25, 32–33, 50, 65, 72–73, 75, 79, 83–84, 86, 92, 106, 114, 120, 139, 155, 183, 194–195, 206, 229, 240, 267, 280–282, 293, 308, 335, 380–382, 384
 北京大學 72, 75–76, 112, 137, 253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72, 84
 史可軒 93, 108
 左宗棠 57–60, 62, 64, 67, 381
 平型關 340
 必然 2, 251, 394–397
 民主 73–74, 77, 141, 328, 331–332, 334, 365–366
 民團
 團練(清) 50–52, 393
 團匪 53, 58, 130
 民團(民國) 20, 83, 97, 111, 124, 126–127, 130–132, 135–136, 139, 143, 159, 161–163, 173, 176, 183–184, 186, 188, 211, 224, 234, 243, 245, 247, 263, 296–297, 300, 315, 328–329, 370, 382–384, 386, 389, 391
 永寧山 55–56, 124, 128, 277
 瓦窯堡 137, 210, 225, 230, 236–238, 246, 256, 266–267, 269, 274–277, 281, 288, 290, 299, 303, 325, 329, 344–345, 373

- 生員 48
 田野調查 5, 12, 16–17, 273
 白話 74–75
 白蓮教起義 26, 49
 石謙 106
- 六畫
- 交農 147, 155
 共產國際 4, 17, 21, 91, 100, 114–115, 119, 145–147, 161, 204, 253, 255, 268, 269, 276–277, 286, 299–302, 304, 311–312, 324–325, 332, 342, 380, 382, 387, 392–393
 反帝 150–151, 153
 七大 266–267, 287, 289, 291
 (參見蘇聯)
- 《共進》74–75, 77, 82–83
 共進社 74, 75, 77–78, 82, 96, 112, 114, 124, 127, 139
 匈奴 29–30
 同盟會 67–69, 72, 84, 89, 155, 326
 回回 50–55, 58
 (參見叛亂)
- 地方史 12, 380, 387
 地方精英 12, 46, 84, 125, 130, 174, 189, 329, 346–347, 371, 389
 「地瘠民貧」28–29, 40, 85, 318
 安子文 221
 安定 20, 96–97, 106, 137–140, 143–144, 183, 194–196, 199–203, 207–211, 217, 219–220, 223, 225, 227–228, 251, 256, 266, 277, 300, 339, 344–345, 382–383, 394
 托派 112, 149, 151, 234, 312, 342, 391
 朱理治 229–233, 235, 237–238, 240, 242, 247, 264, 266
 羊 216, 244
 放羊 38–39
 自衛隊/自衛軍 99, 296, 330, 368
 西北工作委員會 137, 233
 西北反帝同盟軍 142, 144
 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 190
 西北局高幹會議 19, 134, 242, 246
 西北抗日義勇軍 191
 西北軍 20–21, 213, 281, 287, 313, 320, 385
 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 19, 244
 西北國防政府 286–287, 303, 309
 西安 17–18, 26, 33, 37, 52, 65–68, 73, 79, 84, 86–89, 93, 96, 101, 103, 107–108, 111, 113, 120, 124, 128, 134, 138, 144–148, 152, 162, 166, 169, 171–172, 174, 176–178, 183, 185, 192, 194, 200, 206, 213–214, 217, 234–235, 240, 259, 284, 286, 293, 305, 308, 309, 311–315, 318, 320, 322–323, 337, 340, 345, 349, 381–385, 391
 古代的帝都 25
 慈禧、光緒西狩 65
 西安事變 14, 21, 25, 105, 231, 234, 278, 295, 309–315, 318, 320–323, 325, 327, 329–330, 332, 339–340, 344, 367, 370, 385, 391–392
 西夏 30
- 七畫
- 何紹南 339, 353–354, 358, 369
 何應欽 280, 313, 321, 355, 357
 呂梁山 26
 宋子文 312–314, 320–321, 323, 334, 336
 宋美齡 290, 313, 320
 宋慶齡 290, 293, 307
 抗日 2, 3, 6, 9, 149–152, 181–182, 189–191, 218, 234, 242, 249, 260–261, 268–269, 271–273, 280, 282–286, 289, 291–293, 304, 309–310, 312–314, 319–321, 325–326, 330, 335–336, 340, 343–344, 346, 348, 352, 355, 359, 374, 379, 382–383
 抗日軍政大學/抗大 2, 344, 358

- 抗日救國會 283
 抗敵後援會 346
 李大釗 75-76, 86, 119-120
 李子洲 73, 76-77, 85-86, 90, 93, 95,
 101-103, 105-106, 112, 114, 117,
 119-120, 137, 148, 195
 李自成 32, 319, 380
 李杰夫(高維翰) 140, 144, 163, 165,
 167, 174
 李象九 106, 108
 李鼎銘 370
 李維鈞 143-144
 李維漢 272
 杜聿明 370
 杜斌丞 84-85, 88, 134, 142, 195
 杜衡 152-154, 163, 165, 168-174,
 176-178
 政委 168-170, 177
 秀才 48, 123
 秀延河 196
 秀延縣 208, 211, 219-220, 345
 赤源 208, 211, 219
 赤衛隊/赤衛軍 159-160, 201, 215,
 220, 224-226, 228, 256, 265, 271,
 275-276, 330
 辛亥革命 9, 12, 59, 66, 68, 72, 81-82,
 88-89, 106, 129, 132, 155, 326, 360,
 381, 396
 與哥老會 59, 68, 81-82, 106, 129,
 360, 381
 八畫
 「受苦人」39
 定仙 227
 定遠營 303-304, 307
 延川 107, 225, 227-228, 277, 327, 339,
 343
 延安 1-9, 14, 20-21, 26, 29-30, 32, 38,
 39, 41, 45, 60-61, 63-64, 69, 82, 107,
 170, 182, 183, 228, 230-231, 235,
 256, 266, 277, 284-285, 290,
 293-296, 306, 314, 327-328,
 330-331, 335, 346-347, 354, 359,
 365, 367, 379-380, 385-386, 397, 399
 「延安道路」4, 6, 250
 「革命聖地」8, 250, 373
 1937年的情況 250-252, 318-319,
 338-339, 358, 370-376
 延長 107, 221, 226-228, 318, 327, 333,
 339, 343
 性病/花柳病 44, 371
 東北軍 21, 105, 213, 235-236, 260-261,
 271, 274, 281-287, 293, 299-300,
 303, 309-310, 313-314, 318, 320,
 327, 339-340, 385-386
 東征 268-274, 280, 283, 298, 302, 309,
 330, 385
 林育英 266, 269, 304
 林彪 261, 269
 直羅鎮戰役 246, 260-261, 282, 346
 社會主義青年團/共產主義青年團 87,
 95, 112, 116-117, 174, 234, 330
 邵力子 171, 191, 213, 312
 金理科 157
 金湯鎮 124
 金積堡 58
 長征 2-3, 9, 181-182, 184, 190, 214,
 254-255, 261, 265, 267, 270, 296,
 299, 302, 318, 321, 327, 339, 347,
 368, 372-376, 379, 392
 目的地 26, 249, 251-252, 257, 268,
 380, 385
 倖存者 252, 257-258, 262-263, 298,
 374, 393
 長城 26, 30, 34, 189, 195, 227, 270, 318,
 380
 九畫
 俄界 255
 俄國革命 75-76, 178
 保甲 48, 188, 207, 327, 342, 346-347,
 353-354, 363

- 保安 29, 45, 54–56, 60, 64, 122, 124,
128–129, 131–132, 135–137, 139,
167–168, 183, 186, 211, 215–216,
227–228, 236, 244–246, 265, 274, 277,
293–296, 299–300, 303–304, 307,
310, 312, 315, 318, 327–329, 335, 339,
359–360, 370, 379, 382, 384–385
- 保長 48, 188, 355
- 南梁 111, 172, 183–186, 193, 200–201,
203–206, 207, 214–215, 225
- 叛亂 2, 26, 28, 33–36, 60, 321, 323
- 晚明 20, 31, 34–35, 43
- 回亂 15, 20, 49, 51–64, 122,
127–128, 186, 216, 244, 348, 370,
380–381
- 朱龍 36–37
- 太平天國 48–50, 52, 57, 380
- 捻軍 11, 49, 52–54, 57
- 洛河 28, 47, 51, 54–55, 61, 215–216,
225, 245, 328
- 流氓 82, 102, 104, 140, 167, 184, 239,
241, 244, 347, 361
- 科舉 39, 46, 48, 62–65, 123, 126
- 舉人的分佈 47, 62–64
- 紅軍
- 陝甘游擊隊 144, 163, 204–205, 209,
 233, 243, 263
- 二十五軍 162, 192, 224, 231–232,
 236, 237, 246–247, 258–259, 262,
 384, 389, 393
- 二十六軍 122, 162–179, 184,
 187–188, 192–193, 200, 203, 206,
 217, 220, 231–232, 233, 246, 258,
 256, 261, 266, 281, 383–384
- 武器 142, 163, 225, 227, 259–260,
 301, 303–304
- 1935 年的攻勢 213–215
- 新四軍 356, 391
- 規模 163, 181, 231, 250, 252,
 256–260, 271, 274, 278–279, 292,
 298, 301–302, 310, 323
- 招兵/「擴紅」211, 220–221, 260, 263,
 268, 271–274, 298, 302, 339
-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217, 233, 238,
 255, 261, 303
- 紅十五軍 233, 258, 261, 301
- 一方面軍/中央紅軍 204, 246, 249,
 253–256, 258, 260–262, 300,
 304–305, 308, 384
- 二方面軍 298, 304, 307–308, 339
- 四方面軍 174, 253–256, 260,
 304–308, 319
- 西路軍 306, 315, 319, 372
- 改組 322
- 紅槍會 104, 111, 129, 176
- 胡景翼 89
- 苗家祥 174–175
- 范仲淹 30
- 軍閥 20, 22, 69, 71–73, 75, 77–78,
80–81, 83, 86, 88–89, 92, 99, 102,
106–109, 113, 128–135, 139, 142,
145, 148, 163, 190, 195, 211, 213,
217, 242, 262, 266, 282, 284, 286,
291, 299, 304, 306, 310, 324, 329,
352, 372, 381
- 土匪軍閥 80, 135
- 革命 8–14, 21–23, 71, 387–399
- 哥老會 13, 59, 66–69, 80–84, 106,
125–126, 129, 135–136, 139, 186,
191, 196, 199, 215, 234, 242, 245,
247, 263, 307, 328, 344, 347, 349,
360–361, 370, 375, 381–382, 389
- 十畫
- 唐澍 106–108, 110–111
- 埃德加·斯諾 3, 28–29, 40, 122, 231,
235, 254, 257–258, 277, 292–299,
307, 312, 315, 318, 332, 358, 379,
385, 390
- 《紅星照耀中國》251–252, 293–295,
374
- 孫平章 161

孫銘章/孫帝國 159–161

家族 20, 44, 51, 122, 157, 159, 162, 186,

198, 201–202, 208, 222, 329, 370

徐海東 235–236, 239–240, 244–247,

261–263, 265, 281

二十五軍 192, 224, 231–232,

236–237, 246, 258–259, 262, 301,

318, 384, 389, 393

鄂豫皖蘇區 21, 192, 231, 238–239,

262, 384, 388

肅反 231, 237–240, 246–247, 263,

384, 388

恐怖 113, 115, 179, 188, 199, 224, 386,

389

柵邑/旬邑 112, 162, 339, 345–346

特殊階級 76

《秦劫痛話》72

秦邦憲/博古 119, 153, 264

秦嶺 25–26, 176

耿炳光 112–114

袁岳棟 177–178

貢生 123

陝北

生態 26–28, 127, 195, 381

貧窮 20, 28–29, 37–48, 85, 295, 331,

373

文化 37–48

衛生 40–41, 44

邊界 30–31, 379

城鎮 39, 48, 54, 168, 230, 256, 275,

277, 315, 386

多樣性 356

陝北公學 358

陝甘交界 20–21, 60, 121, 195, 216, 225,

233, 260, 318, 329, 370, 379–382,

387

陝甘寧

經濟政策 5

選舉 332–335, 365–366, 369–370, 386

邊界 1, 182, 339, 343, 356

稅收 331, 367

國民政府的支持 327, 337, 367, 386,
392

治安 359–360, 386

農村管理 361–363

教育 358, 364–365, 370–371, 373,

387, 394

封鎖 355–356, 387, 391

陝西

古代帝國的 centre 25

生態 25–28, 128

「落後」25–26, 40–42, 65, 67, 69, 72,

79–80, 85, 93, 104, 107, 113, 153,

183, 308, 356, 381–382

「革命的西北」93

陝西黨

與共進會 75, 77–78, 82, 85, 96, 112,

114, 124, 127, 139

建立 20, 26, 71–120

黨員 86–87, 90–98, 100–105,

108–109, 113–117, 131, 145–146,

148–149, 160, 162, 177, 179, 196,

198–199, 202, 208–209, 219–222,

231, 245, 329–330, 333–334,

351–352, 355, 361–362, 366,

383–384, 386

農民運動 96, 97–99, 101–102,

105, 110, 116–117, 165, 382,

389–390

在學校 20, 71–72, 83–87, 103–106,

109–110, 117, 131, 183, 196,

198–199, 209, 219, 371, 394

知識分子的參與 2, 9, 14, 75, 77–78,

80–81, 83, 86, 88, 91, 95, 101,

112, 146, 152, 196–199, 207, 221,

240, 243, 381–382, 395

省委(及早期陝甘省委) 20, 95–96,

101–104, 106–110, 112–114,

117–121, 132, 140, 144–147,

152–153, 157–158, 163, 165–169,

171, 173, 176–177, 179, 184–185,

193–194, 200, 203–206, 233–235,

- 240, 247, 264, 269, 281, 382–383, 388, 392
- 綏德 20–21, 39, 73, 85–86, 95–96, 103, 105–106, 117, 127, 136–137, 152, 195–196, 198, 209, 213–214, 218, 225, 227, 271, 352, 358, 365–366, 369–371, 374, 387
- 經費 107, 116–119, 145, 149, 164, 171, 194, 382, 392
- 婦女的參與 95, 116, 118, 198, 276, 282–283, 297, 371–372, 374
- 兵運 116, 132, 134
- 「富農路線」147, 222, 230
- 1933 年大搜捕 121, 177–179, 240, 383
- 「陝北」—陝甘之爭 194–202, 205–206
- 家庭的參與 201–202
- 「赤化」村 208, 219
- 陝南 2, 26, 32, 49–50, 61–62, 162, 174, 192, 205, 230–231, 258–259, 269, 275, 281, 313, 318–319
- 馬文瑞 375
- 馬列主義 79, 169, 330, 365
- 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75–77
- 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8, 86, 148, 186, 250, 255, 393
- 馬明方 217
- 馬鴻逵 128, 133, 213, 242, 299, 306–307
- 馬鴻賓 213–216, 218, 225
- 高桂滋 213, 218, 224–225, 228
- 高崗 85, 94, 110, 169, 177–178, 217–218, 232, 237, 242, 246, 258, 264, 312, 334–335, 364, 367, 389
- 省委 166–167, 170, 177, 184–185, 206
- 二十六軍政委 184–185, 187, 206–207, 375, 384
- 作風問題 19, 187, 206, 372, 375–376
- 高福源 282–283
- 十一畫
- 乾旱 2, 31, 53
- 偶然/意外 2, 23, 251–252, 255, 380, 389, 396–397
- 國史館 18
- 國民政府/南京政府 25, 128, 145, 153, 189–191, 207–208, 280, 283–285, 292, 310–311, 313, 318, 320–325, 327, 331, 333–337, 339, 342, 354–355, 367, 391–392
- 圍剿 181, 212–215, 218, 236, 249, 385
- 與蘇聯的關係 289–290, 337, 386
- 國民軍 92, 94
- 國民革命同盟會 326
- 國民黨
-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90
- 派系之爭 93, 228, 312–314, 336
- 1937 年中央全會 322
- 與統一戰線 21, 25, 77, 90, 98, 242, 271, 289, 291–292, 304, 312, 314, 320, 324, 326, 335–338, 340, 342–343, 385
- 「磨擦」21, 331, 343–345, 349–351, 355, 364, 374, 386
- (參見蔣介石·國民政府)
- 國家 15, 18, 22, 30, 47, 65–66, 72, 75, 85, 93, 151, 172, 178, 212, 214, 264, 299, 311, 324, 331, 333, 358, 381, 386–387, 393, 398, 399
- 「堅壁清野」205, 215
- 婦女 38, 41, 43, 52, 141, 157, 187, 224, 275, 283, 297, 329, 361, 366, 368, 372, 374
- 1920 年代 116
- 兩性關係 44, 125, 143, 276, 371, 376
- 崔田夫 194, 207, 217, 220
- 康澤 353
- 張廷芝/張庭芝 132, 328–329, 359, 370
- 張秀山 237–238
- 張國燾 169, 181–182, 192, 213, 253–256, 258–259, 262, 268, 279, 287, 300, 304–306, 319, 380

- 張策 125
 張漢民 162, 231
 張聞天 153, 182, 246, 269, 295
 張慕陶/張金印 112, 234–235, 240, 243, 247, 312
 張慶孚 234
 張學良 21, 105, 213, 235–236, 260–261, 293, 311, 313–314, 318, 320–321, 339
 和中共 271, 281–287, 290–291, 303–304, 309–310, 385
 張獻忠 32
 強世清 200
 救國會 283, 343
 教育 1, 40, 42, 46–47, 62, 64–66, 75, 81, 84–86, 89, 97, 107, 109, 114, 120, 123, 133, 135, 141, 143, 167, 169, 187–188, 193–195, 198, 206, 208, 221, 228–229, 241, 263, 281, 288, 293, 296, 329–330, 341, 343, 348, 352–353, 358, 362–365, 368–371, 374–375, 382–383, 386–387, 393–394
 官員 98, 131, 196
 激進教師 67
 曹力如 365
 曹火星 395
 清洗 7, 13, 20–21, 100, 116, 167, 170, 185, 233, 238–241, 244–246, 335, 384, 390
 清朝 31, 33–37, 40–41, 44, 46, 47, 49, 52, 57, 59, 62, 65–66, 69, 81–82, 88–89, 196, 328, 381, 393
 清潤起義 108, 139
 移民 2, 26, 35, 43–45, 127, 186, 201, 244, 370, 380
 統一戰線 25, 266–267, 269, 271, 279–292, 303–304, 314, 324–326, 329, 335–338, 340, 342–343, 348, 358–359, 370, 379, 387, 396
 1920年代 77, 90, 98, 242
 抗日 21, 281, 284, 298, 310, 312, 320, 385
 習仲勛 19, 112, 133, 172, 179, 217, 237, 246, 249, 346, 375, 384, 389
 許權中 108–110
 郭洪濤 195, 203–206, 210, 217, 223, 229, 231–233, 237, 241, 246–247, 261, 264, 266, 334
 郭寶珊 190–191, 227
 陳立夫 290, 308, 323
 陳珪璋 135
- 十二畫**
 勞山戰役 235–237, 244, 246, 259, 263, 393
 富田事變 239, 264, 388, 390
 彭德懷 258, 260–261, 269, 273, 282, 293, 297, 307, 309, 318, 327, 337, 340
 惠子俊 217
 散紳 48
 斯大林 7, 147, 154, 162, 252, 269, 287, 293, 299, 304, 312, 362, 386, 390, 392
 斯大林的著作 3, 286, 393
 渭華起義 108, 110–113, 124, 139, 176
 游擊隊 14, 20, 61, 85–86, 120–122, 125, 128, 136, 148, 150, 154–155, 157–175, 177, 179, 183–188, 190, 193–195, 199, 202–206, 208–213, 215–217, 219, 222, 224–226, 228, 231, 233, 240, 243, 245, 261, 263, 265, 273, 276, 278–279, 301, 313, 315, 319, 321, 363, 370, 375, 379, 382–384, 387–388, 390–393
 招募土匪 121, 135, 139, 140–143, 158, 160, 164, 170, 172, 184, 204
 抽鴉片 127, 135, 175, 191
 (參見二十六軍)
 湘西蘇維埃 253, 380
 湯恩伯 236, 274–275, 299, 310, 314
 無定河 20, 62, 64, 127, 195, 198, 327, 352
 「無槍階級」78
 稅收 99, 100, 214, 219, 331, 341, 346–347, 350, 353, 355, 363, 365

- 抗稅 100, 110, 129, 147–148, 199, 366
 (參見交農)
- 程子華 233, 261
- 肅反 19, 233, 231, 237–247, 256, 259, 263–266, 334–335, 384, 388–389
- 賀晉年 238
- 賀龍 182, 253, 273, 300, 304, 318, 327, 339, 380
- 越南戰爭 9–10
- 進化社 74, 113
- 鄂豫皖蘇區 21, 192, 213, 231, 238–239, 262, 384, 388
- 階級鬥爭 77, 99, 166–167, 189, 201, 206, 223, 276, 281, 379
- 階級戰爭 77, 201
- 黃土 30, 39
 黃土高原 12, 28, 127
- 黃子文 155, 157, 163, 165, 167, 230, 240
- 黃子祥 155
- 黃埔軍校 91, 106–107, 122–124, 127, 133, 138, 226
- 十三畫**
- 愛國主義 71, 153, 373
 反日 151, 260, 271, 285, 298, 344, 359, 383
- 新文化運動 71–78, 88, 381
- 新疆 33–34, 57–58, 230, 254, 286, 303–304, 306, 319
- 新黨 113
- 楊仲遠 211
- 楊和亭 204
- 楊明軒 98
- 楊虎城 21, 88, 94, 104–105, 128, 134, 142, 148–149, 174–175, 177, 184, 190–192, 213–214, 231, 234, 240, 242–243, 281, 287, 312–313, 315, 318, 320–322, 385
- 楊森 259
- 榆林 20, 30–31, 34, 39, 62–64, 68–69, 88, 102–103, 106, 128, 198–199, 213, 217, 245, 256, 266, 269, 275, 277, 346–347, 358
 榆林中學 84–85, 122, 124, 134, 138, 166, 195, 203, 352, 371
- 照金 163, 170–174, 176, 183–185, 217, 345–346
- 碉堡/塢堡 130, 143, 214, 219, 225, 299–300, 355
- 綏德 20–21, 29, 36–37, 39, 58–59, 62–64, 69, 73, 95–96, 103, 106, 117, 127, 136, 137, 195, 209, 213–214, 218, 224–225, 227, 271, 276, 339, 358, 365, 369–371, 373–374, 387
 第四師範學校/綏德師範 85–86, 105, 152, 196, 198, 352, 371
- 義和團 9, 12, 16, 54, 65
- 董志原 52–53
- 董福祥 53–54, 58–59
- 解放軍 2, 23, 191
- 賈拓夫 204
- 農民運動 92, 96–99, 101–102, 105, 109–110, 116–117 147, 165, 382, 389, 395
- 農民運動講習所 91, 96
- 運輸/交通 15, 33, 38–39, 65, 79, 81, 92–93, 116, 208, 225, 259, 268, 275, 277, 305, 340, 346, 381, 396
- 過激黨 76
- 靖國軍 89
- 十四畫**
- 寧夏戰役 304–305
- 寧條梁 34, 58
- 滿人 57, 380–381
 旗兵 33, 37, 68
 征服 33, 67
- 蒙恬 29
- 蒲城 84, 128
- 豪紳 112–113, 126, 147, 150, 164, 189, 198, 222–223, 243, 328, 353

趙二娃/趙連璧 135, 143–144, 162, 203
 趙老五/趙思忠/趙恕忠 350–351, 359
 鄜縣/富縣 228, 260, 300, 339, 346–347

十五畫

閩變 189, 191–192
 劉子丹 212
 (參見劉志丹)
 劉天章 78
 劉志丹 20, 30, 55, 61, 162–163, 167,
 169–170, 174–176, 179, 183–188,
 190–192, 194–196, 200, 202–207,
 209–210, 212, 214–220, 223, 225–238,
 240–243, 245–268, 251, 256, 258–261,
 263–266, 269, 279, 281, 298, 307,
 328–330, 360, 370, 375, 379–380,
 382–385, 388–389, 393
 家庭背景 122–124, 243
 早年經歷 124–127, 131–136
 軍事領導人 91, 93, 108–11, 122,
 139–143, 187–188, 194, 266, 359
 政治理念 126, 186
 政治錯誤 205, 216, 229–231, 247,
 383
 死亡 21, 122–124, 136, 272–274
 劉景範 132, 144, 216, 237, 245, 375
 德莫克拉西 74
 暴力 52, 110, 127, 131, 155, 224,
 238–239, 241, 347, 386, 388–390
 (參見恐怖, 階級戰爭)
 潘漢年 290–291
 窯洞 1–2, 16, 39, 42, 182, 237–238, 250,
 294, 317–318, 373
 蔡子偉 243
 調查局 18, 179
 鄧寶珊 94, 104–105
 鄭毅 170
 「靠天吃飯」 28, 37
 鴉片 5–6, 59, 69, 75, 80–81, 83–84, 88,
 99, 101, 105–107, 125, 127, 129,
 135–136, 140, 143–144, 171–172,

175, 187, 191, 199, 208, 215,
 218–219, 223, 263, 275, 284, 297,
 354, 359–361, 363, 366, 382

十六畫

學生運動 73, 87, 161, 267, 280–281, 315
 整風運動 4, 6–7, 19–20, 206, 250, 264,
 379–380, 390–391, 393, 395
 燕京大學 293
 蕭勁光/肖勁光 261
 諮議局 65–66

十七畫

閻紅彥 139–140, 144, 155, 163,
 168–169, 195, 238
 閻錫山 138–139, 145, 181, 213–214,
 227, 269–274, 312, 340
 禁煙 187, 199
 戴季英 237–238, 247
 環縣 277, 300, 318, 339, 350–351, 359
 總紳 48
 薛家寨 171, 177
 謝子長 20, 85–86, 106, 108, 110–111,
 136–145, 162–163, 167–170, 183,
 193–212, 219–221, 238, 258–259,
 263, 344, 360, 382–384
 家庭背景 138
 紀律性 138, 143, 203
 在上海的經歷 193–194
 在張家口的經歷 194–195
 婚姻 138, 194–195
 死亡 210, 217, 384

十八畫

聶洪鈞 233, 247, 261
 魏野時 73–74, 76, 85–86, 88–90, 105,
 114, 120, 124, 195

十九畫

關中 20, 25–27, 42, 47, 49–50, 52–53,
 58, 62–64, 66, 68, 73, 82, 84, 86,

88–89, 93, 96, 101, 107–108, 111,
113, 121, 128, 148, 161, 165–167,
176, 183, 185, 200, 203, 206–207,
230, 240, 245, 269, 308, 313–315,
318–319, 340, 375, 380–382

關中東部 52, 96, 108

隴東 1, 28, 52–54, 60, 128, 132–133,
139, 143, 188, 191, 215, 225, 228,
309, 313, 318, 327, 339, 347,
349–351, 375, 386

隴海線 79, 183, 305, 308

難民 43, 45, 55

二十畫

蘇聯 17–18, 20–22, 91–94, 100, 108,
117, 147, 151, 153, 173–174, 178,
190, 230, 254–255, 261, 267, 269,
290, 299, 322, 344, 362, 382, 391

武裝擁護 150, 189, 383

對中共的援助 15, 270, 286–287,
303–307, 312, 315, 336–337, 385,
392

對國民政府的援助 91, 289, 310,
336–337, 386–387, 392

警備區 352, 366, 369–370, 387

饑荒 2, 125, 127, 131, 138, 148, 155,
162, 183, 193, 244

晚明 31, 35

延安是中國的「革命聖地」，也是曾經的中共陝甘寧邊區首府所在地。1935年至1947年，中共中央在這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實踐確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坐標系，令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搖籃」。

陝甘革命聖地的建立，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美國著名史家周錫瑞以三十餘年心血傾力研究，對其間歷史的必然走向與時勢轉換的偶然因緣提出深刻的洞察。他廣泛搜集同時代的文獻、親歷者的回憶錄和口述訪談等資料，並多次前往歷史現場實地考察，從不同角度觀察清代以來這一地區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對關鍵人物在歷史關口的大小抉擇給予客觀之認識與同情之理解；並「以扎實的研究和強有力的敘事」，解析革命聖地之所以能夠出現的種種機緣、意外與偶然，和共產革命如何在「一系列因緣際會的長期過程」中生長起來。



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1942年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榮休教授，畢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革命史等領域的研究，其代表作《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曾獲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和亞洲研究學會列文森獎，另有《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等多部影響深遠的著作行世。

封面設計：何浩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cup.cuhk.edu.hk | HONG KONG, CHINA



ISBN 978-968-237-224-5



9 789882 137224 5